

目录

1 真实与谎言(自序)

史志迷雾

3 明君与昏君

8 制谎的与信谎的

13 李世民的“直书”

20 成者与败者

25 为“坏女人”说几句

31 盛名之下

33 今人与古人

历史的教训

43 屈身事人——攀附者必走之路

49 顺非济恶——谄事者的谎言

52 溜须拍马——谄事者的招数

56 指鹿为马——高压支撑的谎言

60 口蜜腹剑——两面派的共性

64 言伪而辩——盗用国家的名义

70 大奸若朴——小人的缜密

76 反咬一口——小人的一搏

谎言大观

- 强者的谎言 81
- 退让——君子不与人较真 82
- 韬光养晦——自我保护装置 87
- 以谎制谎——智慧的碎片 95
- 98
- 君子良善也撒谎 98
- 安慰——施与弱者的同情 98
- 克己——为了他人的幸福 101
- 沉默——无可奈何的选择 104
- 忍辱负重——君子的际遇 108
- 范仲淹荒政——忧天下而制谎 110
- 艺术家的谎言 114
- 奉命“创作” 115
- 所谓历史的真实 118
- 艺术的迎合 122
- 说谎的艺术家 125

目录

3

谎言之恶

- 130 谎言亡国
- 132 谎言杀人
- 136 谎言酿灾
- 142 谎言冷人心

姑息养谎言

- 147 由“哪些女人好哄”想起的
- 153 英明累
- 156 昏庸谁自知
- 161 我们鼓励谎言
- 165 “水至清则无鱼”解

我们如何制造谎言

- 169 自己欺自己
- 176 也曾制造谎言欺人
- 180 掩盖自身
- 183 自己最无辜
- 187 自怜
- 190 随潮流扯大谎
- 194 做秀

腐败仅只官与钱

- 见面会上的演说词 200
- 愤怒的背后 204
- 名人的丑恶 207
- 美言·抬庄 211

我们需要谎言

- 假如生活中没有谎言 215
- 谎言的功能 219
- 善意的谎言 224
- 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 228

谎之源

- 人的两面性 239
- 保护自己离不开谎言 243
- 我们需要人顺从 249
- 讲真话诸多不便 253
- 道德之虞 258
- 谁是小人 261
- 谎言带给我们好处 265
- 寄身与卖身 270

目录

识谎揭谎

- 275 自己到底几两重
- 279 人之常情的背后
- 283 警惕你的小辫子
- 289 你的那一份儿
- 293 别丢了尊严
- 297 揭谎者的人格

睁眼看世界

- 302 祖传秘方
- 305 且说图名
- 309 佛的庄重背后
- 311 同志与朋友
- 315 去掉一个最高分
- 319 拆台一招
- 322 强盗宰相计
- 327 理论骗子
- 331 久闻大名
- 334 大家关心你

- 338 一生经过了多少谎言(后记)

真实与谎言（自序）

既然“人生惨淡”是个普遍的体验，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况中呢？生命可贵，万事还没开头就已经老了；情义无价，却又能获得几许？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不少，可落实到自己头上时，上帝却总是那么吝啬。命运不能让世界尽善尽美地展现在面前令人叹息，人生难以事事如愿令我们伤心。

所有不如人意的世事中，谎言占了生活中的大头。

谁都企盼能够看清前面的路，不幸前途总如雾中看花，似真似幻；结交几个真情相扶的朋友是每个人的心愿，可是，“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成了人们长久的叹息，更可悲的是短短几十年人生旅程中，谎言的重创让多少人死难瞑目。被出卖，被欺骗，被利用，被侮辱……家破人亡的悲剧没少上演，笑脸掩藏着心灵创伤的更多。这些，都是组成人生沧桑的原料。虽说是非烦恼大多自取，但所有诱使我们自觉落进别人陷阱的，无一不是令我们毫无防备的表面现象，这些表面现象具体表现出来的，又无一不是好听的或是能够令我们激动的假话和假相。

俗言：“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在帮人家数钱。”这真是令人酸

鼻的寓言，但这寓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你在自称平价的商场买东西，真的就比别处便宜吗？你买的名牌，真的就名副其实吗？害病住院，重复收费或是乱加价已不是什么新闻，可你却被蒙在鼓里；吃的饼干或其他食品，怎能保险他是用食用油做出来的？看歌星唱歌，那脖子上的青筋暴露原来是做出来的，他们是在假唱；名片上印的“国家一级”等头衔，未必名副其实。即使在你的身边，向你微笑的未必是你的朋友；给你致命的一刀的，等你明白是谁时，你将会大吃一惊；围着你转的，未必是要真心关心你的知己；拍胸保证说要提拔你的，难保不是出于他一时策略的需要……越是信誓旦旦的许诺越是令人怀疑，这已是现在人们的共同疑虑。看报看电视，不多久以前还让你感动得眼涩鼻酸的典型，原来是个假的；于是在看真正的好人好事时，我们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担心其中有诈。到处有承诺，越是承诺得彻底的地方越是让我们不放心。行政单位承诺公事一定公办，医院承诺实行人道主义不收红包，卖药的承诺不卖假药，法院承诺依法办事；没贪的就该有人送锦旗……这些所谓的承诺或“好干部”的新标准其实已经是笑话了。

谎言如此之多，又如此地可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大半精力花在探求真实上。然而真实竟比沙里淘金还难。一个人在向你讲他悲惨的遭遇时，你怎忍心怀疑他是撒谎？他说爱你并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时，你怎能凭空怀疑他是做戏？一个朋友向你借钱急用时，你怎会怀疑他跟你交朋友就是冲钱来的？等我们上当之后，才发现对方不过是个骗子。然而，新的朋友又在产生，新的选择又摆在你的面前，你却不能因为上过当而怀疑天下所有人。于是再上当，再痛苦。同样的故事不断上演，循环往复，充满了我们人生的全程。

科学的真实是存在，艺术的真实是人类心灵的共鸣，社会生活的真实是什么？尽管我们谁都不喜欢谎言，但静下心来想想看，当你面对全无包装的生活时，你就会发现，那生活竟毫无韵味。原来谎言给我们的，并不仅仅只有痛苦的体验，它有时也有疗伤治病的功效，留给了我们幻想的余地。

想想吧——

我们恨丈夫或是妻子琢磨不透，总希望一窥他或她内心深处的秘密。但如果他或她连掩藏自己都不会，事无巨细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你的面前时，你还会爱他或她吗？

你教育你的孩子说真话，不要撒谎，任何时候都不要撒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的孩子把家里点点滴滴的事情毫无隐晦地向外人敞露，你还会认为你的孩子聪明吗？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总希望弄清货主中间的利润到底是多少，因为价格是个小事，只为怕上当。假如卖货的告诉你真实情况，你会相信吗？你还愿意出那么多钱吗？

我们恨领导跟我们不说实话，往往故弄玄虚，“研究研究”和“讨论讨论再说”仿佛故意显示级差。但假如当领导的毫无遮掩，把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说个透彻，平时跟你勾肩搭背，是否还会获得我们的尊重？

我们恨群众不跟我们交心，假如他把“不喜欢你”也直白地告诉你，你还认为该同志是个好同志吗？

.....

只要平心静气并认真地看一看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原来我们对谎言的痛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态，是基于自己没有获得真言为出发点的。就是说，你可以跟别人撒谎，只是别向我撒谎。我对别人都不撒谎的，未必能够获得我们的信赖。我们认为可爱的或是可亲者的可爱可亲

之处，正体现在他或她对别人不忠诚而对我们忠诚上的。为什么要爱这个人？很简单，他或她不爱别人只爱我。由此便可理解背后的小报告为什么往往会让头儿们喜欢，也可以理解过去那些君王们为什么重用佞臣了。佞臣无不是拨弄是非溜须拍马的专家。

由此还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也难逃谎言的责任。

真理不好看，同样也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试想想，假如生活中没有了谎言，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再想想，我们恼恨别人不说实话，可我们自己是否都那么光明磊落？因此当我们正视谎言时就会发现，它远不是我们凭一时愤怒所理解的那样只有可恨。

我经过了一阵琢磨，写成了这本书，但愿我的努力能够给你的生活提供点有益的帮助。

史 志 迷 雾

若干年前读过一篇外国小说，叫《断剑》。还记得其中几句话的大意：你要藏一片叶子，就要藏到树林里；你要藏一块石头，最好的地方是河边。故事内容也颇有意思。在广场上有的一座历史名人的雕像，那是一位对侵略者作战的统帅，他的手里拿了一把断剑。据说，那把剑的另一半在敌人的心脏里。孩子们向他献花，老人们面对他沉思，确实起到了教育作用。然而一位知道底细的神父却对他冷笑。他道出了吓人的秘密：断剑的另一半不在敌人心脏里，而是在统帅部下一位年轻将军的胸膛里。原来统帅要投降，年轻将军坚决不同意，于是统帅的剑就刺向了年轻的将军。战争结束了，当了俘虏的兵士们太气愤，就将统帅吊死了。回国之后，政府不能将这段耻辱公开，于是便假造起了历史，将这位投降的统帅装扮成民族英雄伫立在广场。

这是典型的谎言，它愚弄了国人，更愚弄了后人。尽管它是小说，但小说并非没有生活的依据。

“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这段话是郭沫若先生说的。我喜爱古书，几十年来读古书成癖。从不懂到似懂非懂，下的功夫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收效却甚微。我觉得古代离我们并不遥远，许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古书中找到出处，因而越不懂兴趣越浓。

慢慢地读多了，就发现了一些问题，郭沫若的这一段话开启了某根闭塞的神经，不觉恍然大悟，再细细琢磨许多古典文献，越想越感到郭老话真乃至理名言。是的，那历史只要你愿意怀疑，就可以不很费事地挑出毛病来。

我不知道古人是否真的比现代人公平，在记录敌人的历史或自己以及先祖的历史时不带偏见。但我们也是古人的后代，先祖的思想感情并非不可琢磨。我想如果我是编历史的，怎忍心把先人不光彩的一面向后人展示？又怎么甘心美化一个世仇？由此便相信，中国的历史只怕不是那么公允。每当翻阅

我小时候听爷爷说，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老祖宗能文
能武，又有钱……



本族历史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那些史籍的时候，这种褻渎先人的心思怎么都抛不开。恰好《润上闲谈》有此一说：“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岂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可见前人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长得似乎没有尽头。那远古的传说，我相信是古人们坐在火塘旁边的口头流传，一代

又一代，不知多少代以后才有了文字的记载。因此以多少千年去追溯它的源头，以文字的起源作为文明起源的依据，在我们这些并非专家的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想象。传说针对的是现实，或教育后代，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现代人不讲道德，现代人不爱学习，现代人不爱劳动等等，于是将先祖美化、夸张一番再拿出来，是至今都在流行的手法。传说在讲述者口里不断被加工，不断被歪曲，到了上书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前人对历史的评价。一个叫崔浩的古人评价古人时说：“古人有虚有实，妄言者多，真正者少。”在读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文字记载过后，我更坚定了我的认识。人抬人高与人踩人贱，同样贯穿在史籍中。每个朝代经过了数百年专制统治的所谓“史”，尤其值得怀疑。

再看那些比较实的部分，谎言竟也占着历史的绝大篇幅。成功者的阴谋变成了谋略，失败者的计策被说成了诡计；此方的忠臣义士，在敌方笔下属于死不改悔，而敌方的变节者，则成了弃暗投明的有识之士。所持的立场不同，对人的评价也就截然不同。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同样体现在史志文字中。

这些都可以用“谎言”来概括。

明君与昏君

还在读小学时候，就知道历史上几个坏皇帝：夏桀商纣隋炀帝。与他们对应的是几个好皇帝：商汤武王李世民。大概是看那些演义看得太多了，好坏在脑袋里打下了刮不掉的烙印。直到人老了，才明白那些所谓的历史有假。

修宫筑墓，是昏君的两大罪恶。我曾以为，那些糊涂的帝王就是修宫殿修坟墓亡了国的。夏桀的瑶台琼宫，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显仁宫……都成了他们的罪恶例证。后来我才留意到，英明的皇帝同样没能够免了这些工程。亡国之君的这些工程都是劳民伤财，开国之君的这些工程是否就不是劳民伤财呢？这么一想，才知道那些例子不过是整臭对方的材料。汉武帝的坟墓不比秦始皇的差，未央宫也未必比阿房宫规模小，只因一个倒了一个没倒，历史给他们的结论也就不一样。

远古的史籍太远，不可能挑出许多疑问，但离我们近的文字多了，终于可以揭开那黑暗帷幕的一角。

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英雄的英雄眼光，就在于顺潮流而动。个人的能力再强，也难以突破这个大框架。四百年前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即位时天下就已经是千疮百孔。这位苦命的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一番，诛杀大宦官魏忠贤就表明了他的决心。无奈命运不好，先人积下的罪孽由他顶缸，国内有造反的，关外有强敌入侵，朝中还有貌似忠厚的奸人，使他三个坛子两个盖，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面对这种局势，即使秦皇汉武再世，也未必能够有所作为。虽说他的猜忌心过重，上了许多人的刁当，但他的个人品质未必就比李自成更糟糕，最终却不免含恨上吊在煤山。据说他死前亲自杀了孩子，在对女儿下刀之前并有一句让后人痛心的话：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在帝王之家。

与他同时的李自成呢，因了后人对“农民起义”的肯定，这个人也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正面的形象。但根据透露的一些资料来看，此人起义的目的也不过是“取而代之”罢了。他对下层军吏制定的纪律十分严厉，口号也提得极具煽动性，他们自己却在有了一些势力之后，就争分夺秒地享受奢华。兵士们

敬慕仰望的大帐深处，是见不得人的荒淫生活，政权还没有到手，就已经勾心斗角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攻占北京短短的时间里，就有了那么多让人遗憾的腐败记录。

如果不是清军这个“第三者”插足，让李自成坐稳了天下，我们就看不见真实的崇祯和真实的李自成了。可以想象，在李自成的史官们的努力之下，那厚厚帷幕后面的腐败和刀光剑影，都将化为没日没夜的操劳或多少警句哄骗世人和后人，假如他姓李的能够有数百年天下，那就更不得了；而崇祯则是跟夏桀商纣一样被贬成小丑了。

另一个现实的例子，便是最近出土的数万具汉代缺胳膊断腿的尸骨，对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的德政记载提出了疑问。

在吕后专政之后，刘家的遗老遗少们迎来了汉文帝刘恒。大家痛恨吕家的专权，现在皇位重新回到刘姓人手中，他们如劫后余生，看刘恒从头到脚都是舒服的。由他们来写历史，今天皇帝所做的一切，都与吕氏当政对照，笔下对吕后自然没有好话可讲了。

史书说文帝掌权的那时候，“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禁罔疏阔，刑罚大省”。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吕后掌权的时期吏不安其官，民不乐其业，少数人控制朝政，刑罚很滥也很严的。为了证明汉文帝的不错，还拉出个女孩子做样板。那个女孩子叫缇萦，父亲获罪，她没有兄弟帮忙拿主意，只有几个姐姐，她便陪着父亲上京城，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肉刑太残酷了。文帝读了这封信大受感动，因此废除了肉刑。“刑罚大省”，其中就有这个女孩子的作用。

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即位，“文景之治”就是说他们父子两人当皇帝四十年那段历史的。文帝废了肉刑，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为了证明景帝更不错，便露出了文帝在世不

便说的部分：“文帝除肉刑，加笞，率多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帝时代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世。刘恒虽说废了肉刑，也只是从大面上走了过场，将认为犯罪该死的还是打死了。其实这比一刀了结生命更残酷。况且，文帝时代的黑暗仅只于此吗？往深处说肯定是不行的。

景帝即位的第一年，就诏令减笞法。“自是死刑既轻，生刑又轻。”轻到什么程度？轻到了“民易犯之”的地步。

然而最近出土的数万具缺胳膊断腿的白骨，正是文景时代的遗产。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如何死的？翻遍史籍，都找不到这些尸骨的出处，它让我们感到，历史典籍欺骗了我们！他们杀人不少，而且极端残忍，但史籍上却没有记载。“死刑既轻，生刑又轻”的结论从何而来？原来写史的也认为杀那么多人不光彩，其中记的全是对他们涂脂抹粉的部分，这段黑暗的历史显然被掩盖了。那个所谓的缙绅，不过是装点皇帝门面的道具而已。

倒是被推翻的前朝遗事，被发掘得充分，而那发掘却是用来为取而代之的王朝作反衬的。

要击倒一个人不容易，将一个人在众人心目中击倒就更难。最有效的办法是先将人搞臭，激起民愤再说。昏君们的昏无非具备昏庸、荒淫、残忍这些特性，具体例证是任用小人，沉湎酒色，然后听信馋言诛杀大臣，不恤民情，枉杀无辜等等，这些劣迹正是世人所痛恨的。用这些材料将人的尊严和人格剥夺干净，然后就证明了不取而代之就不能平民愤。周文王周武王灭了商，商纣王的无道就被写得淋漓尽致。汉取代了秦，秦始皇的无道也被充分发掘。唐灭了隋，隋朝的杨广也成了被人唾骂的坏蛋。杨广开运河原本是一个大手笔，运河至今仍在为两岸的人民造福，可谓千古绝唱。可是唐朝的史官们将

他开运河说成是只不过要到江南游玩，一笔抹杀他对这条经济命脉的功劳。好事也被诬为坏事，那么坏事也可以制造成好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人而异。如果这事出现在唐太宗名下那将如何？

看历史是怎样记载夏桀与商汤的吧。

夏桀，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据说他的罪恶有两方面：被美女迷惑和诛杀大臣。这两方面其实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美女。美女让他不思进取，美女使他听不进忠言，也是美女让他耗尽了国家财力。有人进言，就被他杀了。

这个美女妹喜，是他在伐有施氏时弄到的。夏桀喜爱妹喜，对她言听计从，便开始了穷极奢华。先为她盖起了琼宫、瑶台，为了让她高兴，又说他制造了“肉山、脯林”。这个“宫”和“台”究竟什么样子，有多大规模，后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自然不敢乱猜。将肉堆成山，将脯树成了林，是海拔多高的“山”？是多大面积的“林”？是夏天还是冬天？夏天肉臭得快，冬天又太寒冷，挂了给谁看？这些都模糊着。如果那山那林具有很大规模，相信商王朝的史官们是不会遗漏的。再说帝王之家用酒肉摆阔，也真是太无见识。这倒更像是穷人的阔气。穷人摆阔是给穷人看的，皇帝摆阔是为给谁看？这还不算，他的酒池可以行船，糟堤竟然堆了十里长。即使十里的糟熬出的酒也未必能够行船，无论是多大的池多大的船。“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这三千人都是什么人？这倒更像是在招待贵宾，偶尔干过那么一次。即使如此，以那时候的生产力，和他所管辖的面积来计算，这种奢侈显然被夸大到了荒唐的地步。据传大禹之时天下有万国，到汤时诸侯也有三千多，夏桀所辖面积实在有限。

史籍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举多了也无意思。但这点例

子已足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谎言构成的历史掩盖了成者的罪恶，抹杀了败者的一切，也愚弄了后人！以此类推，被掩盖或被粉饰乃至被丑化的到底还有多少？心怀疑虑，历史便越来越模糊，昏君与明君的定位，实在不敢轻信。

制谎的与信谎的

夏桀与商汤，是在新旧朝代交替中一正一反两个形象。

夏桀的无道除了上面所说那些奢侈之外，还有见人不顺眼就杀的一面。汤是诸侯，是夏桀的臣子，按他的“仁义”说法，就应该为皇帝尽职尽责，皇帝不听劝告，死也得死在皇帝的面前才是。可是他没有这样干。在夏桀沉湎酒色时，他就悄悄地占去了大量地盘，兼并了许多诸侯。据说关龙逢看见了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劝桀不要自绝于人民，被桀杀了。可是汤这个臣子在干什么呢？关龙逢死了，他派了一帮子人去大哭（不是他自己去哭），为这么件事，就被桀关了几夭。这就是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

其实他在派人去哭时，就是为夺取政权作舆论准备的。那时候，桀正在失去民心，而他正借此机会进行扩张，先后兼并了许多小诸侯国，并以仁义的面孔收买人心。他内心里未必不希望关龙逢死。关龙逢是国内知名人物，只要桀杀了关龙逢，他就有理由向桀开刀。如果那个人不被杀，他的文章就做不起来了。

奇怪的是，被他及他的后人称为杀人不眨眼的夏桀，在汤面前不知为什么倒没有乱杀人了，只将汤关了几夭又放了出来。这说明，汤说夏桀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总结是不实的。可见，在夏桀的无道与商汤的有道这一点上，双方的历史都进行

了编造。

最感恶心的还是汤那几句体现善良的祷告词。

有一天汤看见人家张网捕雀，就向上天祷告：从天上下来的，从地下起来的，从四方来的，都将落入我的网。于是他解了网的三面，只留一面，再祷告说：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就往右，想往高处去的就往高处飞，想往下的就往下。不听我的劝告的就入我的网……

那些诸侯们也许好哄，也许迫于压力要顺着他的意思转，听到这么个故事，就认为汤是个极有道德的人，连对禽兽都这么仁爱，何况人呢！于是在他当臣子时，就已经笼络起了四十多国诸侯，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

拥有强大的军队却讲什么仁爱，那仁爱就显得滑稽。这番祷告与其说那是显示仁爱，不如说是明目张胆的威胁。“不听我的劝告的就入我的网”，那意思是谁胆敢不听我的，就等于撞上了我的网！反过来说，哪个敢与他唱反调，他的那一面网就专往谁头上撒。

果然，等桀将他一放出来，他就发动了战争，那张网撒向了夏桀。

这是典型的阴谋造反，按他的标准，也属于乱臣贼子之列，应该诛灭九族的。可是因为他胜利了，谋反者也就成了正义之师，他的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汤将桀打败了，将那个独裁者放于南巢，让他猪狗不如地过了几天就被折磨死了。汤推翻了独裁统治之后，会盟各国诸侯，又演了一出闹剧。

诸侯大会上由他讲话，他在一场开场白过后，却又装模作样地回到诸侯位子上去了，那意思是说他兴兵动武的目的只不过要解民于水火，并无取而代之当天子的欲望。这个谦虚的姿

态仅是个姿态，同时也是威胁。他有兵，有力量，连天子都可以打败放逐，谁敢再跟他平起平坐？只要不听他的，就等于撞上了他的那一面网，他就会找个理由将你置于死地，那么历史上将再多一个“无道”的诸侯。于是诸侯皆推他为天子，他就这样即位了。

谁说他见网对天祷告的一手不是做戏？

可以肯定地说，这段历史是汤的子孙门人们炮制的，尽管他们找了这些拼凑的所谓善行糊弄后人，但我们还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一些作伪的东西。亡国的桀或纣无道，这是肯定的。但他们的无道是否还掩盖了什么呢？这就跟我们后来得出的经验一样，只有这个人倒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作风也很糜烂。

做假的商汤骗了当世人，那段历史也骗了读史的。不过可笑的是，他的后人竟把他的仁义当了真，到头来吃了大苦头。这个人就是宋襄公。

三千年前的宋襄公，该相信的不相信，不该相信的又深信不疑。他相信典籍加传说，尤其崇拜他先人汤的谎言，不明白那典籍背后的文章；相信楚人谎言，把人家动听的语言当真情，最终吃了大亏。

宋国是商朝的后裔，老祖宗子启是纣王的哥哥，周灭了商后，周公封子启于宋，给他一块地盘表示仁义。到宋襄公时，强大的周朝由西周而东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了，齐国国内大乱。那时候晋和秦这两个大国还没有形成，宋襄公于是便做起了称霸复国的春秋大梦。

如果没有他的老祖宗汤的传说，如果他能够识破典籍中的谎言，他也不至于蠢到那一步，去以卵击石。按墨子计算，楚国有地五千里，而宋只有五百里，只是楚国的十分之一，慢说

不能称霸，即使在列强中生存下来也是不容易的。可宋襄公偏偏想过一把霸王瘾，确定自己领导北方的地位。他的参照就是老祖宗昔日的故事。他以相当的精力研究成汤时的情况，那时汤的封地不过百里，比他现在的地盘小得多，不是也兼并数千诸侯，灭夏建国，打下江山有过七百多年的历史吗？他深深地怀念汤的武功，敬慕汤的圣德，并以典籍为依据，写下了以想象代替真实的《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他的脑子成天都沉浸在成汤霸业的想象中。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如汤。然而这位国公却并不知道成为典籍的东西是经过加工的，更不清楚汤的取天下施了多少诡计。“溢美掩恶”，汤的天下就是靠那“恶”得来的，而上了书的却将那一部分掩盖了。上了书的那部分只要用心，也能够分辨出来里头的狡诈。那哭关龙逢之死，其实是捞取政治资本；那解网对天祷告，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天晓得在夏桀的荒淫部分，有没有汤加的作料。他却以为汤真的是以仁义取天下，只要向人展示仁义，人们就会归附到他的怀抱，便死抱着老祖宗仁义的教诲不放，处处展现他大国的谦让风度。

他以小国之君的地位，跟势力强大的国家会盟，还想支配别人。楚王表面跟他虚以委蛇，背后却笑他不自知不量力，暗地里打着坑害宋国的小算盘。宋襄公被楚王耍弄却不自知，以为楚王真的跟他友好。在他要攻打郑国的时候，跟他假装结盟的楚国却背叛了他，以攻凋宋国来救郑。这时候了，他还不知恨楚王的狡猾，跟楚军交战了还讲什么仁义。于是在河南的泓水，宋国与楚国拉开了战争的架子，演了一出让宋国臣民欲哭无泪，让后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

那是冬天，宋军先排好了阵势，等候楚军的到来。楚军后

到，部队比宋军多得多。楚军向来瞧不起宋军，到得晚不说，而且部队松松垮垮。趁楚军还没有到齐，大司马子鱼看出了取胜的希望，就说，敌强我弱，要打就趁这时候打。但宋襄公不同意。他有他的理论，怎么能在人家没准备好的情况下下手呢！当年汤就是以仁义取天下的，即使老人家在世，也不会这样对待人家的。眼看楚军到齐了，但还没有排成阵势，大司马子鱼着急了，又说，这时候不打就来不及了。但宋襄公还是不同意，还是那个理论，不可以诈力取胜。他以为，所谓仁义就是打在明处，而打在明处的仗是可以取胜的。两军相峙，他的脑子里还想着汤的作为，不知是不是想感动楚军将士。等人家都准备好，他还没有开始，人家终于向他进攻了。

结果可想而知，宋军一败涂地，被楚军赶得如蚂蚁窝淋了开水，各自狼狈逃窜。围在宋襄公周围的卫士也都被杀干净，宋襄公努力挣扎，虽说没有丢命，却伤了腿。

拖着残兵败将回国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都怨他如猪一般愚蠢。

民间的情绪渐渐传到宋襄公的耳朵里，他不自我批评，仍然振振有词，以幻想出来的汤的眼光看问题，说什么君子不在人家伤处再添伤，不对人家两鬓斑白的人下手。他大概把没有排好阵式的楚军看成了老弱病残。原来他并非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也明白贻误战机是在什么时候，只不过不愿那样干罢了。他还说，我们虽然是亡国商朝的后代，但老祖宗的好品质不能忘了，不能乘人之危进攻等等。在他的心目中，他没有什么错，错在楚军不按规矩来。那一仗的第二年，宋襄公就因为负伤再加心里难受死了。到死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胜利，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用什么手段都不是问题，包括满嘴仁义的假话。可是这位愚蠢得可笑的

国君怀着仁义之心却要打仗，国家柔弱却想称霸，最终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追溯这位襄公的思想脉络，并不是不可理解。他的老祖宗汤，就是以仁义为幌子笼络了诸侯，并取得了天下。不幸襄公看不清那位老祖宗的仁义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看不清那外衣之下是什么东西，竟以为汤真的是那么仁义，只要怀仁义就会有人同情有人归附的。不料却搭上了一国的财力人力，再加自己的一条老命。汤所耍弄的花招，终于在一千多年之后，让他的后人尝到了苦果，得到了回报。

宋襄公之愚，不在对战争的错误理解，而在于相信了典籍表面的假相。假如他不是读死书，在读史时多长个心眼儿，就不至于把假话当真，吃如此大的苦头。

李世民的“直书”

明君之明，大概“明”不过唐太宗李世民了。你看他，近君子，远小人，从谏如流，常常被诤谏的大臣们弄得下不来台。唐朝从他一接手就变了个模样，贞观之治被后世传颂着。如果作为后世的参考，如《贞观政要》中记载的那些语言，不失为精辟，所举的例证也对后世有借鉴的价值。不过仔细推敲那些典籍看李世民本人如何时，也能够发现其中有诈。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搞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太子）及弟弟李元吉（寿王），当了太子。这个太子是老皇帝唯一的接班人了。过了几个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当了皇帝，是谓太宗，年号贞观。

李世民到底如何，我们只能依据《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去认识。据这些书中记载，李建成与李元吉

互相勾结，排挤李世民；李建成与父亲的后妃私通，并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那里拨弄是非；东宫蓄积三千甲兵，这是为阴谋造反作准备的；李建成准备逼皇帝让位……总之，李建成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十八岁开始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他能够团结各种力量，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讲道理，明是非；他虚心听取意见，有时甚至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认真听下去；他从善如流，让人民安居乐业。总之，两相对照，一切好处都在李世民身上，而一切恶行都让李建成和李元吉占了。

看史书，李建成和李元吉像是个流氓团伙。但史书也有抹不去的蛛丝马迹，仍可捕捉到一些东西。

李世民接班以后，诸王中不满情绪暴涨，造反作乱的不少，都被李世民镇压了。尽管这些造反的都在史籍中成了“作乱”，至少说明这些人对李建成被杀是有看法的。李建成三千兵马，这是杀了李建成以后估算的，或是按所杀的“死党”统计的数字。李建成是太子，是皇帝的接班人，即使有三千兵马，也不能作为造反的依据，更算不得一支大武装。而李世民则是军阀出身，军队势力比李建成大得多，后来充当他左膀右臂的大多是他的下级。李建成修的功课是接班以后怎么治国，那个魏征辅助李建成就是干的这个。按李世民的意思，李建成有三千甲兵就是造反的证据，而他拥有那么多兵马却是应该的。这种说法显然只顾了一头。

李世民抓住魏征之后曾问他为什么挑拨他兄弟不和，魏征叹息说，太子如果听了我的，就不是今天这个结果。这个细节之所以存在典籍中，其目的还是衬垫出李世民的大度。李元吉作为小弟不喜欢老二却喜欢老大，其中定有文章，李世民处置的办法，是将这两个都当成坏蛋一并杀掉。

按魏征的叹息猜想，李建成为什么没有听魏征的建议早些下手呢？理由无非有二：一、李建成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恋着兄弟情谊，这倒证明他并非无心无肝；二、李建成惧怕李世民的势力，这倒从反面说明他的兵马难以与李世民为敌。无论是哪一点，都可看出加给李建成的罪名有很多水分。讲阴谋，李建成还不在行，绝没有料到老二会对他下毒手，竟天真地寄希望于老皇帝偏袒；讲歹毒，他没有李世民那么下得手，大概直到一箭射到身上来了的一刹那间，才明白自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李建成的优柔寡断不但断送了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还将自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老皇帝得知兄弟不和，曾经想让李世民去洛阳定居，以避开矛盾。但李世民却哭着说，父皇年纪这么大了，他不忍心远离父亲膝下。史官记下这个细节以证明李世民是个孝子。但读书的也不都是傻子，谁都看得出来，他的杀机早就有了，所谓不忍远离膝下不过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接着他向李渊告状，说李建成准备造反。老皇帝一听大怒，准备第二天问个明白。

如果李世民所说是真的，第二天对质也不晚。可是李世民等不及了，也不敢让李建成和他在老皇帝面前对质，连夜布置死党埋伏在玄武门，第二天凌晨，等他的哥哥和弟弟上朝的时候就下手，把他们杀了。

假如李建成早有预谋，或者早对李世民有足够的认识，就不会毫无准备地上这个大当，显然他们处于被动地位，并无一点主动的准备。而自称光明磊落的李世民却打了人家一个措手不及。接着，还将两家数百口老幼全部杀了个干净。老皇帝问都没处问了。

死无对证，老皇帝不依李世民说也不行。

李建成跟父皇的妃子私通，也是这么一说而已，杀了李建

成以后，并没有看见惩办什么贵妃。倒是李世民把弟弟的妃子占为己有，并跟那个杨氏生了个儿子，以后长孙无忌怕那个儿子抢了他外甥的班，给栽赃杀害了。这个杨氏出现在典籍中，也只不过为了证明杨氏的儿子不能接班。如果杨氏不生儿子，那么典籍中就不会出现这个人物。

李世民杀人夺人妻的勾当并不仅只这一件。

贞观三年，李世民一日与侍中王_𐵄闲聊，旁边站着一个美人。李世民指着那女人说，这是庐江王李瑗之姬，李瑗杀她的丈夫霸占了她。王_𐵄当即就说，庐江王李瑗杀夫夺妻，可是你杀了李瑗，现在又把她弄在身边呢。其实他比李瑗更恶劣，因为李瑗是他的兄弟。

最有意思的还是李世民看史官记录的故事。一日，李世民向监修国史房玄龄讨教，问，以前史官记的东西都不让皇帝看见，这是为什么？房玄龄回答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为后来者戒。如果人主见了，必然发怒，所以不敢献。李世民于是便谈了他的想法，说我的胸襟和为人跟过去的皇帝不一样，想自己看看国史，知道过去的不善，为后来之戒。如何？房玄龄于是就跟许敬宗等人商量，作书的时候就剔去了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和李世民的实录部分。书成之后，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看见书中对他尽是好话，只有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事情有些遮遮掩掩，就发指示了：“昔周公诛管（叔鲜）、蔡（叔度）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今可出去浮辞，直书其事。”

在这之前，李世民还跟谏议大夫褚遂良有一段对话。他说：你知道起居注，所书的内容我能不能看看呢？褚遂良那时负责记录着皇帝的日常生活，便说，史官记的是人君言行善恶，这样才能让人君不敢为非，我还没听说过皇帝可以自己取

了看的。李世民说，我也有些不好的方面，你也记了吗？诸遂良说，不敢不记。这时候黄门侍郎黄洎插了一句：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也记住了。

天下也记住了？其实这句话并不保险。

这两段文字耐人寻味。首先，李世民何等人也，史官所记不让皇帝见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懂，却装作傻瓜模样，问不让人君看是为了什么。他跟房玄龄的巧意周旋，显然对自己的问题不太放心，同时也是对这些臣子不放心，目的是要看看他们怎么记他这个皇帝的。他是“最高”，大家吃着他给的俸禄，他的话怎敢不听？于是，房玄龄就跟许敬宗几个编造起了假历史，书成之后让李世民亲自过目。

李世民看了那本书，发现没有什么毛病，就放心了，没有发火，只是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政变提出了意见。那段文字显然肯定了他政变的正确性，大概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否定得不够彻底，对他下刀绕了许多弯子。他嫌太隐晦，就说，直接写吧，实事求是地写。“史官何讳焉？今可去浮辞，直书其事。”

这个指示其实已经定了调子。老房跟许敬宗捣的鬼无疑是顺着毛摸的，李世民觉得观点没错，但嫌不够明显，才不得不下指示。他的指示就是说，我杀兄弟跟周公杀管蔡、季友杀叔牙的性质一样，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这个意思表达得还不够充分，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呢。所谓“直书其事”，就是“实事求是”地把他往高处拔。

他不是起初连史官记的东西不能给皇帝看的道理都不知道吗？这时候却一改装糊涂的面孔，懂的东西比哪个都多。

历史就这样在“实事求是”的幌子下被篡改了！

这段文字之所以透露出来，其目的还是要歌颂李世民的大人。大量。大唐统治数百年，许多被歪曲的事实成了正史，即使

有愤怒的，有真正的直笔，也被这几百年给封杀了。后人依据的贞观史料，皆从房玄龄、许敬宗等人手里出来的。

郭沫若先生的那番话放到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房玄龄是知者，不敢谈也不愿谈。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门客中，认得字的都掉了脑袋，想谈也谈不成了。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想想不便谈的知者和不必知的谈者，其中的道理自明。

一部《贞观政要》，说的尽是好话。即使好话，中间也还是有掩盖得不够严密的地方。比如某一年，李世民被宇文士及恭维了几句，李世民当即斥道：“魏征常叫我远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现在我怀疑就是你。”从字面上看，李世民的确不简单。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帝王，能当面给了拍马屁者一嘴巴，可见是个不爱阿谀奉承的。

可是在另一场合，李世民的表现却不是这样。虞世南也拍马屁，上了一篇《圣德颂》，李世民却和颜悦色地说：“你把我说得太高了，如果我能够慎终如始，你的这篇文章可以传之后世。不然，恐怕后人就要笑话你了。”为了报答虞世南的好心，李世民给这位作者总结了五大优点：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虞世南与宇文士及两人都拍马屁，比起来宇文士及的马屁拍得太低级了些。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李世民的光明磊落是怎么回事了。

即使宇文士及不拍马屁，李世民也不会喜欢这个人。李世民当面斥责他时的那份厌恶，真是活灵活现。低级马屁还有没有？有的。但拍马屁者所得的待遇大不一样。

某一日群臣在一起，李世民叫大家说说他的缺点，点名要

他的舅子长孙无忌开头。这位长孙无忌是这么说的：“陛下武功文德，我们要顺从都来不及呢，哪有什么过失可说。”李世民并没有像对宇文士及那样色严辞厉，却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原来，不是谁的话说得好与不好，而是看说话的这人他喜欢不喜欢。

另有一次宴会上的遭遇可以作为佐证。

有次李世民设宴招待近臣，大概心情愉快，他让长孙无忌嘲笑欧阳询。长孙无忌来得快，马上作了几句顺口溜：“耸肩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教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以为天子高兴，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也来几句嘲笑长孙无忌：“索头连背暖，完裆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团团。”这本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且是李世民开的头。此时见舅子输了，李世民马上就变了脸色，斥道：“欧阳询，你就不怕皇后听见吗？”

将这几段文字拈在一起比较一番，就明白了李世民在宇文士及面前的大义凛然须打折扣。那个宇文士及自找无趣，当然用不着替他抱屈。可悲的是史官只拣帝王好的东西记，而后辈人却断章取义地信。

看看李世民这么几段精彩的插曲，也就管窥到了贞观年间的许多马脚。这个英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的独特，而在于让门人整理出了他的那么多语录。好话记下来了，混账话听见只当没听见；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也有理。只有今天的理跟明天的理产生了矛盾时，才能一悟天机。如果照此写史，夏桀商纣隋炀帝也未必就不曾说过几句人话。

还有重要的一点：在李世民当政的许多德政事例中，很明显地看出他时刻为玄武之变的作为心不踏实。在他那勤勤恳恳礼贤下土的作风背后，焉知没有含冤兄长和弟弟的阴影笼罩！

另一个人物魏征水涨船高，在贞观年间的记载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跟李世民的勤政一样，在那不顾死活的诤谏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他的复杂心情。李建成的阴影并未舍他而去，唯有一心为公冒死慷慨陈词，才能洗刷自己背主求荣罪过的污点。苍天不负苦心人，他办到了。

成者与败者

“成则王侯败则寇”，这句中国民谚对历史的总结太好了。许多定律皆是谎，倒是这句话说在实处。

历史只认赢家，还不仅仅只归纳了成败双方在世时的地位与待遇，更在于历史上的记载，如上面所说李世民兄弟，历史给他们的待遇是一个上天一个下了地狱。同样在历史书中，甚至在那么多我们用惯了的成语中，也给了双方不平等的地位。

且先看“纸上谈兵”。

战国时齐国的赵括，名将赵奢的儿子。他自幼熟读兵书，在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的兵家知识，时刻想带兵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气。齐王认定他是块材料，便让他做了大军的统帅。不幸跟秦国的白起一战，四十万大军全部毁在他的手里。于是，脱离实际空谈的典故“纸上谈兵”，就由他顶了几千年，并还将继续顶下去。

这件事认真一想，颇有空子可钻。

纸上谈兵乃理论修养，无论带兵还是其他行当，总有一个理论学习的过程，今天世界上无处没有学校，无不是为培养各种人才而开设。在实践之前先作理论的准备，没有人说它不对。那种“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搞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赵括没领过兵，不在纸上谈兵到哪里去

谈？书生意气，皆是纸上谈兵。若说纸上谈兵不足取，那么赵括并非纸上谈兵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齐桓公见管仲，不是谈了几天几夜吗？张良在下邳得了一部兵书，假说是太公兵法，跟刘邦谈，史书上说刘邦一听就懂，而别人听了却不知所云，也是谈了几天，刘邦连门都没出。韩信在拜将之前是个无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战争，唯一的一次战斗是屠中少年要跟他打一架，他自知没有还手之力，竟从人家胯下钻过去了。让他带兵更是一部险棋。后来的诸葛亮不但自己没有带过兵，他的祖宗几代人也跟带兵不相干。跟刘备隆中对时，他才二十六岁，也是纸上谈兵。诸葛亮打第一仗，关云长和张飞都信他不过，怀疑的根据就是他只会纸上谈兵。《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更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投奔吴王之前，为了得到魏国的信任，他杀过自己的妻子，可谓道德记录也不好。孙武用吴王的爱姬们布过阵，闹了许多笑话，还杀了两个吴王最爱的美人儿，“美人布阵”便成了孙武的亮点。假如孙武后来打仗失败了，那么用宫女布阵将是更大的笑话，“美女布阵”将是另一个空谈的典故。只不过，赵括的确打输了，纸上谈兵的污点便由他背着，而孙武的确打赢了，他的美人布阵便成了不朽的篇章。

纸上谈兵也往往是对年轻人的糟蹋。即使在现实中，有些人动不动就给谈兴正浓的年轻人当头一棒：纸上谈兵！因为赵括年轻，不切实际的过错让年龄也承担着责任，并株连着后来的年轻人。

不错，赵括是年轻，但年轻不等于代表错误。三国时候的陆逊拜将时也很年轻，他的打仗知识只怕也是来源于纸上。周瑜二十四岁经略中原，也不老。赵括的母亲反对过儿子带兵，怎知陆逊的母亲就没有反对过？陆逊跟刘备打仗也胜了，便成

了年轻人胜过老年人的典范。甘罗十二岁拜上卿，简直还是个儿童。假如他到赵国搞砸了，吕不韦将国家大事交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岂不又是一个典故？那个典故会是“家僮当大使”。

王莽篡位，因为失败，他的一切改革尝试都成了笑柄。尤其行将灭亡之时，他带着人到郊外去大哭，更是让后人笑掉大牙。但孔子到宋国传播他的思想时，被匡简子带兵围住，子路想来硬的，孔子却拦住了他，叫他唱歌。“歌，予和汝”。于是他们两个便像两个神经病人，在阵前唱起歌来了。倒也怪，“曲三终，匡人解甲罢。”现代人听这个故事，简直像一场儿戏。除了孔夫子，我还没有见过谁遇到这等危险却对一帮武人唱歌的。一哭一唱，难说谁高谁低，但人们只笑王莽，因为王莽失败了，却不笑孔子，因为孔子挺过来了。

再看“囊萤映雪”。

故事讲的是车胤与孙康勤奋学习的故事。没有灯油，抓萤火虫用布包着读书；再不就是到雪地里借用白雪的反光。这两个用来教育后代少年用功学习的故事，其实可信度十分地低。

我抓过萤火虫，然后将它们装在一个洗净的墨水瓶子里。抓了几十只，却怪，放到书跟前根本就看不清字。看不清还事小，它们一闪一闪的，弄得书上的字跟着一跳一跳的，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我不知道古人是用什么装的，据说车胤用的家伙是很薄的绢。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装萤火虫的工具上，他一定比我还差，绢再怎么薄，也比不上玻璃瓶子的透明度。能在那种条件下读书？经过那么一试验，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再就是映雪。小时读书成癖，为了躲避老爹的眼，大雪之夜我也曾将书揣到野外，躲到一个地方才拿出来。可是，鼻子顶着书，看那么两句，就再也看不清了。手冻得如刀割，要不停地哈气，脚要不停地跺，整得痛苦不堪。过后，记得的只是

天冷，至于看过的几个字，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二位的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我想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读书读忘了天黑，一本书只剩下那么几句了，放下实在不舍，便做过那种试验。二是做试验时碰巧被旁人看见，而那个旁人又要作践另一个旁人，就拖了他们二位做榜样。三是他们成名了，老人要教育自己的后代，便将捕风捉影的事加以夸张，或者干脆就是他们成名后自己讲出来的，拍马屁的就借题发挥编造一番。

红袖添香夜读书。

这是那些将知识化为权力成功的文人的风景，让历代文人们羡慕不已，也让后人以为古时的确有那么些文豪如此这般潇洒过。好长时间，我也以为古人好艳福，尤其在一边读书一边啃冷馒头的时候。待混了几十年过后，才发现那种场景大值得怀疑。文章憎命达，是历代文人的叹息。看看过去靠文为生的人们，竟无一个过得像人。李渔到处叫穷，曹雪芹常常赊酒，柳七死了连安葬的钱都没有。可是不知是谁为文人勾画了一个如此香艳的境界：红袖添香夜读书！

假如那是真的，女人们崇尚为文人添香，那又将如何？可以设想一下，房里有一群香喷喷的姑娘，她们逛荡去逛荡来，这时候你摊开一本圣贤书，读得进去吗？可能性不大。看看图书馆里，墙壁上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字：静！那时要的不是谁来添什么香，如果有人，最希望的是马上滚出去。凡是读书写作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和体验：有人到你家里来了，客气地说：“你干你的。”那时你绝对干不成你的，要么将书稿放下，要么请他走路。这还不是“夜读书”，也还不是“红袖”打搅。如果是欲望蓬勃的半夜里，如果眼里是一帮子红袖，漫

说是书，即使是电视里的惊险片，看不看得进去都还是问题。若不是做样子，定是此人生理上有毛病。在红袖中间读书跟在舞厅里做文章一样荒唐。

宋时的宋祁修唐书，有个雪天半夜里，红袖们铺好了纸，磨好了墨，生好了火，只等他老先生动笔了。他问其中一个姑娘，你在太尉家干过，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那姑娘说，饮酒作乐。于是他扔了笔说，这么好的时光做什么臭文章！于是他叫人收了家伙，饮酒作乐了。

后来我想通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艳语出现。原来读书的无不是苦巴巴的，与其说是“有过”这么个场景，还不如说是做白日梦“指望”有这种艳遇。不说古人，只说当今，不说读书的，只说红袖们，谁愿陪伴你在那里啃死书？早就去歌舞厅了。只能说，那是想当然，不是拿读书的开涮，就是冒牌的读书人，弄一群小姐在那里招摇显示，为的作践到他家去的穷秀才。

还有“头悬梁，锥刺股”。

说的是张仪和苏秦的故事。这两个纵横家因为干出了一番事业，他们刻苦读书的故事便被说得神乎其神。他们曾将书上的段落抄在自己的大腿上和破衣服上，回家再去誊一遍，这点我相信。只是对头悬梁、锥刺股的传说感到有些不可靠。试想，瞌睡如山倒，假如到了不用绳子将头发吊起来脑袋就不能立直的程度，不用锥子刺大腿就不能惊醒的地步，还能够认清书上的字，那倒是神了。再说，这一夜哪怕熬过去了，那么第二天白天呢，岂不是更糟糕？与其毫无收获地硬撑一夜，还不如去睡一觉第二天再干效果更好。

这样的例子还多，不一一列举了。中国是个只认成功不认失败的国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也在老百姓心里扎下了

根。读胜利者的典籍，须多长个心眼儿。那里面的谎言实在防不胜防。

为“坏女人”说几句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本是隋朝的臣子，跟隋文帝又是亲戚，个人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跟炀帝杨广私人关系也不错。可是他见缝插针，趁乱造反，还奸污杨广的姬妾宫人，个人品质不能说不恶劣。然而政治的争斗掩盖了个人道德的卑污，他夺了人家的国家，他的一切恶行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唐朝的史官造假，说他奸污隋炀帝的姬妾是李世民和裴寂为了让他下决心造反，将他灌醉了逼他那么干的。也就是说，他奸污人家的女人是为了天下苍生。他的污点成了亮点，这也罢了，却将人家贬得一无是处，大骂杨广个人生活糜烂，还牵连了几个美人。

中国的历史更替，总有几个女人陪伴着。旧时代的叛臣都成了弃暗投明的有识之士，倒把几个女人扔出来做了垫背的。夏桀的叛臣汤成了商朝的开国明君，而夏桀身边的美人妹喜倒成了断送夏朝的罪魁祸首。据说为了她，夏桀盖起了琼宫、瑶台，极尽奢靡。为此，夏朝的天下才被断送了。商纣王有个妲姬，据说是九尾狐化身。而真正灭商的文王武王也曾是商朝的臣子，他们倒成了代表百姓意愿的好人，妲姬却被当作替罪羊腰斩，因为商朝的天下也是她断送的。周幽王时有个褒姒，为逗她笑，周幽王不惜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周朝数百年天下化为乌有。其他还有汉成帝的赵飞燕赵合德，成帝死后她们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而自杀，唐玄宗的杨贵妃在三军的逼迫下被施以绞刑……总之，所有亡国亡身的昏君们，总有一个或几个绝色女子陪伴着。如果不是她们捣乱，那大好河山似乎都不会

那么完蛋。

这种不合道理的见解不可能哄住现代人，也就用不着多说。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不堪。

有个例子大概可以概括“女人祸国”的真相。

唐朝僖宗中和年间，黄巢起义被镇压，官兵抓了许多俘虏献给皇帝，其中有黄巢的姬妾上百（也许有夸张，但砍去一半也还有五十）。这些女子都出自世胄之家，可见黄巢也是个要过皇帝瘾的，政权还没取得呢，就专拣那些大户人家的女子挑，却不挑农家女子。他并不爱劳动人民的健康美。皇帝问那些女人：“你们都是贵族人家的子女，世代受皇家的恩典，为什么要跟随贼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说：“狂贼那么大的势力，国家以百万之众，还失守宗祧，播迁巴蜀。如今陛下以不能抗拒贼人责备一个女子，把这些公卿将相置于什么地方！”这一下戳着了皇帝的痛处，僖宗皇帝便不再问，将这上百名女子全部当街杀死了。其实这个女子骂的是皇帝，她只说“把公卿将相置于何地”，还没敢直接说皇帝自己没用。老百姓知道其中的道理，行刑之时，人们竞相向这些女子敬酒。

这个僖宗皇帝具有历史的眼光，把管理不好国家和公卿大臣无能的责任都推给这些女人，自己面子上好过，王公大臣们也好下台。杀女人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的丑恶。

将朝代的灭亡归罪于女人，跟这个故事是同一个道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的毛病凡人都有，也没有哪个帝王能够免俗。按说，好色并不是什么问题，将“色”字拉出来大作文章，真实的用意一是简单，二是欲盖弥彰。

有一位赵飞燕时代的女子，在赵飞燕姐妹两个死后嫁给了个伶人，常常对镜下泪。她的丈夫以为她为赵氏姐妹悲哀，发感叹说：“当时她们疲精力，鹜嗜欲，蛊惑之时，知道将会成

一把荒草吗？”谁知她的悲哀却不是这种宿命的考虑，而是另有原因。她说：“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问题在于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方，则为沟为壑。你怅然于荒田野草之悲，我却是抚形属影，俄然相缘奄忽……”

说的太好了！

是呀，在女人没有经济权也没有政治地位的过去，她们求得温饱或生存的唯一资本就是自身的色。“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她说的是“淫于色”，而不是淫于肉。在她看来，能够淫于色的人，皆是慧男子。那些粗鄙的男人仅对女人肉体感兴趣，并不尊重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天然丽质。唯有淫于色者，才不至于无视她们的存在。如果天下男人都不好色，对她们而言，是悲，还是喜？君王不好色，她们就是一具会说话的工具；君王好色亡国时，她们就是祸害的根源当陪斩的。

今天的人们似乎从理论上明白国家的败亡并不是女子的责任，但在斥责帝王“好色”时，是对“色”施以重笞的，仿佛有色即有罪。而好色者的毛病只不过是色引诱，罪源还是在有色的女子身上。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的这两句诗被有人解释为自责或是醒悟，如果这是姓杜的真实思想，那么他倒是醒悟了，却把那位企盼得到爱情的青楼女子蹬了一脚。

利用女子赚钱富国，是那位大政治家管仲的首创，管子成了史籍中的名人，逼迫女子卖淫却并没有成为他的污点。

还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这个被当代和后世尊为治国典范的人物，如果按好色不好色来区分好坏的话，同样也有抹杀不掉的丑恶，甚至比那些所谓的昏君们更昏。他杀弟夺弟妇，并差点儿让杨氏做了皇后。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选拔美女进宫没有停过，然而这点瑕疵也并没有影响他当“明君”的形

象。他生了几十个儿女，其中十四个儿子，还不算早夭的，公主就有二十一个，天晓得被他玩过的女子有多少。武则天因为“乱政”，才得以暴露出昔日曾“充太宗下陈”。

他的原配夫人长孙氏，在他没成气候之前就已经跟他生了几个儿女。李世民南征北战，长孙氏就在家侍奉婆婆，抚养弟弟，还协助悼念跟丈夫打仗而捐躯的人的家属。在李世民成了“开明”的皇帝之后，长孙氏就坐上了冷板凳。即使这样，她仍然协助李世民做了不少事情。她在宫中养蚕，号召命妇注重节俭；哥哥长孙无忌身居高位，她一再劝兄长辞官，因为他们属于“外戚”，不可拥权过重；李世民在宫中养马，马死了就要杀宫女，长孙氏好言劝慰，当面斥责宫女，背后设法相救；李世民要杀魏征，又是她具朝服祝贺丈夫得到了好大臣，说什么“君正则臣直”，婉言劝夫，保护魏征；得知自己要死了，太子要为他请佛道禳灾，她反对，说僧道靠不住；临死前一再嘱咐李世民不要耗费太大，一副薄板安葬就行了……

就是这么聪明贤慧的女子，什么事都看得清楚，什么事都悟得透彻，却在三十六岁时就死了。死后送给她的高帽子不少，并懿为文德皇后。但谁可怜她的贤德是用屈从换来的？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就将弟弟的后妃杨氏弄进了宫中。对丈夫的贪色，她不但要容忍，甚至亲自为他挑选美女，这样做绝非出自她的本意。李世民在她死后还专门在后宫造了一座取名“层观”的高台，每日装模作样登上去遥望昭陵，仿佛十二分不舍的模样。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跟别的女人同床共枕。

尽管做假，魏征也不以为然。他问李世民望什么，李世民说望昭陵，魏征却鬼扯，说，我没看见，我以为你望的是宛陵呢。魏征的意思是说，李世民老爹的陵墓可以望，老婆是不值

得望的。为此，李世民便撤了层观。

如果那位长孙皇后心情畅快，何致于三十六岁就死？假如丈夫是个无能的人，她至少可以得到世人的同情。不幸李世民如不落的红日，她被严严实实地遮挡在那万丈光焰的背后，永远只能充当李世民的陪衬。

李世民这个贤明的君王在后宫的行为又如何？不敢妄猜，仅就上了史书的就有好几个。除了弟媳妇杨氏，除了庐江王李瑗的爱姬，他五十岁了还有个二十来岁“贤德”的徐妃，同时又跟当才人的武则天勾搭成奸。其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本来已经许了人家，却又被选上准备弄进宫。后来经魏征的阻拦，说人家已经有了婆家，并说这样干影响太大才没有让他糟蹋。

有一次，李世民召女人，女人们到得慢了一步，他就大发脾气。还是那个徐妃会来事，写了一首诗，卖乖讨好，才过了那一关。如果李世民在女人堆中的故事被公诸于世，是否比隋炀帝更干净？未必。

李世民也许不昏，但绝对不是不淫；他也许不庸，但这方面未必有耻。

对一个女人而言，贤明的唐太宗未必就比昏庸的隋炀帝伟大！

且看一份资料，看皇帝们是如何对付后宫里的妃嫔的。五代时梁国一个叫崔灵恩的，在他所撰《三礼义宗》中详细介绍了皇后嫔妃陪皇帝睡觉的规矩。“九嫔以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九人为一夕，夫人三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为十五夕。明十五日则后御，十六日则后复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渐就於微也。……”皇后的待遇就是每月可以一个人陪皇帝睡一夜，而其他人或三个

人一夜或九个人一夜。为什么如此？古圣贤有他们的怪道理：“凡妇人阴道，晦月是其所忌。故古人君者，不以晦月及望御於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看他们考证的所谓科学行房，全然没有把女子的身体需要或生理需求考虑在内。

三千后宫事一人，而且不准干政。女人的权利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她们只是皇帝泄欲的工具。尽管人生悲惨到如此地步，皇帝荒政了她们还要承担责任，国家亡了她们还得当祭品。妹喜爱笑，褒姒不笑，妲己爱玩，飞燕好嬉，这些女孩子可爱的天性也成了罪。

关于女人亡国的论调，那些古圣贤们未必就不清楚那只是谎言。

有人说得好，刘禅在蜀国当皇帝，身边并无值得一看的女子，为什么还是亡国了？汉武帝刘彻是个既信迷信又会玩女人的高手，从小就在女人堆里打主意，却不短寿（七十一岁），二没亡国，相反还扩大了大汉的疆域。最可恶的是他决定少子接班以后，竟残酷地将年纪轻轻的钩弋夫人给杀害了。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说主少母壮，将来要危害国家。可他自己穷极奢华，用度不够就横征暴敛，带头卖官。就是这么个愚蠢而又残暴的家伙，竟是历史上威名赫赫的人物。今天我们所说的汉唐气魄，有相当一部分功劳属于他。但绝不会有人承认他这是玩女人玩出的灵感。

且将不可信的记载当真实，也拦不住后人从反面思考。对比那些“明君”们，昏君们有一点是功不可没的，那就是：他们的无能和暴虐，或者对女子的一往情深，倒使那些女子们的才气显现出来了，如西施的美艳，飞燕的灵巧，武则天的才气，王昭君的善良等等。她们如一颗颗明珠嵌在历史典籍中，

成了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明主”们一边玩弄女性，一边却又压制她们，他们的政治英明如泰山压在这些女子们的头上，让她们生时无人知，身后无人识，默默地为她们当了垫脚石。

在这一点上，明君倒比昏君们更可恶！

在这一点上，历史的弥天大谎倒成全了她们！

盛名之下

东晋时候有个卫玠，名声很大，看去看来，竟对他的盛名有些莫名其妙。卫玠，表字叔宝，祖父做过太保，舅舅王济是骠骑将军，岳父乐广做过大官，善于清言，也很有些名气。据说卫玠小时候就很不简单，十岁时读书读到一个“梦”字，便去请教乐广，问梦是什么东西。乐广回答，是想。卫玠说，人在清醒时候用脑子才是想，睡着了神形分离了，怎么是想呢？因为这个问题，便病了。后来乐广专程去解释了一番，他的病才好了。这大概意在说明，他自小就会用脑子的意思吧。

卫玠长得漂亮，“在群伍之中，有异人之望，韶齿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他“少有名理，善易老……友叹曰，卫君不言，言必入真”。可见他很有口才。刚过二十岁就做了太子洗马。后来北方战乱，卫玠和母亲到南方投靠琅琊王司马睿，到了江夏，妻子病死，征南将军山简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继室。连拥兵自重的王敦跟他一交谈，也不得不承认他才华出众。到了江东，江东人听说卫玠来了，要见他的人在街上围成墙。这么一捣腾，他的病情加重，司马睿原本要委他以重任，还没来得及任命，他就死了，才二十七岁。许多人大哭，并说，国家死了个栋梁之

才。后人说是“看杀卫玠”。

就是这么个人，竟然莫名其妙地在史书上占了个地方。竹林七贤虽说有些怪诞，但他们无不是饱学之士，都有著作问世，他们的所谓怪诞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种发泄。可是这个卫玠呢，既没看见他发表个有见地的意见，也没见他动笔写过一个什么玩意儿，当太子洗马时也没有半点儿建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炒成了国家栋梁之才而名动全国。再看看有关卫玠的活动记载，我真怀疑是那个王澄作怪。

王澄在朝为官，向来瞧不起人，《玠别传》说他“高气不群，迈世独傲”。可是跟卫玠一谈，便自称不如。一次听卫玠谈话，竟“绝倒”三次，于是便有了“卫玠谈道，平子三倒”之说。听外甥一席谈就“三倒”，至于吗？慢说王澄那样的人物，即使一般的人，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这倒有点儿像做戏。王澄还当着外人发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又，王澄一日与人同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了这么一句：“昨日吾与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侧，朗然来照人。”

看看王澄对外甥的吹捧，倒看出名堂来了。他说去说来，就是外甥长得好看，除此再无别的东西。如果卫玠有什么著作或是立过一个小功，王澄不会不拿出来卖弄。这个卫玠实在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就说他十岁关于梦的问题吧，在现实生活中，哪个小孩子十来岁的时候没提出过问题？偏偏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了不起了。至于说他的长相，也不过是个奶油小生而已，大概那时人们喜欢病态美。

原来古人也有炒作之风。

还有个郭泰，据说也十分地了不起，竟在《世说新语》里占了很大篇幅。但李贽在读了关于他的恭维之后写了一句：还要有些用。

原来欺世盗名也是自古有之。那个“璧人”的出名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因有了一大帮贵族亲戚的缘故，剥去了那张网，他还剩下什么？那个郭泰什么来头不大清楚，他的成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游弋于士族之间，贬这个褒那个，搭人家的便车获得了盛名。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物：朋友相聚，随兴而谈，忽然就有人插进一杠子，说哪个是哪个的儿子，这回恐怕要当什么长了，等等。如果在座的还有两位也对这种话题乐此不疲的，便有戏看了。这个说那人将要当什么长，那个就要说不会当某长而要当某主任，各人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卫玠郭泰之流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大约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由帮闲者们搅成的。

今人与古人

在史籍记载中，最早的部落时代才是理想的社会，“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治”，管天下的省了许多心，当首脑的动不动要把天下让给更有才能的人，许由洗耳朵的故事让后人如听天书。据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下乡访察民情时，老百姓竟然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位英明领袖。有个老头子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那些东西也可信吗？怕未必。人心不古似乎是大势，人们怀念过去，那不可追溯的过去便成了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境界。后来周公制礼、作乐、颁法度，已经跟过去“不教而化”的民风不同了。他对此说得明白：“德泽不加，君子不殍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这实际上已经跟老百姓玩套路了。

“人心不古”，“古道热肠”，“古朴”等等词汇，透露出一个消息，那就是古人胜今人，今人不及古人。翻开诸子百家的著作，大多有昔日如何现在如何的慨叹，而后来的思想家们又视他们那时候的一切为完美。总之，“人心不古”似乎是历代圣贤们永远的忧虑，人类的文明一代不如一代了。

是否古人真的就那么好，而后代都不及古人了呢？认真分析一下古今各种事情，得出的结论恐怕不是那样。且不说古代用活人祭祀的野蛮残忍，也不说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仅就说谎这一项，今人的一切花样都是师承的古人。

古今中外在撒谎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地方哪一朝代能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乃至所涉及的方面，那时的谎言堪称世界之最。一本春秋故事，谎言贯穿了全局。“连横”、“合纵”，凭的是三寸不烂之舌，而从那舌头上卷出来的，并无多少真实的东西。既然玩花枪成了富国强兵必不可少的东西，谎言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智慧了。著名的《三十六计》，简直就是谎言大赛。孙膑庞涓之间的斗智，说穿了其实就是斗谎。“空城计”，“苦肉计”，“美人计”，“反间计”，“借刀杀人”，“瞒天过海”等等谋略经典，无不是由谎言构成的。

要讲谎言之大，大不过吕不韦的“奇货可居”。他以生意人的眼光及做生意的手腕，不温不火地经营若干年，将一个国家赚给了自己的儿子，还有什么谎比这个更大？讲明目张胆，无过于赵高的“指鹿为马”。他当着满朝文武和皇帝的面颠倒黑白，硬将一只鹿“证明”成了马，还有什么谎比这个更张狂？讲系统，系统不过“三十六计”。将谎言理论化、合法化，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在那个时代，无论活命还是做生意赢利还是要实现政治野心，谎言是最直接的手段。后来的间谍战也好，世界大战也好，商战也好，战略战术皆摆脱不了《孙子兵

法》的影响。

其他阶层的人呢？在这方面也不会弱。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是《卫风》一篇中的几句。说的是有那么个人假装买丝，其实是来打某个小姐的主意的，而这种假相恰好又被那位心领神会的小姐识破了。你能说几千年前的男女就那么心清似水吗？少男少女们在爱情方面的灵慧并不比现代人幼稚。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这是《邶风》某一篇中的几句。闺房中的丑事同样不好说出口，她们思想解放的大胆程度也不比现代人更差。

曾几何时，“生活作风问题”让许多干部倒台，“思想意识问题”限定在男女交往的范畴，让许多少男少女蒙受屈辱。但几百年前的汤显祖依据生活创作的《牡丹亭》里，却把一对未婚青年的野合描写得那样诗情画意。几百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意识流”，也在那出戏里出现了。在那位小姐的梦境里，天神仙女们为他们的野合布置了一个温馨的环境，将这种几百年后称之为“无耻”的行径美化了一番。

再看勾心斗角中的撒谎吧，那也是现代人所自愧不如的。



贴你越近，杀伤力越强，一个美丽的鼻子被一张美丽的嘴巴所断送即是教训。

好色的楚怀王弄来个美人，他的爱妃郑袖气得七窍生烟，但她挡不住大王不停找新人的自由，便只好设计陷害了。郑袖凭她所处的地位和对楚怀王的熟悉，设计了很毒也很绝的一手。她先是对那个美人百般关照，其关心程度超过了楚怀王。这么一来，不但那个美人高兴，连楚怀王也认为郑袖很贤惠。时间既久，楚怀王和美人双方都将她当知心人了。终于到了时机，有一天她对那个美人说，楚王认为你的鼻子有些长，再见大王时可以把鼻子掩着。那位美人儿人美却脑袋愚笨，对郑袖的话根本没有丝毫怀疑，便信以为真，再见楚王时果真掩起了鼻子。楚王背后问郑袖，她为什么要掩鼻子？郑袖说，美人嫌大王口臭。楚王一听大怒，下令将美人的鼻子割了。

看看这位郑袖，她的说谎本领和极大的耐心远远超过了现代人。在沉醉于美人美色中的楚王面前，一般人撒谎是难以奏效的，即使爱妃郑袖也不行。如果郑袖一开始就醋性大发，她的态度令美人和楚王不放心，这一招就不可能实现，说不定鼻子被割的就是她而不是那位美人了。为割掉那个美人的鼻子，她真可谓煞费心机，有条不紊地实施着她恶毒的计划。心怀愤恨却要装笑脸，度日如年却不能不耐心等待，两边挑拨撒谎却要做得天衣无缝，这是一般人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再如三国时袁术看上了一位避难的女子，就将那女子弄到手里。他的后院已经有了若干女人，那些女人教这个女子说，将军很重人的名节志气，你见了将军就多哭，他就会越是重视你。这个女子果然按她们教的方法，见了袁术就哭，果然就得到了袁术的看重。那群婆娘见到了时候了，一起动手将她勒死扔到厕所，然后对袁术说，这姑娘想不通自杀了。袁术根据这女子平时的表现，也以为那姑娘是为了名节而自杀，命令厚葬，叹息几声而已。

历史上宫闱中使坏的并不仅仅这几个心肠歹毒的女人，还可以举出一大把例子。如赵飞燕姐妹自己不生儿子，便将怀孕的宫女一个个杀掉，武则天为了除掉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等等残暴的恶行，历代皇宫帷幕后根本就没有断过。那些有着漂亮脸蛋的婆娘们，杀人不但下得手，其心狠手辣不会比任何一个暴君逊色。而她们除掉对头最拿手的，也正是谎言。有这么几个例子也就够了，不用多举。

现在许多撒谎高手的作品，其实都可以在古代找到出处。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对比的例子：

现实中有某个村紧挨着镇，村里有某甲某乙两个人，同时看中了镇上一块地基，想在那里盖房子，等热闹了好开个门面。申请书递上去之后，就等领导如何表态了。某甲跟村头儿关系很好，而某乙却缺乏后台，大家都说，村头儿不可能公平。村头儿辟谣，说要秉公办事。某乙相信了头儿的撒谎，以为真的能够公平地考虑。村头儿为了不让村民说三道四，决定当众决定。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坛子里丢下两张纸条，谁摸到有字的就占有那块场子，没有字的就放弃。这是凭的运气，与领导无涉。两个当事人也没意见。该两个当事人摸了，头儿说，某甲跟他沾亲带故，为了公平起见，还是请某乙先摸。于是某乙伸出手去，摸出一张没字的纸条。事情就这么定了，场子该某甲得到了。

过了许久某乙才从别人那里得知，两张纸条都没有字，注定谁先摸谁就倒霉。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并没有当场抓住把柄，仅凭怀疑是不能当作事实追究的。那位村头儿的这一手可谓高明之至，既让亲戚捞到了实惠，又避了庇护亲戚的嫌疑。

但这一套把戏并不是他的创造。宋朝时候，狄青南征，所

率军队广西那边的人居多。南人好鬼，在没求得鬼神的许可之前，他们是不卖力的。于是狄青就弄了一把铜钱，在军前讲话说，如果能胜，就请正面朝上。有军官担心不能够全部朝上，劝狄青不要冒这个险，但狄将军不听，硬是将一把铜钱撒出去了。不想天随人愿，那铜钱全部正面朝上，于是狄青命令，将所有铜钱全部就地钉死，等取得胜利之后再取。因为有鬼神保佑，兵士们打仗很卖力，战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回来收铜钱时，人们才发现，那铜钱两面都是相同的花纹。

坛子里的纸条都没有写字，铜钱上两面都印着同一花纹，完全是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狄青是为国家，而这位村头儿却是为的私利。

在当今一些骗术中，骗子们也是师承的古人。有那么一个和尚，每天跑到人家牛栏那里磕头，一边流泪不止。牛主人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死了的妈变成了一头牛，还指名道姓地说就是这一家，所以他就大老远地赶来了，一见自己的母亲成了这样，他就忍不住伤心。牛主人半信半疑，问如何才能证明这头牛是他的妈，和尚说，我的妈认得我，您只要解了牛绳，就知道了。牛主人果然就解了拴牛的绳子，那头牛果真向和尚走过来，在他的光头上舐个不住。牛主人受了感动，将牛给了那个和尚。但和尚没走多远就将那头牛卖了一笔钱然后逃之夭夭。原来他的头上抹了盐水，暗地里在牧场让牛舐过好几次。

盐水在谎言中的作用不小，今人也照搬应用。

某县向上汇报说某某乡大搞养羊，已经养了多少只，并给农民带来了多少收益。领导和记者们去参观，果然见路两旁满是羊，远处山上也还有许多白色的东西，也像是羊。不过到底没有瞒过记者的眼，记者从那些羊身上的记号看出了问题，原

来那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路边的羊为什么不跑呢？很简单，原来路边的草上也都洒了盐水。而远处的山上，竟是小学生披了塑料布在林间穿行。

张仪和苏秦，可以称作说谎话的祖师爷。

苏秦，洛阳人，出身于务农兼做些小生意的家庭。张仪，魏国人，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小人物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是处处受欺负的。如果按照孔夫子所设计的社会，他们两个断无出头之日。因为孔子认为巧言令色是不仁的人，而这两个恰好学的是外交手段，靠的就是一张嘴巴。据说他们和师兄孙臆庞涓皆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学的是兵法，后来这对老朋友杀了个昏天黑地；张、苏学的是游说，后来各执一端，明为对头，暗里互相勾结浑水里摸鱼。

苏秦的家乡洛阳是周天子的地盘，从鬼谷子那里回家以后，就想着用什么办法出人头地。家里人劝他，说如果你真是有本事的话，不妨就在周国服务，既是自己的国家，离家也近些。不幸圣贤在家乡受不到尊重，周国人知道他家的底细，对这个没有地位的人物不肯推荐，更不想重用，于是他变卖家产去秦国。但秦国对游说的人不感兴趣，他再往赵国。

他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走到一个国家就说你这个国家这么强大，为什么要怕秦国呢？让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终于有人被他说动，他得到了重用。只要一个国家用他，就不愁别的国家不跟着上，于是他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游说不止，成了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物。一时间，他腰挂六国相印，总辖六国臣民，经过他的家乡洛阳时，各国使臣相送，一行车驾二十余里，周显王专门为他打扫道路，可谓得意之极。其实他的发迹，靠的还是秦国的强大，典型的狐假虎威。然而背地里，他却与张仪相约，用激将法让张仪去秦国，要张利用

秦国的力量破坏这个联盟。他心知肚明，如果没有秦国的强盛，这六国会听他这个小人物的？要保证他的地位，就首先必须保证秦国进攻的势头不减。

张仪，曾携妻子去楚国，投靠在某个人的门下。一次游玩，主人的和氏璧丢了，大家认为只有张仪很穷，定是他偷的无疑。于是将他打个半死。他的妻子见他奄奄一息，哭得伤心，但他却问，你看我的舌头还是不是好的？妻子说是好的，张仪便说，舌头是好的就不要紧。果然，他跟苏秦一唱一和，既帮苏秦耍弄了各诸侯，又帮助秦国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合纵的盟约终于失败，天下终为秦国夺去。但这一段历史故事，为后来提供的教训和经验颇多，这教训和经验大多是对谎言的总结。孙臆和庞涓，也是两个说谎专家，斗的就是看谁更会说谎。

认真想想“人心不古”的内涵，以及圣贤们为什么发如此感叹，不难找到圣贤们到底想些什么。“不罚而民勤，不赏而民治”，这种理想境界的畅想透露出了全部天机，这就是过去的老百姓老实好驯化，不管不教，他们都能自觉地听话。那些所谓的忠义之士，只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他们就可以帮你去杀人。还有那些当仆人的，主人死了仍然忠于主人，为主人的利益不惜掉自己的脑袋。尤其那些忠臣们，无论君王怎么不是东西，也能够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么一看，就看出了圣贤们念念不忘的，其实对愚民政治的向往。那些给节妇们的牌坊，对“义仆”的称谓，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有“人心不古”的慨叹，都是想驾驭别人遇到阻力后的牢骚。

历史的教训

孔子诛少正卯时数其罪状时，将作恶者归纳出了五个特征：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恶无一不跟谎言有关。心达而险，等于大奸若朴，在一副谦谦君子的外表之下，是险恶的灵魂。行僻而坚，搞歪门邪道

还有一股蛮劲，势必跟正人君子不相容，为了他们自己阴险的目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言伪而辩，显然诡辩的口才不同一般，能把正事说成歪事、把歪事说成正事的本领。记丑而博，那是专门用来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的。顺非而泽，更是为虎作伥者的特



君子同道与小人结党，观其表象有许多相似之处。

征。

古时对这种人物无可奈何，便给了他们两个头衔：奸佞、小人。奸佞小人的主要任务是害人。他们没有什么责任感，也没有什么大目标，更没有什么道德标准能够约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私欲。为了私欲去依附权贵，为了私欲去干人所耻于干的事，为了私欲去欺负弱者，为了私利设计陷害忠良，同样的道理，为了私利，出卖国家利益都在所不惜。

小人都是些天分很高的聪明人，具有一定智商的人物，有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很有造诣。只是他们的聪明永远不会用在干正事上，“小人玩人”，就对小人刻画得十分准确。

春秋战国时候，齐国一个东郭先生曾经对管仲说过，君子善谋，小人善意。“意”，是个承接词儿，善于领会、揣摩的意思。对上善于揣摩，对下狐假虎威，这是小人的两大特征；而其表现出来的方式，大多是谎言。

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用这句话比喻小人祸国殃民也十分恰当。可笑秦始皇经若干辈人的努力创建的大秦帝国，竟让一个宦官断送，唐玄宗励精图治实现的大唐中兴，也让李林甫整得一败涂地。赵高、李林甫、卢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人。他们的第一大本领就是会撒谎。

但同是小人，却各不一样，分析他们各自的特征，基本上可以包含所有奸佞的共同点。

说共性，就是他们都为了自己的私利害人害国，而且都以会撒谎著称。说个性，是他们各有各的招数，行的并不是一条路子。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特性，对我们未必就没有好处。

屈身事人——攀附者必走之路

小人并不甘心居于人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境界。但他们并无独立的人格和才气，更耐不住十年磨剑的寂寞和孤独，难以独立支撑起一方天地。要实现其野心，不能没有可依附的权势，因而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在寻找主子攀附权势者上。

看看唐玄宗时候的奸臣李林甫吧。他原本是长平肃王李叔良的曾孙，舅舅是执政源乾曜的姻家。他是官宦子弟，官场的大门总是向他们敞开着的，即使白痴，也会给他们一个地位。他初为千牛直长，后来迁太子中允。李林甫跟源乾曜的儿子要好，并托那小子给父亲说情，要求当司门郎中。源乾曜瞧不起这个人，说，郎官应该有才望，他哪是当郎中的料子！可见，李林甫小时候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再后来擢国子司业，宇文融当御史中丞的时候，引荐他同列，慢慢地在刑部、吏部当侍郎。

到他这个地位，应该心满意足了。但他不。跟所有小人一样，他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当大臣也不可能建功立业，总得攀附个权贵心里才踏实。因此他到处走门路，结交权贵，一时“朋友”遍京城。不过没有一个平民朋友。

得知玄宗皇帝宠幸武惠妃，他就在武惠妃身上下功夫，让太监转达他的意思，表示愿意让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接皇帝的班。那时已经有了太子，武惠妃尽管有宠，但要儿子当太子却不是件容易事。有人向她表达这样的意思，她自然是高兴的，也表示愿意为李林甫的晋升出一把力。他就这样攀上了最硬的后台。

他还与侍中裴光庭的老婆有一腿，这个关系不是随便拉的。裴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尽管武三思受到了严厉惩处，但唐玄宗身边得宠的高力士原是武三思家的人，旧情未断。裴光庭死了，他老婆自觉自愿地跑去找高力士，请他在皇帝面前说句话，让李林甫当宰相。高力士却没有敢开口。而皇帝那时听了萧松的话，要让韩休进相位。裴光庭老婆得知这一情况，便给李林甫出点子，让他拥护韩休，给自己的将来垫个底。韩休一当上宰相，果然不忘李林甫的拥护之恩，便对他重用了。

这个韩休对推荐他的萧松却不满意，为了排挤萧松，便称李林甫有宰相才，再加武惠妃暗地里下功夫，李林甫就这样靠投机钻营结裙带关系，并利用朝廷人与人的矛盾爬上去了。先是拜黄门侍郎，不多久又当了礼部尚书，再进而为兵部尚书。从此他就开始了他祸国殃民的生涯。

李林甫是个巨奸，他的作恶自然就被充分发掘出来了，便使我们有幸一睹他的全貌。另一些人因为身份没有到他那一步，知道的人也就不多。但小人心肠并不分职位高低，在古代一些笔记中，暴露出来的这种人物实在不少。比如明朝张居正当宰相的时候，那么多官员就跟猪狗一样不知廉耻。

张居正据说是个改革派，他的改革措施使明朝后期有了些生气，皇帝倚重，海内颂扬，于是便权倾朝野了。他的老爹过世，正是他当宰相主政期间，但他必须回去奔丧。就是这一行，让那么多的官员现出了丑态。

张居正回去时乘了一顶轿子，前面有两重杆，后面有寝室，旁边还有两间小屋，每间小屋各有一个小童服侍。抬那顶轿子要三十二个壮汉，还不算替换的。就是这么穷极奢华的享受，罪责却在真定的守官钱普身上，因为这顶轿子是这位钱老爷创造发明并奉献的。张居正所过州县，人们用象牙盘上食

物，品种超过百种，他都不满意。到了真定才说，我走了这么远，在你这里才吃了一顿饱饭。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江浙的厨子供不应求。那些官员都忽然喜欢起江浙菜了？我想不是，他们预备着，恐怕是希望碰上张居正到他们那里去吃一顿的。这位钱普大人，也因此留下了臭名。

陈瑞是张居正亲自录取的进士，当时是都御史，听说张老爷的爹死了，他就先一步往江陵跑，坐的轿子用孝布围着，还和他的手下人都披麻带孝，一进灵堂就哭得死去活来。哭过了，还要见一见太夫人，张居正的老妈不想见客，他就跪在那里不起来。老太太无奈，只好出来见一见。陈瑞见了恩师的老妈再一次地大哭不止。那时屋子里还有一位小太监，是张居正留下来使唤的，老太太大概看清了陈瑞的下流，说：“你或许盼着看他一眼吧？”陈瑞连忙拱手而拜，回答说：“公公大人使我增加了分量。”朝廷命官，面朝下时多么神圣，原来竟是如此嘴脸。

张居正到了湖北，发现有一个人以小儿子的身份戴孝守丧，一看，是楚地的地方长官。此人知道，守丧这一着比给老百姓办一辈子好事还管用，果然才几个月，这个地方官就成了巡抚，那是张居正提拔的。

有个太监魏朝，侍候张居正的老妈北上，所有经过的码头都做了大席棚，张挂着彩帐。

徐州的兵备副使林绍至，掺杂在挽船的兵卒之中，为老太太开道。

除了有名的这几个，丢人现眼的只怕还多。这些人把张居正的老爹当成了自己的老爹，我敢说，他们在给人家的爹披麻戴孝时，一定有自己的亲爹正在家里害病。他们敬的不是张老太爷，而是抓住机遇，谋求个人发展。

看这等排场，张居正好像是个孝子。但爹死了要丁忧，应该回老家守孝三年，他却借有人挽留，朝廷离不开他的名义，不肯回去了。因此被人参了一本，说他为了当官不回家守孝。侍郎李幼滋去看张居正，张居正说：“我现在要去不得去，不去吧，小人又不放过我，我还不如死。”这个李幼滋说，即使死，也去不得。另有一个张居正的门生，当着御史的朱涟拉起一副为国为民的架子，红着眼睛直着脖子大叫：

“老师受国家厚恩，应该为国家着想，你敢走我就顾不得师生之情，也参老师一本！”

这小子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面孔，玩的其实是借公殉私的把戏。

后来张居正“亲自”病了，那更不得了，百官们都为他设了神坛祈祷。每次上香的时候，官员们就一起下跪，求上苍保佑张老爷的身体永远健康，直到晚上。北边这么搞，南方也效仿，一个比一个心诚，一个比一个隆重，便互相比着不断地上香，不断地磕头跪拜。有个朝中的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向别人夸口说：“上了三次香，我都参加了。”

这些人都是朝廷命官，在那顶神圣的乌纱帽下，原来是最下作的面貌。他们当官之初，口头的宣言无不是为国为民。但看他们的表演，却没有半点为国为民的意思。无论眼泪还是戴孝的悲容，一概都是假装出来的，为了攀上一个硬后台。

宋朝一个何尚之升为吏部尚书，升了不多久就告假探亲，走的那天，几乎全体官员都去送行。回家后他的老子问他，送你的几个人？何尚之说，有几百人。老头儿乐了，说，他们是送吏部郎的，不关你何彦德的事。果然不久就有人求他要当某一官职。他叹息道：“此敝俗也。官当图人，人安得图官？”其时有个颜延之在坐，笑道：“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势，彼

势之所求，又何疑焉！”

张居正与何尚之，拖带出来的是一群小丑。其实何止这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连送小妾的都有！

事人是难以避免的，身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但屈身却不是堂堂正正的人干得出来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刻画了两个人物：刘鏞和和煦。这两个人都得在皇帝面前下跪，但这个的跪与那个的跪是根本不同的。刘鏞得理绝不屈服，和煦却可以去接皇帝吐的瓜子



圣人言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皮，跪在地下学狗叫。刘鏞是要帮助皇帝（或者是借皇帝的权力）治国安邦，在为国为民办一些有益的事情的同时，实现兼济天下的大抱负；和煦的心思是把皇帝本人伺候好，并借助皇帝捞个人的好处。

所谓屈身，它的确切含义是扭曲自己的一切而以满足主子为目标。身体发肤，父母家庭，人格道义，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都在“屈”的范围。

小人的计谋并不高深，只要拿自己不当人就行。主子需要拐杖，他就当个拐杖；主子需要走狗，他们就充当走狗。久而久之，等到当主子的再也离不开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稳固了。齐桓公身边的三个佞臣也曾被鲍叔牙赶走，但走了不多久，齐桓公寝食难安，又思念起那几个人来，于是再次将他们召进了宫。这就是齐国一个有识之士说的：“善善不能用，恶

恶不能去。”

另一些人物虽有一些本事，但凭本事爬上高位者少而又少，埋头苦干也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再者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们的本事谋生可以，用以安邦定国却不足，况且他本身并没有行得正坐得直的本性，于是一张好口才或漂亮的书法之类的小技巧，成了笼络主子的敲门砖。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在工作上无所用心，既无建树也无责任感可言，却对领导者的私人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领导者家里缺什么东西，正为什么事费神，孩子什么时候上学就业，喜欢吃什么菜，喜欢喝什么茶，是哪一天生日，喜欢什么体育运动，还有其他什么嗜好，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将拼了全力去办，而且办得十分出色。领导得个什么病，他们竟比得病的本人还要忧心。站在被伺候者的立场上看问题，自然为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感到惬意。因为自己掌管的并非一个国家，也不是私人企业，不必担心退休之后发生政变或是杀身之祸。

但这样的人对其他员工而言，却是一个大祸害。八十年代初，某地有一座磷矿正要崩塌，山上的大石头不住往下掉，场区有许多机关，还有数百人。清晨五点钟，电话打到某局请示局长，一个人接到电话竟这样回话：老头子才睡着，你们不要打搅。结果才过个把小时，大山崩塌了，数百人以及几幢楼房和几辆坐满了人的客车全部压在下面。接电话者如果就在近旁，死者的亲属不把他生吞活剥才怪。

这起事故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那个把领导者个人的睡眠看得比国家集体的生命财产还重的接电话者，其罪难逃！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那些屈身事人的人物的破坏性，的确不可小看。

顺非济恶——谄事者的谎言

翻遍史书，君子小人的成长轨迹都有规律可循。但看帝王身边，正直的大臣们常常因为跟皇帝的意见不合而争论，小人却总是顺着毛摸；他们凭着一张好口才，把本来无理的要求解释为合理，不是让皇帝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表示坚决照办。“顺从都来不及”，是他们的口头禅。如果遇到那些行为怪僻的皇帝，暴露出的鬼名堂那就更多了。

明宪宗死了，内监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只小匣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房中术单方，并且都有署名：臣安进。这个安即万安，他是内阁一名大臣。大太监怀恩大概是恨极了，带到相爷们办事的地方，给万安自己看，并问：“这是大臣干的事吗？”接着万安被免职，大太监干脆令人当众朗读，让万安汗流如雨。这个万安无德无才，就是靠这些歪门邪道爬上去的。内阁曾有人暗示，他可以就此止步，那意思就是要他早些辞职，免得日后不好看。可他说：“我万安决定以死报效国家。”原来他就是这样报效国家的。

秦朝胡亥即位成了二世，提出一个混账要求，他说，人生太短暂，好比骏马过隙，一闪而过。我想这辈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其一生。赵高竟如此回答：

“这正是贤主应该享受的！”

可见，赵高这样的人物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人民的概念，伺候好主子，然后经营自己的私利，便是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齐桓公一生好吃美味，有一天厨子易牙问他天下还有什么没有吃过，他竟然说只没吃过人肉了。这个易牙果真杀了自己的亲儿子，为主子做了一道菜！

还是看李林甫是如何笼络李隆基的吧。

唐开元二十四年秋天，李隆基在东都洛阳，秋时准备回长安。宰相裴耀卿等人说，农民收割还没有结束，皇帝动身，浩浩荡荡，将会扰得沿途农民没有办法收割，最好还是冬天回去。李林甫当面不发表反面意见，离开时却落在后头。李隆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不是有什么毛病，而是有话跟您说。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东都西都，好比皇帝的东宫西宫，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看个什么时候？假如对农民有些影响，免沿途的租赋不就成了。”

李隆基大喜，便下决心回去。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勤勤恳恳，仓廩充实，器械精良，李隆基听说后打算封他为尚书。张九龄说不行，尚书一职必须是当过宰相而且中外有德望的人当的，牛仙客本来是个使典，不能一下子越过这么多大臣居这么高的职位。李隆基说，那就实封。所谓实封，就是封他的爵号，按爵号给他地盘。张九龄还是说不行。他说封爵是封给有大功的大臣的，牛仙客所干的不过是常务，是分内事，不是大功。你要是想奖励，可以给金钱之类的东西。

在这么对答之前，张九龄曾跟李林甫商量，希望他以大局为重，跟他一起陈说厉害。李林甫也答应了。真的到了皇帝面前，张九龄一个人力争，李林甫却一言不发。这还罢了，他还把张九龄谈话的内容泄给牛仙客，于是牛仙客便跑到皇帝那里大哭，一再声明他不要封赏。越这样，皇帝越是要封赏。张九龄还是说不行。当皇帝将眼睛望向李林甫时，李林甫却说：

“天子用人，哪有什么可不可！”

李隆基听了这番话，终于坚定了信心，封了牛仙客陇西县

公，食实封三百户。

对比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显然更让当皇帝的舒服，皇帝为了让李林甫常在身边，将张九龄与裴耀卿的宰相都免了。李林甫当宰相，没有了什么左相右相，他一个人说了算。

皇帝早已经立了太子，一个武惠妃和几个小人老是在皇帝面前说长道短，要他废了太子再立一个。经不起小报告不断，李隆基心里活动了，也有了废太子的打算，问张九龄时张说，太子并无什么过错，怎么可以因为闲言碎语就废掉呢！后来李隆基问李林甫，李林甫却说：

“这是皇上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呢！”

就是他一句话，让皇帝废了太子，并在一天杀了太子并两个王。那都是李隆基的亲儿子。

太子的立废是否家事，李隆基和李林甫其实都懂，李隆基已有废立之心，不过要找个同意的人坚定他的主意；而李林甫已经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不过是要顺着推。在李林甫的心目中，社稷不社稷关他屁事，他要的是自己地位的稳固。

为了巩固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要摸清皇帝喜好些什么，将要干些什么。于是李林甫对皇帝身边的人无论太监宫女一概笼络，好东西送了不少。自然，皇帝听到的关于李林甫的为人，无不是好话，而皇帝有什么动向，也都及时地传到了李林甫的耳朵里。废太子，他的态度与张九龄的态度截然相反。

以前皇帝身边的大多是从节度边关的大将进补而来，李林甫身无一技，怕节度的大将来抢夺他的位子，居然劝皇帝用蕃将当节度使管理边关，安禄山因此管三道劲兵十四年，终于养痍成患。

李林甫不是卖国贼，更不是外国的奸细，也谈不上想篡权当皇帝。他跟安禄山并不和，跟杨国忠更是死对头，谈不上相

互勾结。但他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谓罪大恶极。在他之前的宰相不务权威，出入简从，也不怎么避老百姓，从李林甫开始，出门浩浩荡荡。因为他自知作恶太多，怕有人刺杀他。

看看李林甫的表现，身为宰相，哪有一点为国为民的意思。他睁着眼睛说瞎话，顺着皇帝的意见溜，绝对不管那意见是对还是错。他排挤迫害几位宰相和大臣，走的走，死的死，再也无人能够接触皇帝。他怕谏官们动不动跑去打搅皇帝，有一天还对那些谏官们说：

“当今明主在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服从，不要胡说八道。你们看见大殿门口的立仗马了吗？它们吃的是三品料，但只要一开口，就马上滚蛋。”

既是提醒，也是威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单独见皇帝，再也没有人上什么奏章，皇帝成了聋子瞎子。按他的意思，皇帝要什么给什么，不能够提不同意见。而且还要给主子的歪心思找出合理性来。

这样事情同样出现在今天某些人身上。有人爱吃什么，就给下面露个口风，下面会办事的就屁颠颠开着车到处找，甚至当作任务往下布置。主子爱钱，就给他送红包或者别的什么玩意。主子爱色，就给他找小姐，或者自己送上门去，时尚的说法叫“性贿”。主子爱赌博，就借“玩玩”在桌上行贿等等，花样可谓多矣！

溜须拍马——谄事者的招数

拍马屁一词来源于明朝大宦官魏忠贤。他在骑马比赛时不用鞭子，说要马跑得快，就要顺着马的习性在马屁股上拍那么

几下就成。他将对马的认识用来对付人，居然也百发百中。

“拍马”之前还有两个字：溜须。溜须就是捋胡子，人家的胡子自己不会捋吗？可有人就愿意帮人家捋。溜须与拍马，便成了小人的拿手好戏。

笼络对方，言过其实，拍马为了骑马，说到底为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在古代笑话中有这么一个：一个秀才死了，到阎王那里报到，恰好阎王放了一个屁，此秀才不失时机马上就作了一篇颂屁文章，说那个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甚至说，“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阎王大概从没有遇到人恭维他的尊屁，一听高兴，就赏了秀才一纪阳寿。一纪为十二年。秀才又回到阳世过了十二年，自己来了，走到就对守门的说，请通报一声，就说十二年前那个做屁文章的秀才到了。这个笑话是讽刺秀才的，但它所蕴含的不仅仅就是秀才，也给了阎王老子一嘴巴。拍马屁能捞到好处，这个秀才靠一篇文章就捞了十二年阳寿，可见拍马屁的重要性。

古往今来，靠颂屁文章捞好处的代代相传，有些人捞的还不少。

不过这位秀才的马屁还很低级，有些老套了。对比这位秀才，另几个的马屁就高明得多。某位学生要毕业了，临走时老师嘱咐他说，走向社会各种人物都有，你要处处小心。这位学生说，我准备一百顶高帽子，逢人就送他一顶。老师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学生讲，老师，现在像你这样不爱戴高帽子的人，社会上已经难找了。老师点头道，倒也是。这位学生出门的时候说，我的高帽子只剩下九十九顶了。

这位才毕业学生的马屁就来得很地道，只怕他的老师至死都不明白被学生耍了。可以断定，以后众多的学生请老师帮忙，对别人的要求可能一口回绝，但对这位，那忙是一定要帮

的。马屁就这么讨人喜欢。

马屁是迷魂药，让人上当却不自知。因为马屁往往跟善意的安慰和对优点的肯定是同样的表现形式，一般人弄不清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再者，拍马屁者总是在你并不防备时出现，比如这位老师，怎么都没料到学生的马屁掺杂在诚心诚意的求教中。

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还有更高明的。

“我们大王不喜欢别人拍马屁！”是天底下最地道的马屁。他以主人的代表自居，把主子想说的话抢先说了出来，既斥了拍马屁的，自己在斥别人时也巧妙地搔到了主子的痒处。得到这种药方的人不少，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你这人正直、善良——我这不是拍马屁，我说的是真的。”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拍的与被拍的都知道是什么，

偏偏坐在一起就那么谐调。



拍马屁是谎言的一种。它包含的是两个方面：拍的和被拍的。拍的是站在下风的小人，拍的目的是讨好主子，让主子对他有个好印象，然后加以利用，以获取他所要的东西。被拍的往往是主角，是身上痒需要人挠的主子。两相比较，被拍的是主导，因为拍者是投其所好，

将拍马屁的拒之门外 剩下的就一定是正直之士了。

被拍者“好”什么，拍者就会送什么。不吃那一套的话，拍马屁者就无所作为了。

容易被识破的马屁是那些没有门路和没水平的人拍的，高级骗子不会那么干。如唐朝武则天时候，人们竞相进献象征“祥瑞”的东西。洛水边有人剖开一种石头，见中间有红色的就献进皇宫，说那样的石头是赤胆忠心。中书省长官李昭德恰好碰见这一幕，厌恶地反问，其他的石头是不是要造反？这种低水平的马屁也难以让被拍者欣赏，在这些人面前，被拍者很容易做到大义凛然或浩然正气。

被拍者懵懂无知，又自作聪明，那无异于苍蝇喜欢的脓血。

考察一下拍马屁的方式方法，倒也颇有意思。送高帽子或是颂屁文章，那都是过时的皇历。送礼献寿，也只是顺便的一招。现实中的某些人更恶心，种种丑态都表现了出来。有的把人家的伤心事当成自己伤心的事，对人家的爹妈比对自己的爹妈还亲，跟人家的儿子比孝顺。什么官儿的爹妈死了，他们脸上的愁苦比孝子还凝重。有人当官才几天，回家给爹妈上坟，儿子没跪，跟着一起去的一大排倒先在一堆土前跪下了。上司病了，他们守在床前端水喂药，弄得医生护士不知谁是病者的儿子……等等丑恶表演在现实中实在不少。

拍马屁者都是有心计的人，他们只要攀上一位主子，对上对下的面孔就不一样了。他能够以主子的口吻对主子的下级指手画脚，可以擅自作主处理问题。对上则是另一副面孔，主人喜欢什么，下面就会送去什么，并不只有一种形式。

你喜欢发脾气吗？那好，他可以任你骂个够，绝不回嘴。等你事后表示歉意的时候，他却关心的是你的气是不是消了。你有个什么想法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在一片反对声中，他是绝

不开口的。等你落寞之际，他会让你坚持你的意见。你不慎铸成大错，自责时他可以来安慰你，说那没什么，告诉你那是不可避免的，任谁来处理相同的事，也不可能处理得比你更好，无论那是死了多少人还是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你有演说癖吗？他可以饿着肚子听你讲，爹妈死了都可以不顾。总之，小鸟依人式的马屁是最得主子欣赏的方法。

指鹿为马——高压支撑的谎言

秦朝胡亥当皇帝，杀了李斯，让宦官赵高当了丞相。有那么一天，赵高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头鹿牵到了朝堂之上，很恭敬也很正经地对胡亥说，我给陛下弄来了一匹千里马。喜欢玩花样的秦二世感到很好笑，便笑道，丞相你是怎么了，这明明是一头鹿，你怎么把鹿说成马了？接着再问左右大臣，这到底是鹿还是马？胡亥自以为很清醒，以为赵高若不是逗他好玩就是脑袋有了毛病。左右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沉默，有的说是马，有的说是鹿。大概争论一阵子也就罢了，这在胡亥眼里，最多算开了一个玩笑。

但对赵高来说意义就很重大了。这个谎言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明谎，赵高的这一手也堪称千古绝唱。它不同于其他谎言，因为这头鹿的背后，隐藏着他极大的阴谋。

看看赵高的人生轨迹，撒谎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他的撒谎与别人的撒谎不同，不但谎撒得大，而且很有质量。别人撒谎总有漂亮的外衣，他连伪装都不要。李贽读到指鹿为马这里也有些糊涂，批了以下这么几句话：

“赵高意欲何为？欲专权邪？篡位耶？吾所不解。”

也就是说，赵高指鹿为马的动机，让许多人糊涂。

还是从他出场时的撒谎开始看吧。

秦始皇灭了六国，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他成了这个家的家长。不幸集权倒是有了，生命却难以做到万寿无疆，他于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出游，带着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再就是宦官赵高，至平原津而病。因为他怕死，厌恶一个“死”字，左右不敢说死的问题。七月天正热时，这位独裁者死于沙丘平台。死之前，他也知道他不可能万寿无疆了，曾给公子扶苏下有秘诏。等他一死，各种花招便都出笼了。

丞相李斯怕诸公子有变，秘不发丧。知道始皇帝死讯的，仅赵高、胡亥等五六个人。七月天气正热，尸体变臭，怎么办？就买一车鲍鱼以乱其臭。接下来，赵高凭借掌管着玉玺的特殊地位，要挟李斯将秦始皇的诏书一改，说是始皇帝已经命令胡亥即皇帝位了。怕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发难，再假借诏书命令他们自杀。一回到咸阳，胡亥就即位成了二世。

秦始皇是个不好服侍的帝王，李斯却可以跟他走到终点，原因很简单，嬴政是虎，李斯是伥，嬴政死了，这个伥怕扶苏掌权没他的好下场，转而投靠了赵高这个宦官。李斯的谎言到此为止，赵高却刚刚开始。

胡亥是少子，在吃喝玩乐中长大。现在当了皇帝，认为更好吃喝玩乐，便对赵高说，人生短暂，好比骏马过隙，一闪而过。我想这一辈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其一生。赵高睁着眼睛说瞎话，他说，这正是贤主应该享受的。他要的正是皇帝不管正事，皇帝自己提出要玩个够，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为了把持朝政，赵高还建议，要加大刑罚的力度，杀尽先王功臣，任用自己的一批人马，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了。胡亥认为这主意好，于是修改律法，许多大臣及公子就在法律的名义下被杀了。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赵高得到了重用，但他并不安逸，因为李斯还当着丞相。李斯是昔日重臣，在胡亥上台问题上功劳不比他赵高小，不除掉李斯，他就难以为所欲为。他不急不躁，慢慢实施着自己的计划。第一步，将皇帝束之高阁，不能让皇帝听见不同意见。他对胡亥说，当皇帝的不能随便跟大臣见面，见面多了就没威信。只有不跟他们见面，大臣们才不敢胡说八道。胡亥要的就是有足够的时候玩乐，果然就深藏到后宫，再也不肯见大臣。李斯想见皇帝也不可能了。

赵高安排好了陷阱，第二步，就将李斯往陷阱里送。一日他忧心忡忡地对李斯说：“关东盗贼蜂起，可是皇帝却要发人力修阿房宫，我本来想劝阻，无奈职位太低，不好向皇帝进言。这是你的职责呢。”从这段话里可以得知，虽说这番话是引诱李斯上当的谎言，但他并非不明白农民起义是为了什么，将修阿房宫与关东盗贼联系起来，说明他是心知肚明的。

李斯果然就上当了，说，皇帝深居后宫不上朝，我连见面都不可能，怎么说呢？赵高就让他等着，说瞅着时机就通知他。李斯信以为真，就耐心地等着赵高给他送信。

有那么一天，赵高通知李斯，可以去进谏言了。李斯进后宫见到皇帝，却是一个尴尬的场景：胡亥正跟女人们玩花样。这显然不是奏正事的时候，但好不容易见着了皇帝面，不说也不行，就向胡亥进言。胡亥的好兴致被打搅，果然大怒，赵高便趁此机会诬陷李斯心生怨望，早已有了反心，还说李斯的大儿子为三川令，跟盗贼也有来往。就这样，李斯便下了大狱。

赵高懂狱法，知道怎样对付犯人，安排审讯者对李斯严刑逼供。李斯被整得死去活来，只好认罪。但他不想自杀，希望见到皇帝后能够申辩。他当面认罪，过后就向皇帝写申辩信，但信都被赵高截住了。赵高担心李斯有一天跟皇帝或是皇

帝派下来的人碰面翻案，就来了很毒的一手。他让手下人假扮朝中大臣，分十几批去提审李斯，只要李斯一叫冤枉就用刑。就这么反反复复，李斯以为朝中的观点都一边倒，为了少吃苦头，再也不叫冤了。有一天朝廷真的派人审案，李斯不知道前后审他的人来头各不相同，也就不说翻案的事，承认自己想谋反。皇帝的使者把李斯的情况一反映，胡亥便以为李斯真的有反心，还长舒一口气对赵高说：如果不是你洞察一切，我差点被丞相骗了。

帮助秦始皇灭六国，焚书坑儒的李斯，终于被腰斩，并灭了三族。

赵高接李斯的位成了丞相，便来了“指鹿为马”的一手。

骗子行骗，总是要制造假相掩盖真实，比如将鹿进行一番伪装打扮，假说那是千里马也未尝不可。赵高却不屑于这样干，也不能这么干。他公然地牵一只鹿上朝，公然当众撒谎，说那是千里马。骗子总是怕人家看出了谎言背后的真相，赵高却怕人家看不出真相。如果牵来一头驴或一匹骡子，反倒没意义了。他要的就是让大家看清楚那不是马，才找来一只与马的反差十分大的鹿。与其说他是在哄骗，还不如说他是在威胁。那意思是，看你们哪个敢实事求是



有时候感觉比眼睛更准确

是马，才找来一只与马的反差十分大的鹿。与其说他是在哄骗，还不如说他是在威胁。那意思是，看你们哪个敢实事求是

是。

这么一看，就清楚了赵高的用意。明目张胆的大谎背后，隐藏着探求真实的心机，那就是要弄清“敌、我、友”阵营，分清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到底有多少人、是哪些人。试想，除了指鹿为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拥护者与反对者区分得如此明白？这个从小就受了宫刑的太监，一家人都被秦始皇判为罪人，好几个兄弟也都被阉割，因此他对秦帝国怀有深仇大恨。秦始皇让他断子绝孙，他也就能够让一个帝国大厦覆灭！

屠刀摆在面前，然后征求意见，你拥护也得拥护，不拥护那就想想自己的下场吧。所有的强权政治，大概就是这种意味。这天过后，赵高对敢于说鹿的都给予了严厉惩处。

“指鹿为马”留给后人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句成语，它是一个寓言，一面可供对照的镜子，预示历史还将重演。看看自那以后的许多鬼名堂，皆是从指鹿为马中得到的启示。

在二十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每当有什么指示，全国就一致拥护，有时甚至还不清楚那指示是什么，就已经敲锣打鼓上街热烈欢呼了。还有那么多声讨“贼人”的会议，也无不是争先恐后地“坚决拥护”。后来才知道，政治骗子们借了“最高”的旗号，制造了足以让人人自畏的气氛，政治高压下的“自愿表态”，其实就是指鹿为马的变种。

还有那些大家都清楚是谎言却又不敢说破的骗局，比如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卫星，如果说有人不清楚那是谎言，似乎说不过去。

口蜜腹剑——两面派的共性

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

都是口是心非者的特点。但还是没有对李林甫总结的“口蜜腹剑”来得精炼。李林甫的作为给了人们反面的借鉴，让我们处世为人时不至于又聋又瞎。

这个人没学问，说话浅鄙，开口就让人忍俊不禁，因而他不苟言笑，给人以老成持重的假相。他表面上跟人和善，交谈时听的多说的少，而且不住点头，一副同情人理解人的样子，但背后对你下手都捅在实处。

假如他没有获取权力并以权力作后盾，将属于人中最劣者之一。权力可以将人的面貌改变，竟造就一名竖子成了一个奸臣。就是这么一个人，将唐玄宗费九牛二虎之力使之中兴的大唐帝国整得七零八落，导致了安史之乱。可他居然在宰相位子上十九年，并得到了善终。

看清他害人的手段，对今天的我们绝对是有用的。

李林甫靠攀附权贵和耍阴谋诡计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手下任用的全是出自门下的爪牙。凡没有经过他的手进入朝廷的，一概在他的排斥名单上。大臣们再也不敢正眼瞧他。左相李适之的儿子有一次请客，准备了丰盛的酒菜，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门。一个人对别人的威慑力竟到了如此地步！李林甫要将皇帝束之高阁，可是还有个李适之当着左相，跟皇帝接近很方便，就成了他的重点靶子，因此他要下决心除掉这个人。他铲除李适之的方法算得别出心裁。

李适之为人很豪爽，好交朋友，没人敢惹李林甫，他却要跟那个人对着干。为了除掉李适之，李林甫颇下了一番功夫。在李适之当兵部尚书时，李林甫就曾以不相干的事抓了五六十人，要将李适之牵扯进去。一计不成再使他计，李林甫不停地在玄宗皇帝面前揭李适之的短，说李喜欢喝酒，耽误了许多政事。经不起反复上药，玄宗于是将李适之降为太子少保。

当然，仅喜欢喝酒还不足以将人一棒打死，在这之前的许多小报告中，最致命的是关于华山金问题。

一次李林甫装作漫不经心地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采了可以富国，看样子皇上还不知道。”李适之相信了李林甫的话，也想去讨个便宜。或者以为这样可以跟李林甫对着干，就于一个适当时候向皇帝建议采华山金。皇帝大事小事都问李林甫，这件事情也不例外，就问李林甫如何看待这件事。李林甫却淡而又淡地说：

“这件事我知道很久了，但考虑到华山乃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穿治，所以没敢向您报告这件事。”

两相对照，李适之的建议实在浅鄙，而李林甫的思想就深刻得多。事情虽说不大，但对皇帝的影响却不小，尤其涉及到用人的问题，两人思想水准的反差是十分明显的。李隆基觉得李林甫不但忠心耿耿而且考虑问题很老成，便越是器重他。对比李林甫，那个李适之显然不是宰相之才，从此皇帝再也不愿见李适之了。

李适之就因为李林甫的一句话，断送了一辈子的政治前途。一朝失势，跟着的迫害就来了，李适之终于含恨自杀。

再看他如何害严挺之的。

严挺之，进士出身，姚崇、张九龄都很看重，张九龄当相时严挺之当尚书左丞。李林甫也引荐人，那是拉帮结派。他引荐了一个叫萧灵的人，此人基本上没文化，靠的投靠李林甫才当上户部侍郎。萧灵跟严挺之谈话，将“蒸尝伏腊”说成了“蒸尝伏猎”，严挺之便给张九龄提意见，问：“省中竟然还有个伏猎侍郎？”于是将萧灵赶出了朝廷，到外面当刺史去了。为此，李林甫便恨上了严挺之。

张九龄想把严挺之引进来共同辅政，要他去拜望一下李林

甫，从礼节上走走过场。但严挺之不愿与小人为伍，三年中不是公事不登门，更不用说去笼络那个人了。

但人无完人，要跟奸臣对着干，自己就必须一百二十分地警惕，不能有半点疏忽。这怎么可能？再怎么防备，也免不了有疏漏之处。严挺之有一件事情要委托蔚州刺史，李林甫就抓住这一点，让人把这事讲给皇帝和朝中各位大臣听了，结果就被赶出了朝廷，到绛州当个小官。

许多年过去了，李隆基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严挺之，问李林甫，严挺之在哪里？并说这个人有才能，可以任用。李林甫当面说去问一问，离开了皇帝就又想主意了。

从来不登失意者之门的李林甫，这天却突然出现在严挺之弟弟严损之的府上。严损之见宰相屈尊造访，不能不盛情接待。李林甫一脸谦和，谈的是过去的友情，仿佛闲暇到故人处散散心，并无什么功利事。慢慢地，话题扯到了严挺之身上。严损之大概说起了哥哥的冤枉，李林甫不说皇帝的意见，却以关心的面孔给严损之出点子，说，皇帝其实很看重你哥哥的才华，只是这么远不太好办。你看能不能要他借个名义要求调到京城来，只要能够见到圣上，肯定能够得到大用。

完全是友人推心置腹的态度，说的话假也假，说真也真。说假，是他不透露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皇帝已经问到严挺之了。说真，那就是皇帝的确看重严挺之的才华，即使对质，他的话也没有走火。想必他的表情也很逼真，严损之也就相信了他的诚意。

严损之得到这么个好消息，马上给哥哥送信，让他给朝廷写一封信。严挺之大概忍受寂寞太久了，也日夜想回京城，果然写了一封信，借的名义是自己有病，要到京城来医治。李林甫得到了这封信，拿去给皇帝看，很惋惜地说，严挺之年老有

病了，应该给他一个闲官让他养身体。李隆基听说，好半天没开口，为严挺之年老得病感到遗憾。为了照顾有功的老臣，李隆基果然就让严挺之当个闲官，却不知他们双方都被李林甫耍了。严挺之得到皇帝的圣旨，顿时心灰意冷，倒真的病了，不久他为自己作了篇志铭，死了。

李林甫以小小的手腕，玩人于股掌之中，真做到了杀人不见血腥。

通观他的这一套，不难发现，他是抓住了人的要害才得施以毒手的。他摸清了李适之的脾性，如果李适之不管他华山金不金，或者对李林甫严加防范，也不至于上这等刁当。严挺之的悲哀也是一样，假如他不忘李林甫过去给他的打击而一硬到底，或者不贪到京城当大官，也不会吃这等亏。他们对李林甫其实是有提防的，只不过稍稍眯盹了那么一忽儿，就被他打个措手不及。

凡害人者都在暗处策划，下手之前总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过程，他们如蛇蝎捕猎物，悄悄地向你靠拢，在你毫无防备时猛地出击，因而常常得逞。尤其要注意的，是他们害人并不是按常人想象的揪辫子抓错误一种方式，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分出些心思，以对付身后的暗箭。

言伪而辩——盗用国家的名义

凡是在对你大加赞颂时，那就是要杀你了，戴高帽子就是征兆——这是对唐德宗时期卢杞的总结。这个人不但杀人，而且借的是国家的名义，顾全大局的名义。

李林甫是个不会说话的，他以他的行为给皇帝造成了一个假相，以为他老成持重，不想大唐就坏在这个人手里。安史之

乱之后，国家基本上没有安宁几天，到唐德宗时，又出了一个奸臣卢杞。卢杞跟李林甫相反，能说会道，他的言语足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先看看他是如何爬上去的吧。

卢杞是御史中丞卢奕的儿子。卢奕死在安禄山刀下，临刑骂不绝口，堪称一个烈汉子。肃宗诏赠礼部尚书，被谥忠烈。卢杞的祖父、父亲和伯伯当官都很有很好的名声，到他手里就变了模样。据《唐书》载，此人鬼貌蓝色，身材也猥琐。小时不挑食，对小事也不计较，人们还以为他继承了祖上的好品质。他先后当过鸿胪丞、忠州刺史等中等官，曾经拜望节度使卫伯玉，但卫伯玉不喜欢他。后来当虢州刺史，为三千官猪问题，使他的官运有了转机。

官厅喂的猪是为官场迎来送往或重要事情准备的，谁也不敢随便处置。日积月累，积到了三千。他因此对皇帝说，虢州官猪已经有了三千，对虢州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大祸害，问皇帝怎么处理。德宗的意见是放到同州沙苑去，卢杞却说，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怎么好去害人家呢。他建议分给老百姓吃了算了。于是德宗下诏，分给虢州的贫苦百姓。这一招给皇帝留下了极好印象，德宗说，守着虢州却担心扰了别州的人民，真是宰相气度。从那时起，皇帝就有了大用此人的心思了。

过了不久，皇帝任命卢杞为御史中丞，这是卢杞父亲死时的级别。卢杞的脑袋灵活，最善于揣度上意，在皇帝面前奏的事情，每一件都符合皇帝的意思，才过一年，又升成了大夫，没过几天，又当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已是宰相的级别了。

一朝得志，便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整人的方法跟李林甫不太一样，且看他是怎么整人家的吧。

杨炎是中书侍郎，跟他一起辅佐朝政，平站在一起，就能

更多地了解卢杞，见此人除了口辩外没有才学，不愿跟他说话，在办公处吃饭也不愿跟他坐一起。卢杞就在皇帝面前说杨炎的坏话，皇帝迁就卢杞却贬了杨炎。

卢杞必欲置杨炎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大理卿严郢跟杨炎有矛盾，卢杞就将严郢提为御史大夫充当整杨炎的助手。这样，皇帝过问杨炎时，听到的就是一致的意见。他们罗织罪名，终于让皇帝杀了杨炎。

等除掉杨炎的目的达到，卢杞又因别的案子，然后又对严郢下手了。

同为辅政的张镒，既有才气，人又刚直，只是嘴巴没有卢杞会说。小人跟君子在一起总是不舒服的，卢杞就要想办法除掉此人。恰好凤翔需要一个人去替代朱勣节度镇守，卢杞见机会来了，便假意自己要去。他摸准了皇帝的态度，此时是离不开他的。他对皇帝说的话颇有煽动性。他说：

“凤翔的将校兵卒不好管，若不是宰相级的大臣和陛下的信臣，是镇不住他们的。还是我去吧。”

这就是说，必须宰相一级的人物去，如果他不能去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人：张镒。果然皇帝说不让他去。但皇帝也并没有说应该张镒去，于是他再砸一锤：

“陛下如果担心我的容貌差了三军不服，日后生变，我也不敢硬坚持。听您选择一个吧。”

选谁？到了这时候了，既然他不能去，可选的也就只有张镒了。皇帝认为卢杞的分析是对的，必须安排自己最信任而且上了宰相级别的人去。他受了卢杞的暗示，便顺着他的话对张镒说：“文武兼资，望重内外，没有谁再比你更合适了。”张镒明知道卢杞安的什么心，这时候却又没办法客套，只好接受。最后终于被叛军杀了。

建中年间，李希烈造反，攻陷汝州，朝廷已经没有办法扼制了，惟有好言抚慰，希冀造反者回到朝廷的怀抱中来。皇帝要找个人去“宣慰”李希烈一番，问派谁去好，卢杞就推荐了一个人去送死，那是大书法家颜真卿。

颜真卿此时已经七十多岁，当的是太子太师。他在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就踏入了仕途，一心为公，勤勤恳恳，跟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斗争贯穿于他仕途的主要部分；在朝中以刚直出名，获得了朝野人士的好评。颜真卿对卢杞怀有戒心，又耻于与他为伍，从来不正眼瞧那个人，因而姓卢的视颜真卿如肉中刺，早就想除掉姓颜的，只不过没有找着机会。皇帝一问，卢杞暗喜，这不是除掉颜真卿的好时机吗？

于是他说，这时候要去对李希烈晓以利害，必须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当此重任，颜真卿“三朝旧臣，名重海内”，是最佳人选。

“三朝旧臣，名重海内”，卢杞此时说的是真话，并无造假。正因为颜真卿德高望重，卢杞才要除掉他。小人对光明磊落者的嫉恨，并非那人对他构成了威胁，更不是人家伤害了他，仅仅君子对小人如阳光之于鬼魅，颜真卿的存在显出了卢杞的卑劣。卢杞从来都没有说过颜真卿一句好话，这时候倒恭维起来了。但他的真话里却掩盖着最险恶的用心。他明知这一去等于送死，也知道颜真卿是没有办法客套的，便来了如此一招。果然，颜真卿没有办法揭露卢杞的真实意图，不能不往卢杞设好的圈套里头钻。

颜真卿不但字写得好，为人也是一条烈汉子。许多大臣一听卢杞的建议就明白朝中又要失去一位好大臣，纷纷上书挽留这位元老。他一走，更没人跟卢杞对抗了。但颜真卿以大局为重，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踏上了不归路。到了半路，又有将士

请他别往那里去，但他视死如归，硬走进了李希烈阵营。在那里，李希烈让干儿子们谩骂颜真卿，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要他承认李希烈的合法性。颜真卿早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不为所动。李希烈又在住处院子里挖了个坑要活埋他。但颜真卿神色不变，说，死生我早已知道了，不要绕这么多弯子。李希烈也不得不对这么一条好汉心生敬慕。

但颜真卿最终还是没有回去，被李希烈杀了。

叛将势力越来越大，军队费用不够，卢杞出点在京城搜刮商人，还是不够，就搜刮普通老百姓，弄得长安城里做生意的全关了门。

建中四年，李希烈攻克了襄城，皇帝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发兵救援，姚令言率五千军士冒雨至京师，以为可以得到赏赐，不想给他们的竟是粗粮粗菜，于是救援的兵成了叛军，皇帝带着皇妃、太子们仓皇出逃。

德宗皇帝在奉天被朱勔围住，连吃的都没有了，只有趁夜派人翻城墙下去找点野菜。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听说皇帝被困奉天，带领将士冒雨日夜兼程往奉天赶，在醴泉一场大战，才将朱勔赶走。如果李怀光迟到三天，奉天就没有了。李怀光破贼有功，赶往奉天去见皇帝，不想离皇帝近在咫尺，却见不着皇帝一面。原来又是卢杞捣鬼。

卢杞知道这场大乱他该负什么责任，假如李怀光跟皇帝一碰头，势必没有他的好下场。在这之前，李怀光曾经对人说，要是我见了皇帝，非要把卢杞的罪恶揭露出来不可。这话被卢杞的党羽听见传给了卢杞，这时候，是绝对不能让李怀光跟皇帝碰面的。他对皇帝说了一番话，让人觉得他绝对是站在全局的立场上的思考：

“李怀光立了大功，威震贼胆，如果乘胜追击，可以一举

而定。假如让他来面见圣上，免不了要为他庆功，要给他赏赐，这些仪式很费时间，贼人就有了喘息的机会，再打就难了。现在最好命令他乘胜杀敌，收复京师。”

孤立地从战略上考虑，他的话无疑有其正确性，但正确的话包含着最险恶的用心，皇帝却听不出来。德宗当真给李怀光下命令，让他乘胜前进。李怀光转战千里，却难见皇帝一面，越想越气，干脆扯旗造反了。

在唐朝的叛臣中间又多了一员大将，这是卢杞干的好事。

看看卢杞的这几手，可谓恶毒之极。然而他的手法却让人难以戳穿，难就难在他说的全是真实情况，你永远不可能抓住他的把柄。颜真卿的确是“三朝旧臣，名重海内”。张镒也是皇帝十分信任的宰相，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个人的生死存亡怎能在这个时候计较！由此更显出了卢杞推荐的这个人没有错。而在对待李怀光的问题上，他的话也没有错，真的追究责任，都没办法给他写定性材料。

卢杞的恶毒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就在于他把持着推荐人的位置，处于主动。他对颜真卿和张镒的赞词都是事实，然而这事实虽说是真的，嘴上的恭维却是假的，其动机不是真心称赞人，而是要杀掉人。

原来实事求是也可以作为谎言的伪装。

这一套同样也在现实社会中被有些人运用，其他方面不敢说，就拿文艺战线的某些人物做例子吧。

有些专家和学者们，在单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他们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为头儿们服务的角色，那些手上握有派车分房权力的人们，借助于领导的看重而骄横跋扈，作践专家学者的事情并不少见，头儿们知道却装聋作哑。可是怪，当有些人需要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涂脂抹粉的时候，就将那些

可怜的专家们抬出来了。“著名”的这个对他的作品评价如何之高，“德高望重”的那个曾说过他的某个创意“充分地不简单”等等。

要说这些人嘴里的“著名”和“德高望重”是假话吧，却不是，因为假的专家和学者并没有利用的价值。要是真话呢？那更不是。因为在这之前的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这些著名的人物放在眼里。此时叫出了“著名”二字，绝不是对著名者的尊重，只不过是用来衬垫自己或自己的对象而已。

这“著名”是真实，但真实的背后却掩盖着谎言！

大奸若朴——小人的缜密

有人说小人并无什么学问和才气，这话不对。如秦桧、严嵩这些人物，都能做出很不错的文章，书法也都可以称为炉火纯青的。蔡京的书法甚至是北宋四大家之一。

他们有的也曾寒窗苦读，立过报效祖国的宏愿。比如秦桧在一段时间，对防止金人入侵和在施政方面，就有过一些让人称奇的谋略。我想他们在考进士时，答卷也曾有过安邦定国的设想，不然的话，考官也不会让他们过关。假如秦桧回答说将来要陷害忠良卖国投敌，假如蔡京回答说有一天要祸国殃民，能不能出考场都成问题。经十年寒窗初出茅庐的那时候，他们的文章也曾打动过考官的心弦的。

不幸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将他们灵魂深处的丑恶诱发出来，权势欲刺激起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于是将知识化为权力，爬上高位以后也不以自己的才气为国为民，而是俯视众生和社稷，挖空心思怎么玩人。世界在他们眼里变为一个狭小的球捏在手里，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人生的

大半精力就在划分对自己的“顺”与“逆”上。

小人物的谎言易被戳穿，大奸者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副谦谦君子相，平易近人，彬彬有礼，温良恭俭让，嘴里不说脏话，遇事知道谦让。然而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是绝不会被你发现的。

那被吴国打败了的越王勾践，站在越国的立场上看是卧薪尝胆，站在吴国立场上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巨奸。他为夫差尝粪，他为夫差牵马，并且把最漂亮的女人送给吴王，还将本国的最好的东西往吴国送。当他在为吴王夫差牵马让夫差出行时，吴国的人们争相一赌牵马的越王，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勾践居然面带笑容，没一点儿愠色。

夫差从中看出了勾践的忠心，可伍子胥却被勾践毫无骨头的表现吓得忧心如焚。那是只有巨奸才干得出来的事情！

还是先看秦桧的几个例子吧。

秦桧当相的时候，在太子中舍任职的程子山一日被通知去见秦桧。到了秦桧的府第，他被安排在接待贵客的内阁里坐下，等了一整天，却没见着秦桧的人。房里房外一片肃然，走又不能走，问又无处问，就在那里干等着。房里没什么东西打发时光，只有案上有一册装帧得很好的书。一翻，发现是写古圣人日星为纪的赋。看后面的落款，原来是准备考进士的秦暄所作并呈上来的。这个秦暄不是别人，是秦桧的孙子。程子山没事，只好借这唯一的一本书消遣。读着读着，他发现这些赋很有文采，也很喜欢，差不多都背得下来了。那一天招待他的都是好酒好菜，只是主人一直没出来见他。到晚上回家去，一直猜不透秦桧要干什么。

过了几天，程子山接到通知，派他去主持录取贡生秀才的考试。进了考场，考题该他出，这时候他才忽然明白了秦桧要

他去府第的意图。他只好以他在秦府读到的书的内容出了题。果然，秦暄的考卷得到了所有试官的赞赏，结果可想而知，秦暄得了第一名。

在这件事情上，秦桧做得可谓天衣无缝，比我们现在某些人物为子女捞好处的办法高明得多。他连面都没露，却比露面直接“拜托”更妙。大概那时候文人的嘴巴比现在厉害，尽管秦桧权倾内外，毕竟还有些惧怕舆论，才想了如此一招。如果程子山敢于揭露，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到时候难堪的不会是他而可能是揭发者自己了。

再看另一件事。

秦桧的老婆王氏有一次进宫去见显仁皇后。皇后在闲谈中说，最近子鱼都那么小，大的都没有了。王氏要拍马屁，想都没想便说，我家里多的是，明天给您进一百尾来吧。

王氏回家把这事对秦桧一说，秦桧顿时变了脸色。因为那时候他独揽朝政，外面进贡的先得把好东西笼络他，然后才谈得上向皇帝讨好。有的甚至忘了皇帝，眼里只有他秦相爷。秦桧到底老谋深算，心想，皇宫里都没有了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而且一进就是百尾，这不是自绝前程吗？他灵机一动，想出个很绝的主意来。他把青鱼弄了一百尾，给皇宫弄去了。那个显仁皇后一看就大笑说：“我说这婆子村，果然！”

明朝的李贽在这段话后批了一句：我说显仁这婆子村，果然！

秦桧来的这一手可谓大手笔。他不但解除了显仁皇后可能产生的疑心，而且把自己置于无见识的地位，让显仁皇后虽说没吃到子鱼，却得到了心理的满足。那个高贵女人的大笑足以说明她上了大当还不自知，而他的地位仍很稳固。若不是大奸，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大见识？

在一些零碎的古代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秦桧聪明的例子。比如有个人冒充他的笔迹假造了一封推荐信去某地谋官当，秦桧知道后，果然就封了那个家伙一个官。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说，这个人敢于仿冒丞相的笔迹，不但胆子大而且很有些水平，如果他跑到金国去了，岂不要坏大事？这说明，秦桧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也足以看出他是个有主见的人。可恨他的聪明才智并没有用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面，却用在个人的私利上，最终导致他的卖国求荣，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一切聪明的主人似乎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任用能够搔到自己痒处的佞臣。这种人物的第一大优点就是顺从，这就是“善意”。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那些无耻的角色有机可趁。这是小人成气候的外在因素。

唐玄宗委任李林甫，唐德宗任用卢杞，秦二世重用赵高，等等历史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作为被任用者，他们必有一套笼络主子的好办法。其中最拿手的就是装糊涂。秦桧送鱼就是例子。

再一个例子就是王莽。

王莽出身于豪门，靠了皇后的裙带关系，王氏一门掌握了刘氏政权的绝大部分。自从刘彻以后，天下无大事，豪门贵族竞相奢侈，至元帝时更甚。王莽的叔伯兄弟们自然也不甘落后，极尽享乐。在这种环境中，王莽却是另一副面孔出现在人前。他少年好学，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对老师和同学都极尽恭敬；儒家讲孝悌，他数十年如一日侍奉老母；伯父王凤病了，他亲自请郎中，并且守候床前，端屎端尿，喂药的时候还得亲口尝尝。伯父病了几个月，他竟然没有解开衣服睡过觉，有时连脸都不洗。对于老师和长者，他更是一副谦恭模样，每

到公休日就去看望他们，随带着羊和酒。年纪不大，他就继四位叔伯之后当上了大司马。

当了这么大的官，他还讲究艰苦朴素，主张节约。有一次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都去探望，个个都是雍容华贵，王莽的妻子出来招待客人，人们竟以为她是佣人，得知她是王莽的夫人，一时举座大惊。

他从不说脏话，很少开玩笑，启口必有章法，做事十分严谨。一度，人们以为大汉又出了一位力挽狂澜的好大臣，许多人对寄予厚望。

但渐渐地，大汉天下的大权集中到了他的手里，门生弟子遍布，玩皇帝于股掌之上。他将异己一个个排除，国家大事由他说了算。不少人看出了王莽用的是什么心思，便走的走，溜的溜。另一些傍粗腿的人却盛赞王莽的功德，连写《法言》的大才子扬雄也极尽吹捧之能事。

时机终于成熟，他撕下了那副谦虚的假面孔，篡夺了汉朝的皇位。

王莽年轻时候是否做到了做皇帝的大梦不得而知，但此人的胃口很大却是事实。他不在乎金银宝器，也不在乎小名小利，总是将好处让给别人，对人一脸谦和，一副大度能容的模样。在他谦虚的面孔之下，平常人是看不出他的用心的。这个人的撒谎手段堪称空前绝后，也不是一般人学得了的。西汉王朝，就败在这个撒大谎的人物手里。

后来有人发感叹：假如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确。如果他早死几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将会遗憾失去了一个壮志未酬身先亡的好人。那么已死的“好人”中，是否也有遗漏的奸人呢？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这样的人物。他们或许没有王莽秦

桧这么高的地位，也可能没有窥视神器的本领，但他们的居心叵测却是同出一辙。明明领导人要求大家出点子，他来一句“您怎么说我们怎么搞”。明明领导说的一句话是错的，他也连连点头。不当场指出那个错误情有可原，毕竟要照顾人的自尊心，但跟着点头就可以判他为奸！

一次在某县遇见一个当过秘书的镇头儿，他竟恬不知耻地当众说，他当秘书期间，写报告或是什么汇报材料时，常常故意写几处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那是要让领导纠正，然后“恍然大悟”的。这个人仅只是个镇头儿，假如有个机会让他爬上高位，他的作为可想而知。

大奸与大忠，在没有最后见分晓之前，善良而质朴的人们是难得将他们区分开来的。他们同样不计较小利，同样对人宽厚，同样注重学习和修养，同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对待那些贪图小利的人面前，他们的分数竟比那些耿直者更高。然而这些貌似忠厚的人物其实是最应该警惕的！“心达而险”，正是指的这种人物。

如何在纷繁的人群中区别出野心家来？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说难，是他们的外表装扮得如正人君子，说简单，是再怎么伪装，也难免露出马脚来的。这种人物有几条是共通的，第一是喜欢结交私党。只要顺从他的，无论是什么东西他都将给予庇护，你只要到他的名下，他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保你一把。庸才被夸成天才，无耻被他赞为正义。反之，君子也被他说成小人，旷世奇才也被他贬得一无是处。第二是对上的卑屈。这种人对上司不是尊重，而是依附。一般人据理不让步，这种人却可以将正确的意见放弃而屈从。只要看出这人具备这么两点，那么此人之奸就八九不离十了。

反咬一口——小人的一搏

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冤案都是小人所制造，恶人先告状，将自己正进行的见不得人的罪恶都加在被害者身上，于是冤案就形成了。那些当主子的也并不都是傻子，却往往听信了小人的拨弄，足见邪正的表现形式不好分辨。

唐朝宪宗皇帝时代的裴度是个忠臣，他是三朝元老，各位皇帝都赐给他不少好东西。临死的时候，他将所有皇帝给他的东西都还了回去，不要陪葬，也不留给子孙，显示出了一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所处的时代，是大臣们互相闹矛盾，宦官也想干政，皇帝又好神仙，是个当正直大臣不容易的年代。有一天，宪宗皇帝跟裴度谈心，说，当臣子的应该好好向善，为什么好为朋党呢？裴度对此有一番解释，当即回答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之所以有这番交谈，正是因为朝中有人互为朋党，而真正心术不正的人却对皇帝说别人好结朋党。不幸的是，有几个皇帝能够辨别邪正呢？跟他谈心的这个宪宗既好神仙又喜欢佛事，而且喜欢吃丹药。韩愈因为反对迎什么佛牙，差点儿被他砍了脑袋。最后他自己因为服了道士的药死了。在裴度之后的李德裕也说过同样的话：

“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如何辨别邪正呢？李德裕的话颇有道理：“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

小人的特点之一是依附于有权势者。他们不可能如君子一

样甘守淡泊，却又难以独自支撑起一块天地，要在世上混个人模狗样，必须依仗权势以壮自己的腰杆。他们敢于欺人，仗的就是背后的权势。“狗仗人势”的比喻，正是对他们的刻画。

但另一特点李德裕没说，那就是凌强欺弱，容不下正派的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其中最拿手的就是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翻开历史，那么忠臣被害，罪名无一不是现成的。

东汉桓、灵帝年间，曾有一次党锢之祸，就是恶人反咬的例子。那时皇帝昏庸，宦官依仗皇帝撑腰，与朝中奸佞狼狈为奸，与社会上的一帮人互相勾结，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天下被整得一团糟。比如一个黄门小太监的兄弟，就可以在外当官，无恶不作却无人敢惹。当时一批忧国忧民的忠义之臣和名士，怀着匡扶社稷的大志，奋起与他们对抗，曾给了天下人以希望。比如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就直冲太监的家，劈开他家的合柱，把藏在合柱中的兄弟搜出来杀掉了。另有妖人纵子杀人，李膺抓住了却被皇帝赦免。李膺不管那一套，照杀不误。

因为跟宦官小人形成了对抗的局面，李膺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圣贤，因而有士能够被接纳，就成了“登龙门”。容易冲动的太学学生受了他们的影响，竟传出这样的话：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度。这些没有皇帝支持的精神领袖们，却被老百姓和士子们拥护，他们对王公大臣品头论足，让公卿以下都害怕他们贬议。

宦官们受到了威胁，就唆使恶人告状，诬李膺等人为朋党，说他们以办学为名招收党羽，公然诽谤朝政，跟后来所说的反动言论差不多。

皇帝本人的思想感情跟宦官们是一致的，便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仅上了名册的就有二百多人。这二百多人皆是当时的天下名贤，素为全国各层人士所敬重。见要搜捕他们，有

的自己去了监狱，有的则逃跑了，于是便在全国通缉。

可笑的是，有接到逮捕令的官员见要捕党人，自己倒先哭起来了。还有一位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诩为川西豪杰，见搜捕的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竟感到很耻辱，自己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他也是党人。

小人就那么一小撮，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可是他们依附着皇帝，就可以让天下所有的正直之士难逃厄运。考察历代的文字狱，无不是这么可恨可气。小人善于伪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忠心耿耿的样子。武则天时期一帮子杀人不眨眼的人物得到信任，无不是借助于对皇帝的忠心。

唐德宗是个不明是非的，用了一个卢杞，引起了国内的大乱，可是他至死也不承认卢杞是个坏人。本来因为李怀光被逼造反后，朝中一致反对卢杞，才将卢杞贬到了新州当个司马。可过了不久，德宗又想将他收回来，还是因为大家反对，才没有实现。他一日跟李泌说：“卢杞这个人其实很好，都说他奸邪，我怎么看不出来呢？”李泌说，这才正是他的奸邪之处。你看得到他的奸他就不算真正的奸了。

也就在那同时，有位陆贽跟在皇帝左右，一边勤勤恳恳工作，一边苦口婆心地劝诫皇帝辨忠奸，取信于民，德宗乱中没有亡国掉脑袋，与陆贽的努力密不可分。可是一到太平时候，情况又急转直下。

卢杞走了，却又出了个裴延龄。此人无德无才，靠拉关系钻门路往上爬，当上了司农少卿。他善于揣测皇帝的意思，德宗就任命他管财政。陆贽知道此人靠不住，一再说此人不行，可皇帝被裴延龄迷惑，表面应酬陆贽，暗地里却还是任命裴延龄判度支。这个裴延龄根本就不懂财经，却专一造假，他串通老吏，另设仓库，将原库中的物资往新仓库里偷运，假说是自

己的功劳。为了让自己能有好业绩，巧立名目搜刮老百姓，在笼络皇帝的同时自己大贪特贪。他甚至说，皇帝用度应该是国家税赋的三分之一，那是皇帝的本份钱。他造假造得莫名其妙，为了诋毁前任长官，说前任管理不善，把原仓库的钱弄出来，假说从粪堆土中捡了三十万两白银，匹缎杂货也值百万。这些钱应该另辟一个仓库，供皇帝专用。

陆贄知道这家伙做假，常常当面戳穿他的西洋景。裴延龄知道，陆贄和拥护陆贄的人不除掉，就没有他们的好日子过，便反扑了。他和他的一批党羽就在皇帝面前说长道短，让皇帝明白一个道理：陆贄对我的不满，其实是对皇帝的不满。

现在已经太平了，再也不需要宰相帮他度危难了，德宗皇帝终于大怒，免了陆贄的宰相职务，给了他个太子宾客的名义。同时罢免惩办的官员一大批，都是敢于斥责裴延龄做假的正直大臣。

这还不算完。陆贄没有私交，平常时节连文章都不写。他在皇帝身边多年，深知人生旅途充满了凶险，满腹才学却不敢写诗作文章。裴延龄等人抓不住辫子。恰逢天旱，裴延龄说这是因为陆贄不满而引起的灾荒，不除掉此人，国家就没好日子过。薄情寡义的德宗皇帝便要杀掉陆贄。许多大臣苦苦求情，才让陆贄保住了脑袋，贬为忠州别驾。有个阳城带着百官守在延英殿，集体上书数裴延龄罪恶，但皇帝不听。陆贄终于死在忠州，才五十二岁。

小人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还有笼络人的手段，再加逼真的表演，是很能够迷惑人的。他们一边用谎言蒙骗他人，一边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如文革中，敢说直话的成了反革命，真正祸国殃民的家伙倒成了革命家。

谎言大观

谎言有善恶之分，也有大小之别。小孩子撒谎，大人一眼就可以识破，大人撒谎，就可以蒙骗小孩子。引申一下，大人物欺骗老百姓总有许多方便，而老百姓想在领导那里编个谎却总是容易露出破绽。我们都有上当的教训和对谎言的警惕性，却未必都有识破谎言的能力。多了解一下各种谎言的结构，可以让眼睛亮一点，即使吃亏也吃在明处。

谎言也有层次，请看——

“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是蠢才的谎言。

“我们大王不喜欢人家拍马屁。”这是聪明人的谎言。

“你一点也不显老。”这是善良的谎言。

“只擦破一点皮。”这是崇高的谎言。

“我这人最善良。”这是只有自己相信的谎言。

“祝你万寿无疆！”这是跟大家一起不用心的谎言。

“我当这个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是官样谎言。

“小坏蛋！”这是爱的谎言。

“捣蛋鬼！”这是疼的谎言。

“老子怕谁！”这是弱者的谎言。

“你赢了！”这是强者的谎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这是独裁者的谎言。

“我是小小老百姓。”这是野心家的谎言。

.....

这么列举下去还有很多，还是一步步来吧。

谎言之集大成者，莫过于春秋战国那一段历史。谎言所酿成的血淋淋的杀戮和争夺，竟在诸子的著作中成了精彩的文章，其影响的深远，以致改变了后来历史的许多事件，甚至我们语言中舍弃不掉的成语都将永远存在下去。“奇货可居”，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大谎。“指鹿为马”，堪称众目睽睽之下的明谎。“烽火戏诸侯”，是自己坑自己的谎。“破釜沉舟”，是迷惑敌人的谎.....君子的谎言是智慧，小人的谎言是欺诈，军事家的谎言为谋略，政治家的谎言为术数。

总结那些谎言，都可以找到其规律，归纳一下倒颇有意思。

强者的谎言

在凡人眼里，韩信是个无能无信的人。当一把剑指着，给他两种选择——要么抽剑出来证明自己是个强者，要么从胯下钻过去承认是个弱者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的行为引起了满街轻蔑的笑声。韩信自己也回过头来，向那些笑他的人们笑了笑。他给人的印象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无耻之徒形象。然而以后他用事实证明，那是一场没有可比性的较量，一场智慧悬殊的对峙。天下能有几个人生了一双慧眼，识破这个貌似无用的人竟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这位既无品行也无本事的年轻人，此时正酝酿着如何跟天下最强劲的人物较量，哪有心事跟一个只配当兵的无名鼠辈一较长短。那回头的

一笑，是留给世人的思考，是对芸芸众生的同情。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有鹰那么高。智者的总结既是对强者的赞颂，也是提醒世人，且莫凭衣貌看人。那些具有大智慧大谋略的雄才，在他们没有成功之前，并不显得比我们常人更高超，有的甚至比常人更拙更可笑，以至于引起那些凡夫俗子们的嘲弄作践。只有那些也是非凡人才的眼睛，才能从市井小巷中看出这些人物。遗憾的是，我们或多或少地看走眼过，把庸才当英雄，而又把珍珠当玻璃球的体验。

强者并不仅仅如韩信这样一种表现，有的最终被人认识了，如韩信；有的则不然，“大智若愚”的成语就告诉我们，在愚笨者中间就隐藏着高人。

退让——君子不与人较真

几千年前“将相和”的故事，有如一个优美的旋律，永远拨动着炎黄子孙的心弦。蔺相如，一个文弱的书生，在秦王面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可是在他封了上卿之后，有些人就不舒服了，首先不满意的是廉颇将军。站在廉颇立场上想问题，的确有些气不顺。廉将军总括三军，出生入死，充当着国家的栋梁，不想千军万马抵不上秀才的三言两语，排座次却在蔺相如之右。大概手下的门人幕僚在他面前也没少挑拨，于是他要羞辱蔺相如了。

可是蔺相如却处处避着他，使他无处下手。

在街上碰见蔺相如，廉颇直冲过去，蔺相如却回避了，绕道溜进了小巷。事实证明那个秀才怕他，让廉将军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蔺相如这边，人们感到脸上无光，便

有人在蔺相如面前说三道四，认为这样做太窝囊。那些话与其说是蔺相如身边人说的，还不如说是读者的心声。而蔺相如一番话，简直就是说给后人听的。

蔺相如反问，是凶狠的秦王厉害还是廉将军厉害？自然，秦王更凶狠。蔺相如说，我连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惧怕廉将军呢！我的退让，乃是出于对老将军的尊重，是出于对国家全局的考虑。这话传到廉将军耳朵里，让这位将军如梦方醒。得知蔺相如在自己面前的退让是从大局考虑以后，这位带领千军万马出生入死的老将军，却对蔺相如这么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文官甘愿低头，竟然负荆登门请罪。这两个古人的故事发生在几千年前，他们启迪过后世多少人也都成了大英雄。

假如两人真的较起劲儿来，谁也不会怕谁，但，两个人都将证明自己不过是个庸才。他们的强壮和高尚，体现在各自的退让之上。

我在很小时候就知道历史上有个寇准，那是在《杨家将》中读到的。他铮铮铁骨，忠心耿耿，让人以为他是他那个时期的唯一正直的代表。直到自己也有了一把年纪，才明白他身后有个人对他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王旦。

寇准，北宋太宗时在朝中做官，真宗时官至宰相。他敢于跟皇帝顶撞，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同时他还有胆有谋，如契丹侵犯澶州，边事告急，朝廷内外震骇，连皇帝都吓得不得了。寇准却说，不过五天就能平定。他请皇帝亲自出征到澶州，到了南城，大家请皇帝停步，又是寇准力请过河。果然，皇帝一渡河，诸军受到鼓舞，高呼万岁，声震数十里，契丹气夺。皇帝将军事让寇准掌管，寇准纪律严明，很得下级拥戴。跟契丹打了一仗，斩获大半。契丹派人请和，寇准不准，只是

皇帝厌战了，才不得不结盟。

这个仗打了没多久，寇准被罢了相。因为他用人不论资排辈，引起了同列不满。在他当宰相的时候，手下人上报给他的官员提升名单都是按资格，他曾说，所谓宰相，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按老办法来，那岂不是个办事员的见识？结果终于被王钦若在皇帝面前一捣腾，就被贬了。

后来好不容易再回朝中，又被一个丁谓使坏吃了大亏。丁谓原本是寇准推荐上来的，虽然两个人都在朝中同列，但丁谓对寇准很恭敬。有一次两人在一起吃饭，汤污了寇准的胡子，丁谓连忙起来为寇准揩。寇准开了一个不太高雅的玩笑，他说，参政为长官拂须吗？从此丁谓就恨着寇准了。待再一次贬寇准到相州的时候，丁谓还嫌不足，请皇帝再贬。丁谓左右朝中，皇帝有一次问，我怎么好久没见寇准了？朝中一班大臣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于是京师传出顺口溜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前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就是这么一位被后人爱戴的人物，却也有让人不舒服的一面。

王旦处事稳重，谨守祖宗法度，按今天人的眼光，他大概没有什么改革精神。他从不跟人私下来往，在那些后进激烈老想干点名堂出来的人眼中，他就是个无所作为的人物。然而他平中有奇，稳中有忧。经他推荐的有不少人，却从不让人家知道是自己推荐的，这与我们今天一些好引门生者是不可想象的。他从不让讨好他要求捞官当的人进门，比如谏议大夫张师德曾经两次到他家去，都吃了闭门羹。张师德因此怀疑别人打了小报告。后来王旦对向敏中谈心说，可惜了张师德，有才气，有士行，却没有想到两次来拜见我。如果大家都为自己的前程竞相奔走，那些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可见，他的人品和

深谋远虑都堪为大智。

可是寇准在没有进相位之前，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短处，言辞激烈，喋喋不休。而王旦却时时在皇帝面前说寇准的好话，仿佛不知道寇准背后对他说了多少坏话。两相比较，至少在气量上，寇准就差了一着。有一天王旦又向皇帝说寇准是个人才，连皇帝都有些弄不懂了，说，你经常说寇准如何好，他却专门说你的坏话呢。王旦没有吃惊，却从容地这样回答：

“我在相位太久，政事疏漏处必然很多，寇准能在陛下面前毫不隐晦，正是他忠诚的表现，也是我看重他的缘故。”

宰相肚里能撑船，看王旦的表现，这句话就不完全只是个形容词了。他的大肚简直就深得没底！不知几个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寇准光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短处也还罢了，却又托人向王旦谋求当相的职位。王旦惊奇地说，将相之任，是能自己求的吗？我不受人的私人请求。为这事，寇准还恨着人家。过了不久，朝廷传下任命，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寇准去向皇帝叩谢，十分委屈地说，若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能到这一步。言外之意，是怨王旦不提拔他。皇帝却说，这是王旦推荐的。

王旦处处退让，并非他没有跟人较量的本事，相反，以他的身分和皇帝对他的信任，只要他一句话，什么事都办得成。假如皇帝非要舍弃一个，可以肯定地说，皇帝不会因为寇准而撇下王旦。王旦表面的无所作为，正是为这些有气节有本事的人留下的空当，不知几个人能够识别这表相下面的深意。

王旦死于宋真宗天禧元年，那时候寇准被贬还在下面呆着。病重期间，皇帝问王旦谁能代替他的职位，王旦再一次地

推荐了寇准。提起那个人皇帝就有些厌恶，不大高兴地说，那个人性情刚而褊，你再说一个。王旦说，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看看王旦身处相位所干的事情，表面的无所作为中，却为国家推荐了那么多有用的人才，并以大局为重，绝不因为人家对自己不利就排斥打击。“大智若愚”难以概括他的度量，“大贤若庸”也难以包含他的人格。他处处退让的高尚境界，以静待躁的处理方法，比起那些以进攻为业绩者的业绩来更为宏大。不幸我们带着现实主义的眼光评判古人时，将那些不停地玩花枪者掺在改革者中间顶礼膜拜，却将这样的人深深地埋在历史的尘垢中。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个人物，他就是武则天时期的娄师德。

狄仁杰与娄师德同时在朝当宰相，狄仁杰对娄师德极尽排斥，非止一日一事。但娄师德一直隐忍着，处处退让，从不跟狄仁杰正面交锋。还是武则天看不过去，有一天对狄仁杰说，我这么重用你，你知道为什么吗？狄仁杰傲气十足地回答：

“我凭的是文章，走的是直道，并非钻门路托人情起来的！”

武则天沉默了好久，才说，我其实并不知道你这么个人，你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实在是娄师德推荐的。接着命令左右取筐篋，找到了十几封推荐表扔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接过来一看，不得不汗颜了，原来都是娄师德推荐他的奏折，马上引咎谢罪。从朝中出来以后，他不觉发感叹道：

“我没想到被娄公这么包涵，而娄公却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露出半点骄矜之色。”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旦和娄师德这样的人物，是难以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成功者，功成名就容易被人认出。但人才是辈出的，更有许多才露

出小小的嫩芽，他们被掩藏在世俗的尘埃中，唯有超凡的眼光才能看出他们的价值所在。以这把尺子看身边，就可以看出人的优劣来了。凡在乎小名小利的角色，凡是在小事情上势必争个上下的角色，八成都是庸才。

韬光养晦——自我保护装置

汉丞相萧何在刘邦创业时负责管后勤，为刘家得天下立下了赫赫大功。天下平定，封了丞相。回家之后，不不得得意。他召集他的幕僚谋士们喝酒，在酒桌上说，我在帮助皇帝夺取政权时候，无论战事多么紧张，从来没有因为粮草问题耽误。这些成绩，都是大家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才取得的，你们也立了大功。现在天下太平了，再无仗可打，皇帝封了我丞相之职。你们再帮我说说，我应该怎么做？

这时候，有个跟着他吃喝多年却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好点子的人，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丞相应该做几件缺德事。萧何一听大怒，当面斥道：你跟我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一言教我，第一次说话，就出了这么个馊点子？

这事仿佛过去了。那个人虽说没有被驱逐，却也受到了冷遇。

和平的日子过得快。萧何一门心思帮助刘邦收拾残局，制定政策抓建设，安抚百姓，干着一个丞相应该干的工作。忽然有一天，刘邦出去了一阵子回来，找萧何谈话，他和颜悦色地说，丞相，你的威信高得很呢，老百姓都知道丞相的大名，威望比我都高。

这句夸赞的话蓦然使萧何警觉起来。皇帝的笑容里，分明藏着杀机！这时候他才明白，现在不是共患难的时候了，一心

工作或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并不是一个帝王的本意。他表面谢恩，心内却惶恐不安起来。回到家，就急匆匆去找那位给他出馊点子的家伙，先赔不是然后请教。那个不知名的幕僚显然对历史和人心了解得透彻，对帝王的权术也并不陌生。见丞相虚心求教，经过一番分析过后说，你如果要自保的话，就不能不留点小辫子让皇帝抓着。于是他们连夜策划，要把自己的小辫子塞到皇帝手里去。

萧何以扩大丞相府第为名，跑马圈地，将许多老百姓赶到了大街上。一时间，长安城里哭声一片。

消息传到皇帝那里，刘邦将萧何召进宫去，大声呵斥他不恤民情。萧何跪在地下发抖，不停地认罪，肚子里却在笑：好了。见他如此这般，刘邦也就批评了几句而已。可能还有话，比如当官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呀，当了丞相这么大的官要戒骄戒躁呀，等等。萧何磕头谢恩，谢的是自己的地位终于稳固。从此，那把丞相位子就算坐稳了。

这就是功高震主的故事。

人生这么地不可捉摸，越是功高德厚而又具有智慧者，越是感到人生旅途的艰难，让这些优秀人才不得不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无可奈何的凡人俗事的竞争上。不过话说回来，天生出这些智慧的人才，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该干些什么时，那么再无人是他们的对手了。比如萧何，跟刘邦玩套路，并非毫无招架之力。

再看另一个例子。

京戏《打金枝》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是儿女夫妻闹矛盾，亲家之间倒显出了大家风度。其实只要是了解它的历史背景的，就不能不为之怜悯。公主下嫁给郭子仪的儿子，两口子吵架时公主骄横地说，我的父亲是皇帝！女婿郭暧说，这个皇帝

给我爹当他还不愿要呢！公主以为这是句十分严重的话，将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讲给当皇帝的父亲听时，皇帝却说，他说的对呀！只要郭子仪想当，你爹这个位子就坐不稳了。郭子仪知道后大怒，将儿子关押起来然后去向皇帝认罪。皇帝没有怪罪，反倒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小夫妻吵架说的话，你何必当真。

仅看表面现象，郭令公和皇帝都堪称谦让的模范，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悲哀。皇帝悲哀，郭子仪也悲哀。代宗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不将国家安危系于一位大臣身上，这是何等扫兴的事情。郭子仪固然是个忠臣，对皇帝没有二心，但主弱而臣强，并不是他所愿意的。郭子仪统率千军万马，平定安史之乱和回纥吐蕃的挑衅，身系国家安危三十年，却因功劳太大日夜不能自安。儿子一句混账话，就让他战战兢兢。

平庸者能够高枕无忧，优秀者反倒永难自安。郭子仪的人品和战功，为时人所称颂。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功勋卓著，在战争中应付自如。然而在和平时期跟人打交道时，总是被人嫉恨。他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一直退让，不停地辞官，不停地要去外面工作。但一旦战事兴起，他又披甲上阵。几经反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不幸一旦和平到来，他就再也没有那么自信而自若了。在一些野史中，记载了他生活中的一些残片，从这些残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的悲哀。

他的对头冤家鱼朝恩恨他，支使人挖了郭子仪家的祖坟，连皇帝都震怒了。可是郭子仪却不让人追查。挖祖坟在过去是最让人伤心的，他哭着对皇帝说，只因我过去没有管好部下，有人乱挖别人的坟墓，这是上天的报应。

《唐语林》中记载，这位令公住着深宅大院，他的府第占了半条街，大门后门却不设防，人们如走大路来来往往，他家里的事情平常人都可以说出细节来。手下人出外当官来辞行，亲眼看见他的老婆和女儿洗头发，大呼小叫地支使这位元帅倒水，郭子仪就如一个打杂的伙计跑去跑来，没有一点威严和气度。他的子弟对家庭的状况很有意见，劝告不听时，甚至哭着哀求他说，即使穷家小户也还有个内外之分，可我们却像个公共场所。郭子仪到底老谋深算，告诉他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我们家庭里的情况外人不知道，天晓得有多少人怀疑，遇到那些有心计的人做文章，到时候身家性命都得赔进去。

事实证明郭子仪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人生处处有凶险，在郭子仪的遭遇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奸臣卢杞还没有成大气候之前，也曾去拜见郭子仪。郭子仪的家什么人都可以进出，男女对什么人也不回避，可是一听说卢杞要造访，郭子仪就赶紧让女人都回避。儿子问他为什么对这个人造访特殊对待，他说出了内中道理。原来这个人的脸色如蓝，有口辩，相不好看，他担心妇人见了免不得要大惊小怪，甚至忍不住要发笑，将来卢杞一旦得势，就将大祸临头。就是这么一个害了不少忠臣良将的卢杞，却自始至终对郭子仪没有动手脚，这正是郭子仪自己的保护装置起了作用。

郭子仪经历了四代皇帝，史书上说他“功盖天下而上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年八十五而寿终”。盖棺定论，死后自然风光。但看看他在世的日子，就不难知道这死后的评语是怎么来的。他的“穷奢极欲”，焉知不是做出心满意足来让人们放心的！

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郭令公，和平时期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尴尬中度过的，死后有那样的评价，代价却是不小的。智者不能

不将自己的才气用来对付身后的暗箭，这不能不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成大器者总有一段人生的泥泞路。有时候，他们面对社会生活时，也不得不经受世俗的白眼和作践。他们的事业还没有成功，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但世俗的偏见时时困扰着他们，习惯势力紧紧地包围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分出心来以应付琐碎的俗事。因此除了生活中的难堪，更有跟世俗较量的欲望干扰着他们的灵魂。如何潜伏自己的棱角，忍受难以忍受的孤独，如何战胜要跟人一争长短的欲望，时时折磨着他们。但毕竟都是人中俊杰，强大的毅力使他们具有战胜自我的魄力，他们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强者正因为是强者，更易于受到攻击。小人们有时也具有非凡的眼光，别人看着是一般人，他们却能够认出哪些人在将来才会对他构成威胁，因此迫害一直伴随在强者的身边。

春秋战国时候的孙臆与庞涓，就是这种残酷游戏的一对。

据说孙臆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庞涓学到半途，建功立业心切，应魏王之邀提前出山。他在魏国立了大功，使魏国强大起来，因而被魏王委以重任。初出茅庐即成功，使他得以视天下如小丘，不觉做起了征服世界的春秋大梦。正是因了这个梦境，他才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个人是他不敢小觑的，这就是他的同学孙臆。孙臆的存在是他实现梦想的唯一阻碍，而孙臆手里还有孙家老祖宗孙武的《孙子兵法》，就更是他梦寐以求的。除掉孙臆再将《孙子兵法》窃为己有，那么他将是天下无敌了。于是，私欲的膨胀使他心理变异，原本很友好的朋友再不是朋友，同学的情谊也化为了对头冤家，他要置那个人以死地。他终于给孙臆写信了，写得词恳意切，请孙臆出山，共同完成人生大业。

孙臧是个什么人物，魏王并不知道，魏王只信任庞涓是个人才，将国家大事委任于他。孙臧到了，庞涓这个原本有真才实学的人物，只因才气抵不上这个同学，只因私欲无限膨胀，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造假。他周旋于魏王与孙臧之间，假魏王之名，利用孙臧对他的信任，为实现他的阴谋一步步向同学和朋友伸出了他的毒手。

孙臧在魏国并没有想取代庞涓，他将朋友情谊看得很重，指望跟庞涓同进退，共患难，一起完成人生的伟业，不负先生教给他们的知识。尽管他的才气远在庞涓之上，却并不抢占庞涓的功劳，也不显露出来，真心帮助庞涓。他用计取得了许多胜利，而这些战功都被庞涓据为己有，在魏王那里邀功请赏，获得了魏王进一步的信任。

如果没有孙臧，庞涓也将是一位英雄，不幸孙臧的才气令他寝食难安。他以小人心胸看待孙臧，因而这位朋友的所有长处，在他眼里都化为了难以接受的挑战。他假借魏王之命弄断了孙臧的腿，使孙臧四肢不全，这样就失去了在战场上驰骋的条件；然后又以朋友的面孔关心，诱使孙臧写出《孙子兵法》。

具有大智慧的人跟小人打交道，才气往往不够用。因为他们总是把大道和情义放在做人的首位。人无戒心时就很容易受骗，小人所熟悉的当面一套暗地里一套，他们并不熟悉，因而一再上当而不自知。孙臧被人耍弄了却不知道，变成了残废还对庞涓感激涕零，当真就在家艰难地抄《孙子兵法》，为的要报答朋友对他的关照。待吃了许多大亏之后，经人提醒，他才如梦方醒，明白自己太夫子气，被庞涓的谎言欺骗了。觉悟是痛苦的，也是振作的开始，于是，一场较量正式拉开了。

为了逃避庞涓的加害，他开始装疯。他吃猪食，睡猪窝，在街头狂笑或胡言乱语。讲究卫生却不能不让身上长疮，喜爱

精美食品却不能不吃那些一看就恶心的食物，满腹经纶却不能不装糊涂……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他的身上，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慨叹做个常人的幸福。然而孙膑注定不可能过平常人的平静日子了，非凡的才气将他推向了一个常人不可望其项背的高度，他必须忍受常人不可能经受的苦难，必须跟高层次的人物竞争。为了日后的战斗，他不得不抹去身上的亮点，将自己降为一个猪狗不如的模样。

我们读着这些故事时可能不以为然，设身处地地想想，就不能不敬佩这些人中之杰忍辱负重的能力。

一旦正式较量开始，庞涓就再不是孙膑的对手了。孙膑以他的经世之才冷静地跟庞涓周旋，并不以个人的愤恨取代战略的思考，该退时必退，该让时必让，稳步地将那个心怀叵测的敌人置于死地。这个不能站立起来行走的残废军师，仍然比六根齐全的庞涓强壮！

身体的强健仅仅是匹夫骄傲，拥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强者。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没成气候之前寄身于曹操帐下，为了不让曹操看出他的野心，便天天锄地种菜，种得有滋有味，仿佛对天下纷争再无兴趣了。然而暗地里，却为自己腿上的赘肉伤心。曹操为了试探刘备的虚实，来了个煮酒论英雄。在他说到当今英雄属曹刘时，一声雷鸣，刘备吓得将汤匙都掉在地下。为了掩盖他内心的不安，便假说他怕打雷。

三国时候的另一个人物司马懿，为曹魏的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曹操曹丕和一批元老的逝去，魏国内部远不是当年曹操掌权时候的风光，司马氏的实力不断上升，与曹氏的斗争日趋激烈。

正始年间，曹爽擅政，他们要捍卫曹氏的统治权，而司马

氏的强大势力正日益威胁着曹氏天下，因此反司马氏的人马结网成一张网，要除掉司马氏。司马集团的主帅是司马懿，假如他早死，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不幸曹氏重臣死了那么多，可司马懿却活着，因而他的存亡关系着天下落入谁手的大问题。曹爽专权，时刻想动武灭掉司马集团，却忌讳着司马懿的力量，不得不常常要探一探司马懿的虚实。

某一次，河南郡守李胜将改派到荆州去，借辞行去看望司马懿。李胜看到的司马懿口眼歪邪，两个婢女喂稀饭，都从嘴边流下来了，湿了胸前一大块。说话也有气无力，声音很小。李胜问他：“听说您旧病发了，怎么都没有想到成了这样。”司马懿说话颠三倒四，像是脑袋也不管用了：“听说你到并州，去了好些干吧。我死在旦夕，恐怕再也见不着你了，把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托付给你了。”李胜解释说，是“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点头：“哦，刚到并州。”李胜再解释：“是荆州。”司马懿就摇头：“人老了，听不懂你说些什么。”李胜回去就告诉别人说，司马懿跟死尸差不多，不值得担心了。这些人心里有数了，认为司马氏大势已去也，再也用不着提防。他们表面对他恭敬有加，暗地里加紧活动，对司马懿放松了警惕，却不知他们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其实李胜刚出门，司马懿一跃而起。原来他根本就没病。最终，专权的曹爽终于被他杀了，并灭了三族。这是个大转折，致使魏国的天下落到了司马氏手里。

那真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考察所有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之前，都或多或少地有过韬光养晦的过程。

以谎制谎——智慧的碎片

在一本《艾子后语》中有这么个故事：赵国有个方士好大言，艾子问他多少岁，方士说他忘了多少岁了，只记得儿时见伏羲画八卦，人头蛇身，回去就得了癫痫病，赖宓羲给他用草药治疗才没死。后来又跟女娲打过交道，见神农播过种子，苍颉不识字找他求过教，舜受父母虐待他帮助揩过泪，笑过成汤结网，禹治水从他门口过，请禹进去喝茶他不进去……艾子当时没有吭声。恰好赵王骑马摔伤了，医生说须千年血敷一敷才能好，赵王就下令找千年血。艾子就说，现在有个方士，活了几千年了，可以取他的血。赵王把方士抓来要杀，方士大哭说，我的父母五十岁，东邻姥来祝寿，带来了酒，我喝醉了，说话有些过分。艾先生喜欢说假话，大王千万别听他的。

这位方士原指望哄骗赵王弄点钱花讨些酒喝，不料运气不好偏偏碰上了艾子，差点儿掉了脑袋。假如没有艾子这一招，赵王认识不了方士的面孔，方士也不可能露出尾巴。

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少了策略就难以实现。而那些运用策略出奇制胜的人，无不是智慧的拥有者。英雄豪杰游戏于人世，除了两军对垒必须有大谋略外，在生活中，有时也不得不应付前后左右的暗箭和不测。

南北朝时有一个张率，十六岁时作了赋颂二十余首，请有些名望的虞讷指点。虞讷看了诋毁得一无是处。张率气不过，回去一把火烧了。烧了过后才意识到，那个虞纳的评价未必就是准确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测，过了几天，张率再拿了另几首诗请姓虞的评判，并说那是文学大家沈约写的。这位一听是沈约的作品，“便句句嗟称”。张率见果然被虞纳的谎言所骗上

了大当，便不客气地给了虞讷重重地一击，说，这都是我写的。虞讷“惭而退”。我想这位姓虞的当时不好下台，如何“惭而退”的没说清楚，但那种狼狈是可以想象的。既然“句句嗟称”，显然是逐字逐句分析的，头头脑脑一定讲得很细。虞讷认为这样的诗除了沈约别人写不出来，却没想到不知不觉落入了张率设计的套子里去了。由此可见，名人也不是个个都那么磊落，对付这种凭权威摆谱的说谎者，张率对虞讷的教训可谓痛快之极。

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这个会面对双方都不那么舒服，毕竟没有危害到人身安全，更没有对国家民族造成损害。但这个例子倒足以说明，对付那些并不光明磊落者，以谎制谎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将计就计，就是个以谎制谎的措施。

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那可以称为谎制谎的范例。

西门豹为邺令，初到辖地，免不得各处走访，在访问老人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情况，这就是每年为河伯娶妇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原来当地有“三老”和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吏勾结，把持着地方的一切。他们串通巫婆神汉，利用为所谓的河伯娶妇聚财。他们从老百姓身上征集数百万钱，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其余的就坐地分赃。

光捞钱也还罢了，他们还以为河伯娶妇的名义残害少女。他们在河上扎起斋宫，布置举行仪式的大场地，煞有介事地举行一番仪式过后，将弄来嫁给河伯为妇的少女放入河里的斋宫。选好一个日子，就将载着少女的斋宫放入河水中漂走了，“行数十里而灭”，显然少女都难免溺水而死。老百姓也习惯了这一套，以为真的有什么河伯，年年借此看热闹。苦只苦了有

少女的人家，无处申冤，只有逃走，因此城中一空。西门豹得知了这一情况，便有了主意，说那天也去送河伯的新娘子。

到了那一天，各种人物都来了，围观的群众数千人。西门豹首先拿太巫开刀。那是个老女人，带着十个女弟子。他仿佛表现得比那些人更热心，说这个新娘子不太理想，请你去给河伯说说，让他等几天，我们再选个好的送去。接着不用分说，让兵卒将那个女人扔进了水里。不用说，那女人被卷走再也不可能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怎么去了这半天还没回来？再让人去催吧。于是将她的女弟子扔了一个。过一会儿，就再扔一个。连扔了三个了，又说，可能去的都是女人，不会办事。便再扔“三老”。三老不见回来，再扔为恶的什么豪长和当廷掾的人。一连扔了好几个了，毕竟都是怕死的家伙，剩下的怕被扔进河里，马上跪下磕头流血，恳求大人饶命。

眼见为恶的自己向人们证实了那是谎言，老百姓也受到了教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西门豹这才说，河伯说了，他不再娶妇了。

在这出喜剧里，西门豹作为行政长官，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也尊重他们的习俗，效仿那些行迷信的人们，也一本正经地假戏真唱，“簪笔罄折，河立待良久”。他必须让人看见所谓的河伯不存在，必须让那些以迷信号召愚昧老百姓的人怕死磕头，才能达到根除恶习的效果。假如他事先就去搞什么破除迷信的宣传，绝不会有人相信，老百姓也不会站到他这一边。经过多年的迷信影响，老百姓也认可了那些巫师巫婆，弄不好将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将计就计把他们一个个除掉，是开刀问斩都难以达到的效果。

以谎制谎，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愿意，智者将聪明才智用来对付这些雕虫小技是绰绰有余的。

君子良善也撒谎

我们每个人都不敢保证我们不撒谎。不真实的语言或现象称谎言也好，称假话也好，其实并不总是令人讨厌，撒谎也构不成好坏品质的标准。判断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不在于他是否说真话或是假话，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是善良还是恶意。

善良人也撒谎，但善良者绝不会为了损人利己而撒谎。相反，为了帮助别人，他们可能藏起自己的苦痛和窘迫。现在提倡的献爱心，正是一个善良人应具有的品质，真正的爱心也只能从善良者那里得到。凡响应什么号召或是学习了哪篇文章才来献爱心的，那“爱心”两字真值得打引号。显然，那“爱心”后面又暗藏着其他的目的。

善良者谎言的背后是真诚，是真正的爱。

安慰——施与弱者的同情

安慰，是给失望者的强心针，是塞给正在倒下去的人手里的拐杖，是帮助对方擦拭伤痕的用品，有时，也是糊弄对方的海市蜃楼。

生命是强大的，某些时候却也脆弱不堪。一句话送一个人的命绝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我们需要安慰，需要同情，而安慰和同情是不能用一是一二是二所谓的“实事求是”来概括的。当我们遇见一个多年的朋友时，尽管你对他或她的老态深感惊讶，却也知道拣好话说：“你一点儿也不显老。”这是地道的谎言，但这谎言的出发点却是善意的。听者听到的相信的并不是你的假话，而是你对他的友情的表露。无论我们怎样地对谎言

深恶痛绝，却没有哪个人会反对这种谎言。谁都不敢保证自己没有说过类似的假话，谁也不敢保证他永远不需要这样的假话安慰。

安慰是善良者对人同情的表述，而同情心是人类好品质最直接也是最可贵的体现。同情者并不总是比别人强大或威武，有时候恰好相反，有能力帮助人的偏偏吝于施舍，而那些自己也很艰难的，反而能够给人以帮助。

穷人少金钱，富人少怜悯，这种结论我在现实中没有少见。我曾在某一本书里讲过文革中农村看电影的情况。有一阵子农村放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之所以放这样的东西，其目的是要人们安于贫穷，告诉大家你们比她们好，也比昨天好。纯朴的农民的确好哄，我看见，银幕下的观众并不比银幕上的主角们穿得好，甚至绝大多数穿得更差，但看到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情节时，竟是一片哭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竟为艺术创作出来的人物痛苦而伤心。面对那种悲剧无动于衷的，反倒是我们这些吃国家饭的干部们。

几年前在某本杂志上，登载着一篇回忆伟人毛泽东的文章，我读到了这样的故事：当年毛泽东病情恶化，常常彻夜难眠，只好半靠在沙发上度过漫漫长夜。腊月三十除夕夜，他的住处静悄悄的。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战士们都在身边，他记得今夜是除夕，便说，过年要放炮竹，你们放了没有？战士们说，怕影响您休息，没有放。毛泽东说，过年嘛，放一放。于是战士们就弄了一小截，挂在既能让毛泽东听见又不能让声音太大的地方，噼噼叭叭炸了几下。其实毛泽东在吩咐过后，就又昏昏沉沉了，那鞭炮声没有听见。待再次清醒过来，还记着放鞭炮的事，就问他们放了没有。战士说，放了。毛泽东这才吃力地笑了一下。

这件事情实在太小，唯其小，才显现出一代伟人有血有肉的一面。在这件小事上，毛泽东再不是永远不落的太阳，也不再是个神话。这位一言就可以让神州大地刮起旋风的人物，在生命的轮回中成了十足的弱者，在神圣肃穆的中南海艰难地支撑风烛残年，他同样需要同情和安抚。

从生命的角度而言，守卫他的战士们个个都是强者。战士们燃了鞭炮，却不是为了以鞭炮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而是安慰这位被病痛折磨的老人。无论此时他们面对的是当领袖的老人还是其他老人，他们都会这么做的。作为毛泽东，他是精神的强者，政治的强者。尽管他自己痛苦不堪，却也知道这些孩子们大多出身于农村，农村除夕的欢乐，少了鞭炮就无从谈起。这位出身于农村的领袖，没有因为自己病痛就巴不得天下人都不欢乐，忘不了中南海的寂寥不适合年轻人，仍然记挂着他们想家的心情。嘱咐他们放一挂鞭，也是对他们的同情和安慰。

安慰对方的双方，都藏起了自己的真情，都为对方着想。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怀，体现在地位悬殊的老人和一群年轻人身上。

有时候，尽管别人说出的话自己也会说，尽管别人说的话未必比自己说出来的更深刻，然而通过另一张嘴巴说出来时，那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电视里看见过警察劝阻站在高楼上想自杀的人，也见过警察劝阻作案者终止作案的画面，那一切许诺，拍胸的保证，未必就一定真能够兑现。但此时，能够挽救一条生命，能够让犯罪者减轻破坏，是劝阻者唯一的目的。我们看见的画面大多成功了。其实，警察说的话那些人自己也能够说，也想得到。当一个人跟你面对面真诚跟你交谈时，谈什么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人在跟你沟通，多少人正是

缺乏这样的沟通才走进死胡同的。

医生和护士们的谎言可能更多。当病人面对自己的疾病忧心忡忡时，医生总是说，不要紧的。尽管医生已经知道对方的生命已不长久，也还要拣好听的话给病人听，聪明的医生甚至很武断地斥责病人：“别瞎说，哪有这么严重！”此时的谎言，就是人道主义，就是善事。真正受病人爱戴的，往往是那些最会撒谎的护士。她们的微笑和若无其事的表情，能够让病人忘了死亡和病痛。假如她们也跟病人亲属一样，知道病人生命不长久就惊慌失措，那么带给病人的将不是福音。

到处都讲微笑服务，可是殡仪馆里的工作人员却不能以这样的姿态服务。他们必须藏起自己一切高兴得意的事情，以满腔的同情接待顾客。谁如果露出了真实的高兴和得意，那他就缺乏起码的同情心。

善意的谎言与拍马屁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针对弱者的同情。

克己——为了他人的幸福

“相濡以沫”一词让我常常想起两条离水的鱼，那时它们给予对方的空气和湿润，就是给自己的生命养分。以相濡以沫形容患难夫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克己让人，是这样的夫妻之间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景象。尤其人在逆境中的时候，他们互相向对方展示好的一面，将不幸藏起来独自承受。

在那一阵子下岗大潮中，我们遇到过许多下岗的工人。他们过去在国营工厂里工作，除了好好劳动再也不操心别的事情，生活自有领导考虑，到时候涨工资，孩子上学或就业，家里有什么困难，一切都由厂方安排。忽然地没有了工作，生活

就断了经济来源，至少过去的福利和加班费没有了。于是人间的真情就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

有些不在一个企业上班的夫妻，不敢把下岗的事对家里人讲，怕家人担心着急，就隐瞒下岗的事不说，每天准时出门，假说去上班。实际上却是在外面寻找零活儿干。所有的负担一人承受，挣得的每一分钱都交回去，假说是加班工资，自己却在外面啃冷馒头。

《演讲与口才》2001年第4期登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的女儿丢了，她寻找孩子，却一直没有找到。她挂牵孩子，孩子的小伞和衣服一直留着，思念时就拿出来看看。连墙上贴的画都是孩子丢失的那一年贴的。二十年后才知道下落，在邻县一户农家。但收养那孩子的家人捎信说，孩子生活得很好，最好不要让她知道真相。为了孩子的幸福，她终于没有出现。她这样做将意味着什么？就是亲生女儿不知道世界上有她这么个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但为了孩子，她将生生掩埋自己了。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据一家报纸披露，有一位农村青年，母亲病重，却眼巴巴盼望儿子考上大学。为了安慰临终的母亲，他假说自己考取了，让母亲安心地合上眼睛。但问题接着来了。父亲信以为真，凑钱让他去上大学。他说要在家里陪着父亲种地，父亲就是不答应。他万般无奈，只好出去，边打工边读书。几年之后回家，又假说大学毕业分到了某单位，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父亲。为了父亲的欢笑，他总是揩干了眼泪才出现在村里。

中国人对家庭的责任心，就体现在这种克己上。为了全家人的欢乐，他们不惜苦自己，也不愿其他成员跟着担惊受吓。

有谁见过穷人拿出钱财接济富人？有谁见过自己没吃的却

为人家没肉吃掉眼泪？我见过。前门接客，后门借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样的事情我一生中遇见得太多了。到任何一个穷亲戚家里去，尽管他们自己朝不保夕，仍然要尽可能地招待好客人。在那些苦难的年月里，乡邻间的友好情谊，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他们总是在客人面前展示自己好的一面，穿着没有补巴的衣服，然而那衣服的背面，却是一个挨一个的补巴。在客人面前，女人还将梳梳头，洗洗脸，竭力掩盖被风刀霜剑刻下的皱纹。如果谁在客人面前诉苦，那是最没家教的事，就会被人们背后指指点点。

没有米了，这是真实。然而谁能够在客人面前把这个真实端出来呢！不光米，茶也没有，烟也没有，这在那个年月是个普遍现象。可是在过年过节前夕尤其是腊月，手头有一点钱，首先考虑的就是备什么东西招待客人。看看春节前赶街的人吧，买张年画图吉利，也是要遮住寒碜的一面；如果有一百元，其中八十元是为招待客人花出去的。

我曾帮农村老乡给在外打工者写过信，他们说，“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要他放心。”其实家里并不是一切都好。数不尽的麻烦和经济的拮据，都在“一切都好”这一句里被掩盖了。再看看从外面寄回来的信，也是“一切都好”，但字里行间显然也掺杂着假话。如果真的一切都好，那么他定会告诉家里人，工作是干什么，累不累；工资是多少，除了吃饭还可以存多少；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对工人怎么样等等。凡是含糊其辞的地方，都是没有着落的假话。但为了让家里人放心，一切都不好的方面，一个人扛着了。

记得在“文革”时期，那么多干部下放到农村，农民们不会向倒霉的客人诉说自己的悲哀，却对这些外来的人们倾注出满腔的同情。工作队下乡去教训他们，住在每家每户，跟他们

同吃同住，他们不会将你的训斥和对你的伙食联系起来考虑。

然而这美德没有赋予弱者提防的保护装置。

当年搞社教，对农民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就是用谎言哄骗他们。让贫苦的农民忆苦思甜，要他们树立为革命种田的伟大理想，将他们的劳动果实拿走了却还要说这是先国家再集体然后个人，同时还起用一些好逸恶劳的人物当作典型要大家向他们学习……农民无力反抗，久而久之也就只好麻木对待。

与这样的情形同出一辙，越是落后的地方，庙里的香火就越盛。寻找不到现实安慰的人们，就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将自己的辛苦钱往那里扔。有些骗子到乡里行骗，凭花言巧语让农民拿出钱来，然后溜之大吉。

在这种善良与愚昧搅和在一起的善良表现中，我竟看见了这样的例子：有村干部欺负了他们，被上级惩处。等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时，那些受过欺负的农民，竟然转而为他说话，说把他整得太惨了。这时候，他们丢开了自身的伤痛，却对那些害人的家伙抱以同情。其实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些家伙加在他们身上的痛楚，只不过，那痛楚已经过去，人家的不幸遮盖了过去。一切仿佛都是从现在开始，两相比较，自己是幸运的而人家是不幸的。这种叫什么呢？也许可以算作自我麻痹吧。但，麻痹也是谎。

含辛茹苦的背后，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愚昧。

沉默——无可奈何的选择

据说商纣王荒淫无道，箕子劝解他不听。再看大臣们喝酒烂醉如泥，问他们日期都不知道了。箕子便说，知道他不听却

硬要说，是愚蠢。杀身以彰君王的罪恶而取悦百姓，我又不忍这样做。于是解衣被发，佯狂而去。

当不适宜说话时，当真话无人肯听时，或者真话再也起不到作用时，假话不愿说，而真话却又无济于事时，最好的办法只有一条：不说话。

沉默也是谎言的一种，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诚如箕子所说，说话不起作用你硬要说，那是匹夫之勇。促使正直的人沉默的原因很多，最为常见的莫过于政治的压力。上面所举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在那样政治高压之下，沉默才是明智的选择。跟坏人讲道理，那是傻瓜，跟骗子讲真诚，那是脑袋不清白；而用脑袋往石头上硬撞，就更是以卵击石的蠢事。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文字狱，比如清代雍正年间曾静吕留良案，就是雍正一手导演的冤案。这是典型的谎言。

一个秀才曾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要他不负华夏子孙的厚望，带头反清。原来岳钟琪是汉人，而总督一职向来是旗人当的，汉人得这一职位，是大清从没有过的先例。岳钟琪好不容易爬上了如此高位，如何会反清呢？原来曾静是道听途说，将传言当了真。传言还说姓岳的是岳飞的后代，据此便以为忠臣的后人是不会跟清朝统治者合作的。误信传言加想象，曾静便傻乎乎来了这么一手。

岳钟琪为了自保，威胁利诱加严刑，软硬兼施套出了他们的真情，便跑到雍正那里邀功。跟曾静一起策划的学生张熙说他们很崇拜吕留良，雍正便以帝王的有利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跟这个案子风马牛不相及的吕留良扯出来，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拉网式清除异端思想的运动。

与吕氏有关联的所有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真正搞造反策划的曾静倒受到了宽恕。一时间，全国笼罩在恐怖之中，所

有文章都有犯忌的可能，许多已死了几十年的人也被拖出棺材接受所谓的审判。“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等文人吟风弄月的字眼儿，也被人发掘出来当作造反的证据，作者也因此掉了脑袋并株连族人。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语言是最容易获罪的，政治恐怖让人人自畏，除了沉默能够自保外，再也没有其他出路。一时间，万马齐喑，全国只能听到皇帝一个声音。

雍正时代的文字狱是皇帝为了巩固统治自造的冤案，历史上其他几次文字狱同样残酷。在小人把持朝政的朝代，正直之士不屑于为伍，又无能扭转乾坤，唯有不开口。王莽即将篡位时，除了他的死党和一些糊涂蛋外，稍有良知和远见的人都远离而去，等待着王莽败露的时候到来。《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厌恶曹操凭诈力扣他的母亲，身在曹营心在汉，发誓不与曹氏合作，一生保持着沉默。他读破万卷书，知道如何用兵，也知道对付刘蜀和孙吴的方法，更知道曹操出兵会是怎样的结局，却永远不开口。他的沉默即是牺牲，活着等于行尸走肉，这是一个有识有知的人的最为悲惨的处境。

上面所说东汉时候的党锢之祸，不仅整了上了册的人，株连的人更是无计其数。在所谓“党人”中，也有不那么地道的。如有个张俭，在大清查中亡命天涯，所投之处，老百姓因为重其名节，无不是破家相救。因为他，被杀的无辜者不知多少，有的甚至一族都被灭了。可他还继续这里窜那里跑，跑到哪里官兵就追杀到哪里。

关键时刻显出了假名士的真面目，却也显出了真豪杰的高风亮节。党人中有个夏馥，听见张俭的事情之后叹息道：“孽是自己作的，却连累善良的无辜者，一人逃死，却祸及万家，

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张俭的行为让他为党人悲哀，他将形象改变，跑进深山给人家当佣人，最后死在深山老林里。

另有一个袁闳，家里豪富，眼见国家乌烟瘴气，而家族中竟有人推波助澜争权夺利，他既看不惯，又无力扭转局势，便在家里筑了一间土室，在里头竟然呆了十八年之久，最后竟在土屋里结束了一生。

国家不幸，有识之士不幸，连无辜百姓也受牵连。在连普通人说话都容易获罪的年代，除了沉默，还有什么办法呢！二十世纪发生在人民共和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想竟再现了封建专制时代的别样风景。古时奸人害忠臣，文字狱时害的是喜欢著述的读书人，可文革却连普通人都难以生存，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大倒退。有人因为喜欢说话，检举者断章取义都分析成了反动言论。有话不能说，唯有最为简便的便是沉默。

除了这种连平常话都不能说的政治压力之外，促使正直人不说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沉默是金”的俗语，告诉我们的就是少说话的好处。“祸从口出”，实在是血写的经验。君子也要吃饭，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人群之中。世俗的飞短流长，也时不时地干扰着他们的精力和心神。因此马援给他的侄子曾写几句话以戒讥议：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言。

小人记丑而博，君子却不屑于扬人之短，小人以知道是非和别人的隐私多为荣，君子却生怕自己知道的庸俗事情太多。每当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愿开口的。伐国不问仁人，问了他们也不说。沉默，既不得罪人又少了是非，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忍辱负重——君子的际遇

忍辱负重，是送给那些具有伟大情怀的人的。凡能够忍辱负重者，必不属于凡夫俗子之流。他们是一些怀着大目标的人中之杰。看世相，多少人在某个人遭遇灾难之后，对遭难者避之尤恐不及。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候，才能显出英雄的本色和君子的操行。

最为惨烈的，莫过于为他人牺牲，身背并不属于他的耻辱，含垢忍辱地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中。《左传》和《史记》所载“赵氏孤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时候奸佞的诡计，忠直义士的浩然正气，以及他们为了正义不惜牺牲一切的情操。赵盾是晋国的大臣，为屠岸贾所害，并为此一家三百多口全部被杀。忠与奸，是与非，在那场较量中都使出了谎言一招，谎言使奸佞更显其奸，也使义士更显其义。

据《史记》载，屠岸贾为了除掉赵盾，煞费苦心设计了整套方案。他在家训练一只外国进贡的猛犬，将赵盾作为它撕咬的对象，然后对晋王说，这条犬有特异功能，能够识别忠奸。愚蠢而无聊的晋王要的正是掌握人对他是忠是奸，便要他在朝臣面前试试。那条狗一见赵盾就追咬，追得赵盾不得不逃避，就这样将赵盾置于绝境。

在屠岸贾一手设计的谎言中，忠臣成了奸佞，邪恶反而成了正直。晋王信以为真，自然龙颜大怒，屠岸贾借助国王的命令，将赵家三百多口全部杀光了。赵盾一个儿子是驸马，被逼自杀。恰好公主怀孕，生下一个孩子。为了斩草除根，屠岸贾在皇宫门口布下天罗地网，誓必杀死赵氏孤儿。于是便上演了一场义士与奸佞斗争的感人故事。

程婴与公孙杵臼，两个地位低下的门客和仆人，在这个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两个挺身而出了。程婴以给公主送饭的名义，偷偷带出了孤儿。孩子虽然出来了，却仍然没有逃脱追杀，相反引来更大的灾难。屠岸贾命令，要是不交出孤儿，那么全国所有半岁以下的孩子都将难免厄运。为了保护赵家的孤儿和其他孩子，程婴和公孙杵臼两人商定一个就义，一个忍辱活下去。公孙杵臼的话令人感佩：

“生与死，死是最简单的，我只好选择简便的，把难的留给你了。”

这是烈士才有的志趣，唯有视死如归的大豪杰才可能有的情怀。“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庸人的哲学，对于义士而言，赖活着形同地狱。但，程婴不得不赖活着。

程婴去报案，说孤儿藏在公孙杵臼那里，屠岸贾果然就在那里搜出了一个孩子。公孙杵臼在大骂屠岸贾和程婴时被杀了，那孩子被屠刀断成了三截。

谁能知道，程婴交出去的竟是自己的婴儿！

这是真正的做假，然而这假是鲜血凝聚而成，做假的背后，谁能知道程婴的心里时时淌血！我实在难以想象，他的夫人还有勇气活下来吗？他的家里其他人怎样过日子？更难忍的，是他出外必被人唾骂，身后总有人戳脊梁骨，有的还向他扔石头，吐口水。他背着卖主求荣和出卖朋友的罪名，在并不属于他的屈辱和痛苦中度日。

如果能够公然地以泪洗面，大概也能好过一些。可现实不允许他这样。他必须跟屠岸贾来往，必须在那个令他刻骨仇恨的人面前装笑脸。程婴在人们的唾骂中整整过了二十年，直到赵家得以彻底平反。

然而别人欢庆冤案得了昭雪的时刻，留给程婴的却并无欢

乐可言。相反，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日子，竟比盼望复仇更难以忍耐。他的一生，就在这个不属于他的灾祸中耗费掉了。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最大的谎言了。正如董仲舒所说，那些仁人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婴和公孙杵臼，这两位极普通的小人物，却在中国文明史中演出了如此悲壮的一幕！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些让人难以选择的词儿对比程婴的事例，原来并不是最难的牺牲。程婴的谎言催人泪下，读了他的事迹再看世界，天下的造假者还有谁造得如此艰难，而又如此令人痛彻心肺！

但历史长河中，忍辱负重者并不仅仅程婴一人。忍辱负重，这几个字就是由受苦受难组成的，它注定是套在君子头上的枷锁，小人唯利是图，是绝不会为了道义牺牲自己的利益的。

当然，并非所有受此磨难者都背负着谎言，更多的却是谎言的牺牲者。如上所举陆贽，少年入翰林，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皇帝曾经解下自己的衣服为他披上，怕他着了凉；皇帝奔命之时，一时见不着人，竟然涕泗滂沱，赏千金寻找陆贽。一朝皇帝听信谗言，将他贬至荒野，他闭门不敢出，更不敢交朋友，人们近在咫尺，却只闻其名而不识其面。满腹才学却不敢著书，以至郁郁而死。

范仲淹荒政——忧天下而制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两句话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博大的胸怀，他决不会想到，后世会有人以这两句话为时尚，挂到豪华居室里装门面。可笑有些大贪污

犯，嘴里也常常哼着这两句。原来他们将这两句话挂在嘴边一是为自己脸上贴金，二是要求人家这么做，仿佛他自己早就按这两句话修成了正果。

因此，有必要看看范仲淹是怎么做的，以正视听。

范仲淹一生正直无私，他写文章是大手笔，生活上十分俭朴，在施政方面也堪称大手笔。简直可以这样说，他所干的别人干不了。至少在他之后到如今，我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人物。

一是《初潭集》里读到的，说他用人只取气节，而不挑小毛病，有些有毛病或受过处分的人，都被他重用了。在他当元帅守边关时，参谋班子里大多用那些受过贬而又没有重新起用的人。有人对这问题提出了疑虑，他说，人有才能而无过失的，朝廷都用了。若其实真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官吏的谗言，不找件适当的事由起用他们，这些人才就成为废人了。李挚在篇后批道：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而无过者。

遭贬谪，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犯过错误并受过处分的人，范仲淹用的不只是一个，而是很多。从这一点看来，他真具有伟人胸怀。即使载着这两句话的这篇《岳阳楼记》，起因也是因为滕子京遭了贬谪之后请他写的。如果换个沽名钓誉之徒或是个只爱惜自己的人，不写这篇文章不用那些人绝对不犯错误，而写了用了就可能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事实上，那些人都在以后保卫祖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范仲淹给了他们政治生命，给了他们历史中的地位。

这一点今天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如果仅仅说范仲淹是在做好人，那就错了。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也是在上面某一篇里读到的。他在朝当相的时候，有一次拿起官员的任命簿，见到不合格的就一笔划掉了。与他同在

朝廷的富弼说，你这一划不要紧，将会一家人哭。范仲淹反问道，一家人哭比起一路人哭来如何？被划掉的那些人大概都是没毛病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绝对也没什么建树。庸才当官，害的是一路人，这也是范仲淹的观点。因为治国不是树道德标兵。

对比现在某些喜欢扶持提拔亲信的人来，其差距岂止十万八千里！

三是《梦溪笔谈》所载，名叫《范文正荒政》。这篇故事最令人感动，也最了不起。从不撒谎的范仲淹撒了一回谎。这个谎更不会有人去撒。

范仲淹管浙西的时候，吴中大饥，饿死人不少。范仲淹身为一方长官，不但不带领群众抗灾夺丰收，却大搞游乐活动，并大兴土木，盖寺修庙整官舍。吴人喜欢划船比赛，他就让老百姓大搞特搞，他自己每天带头在湖里游玩，那船大概也是比着看谁的更华丽。从春至夏每天不断线，以致居民空巷出游。那里的老百姓还好佛事，范仲淹便召寺庙里的住持们说，大旱之年工钱便宜，趁这机会可以大兴土木。于是大修庙宇，全面开花。他还借机整修仓库和公房，每日投入的劳工上千人。

这种行为跟抗灾毫不沾边，不愁没人打小报告。果然监司给皇帝上了一本，奏劾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

光看表面，范仲淹这些作为的确是个问题。人家都在抗灾，你却在那里玩花样，不说是腐化堕落，至少是对百姓不负责任。要给他处分材料都是现成的。然而这却是陈腐之见。范仲淹在皇帝面前申辩说，宴游及大兴土木，是为了发掘多余之财，以接济贫穷的人家；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借此吃饭的每日有数万人之多；荒政之施，莫此为大。这一年，两

浙都灾情严重，唯有杭州没人逃难。原来他是布下的假相！

其实“荒政”是一着很危险的棋。这个办法不是别人想不出来，我相信也有人懂得其中的道理。但没人敢这么做，更没有几个人愿意这样做。但看今天有些人吧，灾情来了，上面重视，就访贫问苦，走访群众，无论看着还是听着，都那么顺耳顺眼，何苦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带着记者们装模作样“深入”一下，无论解决了问题没有，姿态倒是出来了，上报上电视既有事迹可写又有画面可看。事实上，用这一套捞好处的大有人在。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正体现在他胸怀天下，对自己的前途看得轻这一点上。说他是大手笔，也在于他干在实处。

我们听到过太多的时髦提法：“不摆花架子”，“干在实处”等等，但说是这样说，做却不是这样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面是这样要求的，也就依样画葫芦也这样说。说是说给下级听的，自己该怎么做还是那样做。摆花架子最能够为自己树形象，有几个不摆？可笑自己一边摆还一边号召别人不要摆。还没动身就把电视记者叫上，名曰拍灾情，究竟拍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如范仲淹那样倒是干在实处，但吃力很难落好，不知有几个人肯那样干？其实在灾害来临之前，他并非没有事先准备，早就号召老百姓储粮备荒。

范仲淹荒政游玩，可以说是个弥天大谎，但这谎言里的实质却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相信他是外松内紧的。那个监司的确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那真实就是范仲淹带着人们玩花样。然而他反映的真实里面，却包含着真正的谎言。借表面现象做文章，其实它的目的是要置范仲淹于死地。

真实与谎言，真理与谬误，有时候就这么相悖相斥着。诚

心办事而又善于办事者，怎么弄都成文章，谎言也是大手笔。不干事或者办不了事的，甚至居心不良者，无不打着好旗子，以真实掩盖谎言，如那位监司官员。

谎中有真，真中有谎，这是社会的复杂，更是人心的复杂。辨别真伪的尺度不在于是否真实与谎言，而在于用心。有人家里挂着写有这两句话的书法作品，其实也是摆的花架子。

艺术家的谎言

严格意义上说，没有谎言就没有艺术。无论神话还是描写现实，都不过是现实的摹仿。即使个人的某些体验，凑成文字让别人读时，也经过了虚虚实实的迷团伪装。所谓艺术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美丽的谎言。如果按照严格的实事求是来要求，那么世界上将再没有艺术可言。

有那么一段时间，最尴尬的就是搞艺术创作的。古装戏曲成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遭封杀，现实的生活又有“利用小说反党”的禁忌，“封、资、修”把一切可能涉及的领域都囊括尽了，喜欢写喜欢画的人们简直无处下脚。但人世间不能没有文艺，于是就只好昧着良心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和事件，文艺真的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了地地道道配合中心的宣传。凡是不按那条道走的，一概是反动的。有那些不死心的按自己的标准写了小说在朋友间传看抄写，追查手抄本便成了一时的政治运动。

即使按“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来编造，也还是保不住遭批遭禁的命运。因为不知道上面有些什么须忌讳的东西，莫名其妙就给自己捞了一顶帽子在头上了。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东西成了官方肯定的创作，就事论事套上政治标签成了官方倡

导的创作方式，而艺术的真实却被粗暴地否定了。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荒唐事。

但这些似乎没有了讨论的必要，对于艺术的真实之类的话题，更是专家们的研究课题。我想说的是，不是利用文艺反党，而是利用文艺撒谎。

奉命“创作”

江青当年抓文艺很有一股蛮劲儿。她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号召作家艺术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去“发现”，去“表现”伟大时代产生的英雄人物。她还下指示说：“把他们全都撵下去！”于是各级领导加紧贯彻，坐下来学习，深刻领会，然后把搞创作的往乡下撵。对有些不自觉的，认识不到生活是创作源泉的人，领导们则苦口婆心，启发诱导，最后的结果是“纷纷觉醒”，“一致认为”，“深刻认识到”云云，愉快地到生活中去了。

想想滑稽，几亿人的泱泱大国，就只江青几个懂文艺创作的规律，而搞文艺的都是白痴。她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阿姨，搞创作的成了不懂事的儿童，需要她样的人启发诱导，才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再看看她抓的几个戏，今天还被有人称作“红色风暴”，也颇有意思。被尊称为革命群众的龙套，其实只是一群雕像，没有生命力，除了跟着起哄外没别的。只有几个充当主角的女人比别人聪明，教育你应该这样，提醒你不应该那样。最后是饭桶们经过几番挫折，才觉醒了，才“深刻地认识到了”，于是“纷纷”提高了觉悟。那几个女人被称为样板，据说她们才是从生活中发现的。

原来生活中的英雄就是她们。

悲哀并不仅限于此。据后来的材料披露，那么多大作家大艺术家们，竟也自觉自愿地接受那一套，按上面要求的“高度”去创作，并诚心诚意地请最聪明的卑贱者提意见，改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在代表“工农兵”的领导们面前通不过。先把你打疼，你才认识到自己是幼稚可笑的，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代表在上头。

看来智者也有被搅昏头的时候，产生了把狗洞当高度的错觉。

那时只有我这样的年轻人还不知真正的文学艺术为何物，对编造那些东西表现得积极。“文革”中学大寨时期，我的任务是为剧团编剧本，现在回想就是个行骗的名堂。每年地区都得开创作会，报计划。上头管文艺的领导每到这个时候就要作报告，号召到群众中去“发现”，去“表现”。那报告里的几句话当时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就记在本子上。现在翻出来一看，倒说不出个滋味了。那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要鼓励作家艺术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去发现、歌颂新的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写出反映农民自己生活的、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

这意思是，广大人民群众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的精神产品赶快送去。再往深处一想，岂不是几千年来老百姓都在漫漫长夜中过日子？不幸那时候没长脑袋，根本就没想。

首先，那“火热的生活”其实就是“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之类的政治运动。所谓的“英雄人物”，就是跟那潮流跑的角色。拥护就是群众的积极性，不拥护就是阶级敌人破坏。

最不好理解的就是“农民自己的生活”。什么叫农民自己的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人物或者小人物，都不能免，并无行业分别。既然将生活分成职业的阶级的阶层的，有“农民自己的”生活，那么也就应该有“官员们自己的”生活，“上层人物自己的生活”。不过这样说时又有了新的忌讳。

据说那些运动都是老百姓要搞的，上面不过是顺应了老百姓的要求，为了不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才支持的。这么说时，就是要你写农民种田的东西，进一步地让农民只种田，不想别的。

除了种田不想别的，这种人物是没有的。于是就编。某知青下乡了，来了招工表，城里的爹妈也要孩子回城而暗中使劲，但想到农村建设需要我，便毅然留下来了。还有的是回乡青年，爱上种田了，不愿进城当工人。而劝子女进城的父母们，则成了嘲笑的对象或是团结帮助的对象。爹妈不通，于是子女就满怀深情地唱，唱过去的苦，似乎过去的苦子女比爹妈还清楚。唱得声泪俱下，于是爹妈通了。

要不，就来个阶级敌人破坏。那更好办，将敌人揭露出来，爹妈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将作品的起点定在大家“已经幸福了”的位置，大多批的是老百姓的自私自利。“我们的日子比蜜甜”；“我们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等等，都是唱给台下饿着肚子的社员们听的。所谓的矛盾，说白了就是要老百姓再牺牲一回，而遇到的困难不过是为了比幸福更幸福所做的小小的舍弃。

尽管这样，讨论剧本时往往还是通不过。军代表希望戏里的主角是转业军人，是民兵连长或者积极分子；管计划生育的

要求主角是计划生育的模范，没儿子或者只一个；管方向路线的更不得了，要求把大批判贯穿于矛盾始终。总之，大家都拿着剪子提着水壶，都要为这株幼苗剪枝浇水。最后成了“关于当前运动的形象解答”。

我们就用这类东西去让农民“喜闻乐见”，反正你不想看这样的东西的话，就看不成任何东西了。至于喜闻不喜闻，乐见不乐见，有代表群众的上头说了算。

下乡期间，看戏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还以为自己的戏编得如何成功，以此做为农民欢迎我们的节目的实证。

到地区会演，还能得奖，越是糊弄人的东西越能得奖，只要你歌颂学大寨的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拥护就行。至于是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不用管的。盗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名义，说学大寨激起了农民的热情，也不可能有谁敢来声明那是有人冒充农民说的。

真正“原汁原味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饿死人，是讨米要饭，是有干部为非作歹，为了政治目的不惜让老百姓受苦。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但那是所谓的“阴暗面”，那些当权者不承认是生活的主流。

原来“生活”不在生活中。

只有到了现在，我们才敢于公然地说：农民很苦。谎称学大寨让农村一片繁荣，这种虚假也有我们搞文艺的一份儿责任。我们或多或少地都曾经用笔撒过谎。

所谓历史的真实

我们经常在电影或电视片头上看到如下声明：本故事纯属

虚构。有的索性还加一句：请勿对号入座。可见搞文艺的不好办，须忌讳的东西很多。

不过这种声明恰好告诉大家这正是欲盖弥彰。如果作品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何必要如此声明？既然要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正说明你就是刻画现实的。而《聊斋志异》却无须作如此声明，谁都不会认为那鬼狐是说自己的。

但搞历史题材也不好办。针对最近历史剧四面开花现状，各种报刊不时出现呼吁改编历史剧“要尊重历史”的文章。这种呼吁乍一听似乎有理，但认真一琢磨，倒有那么点似是而非。说有理，是你的确不能把侵略战争“改编”成正义战争，也不能把秦桧那样的奸臣改编成好人。说似是而非，是艺术的真实跟生活的真实不是一回事，作品要告诉人的是跟今天有关的道理，而不是考证历史。至于一般的人和事，不过是借

用的代号而已，未必就值得扣上“歪曲历史”的帽子。

现在有些人有严于律己宽容待人的好品质，可以原谅古人的作品，原谅港台的作品，对自己创作的东西总是说三道四，却又不是认真的文艺批评。香港的《戏说乾隆》赚了大陆人不少钱，电影《大话西游》更谈不上尊重原著，大家都喜欢看，并没有让看电影电视的糊涂得



欣赏文艺应该有懂科学的人陪伴

弄不清历史的真实了。再说古人的作品吧，也不见得都那么准确，如中国差不多所有的文艺形式中，刻画出的曹操都是一副奸相。曹操的胸襟和作为都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慈悲心也未必就比刘备更少，是非观更不是一塌糊涂。可是，他却是个奸雄的形象出现在后人的眼中。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总概括下，众口成碑，曹操就永久地成了一个坏人。

假如按历史的真实来要求，四大名著大概都有问题。

说古是为了今，说神是为了人。拿《西游记》为例，说的是神话鬼话，展示的却是人情。举个例子吧。

某一天，唐僧师徒四个走在路上，大概是都心平气和吧，孙猴子就给唐僧提意见，说唐僧对自己不公平。他说一路上没路了找我，没吃的没喝的也找我，遇到妖怪更要找我。可是我受的磨难最多。你动不动就念紧箍咒，疼得我死去活来。可猪八戒呢，贪吃贪睡还好色，一遇困难他就要分行李回高老庄，还背地里打小报告挑拨离间。更可气的，是我每次要教训他的时候，你就护着。这番话也正是读者憋气的问题，经孙悟空提了出来，反映了我们的思想。但接着，唐僧的一番话让我们明白了更深刻的道理。他说，我知道有些对不住你，可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凡事可以自己化解。猪八戒就不一样了，他的毛病很多，又没用，要是我不护着点，他怎么办呢！

是呀！鞭抽快牛是世界上普遍的问题，单看这点的的确让我们气不顺。但唐僧的话点穿了世相的另一面：

老娘疼的是无用无信的儿！

这不仅是某个单位某个家庭的现象，甚至每个朝代的帝王都如此这般。看看历史，那么多忠臣义士都没有好下场，那些暗中捣鬼的却处处受保护。即使阴谋被戳穿了，即使没有皇帝

护着，正直的人们也不愿意把聪明才智用来跟这些人一争长短，往往也原谅了使坏者。

放着这样的机关看不出，却去考证有没有孙猴子这么个人，或者说把伟大的玄奘丑化了，就不光是作者的悲哀了。

前不久看到一份资料，说是在历史档案里，前人对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名人的画像，跟我们印象里的人是两码事。比如李白，以他的那么多豪放的诗来推测，那一定是个风流潇洒的美男子，但那里存的李白形象大概颇有些伤我们的感情。再如张飞，并非一个只会喝酒打人的黑脸汉子，而是一位俊俏的白面书生。纪晓岚是个烟鬼又是个大胖子，而且是个好色之徒，但没有人愿意将他想象成这副模样。那个人人喜爱的寇准，也曾到王旦那里要官当，还在皇帝面前对王旦飞短流长。那个让人敬佩的狄仁杰，也曾为自己的侄子（有说是姑表弟）谋过私利，也曾在武则天面前有过对别人不公平的语言。这些，都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因此他们出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时，充满了浩然正气。文艺家们顺应老百姓的心愿，在创作时给予了添加或割舍。

即使现在，屏幕上银幕上出现的那么多古人电视电影，无不是在借古人说今事。雍正的改革措施，刘镛的不畏权势，和瞭之流的贪赃枉法等等，都在告诉人们什么道理。不然的话，仅仅为了让观众满足对古人古事的好奇心，是不可能达到预计的收视率的。即使《西游记》里的四个主人公，也无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功高的孙悟空动辄挨整，贪色懒惰又爱打小报告的猪八戒却受到庇护，一本正经的唐僧让人既佩服又恼火，还有充当基本群众的沙和尚让人同情，都如寓言仍在现实生活中起着参照的作用。

看看具体的文艺作品，更能认识到这一点。秦香莲的故事

家喻户晓，那个陈世美成了负心男人的代名词，这个形象被创作出来，针对的就是世上的负心汉。但据说历史上的陈世美并非戏台上的陈世美，“尊重历史”一说在这个故事里是不存在的。《西游记》里除了唐僧有那么点影子之外，其他几个人物全是编造。还有，张飞并不是那么黑，关公也不是那么红，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曹操也并非那么坏。严格这么一扣，那么舞台上演的就是历史，而不是文艺了。

再说史籍中的历史就真的是历史的真实吗？未必。

作品中负心的陈世美或黑脸的张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作品所要陈述的不是那人是真是假，而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老百姓骂的不是陈世美本人，而是所有的负心汉。他们把现实中的人物和事情跟故事中的情节联系起来了。

即使当代创作的作品，也跟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小说戏剧所虚构出来的人名，很难保证没有跟现实中的真人撞车。如果按照某些说法来套，那么任何名字都不保险，今后取人名只好用代码了。

艺术的迎合

“文章合为时而作”，听这意思，那文章就包含着迎合在内了。不过好在他是说“为时”，并没有说为什么样的时。所有现实需要的都是“时”，就看你怎样“为”了。

耍笔杆子的都免不得“迎合”二字，或迎合读者和观众，或迎合官方的需要，或迎合权贵以求得晋升的机会，或迎合现实的时尚。

在中国，知道老子和老子的《道德经》的人是少数，知道

太上老君和八卦炉的却多得多；知道释迦牟尼的更少，如来佛和观音大师的名声却堪称家喻户晓。那些在古刹烧香磕头的人们，朝拜的并不是老子 and 释迦牟尼，而是菩萨，他们并无一个对佛教道教的本义感兴趣。

传说或作家对神佛的创造，包括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们对佛道的解释，迎合了芸芸众生的心态，于是将艰深的“佛法无边”的哲学化为了媚俗的现实交易，将几位哲学鼻祖变成了管闲事混香火的俗人。要发财，要升官，要报仇雪恨，要生个儿子，都可以找他们。如果不俗，哪有那么多的香火！

这是为迎合善男信女的创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老百姓广泛接受的佛家语言。许多现实的人物和故事，也就在这一心愿下被创作了出来。秦桧“疽发背死”，为了迎合老百姓对恶人的愤恨，索性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再变成乌龟，老百姓便长舒了一口气。《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爱情悲剧。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就那么死了对不起观众，就让他们双双化为彩蝶。不然，观众面前是通不过的。遍布中国城乡的古刹寺院，寄托着老百姓的希望，现实难以解决的苦衷，只好求助于神佛了。《丰都鬼城》，就是文艺创作的延续。《秦香莲》里让包老爷铡了陈世美，皆大欢喜。

这是迎合向往美好的人们的创造。

迎合就要撒谎，不过这些谎言顺应了老百姓的思想感情，要达到的目的还是惩恶扬善，歌颂正义。虽说让有些历史人物担待了些冤枉，但并无在大是大非面前颠倒黑白，也算不错。

最令文人不堪的就要算迎合时政和权贵了。为了让权贵们高兴，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必须的作业。唐朝高宗皇帝时候，每到一一个什么节日，宫内就张灯结彩，达官贵人们游园赏景的同时，还要弄一大帮子文人墨客随身听用，并命令他们即时赋

诗作文。那个上官婉儿因此当上了称量天下名士的裁判。直到玄宗时，这一套不但没改，反而还进了一步。那个王维为了跻身于贵族行列中，也不得不走公主的门路，为那个女人写诗，操琴。

二十世纪一段时间，奉命创作的格式成了“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编造着并不存在的所谓“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那些作品起着棍子的作用，专门敲打不满现实和跟不上伟大步伐的人们的。写那些东西据说都是被逼无奈，但都是事情过后的声明，真的假的弄不清楚，绝对没有人承认他是以此为敲门砖的。

到了今天，对比以往，可以说是文艺创作的最好时期。然而为迎合某种需要的写作仍然存在。那么多诲淫诲盗的地摊文学，就是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图金钱的做法。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其实谈不上“实”，为了迎合热点卖点，不惜糟蹋当事人，有的干脆就是编造。还有那些发行量很高标榜所有故事都“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杂志，赚取人的眼泪的故事，原来都是编造。

为谁而写？写给谁看？高雅的人说是“不为什么而写”，或者说“为自己而写”。但事情总是跟我们自己的宣言有距离。才涉水者揣摩着编辑的心思，要出头的研究评论家有什么动向，要得荣誉的看哪种类型可以评奖。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滑稽事：许多剧团花巨资排出的戏到北京评上了奖，观众却并没有看到；或者专家的评价很高而观众却很不愿看。

上级满意了就等于人民满意了。

办刊物不能太离谱，不然办不下去。但也不能没有棱角，不然没有人掏钱订刊物。于是在一个大方面肯定的前提下，将一些中下层干部弄出来当了腐败的代表。那样读杂志的出了

气，审稿者又能够通过，却不管是否是事实。有的如此写作，竟然百发百中，甚至得到了盛名。有些杂志专找热点登，有的便专找热点去写。还有的为了得到评论家的肯定，便在形式上标新立异，以达到快速引起注意的目的。

所有搞腐败的贪官都是副手。不是副书记就是副市长或是副厂长。尽管生活中查出了那么多大案，罪魁祸首皆是身负要职的一把手，何以在文艺作品中一反映就要变成副手呢？这就可以用上一个专用的提法了：

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

健全法制，根除腐败，到处都是这么说的。可是文艺作品似乎不是这个观点。时代需要当代包青天——有的作品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人民的作用是被调查或表示痛恨；人民的权力的体现是惩办坏人之后拍手称快；法的作用是让清官把腐败分子送那到法那里去……

这么一看，封建时代也就不能算无法无天了。凡破案的官儿谁没有找老百姓调查过？包老爷要铡陈世美，也是翻了法律条文的。以此体现人民当家做主和法治的意义，实在谈不上进步。让老百姓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清官好官身上，将根除腐败和丑恶的落脚点建立在身居高位的干部个人的品质之上，就是个大大的谎言，也是对法制的嘲笑。

这样的作品很受欢迎，到底是该惋惜呢，还是该鼓掌？

再如人为因素造成的祸害带来了经济的萧条，让老百姓分享艰难而不是分享幸福，很难说那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说谎的艺术家

前不久一位女作家访问法国，在某一团体召开的什么会议

上，遭遇了一个从大陆去法国的也称为作家的人。那人在会上控诉中国政府，说什么文学与政治挂得太紧，在专制制度下创作被窒息，许多人都不写了或者写不出来了云云。这位女作家实在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拍案而起，不客气地对此人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她说，写不出来或没有才气，就归咎于政府，是骗人骗自己的鬼话！

的确，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作家首先说话得实事求是，但这位所谓的作家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来都没有过对某个文艺作品兴师问罪的事情发生，尽管有对某些作品的倾向并不赞赏的文章，也没有因此就打棍子，更没有因作品跟作者过不去。这些，只有从当年窒息中走过来的人才感受深刻。这位显然并没有经过那样的时期。

权且承认此人所说的现状是真的吧，真正的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因为外在的原因就真的窒息了。曹雪芹作《红楼梦》时才叫真正的专制，政治的高压不可谓不大。但却怪得很，外界的压力反倒成全他完成了一部惊世之作。他将“真事隐去”，作“假语村言”，披阅十载，十年中并不仅仅为了艺术的锤炼。他怎么又写出来了呢！

再大的压力也大不过文革时期，不照样有手抄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传抄吗！至于跟政治挂得太紧一说，更是站不住脚。《马赛曲》，《国际歌》，都堪称革命文艺的典范。即使富兰克林的《独立宣言》，也是一篇上好的散文。

借外界有压力的名义，不过是要遮掩才气的不足。

才气不够也不是什么坏事，人人要吃饭，最多不过碗里差点，总不能个个都成曹雪芹。才气不够却偏想当大师，或者东方不亮西方亮，想以别的套路达到出名的目的，那才叫悲哀。

其实这样的人很多，表现的方式也各种各样。不过有其共同点。他们自己江郎才尽，或者从始至终就没有过才气，而又出版欲望强烈，就将出不了作品的责任归为外在的原因。有人当作家或许就是个误会，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十分偶然的机会进了作家这个行当，并且享受惯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作家待遇：只要写得出就必定能出版，只要出版必定有人掏钱买。市场经济打破了那种格局，读者可选择的更多，便不舒服了。

在一些场合，总有人发牢骚，说出版社只出赚钱的书，比如地摊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出版社的书号，“我们的书不赚钱，不愿出版”。言外之意，即自己的著作是属于好书应该出版，而出版社不给他这个方便。

有没有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却无缘出版的？肯定有。对这种现象已有过不少的批评文章见诸报端。但人们呼吁的是对学术著作的态度，并不是小说之类的文艺书籍。说这种话的显然将自己的作品跟学术著作混淆了。不错，地摊上的确有许多上不得台面的读物，但这种现象除了证明文化市场需要整顿之外，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问题。

这些人怀念的，不过是当年少数几个写，全国人民争着读的美好景象。对创作的概念，也是按我们习惯了的模式炮制，这些显然都不适应今天的读者的审美标准了，于是便有些落寞。

造成某些人落寞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另一些人由国家出钱的“自费出书”。名曰自费，却是国家拿钱，据说是好书。对这种情况许多人不懂。既然是好书，却又走不进市场。如果说凡好书都没有人买，那么“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一说岂不是谎言？答案只能有一个：要么书不是自称的那么好，要么老百

姓不懂好书。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连字都认不清楚的人们，居然也能出一本一本的书，而且销量不错。市场的奇迹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作家，以为这就是成功。于是他们也到处夸夸其谈，讲他的成功之道，甚至还教年轻人如何写作。

出版不了的与出得多的，都不会承认他们的才气有什么问题。

其他方面军的现状也并不值得恭维。比如某些书画家们，玩的就是另一种套路。

在某些拍卖会上，一些人的作品价格猛地飙升。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自己在那里做假。艺术家的经营头脑比对艺术更娴熟，在熟悉艺术之前就先学会了经营，是艺术家的觉醒呢，还是艺术的堕落？假如你跟当今某些“艺术家”多接触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谈技艺提高或艺术交流的很少，他们随时都在谈钱。谁的字卖了什么价，谁的画在香港或别的什么地方卖到了多少万。

还有人一直处于尴尬中，肚子里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水平，表面却永远不愿承认。如某些名气很大的大师级人物，叫得震天响的作品实在不敢恭维。但是却怪，大家背后都说不行，当面又一致叫好。大画家不懂色彩，就是个叫人喷饭的笑话。当然有人也说：“有几幅还可以。”如果是对初学者评判，这话当然没错。问题在于我们的对象是被人称作大师的，既是大师，话就应该倒过来说：“有几幅不行。”说到底，原来那巨大的名声不过借助了官衔的动力，再加自己名分的便宜做秀做起来的。送高帽子者的恭维之辞，并不是送给画家的，而是送给什么长的。

我们当作家的书出版了或是作品发表了，并无什么反响。

这对熬更守夜的我们实在是不轻的打击。于是便请评论家们写篇文章吹捧一番，或是请有关单位开个作品讨论会，让到会者说几句好话。然后请大家上馆子，答谢大家的抬举。有本事的还将请电视台的人出马，在电视上露脸，讲他的书如何如何。

所谓的炒作、包装、作秀的套路，说穿了皆是假！

谎言之恶

当天下谎言横行时，这个时代就值得警惕。无论撒谎者是谁，正直的人或者奸佞小人，撒谎都是个危险的信号。小人靠谎言起家，说明当权者已堕入昏庸，或者正在利用小人干歪事；正直的人撒谎，说明君子处境不妙，真话已经无人肯听也不起作用了。

人们痛恨谎言，大多基于感情和情绪，真正谎言的恶果，未必有多少人去思考。在这里，不妨展示一下历史的教训。

谎言亡国

在上面所举的赵高、李林甫、卢杞、秦桧这样一些奸人的例子中，皆是因撒谎而丧了国的。如果仅这样一些大事，历史倒也好总结。问题是并非所有的谎言都是这么直观。

西周的最后一个皇帝周幽王，可以算作以谎言骗人却最终却骗了自己而后亡国的先例。与他并存出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美人褒姒，一个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烽火戏诸侯更像是个“狼来了”的寓言。

那个褒姒据说是妖魔化身，就如典籍中编造出商纣王身边

的妲己是九尾狐一样，那个美丽的女人也是专门来断送周家王朝的。这么编造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帝王的恶行和罪责减少些分量，让人相信天下的丧失是天意安排。那个美女不笑，周幽王为了哄她笑，什么办法都想遍了，某一次给她那么多美丽的绸缎，她还是不笑，周幽王气起来将绸缎撕掉，她才露了点笑的意思。周幽王见撕东西可以让她开颜，就专门让人在她面前撕绸缎。可她也就只笑了那么一下，就再也不笑了。于是，便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故意点起烽烟，让诸侯来救他。诸侯们来了，才知大王仅仅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而开的玩笑。后来敌人真的打来了，再点起烽火时，诸侯们也就不来救了。周幽王以谎言戏弄诸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结果，他自己戏弄了自己，不但将性命赔进去了，也断送了西周数百年天下，因此在历史上，他与他的老祖宗周文王周武王同样有名。

这是典型的拿国家大事开玩笑。

其实追溯起来，所有的亡国之君无不是为谎言所误。“国将乱，必出奸人”。这是说，出奸人只是国乱的征兆。其实这还是为当皇帝的开脱。其实话应该颠倒过来说：国出奸人，必乱。秦始皇厌恶人家说死字，所以到死也没有人敢说他的病很严重。秦二世不愿别人说天下不安，赵高就让他玩个痛快，连大臣都不见。隋炀帝相信自己是个文武全才，没有人敢夺他的江山，身边的人便压下所有告急的文书，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知道天下早已不是他的了。有的是制造谎言糊弄人家，最后只得自食恶果，如这个周幽王。有的则是糊弄别人的同时也糊弄自己，比如最早的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桀。

据说关龙逢眼见得夏朝天下危在旦夕，劝夏桀不要再沉湎酒色，不要滥杀无辜，劝他多听听大臣的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亡国的。可夏桀竟狂妄地说，我有天下，如同天上有太

阳，什么时候太阳亡了我就亡。处在他那个位子上，的确看不到危险。宫里物资丰富，便看不到饥饿灾难，大家屏声静气，便听不到不满的声音。他要什么有什么，看见的只是顺从，他一言九鼎，无人敢不听，听到的是赞歌和“万岁”的朝拜声，他不会相信这个天下还会亡的。他认为关龙逢是在故意跟他作对，将关龙逢杀了。

他被自己的谎言所骗，天下都是清醒的，只有他一个人是糊涂的。当敌人打来时，他才明白顺从他的只是极少数，其中还有高压下的顺从，身边的这些人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他被取代他的汤流放于南巢，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不要几下就拖死了。

隋末，天下到处有造反的，各郡县每日的加急文件如穿梭送往京城，可是那个虞世基就可以按下不上报。于是“盗贼遍海内，陷没州县，帝一无所闻”。隋炀帝以为天下无事，依然甜蜜蜜在深宫女人堆里玩花样。

谎言杀人

没有哪个奸臣没有以谎言杀人。但谎言多种多样，杀人的方式也不一而足，那种杀人也就不谈也罢。

曾在一份杂志上看到外国一则小故事：某大学几个同学晚上喝酒，有一人喝醉了，同学们就跟他开玩笑，将他的周围放满鲜花，插满蜡烛，布置成送死人的场景，看他醒来会怎样反应。半夜里那人醒来了，左右一看，屋子静静地，弥漫着鲜花的幽香，烛光摇曳，衬托出神秘的气氛。他体会到了死的平静和安适，以为自己真的死了，便再躺了下去。人们去看他时，原来他真的死了。玩笑造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是这几位同学始

料不及的，他们以昂贵的代价，证明了谎言可以置人死命。

但如果存心害人呢？可以肯定地说，谎言是杀人的最好的武器。所有的冤案，都是谎言造成。因冤案致死者，皆是为谎言所杀。

谎言杀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两国交战时的反间计就是常用的。《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利用蒋干盗书，让曹操杀掉了两个投降教北军水战的头领。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很多，现代战争中也少用，都是这类方法。

但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提醒的是平常人，对付的是平常的日子，防备的是身边的小人。在闻不着硝烟的和平时期，应用这一套害人的多是小人，他们要达到目的，什么道义什么报应是一概不管的。

欺上与瞒下，是小人性格的两个方面。考察这类人物害人的手法，一般而言，都必定窃取了一定的权力，并有人为他撑腰，攀附主子然后利用主子的命令才能整倒对头。小人无论怎么坏，没有后台的权力也是不行的。

秦桧杀岳飞，那句有名的“莫须有”，就是个天大的谎言。假如秦桧没有相印在身，假如皇帝没有依仗他，要害死一个带兵的统帅谈何容易。朱仙镇那个秀才对兀术说的话，真是读破了中国历史后的箴言：“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那个飞将军李广，曾为大汉江山的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最终没有死于敌人的剑下，却被自己人以违反纪律的罪名杀了。还有宋朝那位投靠大宋皇帝的杨业，也是在这样一种进是死路退为叛逆的绝境中，含恨战死沙场的。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为馋言所害，被楚王囚禁，摆在他面前的就再也不可能有常人的人生了。要逃命就是叛徒，要忠于祖国就是死路一条。纵看历史长河那么多让我们下泪的悲剧人物，无不是悲剧

的处境，摆在英雄面前的，往往就是这样一条进退两难的道路，从这些圈套里爬出来的，实在是少而又少。

但也的确有爬出来的，那是一些智者。

战国时候，秦王派甘茂约魏国共同讨伐韩国，甘茂担心朝中是非太多，秦王日久对他疑心，便跟秦王讲过曾参母亲的故事。他说鲁国有人跟曾参同名而杀了人，人们误以为杀人的就是那个有名的曾参，跑去向他母亲报告。第一个人跑去对他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根本没有下机，也没有理。接着又来一个，报告同样的消息。到第三个人来报告时，曾参的母亲就投杼翻墙而逃了。

报告曾参母亲说她儿子杀人的，并非有意开玩笑或是害她，只不过以讹传讹。但几个人重复同一个谎言，就足以使她对儿子失去判断力，可见谎言的杀伤力多大。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体现。甘茂以这个故事告诉秦王，他最怕的不是攻不克敌人，而是背后的暗箭。他直接了当地对秦王说，我的贤抵不上曾参，大王你对我的了解比不上曾参母亲对儿子的了解，而将来背后打小报告的也绝对不止三人。秦王于是跟甘茂有了息壤之盟。

甘茂出征，打宜阳时五个月不克，秦王每天都接到对甘茂不利的谏言，终于后悔了，要求罢兵。不过因为有了息壤之盟，甘茂没有听他的，最后才打了胜仗。假如没有那个息壤之盟呢？甘茂半途而废，即使保住一条命，也背上了洗不掉的污点。

围在君王身边的人们，他们对前线的评头论足，都对前方将士产生严重影响，奇怪的是，为将军们说好话的往往有祸及自身的危险，说坏话的反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司马迁为李陵说了一句话，结果是差点儿掉了脑袋。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

不得不忍受后半生的奇耻大辱。可说坏话的呢，被攻击者如果没有被害死，又往往因为不屑于与人小计较，都无一例外地被容忍了。

北宋时候的狄青，作战有勇有谋，对朝廷忠心耿耿，对下级也很关心，很得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在他当将军的时候就帮助过他，曾勉励他说，将帅不知古今，只能是匹夫之勇。狄青从此发愤读书，读遍了秦汉以后所有的兵法。后来累建奇功，功德厚。不幸带兵的将军终不及玩权术的，竟死于文彦博一句话。

狄青当枢密使时，那些文官对他嫉恨，看他不顺眼，就说他居功自傲。为此，文彦博就向皇帝建议，让狄青到边疆去当节使。狄青认为这样安排不公平，向仁宗皇帝说，如果让我去当节使是奖赏，我没有功。如果是要借此贬我到外蕃，我又没有罪。仁宗皇帝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这样安排不大好，转而向文彦博传达这个意思，并说狄青是个忠臣。可是这个文彦博却来了一句让皇帝回答不出的话：

“太祖（赵匡胤）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可是他得了军心，所以有了陈桥之变。”

皇帝一听，回答不出了。

赵匡胤靠笼络军队篡夺了后周的皇权，后来假说是军官们黄袍加身，逼他当皇帝的。原来狄青对下级极体贴，兵士们衣食充足，常说这是狄爷爷所赐。文彦博夸大其辞，把将军关心士兵的好品质说成是图谋不轨，并且扯出皇帝的老祖宗来比狄青，就是要置狄青于死地。

狄青意识到有人在皇帝面前说了对他不利的话，要到中书省文彦博那里去申辩，却并不知道正是文彦博搞的鬼。文彦博直瞪着眼对他说：“要你去镇守边关没有别的事，不过是朝廷

对你产生了怀疑。”狄青吓得差点跌倒，只好听从命令到边关去了。

狄青到任上了，心头却蒙上了阴影。文彦博还不放过，每月两次派中使去那里转一圈儿，又没有特别的使命，实则是制造恐怖。狄青每当听到中使要来，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不到半年，就因惊惧而病死了。一个忠臣名将，就死在这种毫无道理的谎言中。

居心叵测者害人，并不用大谎，那样容易穿帮。最好的办法，是永远处于“言者无罪”地位的小谎言。“听人说”，“好像是”，“群众议论”，叫你查都没办法查。但正是这些拈不起舀不上的小事情，就将人置于了永难翻身的境地。

谎言酿灾

据《清代稗史》载，咸丰四年，黄河决堤，溃口在开封西北的铜瓦厢。然而从道光年间开始，每年拨给黄河南岸防灾的款项都达五六百万两白银。每年这么多钱拨到修防护堤上，即使筑铜堤铁坝也绰绰有余。可是有那些领导“抗灾”的官员们捣腾，花在修砌堤防上的竟不足十分之一，绝大多数被管工程的官员们乱花了，不是吃喝玩乐讲排场，就是中饱了私囊。

这些人掌管着大笔的款项，便成了老大，各种人物都向他们靠拢，帮助他们花钱玩花样。比如数十只小猪才做一盘菜，其办法是用木棒残酷地抽打小猪，直到抽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就割脊背上那么一小条肉。其他整动物的名堂还多。天天有宴席，处处有歌舞，吃了玩了还不算，还要享受第一线才有的辛苦费。冬天有烤火费，夏天有降温费，大节小节都有名目捞钱花。想必前去慰问的老百姓也不会少。

汛期一来，发财的机会就到了，争着要深入第一线去。哪个被派到工地去几天，大家都羡慕不已，因为不管你去工地干不干事，总是深入工地了，回来就又要捞上一笔。假如长期泡在工地，捞的好处更多。当然，到“第一线”的资格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捞到的，唯有跟头儿关系好的或是有来头的人物，比如是上司的亲戚朋友，才可能有如此待遇。

把抗灾当肥差，听起来可笑又可气。可是认真一想，其中的道理自明。那些人每年向上报的材料中，定然少不了添油加醋的典型，甚至还有催人泪下的故事。皇帝高高在上，只说在第一线的人们都是百姓的好公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那都是些制造谎言的专家。假如黄河不决口（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和骗取的荣誉将无人知道，黄河的溃口给了那些家伙无情的一嘴巴，才使人们如梦方醒。可是，捞好处的已经捞了，惩办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更主要的，是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再怎么惩办也是无可挽回的了。

抗灾，多么壮烈的行为！谁能相信，这壮烈的背后竟隐藏着丑恶！

这是过去的事情，几百年过后的今天，这种丑恶仍然存在，除了不敢公然在抗灾中讲排场之外，其他方面未必好多少。长江发大水那一年，记者们采访先进事例时，雷同得最多的是某某人“拔了吊针上前线”。这种典型一多，就让人产生疑问，仿佛那些英雄都在这同一时刻挂吊针。其中有谎，谁都看得清楚，但在特殊情形之下你还不把他们怎么样。果然过了不多时，就有那么多防洪堤坝的豆腐渣工程曝光。

原来在那些令人感动的报道中，也夹杂着怀着下流动机的人物！

领导者未曾动身就把电视记者叫上，美其名曰拍灾情，实则拍自己深入第一线的事迹。如果是个干实事的，何以就离不开搞新闻的陪着呢？除此外还有个怪现象，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给本地的新闻单位下过指标，在某某级报纸上、电视上，要上多少条本地新闻，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些力争要上到某级版面的所谓新闻，说穿了其实就是为本地的主要头儿涂脂抹粉，这与人民的生命财产毫不相干。

兵祸、天灾，差不多贯穿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全过程。中国的老百姓似乎都习惯了灾害下的磨难，即使日子过不下去了，也各自咬住牙关挺住，绝不埋怨当官儿的，更不知道还有理由讨说法要照顾。有这样的老百姓，最无道理也最令人不堪的，是人的谎言带给他们的无妄之灾。

所谓谎灾有几种，各自表现的形式都不一样。

为了政治需要而制造灾害，是其中之一。翻开史书，那些政治家军事家为了夺取胜利，放火的，毁坝的，从来就没有断过。读《三国演义》时看到水淹七军，读者读得畅快，却没有想到那场大水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麼。他们庆祝胜利之时，却正是老百姓哭天无路的日子。

不过这还是明的，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都干在明处，也在所难免。最可恶的是那些政治野心家为了栽赃对方，而不惜制造的灾难。我在收集刘文彩的有关资料的时候，研究了四川军阀混战的历史。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四川的各路好汉都想独霸全川，借了北京政权的牌子各自发展势力。最早追随蔡锷将军讨袁世凯的刘存厚为了击退盘踞四川的黔军，两方在成都打起来了。戴湛领导的黔军大肆抢劫，并放火烧民房。刘存厚为了让四川老百姓恨黔军，也争着放火诬陷对方，两方都在成都放火，仅烧死的人就多达六千多。可他们谁都不认这笔账，都

大叫大嚷对方不是东西，都愤怒声讨对方坑害百姓。

后来刘文辉与他的老同学邓锡侯在岷河相峙，邓锡侯为了阻止刘文辉的部队渡河，将都江堰上内江分水码砍断，以提高岷河水位。刘文辉就干脆用炸药炸毁了飞沙堰，致使水泄外江，让岷河水下降。这么一弄，内江遭水灾而外江大旱，两边的农田都种不成了，坑害的全是贫苦的老百姓。可是这两个人开足宣传机器，大骂对方不恤民情，破坏水利建设。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造假，是直接引发灾难的原因。比如近年披露出来的基础建设中，因为贪污工程款，不惜官商勾结，将工程包给自己人，材料上以次充好，建设中以假乱真，这在已曝光的新闻中常常见到。防洪大堤、高楼大厦、公路大桥等等，都有豆腐渣工程存在，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些都是谎言带给人民的无妄之灾。

还有人为了升那么一官半职，虚报成绩，捏造产量。所有的造假都是谎言，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多报的所谓业绩，都将在老百姓那里榨取亏空。上了些年纪的人们不会忘记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大办钢铁、亩产多少万斤等等，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皆是谎言的结果。平心而论，现在的干部造假而捏造出的成绩，多数除了给自己带来好处外，危及到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可那时候，粮食统购统销，你虚报的产量必须跟上交的任务挂起钩来，地里“增产”了，上交的任务也就要增加，实际没有那么多粮食上交，怎么办？全部由老百姓承担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人为的谎言造成。

将人祸嫁祸于自然，同样是谎言！

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吧。先是办食堂，共产主义早来到，吃饭不要钱。一个凭空想出来的虚假共产主义产生于领导的头脑中，全国便罄其所有来证明这个假共产主义的存在。大家都

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人敢于戳穿那是个谎言。

紧接着是全民办钢铁。“青壮炼铁去”，地里无人收，原本已经吃空了仓库，眼看已经成熟的粮食却不得不扔下不管。为了那一千二百万吨钢，不但荒了地，而且砍伐了大片的原始森林。最后的结果，是树没有了，能用的铁却没有炼出来，只剩下报纸上的成绩躺在档案馆里。

等大办钢铁结束时，当年的粮食没收起来，仓库里的存粮却早已吃光了，第二年种植的时间更没到，老百姓碰上了要命的时刻。中国大地顿时一片萧条，到处都是走路摇摇晃晃的农民，饿死的人至今都没有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字。

工业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又成了第一等的大事，于是号召增产，便又出现了另一种卫星：亩产多少万斤！这里放卫星，那里放卫星，这里亩产三千，那里就亩产三万斤，后来居然亩产达到了三十万斤！

那个谎言一环套一环，范围之大，危害之烈，堪称空前绝后。

事情过了多少年后，访问当时的虚报者，他们竟也表示痛苦，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原来那产量是上头逼着报的。报多报少都有利害在其中，说怪话的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正大家都在撒谎，我们不撒谎就要挨批评，就要吃亏。于是便上下一起撒谎。

全民撒谎，过后哈哈一笑便罢。可是想想当时的惨景吧，饿死的无不是不知撒谎捞好处的老百姓，首当其冲的是无辜的种田农民。那并非他们懒堕造成的，更不是后来批他们的所谓自私落后造成的灾难，却要他们用性命承担了直接的责任。

接着，为了掩盖真相，再制造了第二个谎言：自然灾害！

凡制造谎言的，制造者本身是第一个清醒的人。能不能

说，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的谎言也不过是要获取一个真实呢？彭德怀为了证明亩产到底有多少斤，竟然自己种了一块地，用最好的肥料，用最好的管理，结论是连两千斤都难以达到。他用自己的努力，证实了一个大家都懂的东西。既然亩产多少万斤的神话没人相信。那么他要向谁证明、证明什么呢？

今天是否都实事求是了？远远不是。近几年光媒体披露出来的事实，就足以触目惊心。举个小例子吧。据某报载，某地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上面要税，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预收。按我们外行的脑袋想问题，是先有了交易然后才有税，那交易还没有发生，甚至不可能发生，那么交税一说就不能成立。可预收就是有指标的定额。春天预交秋后的税，不知是如何计算的。

某村支书交不上，就找人家借钱预交。过了不久，支部改选，支书换了人选，所借的钱人家不找集体却找他，那笔债成了私人的欠款。要钱的不断，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最后含恨上吊自杀。这到底是支书做假呢，还是上面逼迫下面造假呢？无论是哪一种，它都给人民带来了灾祸。

电视中还播放过一条新闻：某地学校为了应付上头检查，竟然从其他地方弄来许多学生充数，仿佛就学的人很多。记者一问，大多不知道来干什么的，许多不是本地人，而且根本就不是学生。另一件事是某县为了制造所谓养羊致富的神话，将路边撒盐水，找四乡借来许多羊。远处山上，就让小学生披上塑料薄膜在树林里钻，远望倒真像是满山的羊。路边有一户人家不会说话，怕他们露出了马脚，就让干部冒名顶替，暂时当那家的主人。

.....

这些鬼名堂幸亏都被戳穿了。假如不是聪明的记者多长个心眼儿未让他们蒙混过关，结果可想而知，都将是老百姓承担

这谎言的恶果。在谎言圈里，戳穿的毕竟是极少数，那些没有被戳穿的继续在坑害着老百姓。

谎言冷人心

在前面讲过卢杞杀人的例子。那些反叛的军人们，有许多都是被他逼上绝路的。比如李怀光，千里勤王，与君王近在咫尺却不能见一面，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临撤走时他悲哀地说：我现在被奸臣排挤，其下场可知。他因此也扯旗反叛了。

北宋时候金兀术进攻中原，十万人马在朱仙镇被岳飞五百骑打了个落花流水。兀术取胜无望，只好退兵。这时候，一个秀才却拦住了他的马，叫他不要走，并说岳飞在这里呆不长。兀术问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这个秀才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兀术忽然开窍，蓦然明白了汉人窝里斗的名堂，决定不走了。果然没过几天，岳飞被召回去了。最后，这位民族英雄终于被秦桧的谎言所杀害。在中国历史上，奸与忠的下场往往叫人寒心，那些为国家立下了大功的人难以善终，靠笼络主子的小人却能一帆风顺。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就是老百姓对这种不公的总结。

这都是过去的事，有关国家的大事，对普通人未必有什么痛痒。那么就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吧。

有这么两个同班同学，不好说名字，暂叫他们张三李四吧。两人从初一时同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高考时，张三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李四却没有考取。考取与没考取，原本没什么，问题在四年后。张三大学毕业了，为求职四

处奔波。打听李四在市级某个单位任职，而且是那个单位的领导之一，对吸收人员有发言权，便向李四求助。李四很欢迎张三去，表示再怎么不好安排，也要对老同学帮一把。经过再三考虑，张三决定去这个单位了。四年后的情况与四年前发生了根本变化，本科毕业的他，已没有四年前风光了。李四亲自开车到车站迎接，态度十分热情。

上班以后许久，张三从同事们口中得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这位李处长是个硕士研究生！而大学四年寒窗的张三，才是个本科，工资矮了李处长一大截。张三怎么都弄不清楚，李四不过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怎么能够跨过本科的四年呢？从此，张三的心里不平衡了。后来在单位跟人混熟了，人们才告诉他，李处长这个硕士研究生没有花多大功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李四填的表上就是个大专了，读专升本，是上班时业余时间读的，接着就读研究生班，好几门课是请人代考的，论文是单位的大学生秘书代写的，学位马上就要到手了。

就为这件事，张三吞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辞职了，除了少数几个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干得好好地忽然就不干了。原来他下决心到国外求学。又是几年奋斗，GRE 考得了高分，他在美国拿到奖学金，跑美国读书去了。

临走时他对他的同学们发感叹：“中国实在没得搞头！”

对于张三的如此感叹，我们自然不能苟同，也知道他不过是说句气话而已。但他的遭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认为只是件小事。张三李四只是现在做假的例子之一，看看那些拿着毕业文凭四处求职的大学生们吧，到这个单位赔笑脸，到那个单位说好话，碰到一些态度生硬的，还得看人家的白眼。找个工作是这样难，然而有些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了这些大学生拼命才得来的资格，叫人怎能心平气和。

那些买假文凭的，假上学真混文凭的，到底有多少，实在不容乐观。可以这样说，每个单位都有人在捞文凭，到底有多少是凭下功夫弄到的？党校发文凭，电大发文凭，一些正规学校也搞什么“扩招”，只要你出了钱，就不会让你拿不到文凭，不然就没有人来读了。这真是教育的悲哀。许多单位的领导和人事部门明知某些人的文凭是假的也当真的，有的甚至给至爱亲朋出点子：花几千块钱买个文凭，将来提工资上级别我们也好搞一些。

在一些圈子里，常看见那些捞假文凭的讲他们造假的事例时眉飞色舞，比如怎样在电脑中改身份证复印件，如何请人代考，如何给出题的老师送礼，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搞到考试题目。听的也都畅快地大笑。更有那些当头儿的，如李四，捞个文凭自己竟然没有翻三页书，一切都由别人捉刀，反正每个单位的大学生多的是。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资料：美国和英国以最低的投入，将第三世界国家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都弄到他们国家去了。我们恨美国英国，也恨许多人不爱国，好容易学到些东西，就往美国英国跑。然而看看张三李四两个人命运不同的事实，就不能不对张三抱以同情。十几年的寒窗苦，有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在校期间过的什么日子，那都是足以让人下泪的。然而毕业后去一些单位一看，就不能不让人心寒。

假文凭泛滥成灾，固然可恨，然而那些不是假却也称不上真的文凭，同样冷了莘莘学子们的心。国家领导人号召为留学回国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为留住人才想了许多办法。可是假文凭的泛滥，无疑是为这些努力设置的障碍。消灭假文凭迫在眉睫，然而又何其难！

文凭是这样，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在基层，辛辛苦苦干实

事的干部是绝大多数，然而干的敌不上吹的，讲实话的敌不上造假的，努力工作的敌不上攀亲戚的，就不能不让“实事求是”大打折扣。

上面所说的五十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谎言，那么多造假者皆是“被逼”，而不造假的的确吃了大亏。彭老总被打成坏人给人们提供了反面的经验，那么多干部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是对他们身边的人起到了警戒的作用。尽管他们在多少年后被证明他们坚持的是对的，但，具有能够为他们平反资格的许多人，是当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同事，现在却成了纠正错误的领导人。这些人为什么又没有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

人生的沉与浮，就是一面镜子。不同的结局告诉人们一个聪明的办法，大家都造假时也跟着造，大家都改正时也跟着改，既不会受良心的谴责，也不会为出头而吃亏。

干实事的一直在基层干，成天想花样的却提拔上去了。因为这些人见上级现在注重什么，就编造着某一方面的材料，新口号，新提法，新套套，都是“政绩”所需要的作料，却不是老百姓需要的实际关心。

可以这么说，一处造假，绝对不是这一处的独创。就在这处造假者的周围或前后，一定有其参照的东西存在。倘若造假捞不到好处，就不会有那多人乐此不疲。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景，某处造假被新闻媒体抓住了，问当事人为什么这样干时，他们的回答令人深思：看见别人是那样干的。但还有话都不会说，那就是，人家造假已经捞到了好处。

造假作伪，是对踏实肯干者的打击，是对实事求是者的嘲弄，更是对歪风邪气的推波助澜。揭露谎言，也是对那些好人的保护。

姑息养谎言

讨厌谎言，是所有人的共识。即使骗子合伙骗取了财物，内部分赃却也希望大家真诚相待。这里暂且不谈骗子的可恨，先说说骗子何以有机可乘。也就是说，先谈谈我们自己。

被我们信任的，关键时刻却蹬了我们一脚；称我们为再生父母的，没几天就投进了别人的怀抱；被我们扶上马并送了一程的，现在却坐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患难时得到我们无微不至照顾的，在我们需要他伸出援助之手时他却出卖了我们……这些都是吃亏上当的方方面面，那些人都是小人！

世上有小人，可为什么小人偏偏跑到我们身边来了？世上的骗子更多，可为什么他没有骗倒别人却骗了我们呢？这只能说，我们自己恐怕也得检讨一下身上的免疫力，更要检讨自己的灵魂是否很干净。

如果没有对自己十分清醒的认识，没有智慧的头脑，仅仅被动地防御，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比如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你一大堆好话，怕你不相信，还补充一句：“我这绝不是拍马屁，我拍你有什么用？”那时候，你将会跟着他的节奏点头。尽管前不久还上过他的大当。

有时候，你分明已经看清你面前对你说好话的是个骗子，

也不好意思当面踢他一脚。有一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的名言，教我们如何做人时，也包含着容忍谎言的内容。戳穿一切谎言，不利的将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原来宽容人也得连他的谎言一起宽容。这些，都给谎言的流布提供了生存繁衍的空间。

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吧。

由“哪些女人好哄”想起的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题目：哪些女人好哄？其文的总结是：大龄女子；长相平平的女子；长得丰满的女子；性格外向的女子等等。仔细一想，颇有道理，而这道理任何人一想就会明白。大龄女子有些饥不择食；相貌平平盼望恭维，一受恭维就难以把握自己了；长得丰满的女子送媚眼的多；性格外向的易被人抬举。总之一句话：易接受恭维者好哄。

这么一看，那个题目似乎应该换换，因为它几乎把所有女子都囊括了。“哄”即是假话，各种女人都有被骗的可能。

这篇文章如果做为寓言，所启发的题目就是多方面的了。我们可以将这个话题转换：哪些领导人好哄？哪些权威好哄？哪些父母好哄？哪些老百姓好哄？……哄就要说好话，说你想听却没有听到过的话，不然就哄不了你。每个人都在骗子的眼睛里过日子，骗子在每个人身上打主意。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他们要哄你的话，就要对你进行研究，可能他掌握的有关你的材料比你自已更详细。

先说领导吧。哪些领导好哄？仔细想想，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爱动脑筋的，政绩平平的，素质低下的，不爱学习的，不是凭本事上去的，在某个位子上呆得时间过长没得到提

拔的等等。

先看不爱动脑筋的人吧。当官之初，也许讲稿自己写，事情亲自干，材料亲自调查，真假也要亲自弄个水落石出。待干了一些年头之后，老是如此这般是不可能的，经验多了，政绩也不少了，手下人也调教好了，便君子动口不动手了。越往后发展，竟连口也懒得动，你们干好了再报告一声。到了这分儿上，想事的脑袋便成天想人了，谁会干事，谁不听使唤，谁有孝心，都汇集在脑袋里上下沉浮。有那些会来事的，就会把伺候长官当作革命工作去做，谁出的点子好谁就得到重用。省事倒是省事，只是出点子的这人的人品如何，可能就不那么知道得准确了。时间一久，某长便只剩下一个空壳，真正的大权到了孝子贤孙手里。

政绩平平，必然没有多少人说好，这是很伤脑筋的事。在你感落寞时，有个人忽然来对你说，老百姓对你很感激，比如某件事，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干的。因为这事不大，正因为不大，才是实事。真正想出头露脸的人都去干大事了，像这种小事除了老百姓喜欢外，上头是不知道的云云。如果说这话的再加上一副很会表演的表情，那效果就更不一般了。可以肯定地说，长时间没人说一句好话，此人一番知心话，不留他吃顿饭才怪。只是，此人假如仅为混一顿饭吃还算万幸，只怕他的要求还要高得多。好容易有了个知己，你的许多不满和牢骚也将倾泻而出。那些跟你同时参加工作的，许多都提拔了，唯有你还在这个位子上，跟拍马屁的人在一起，你将把人家贬得一无是处，把得不到提拔的原因总结成不会吹捧，上面无人等等。至于自己的政绩如何，是不肯冷静思考的。于是你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攻击别人的行列中去了。

素质低下，更是小人进攻的目标。甚至可能踏进干部行列

时，背后就跟着一串小人。这样的人进入干部行列可能就是误会。他们对一切高雅的艺术或文学不感兴趣，对美术音乐更是墨之黑也，喜欢的就是下九流的低级趣味。认真说，他们本身就是下九流一伙的。比如高俅，他的手下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人才或是趣味高尚的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搜罗自己的死党，这种爱好将会吸引许多英雄好汉加盟。那些人物绝不会把什么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抬轿吹喇叭投其所好，你哄我，我哄你，利用一回是一回。上下倒是齐心，不过齐心办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而已。

不爱学习，只凭经验和感觉行事，便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小人可以让你在家睡觉，什么事由他去干，干好了得上级表扬时你去，他把功劳都自觉自愿地记在你的头上。遇见这样知冷知热的人物，我敢说，不要他自己开口，你就会主动帮他捞一大堆好处，还生怕对不起人家。你绝不会相信他的积极性就是借你这块牌子捞好处。

并非靠公平竞争爬上一个位置，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三道四，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自己靠本事争得的职位。假如有个家伙跑来说，你工作过的地方老百姓至今还在怀念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才怪。至于他为什么大老远跑来对你说这么一句话，可能就不去深想了。

在某个位子上坐久了，免不了会有落寞感，不被理解的心情不好受。尽管嘴里也声明对提拔不提拔并不在乎，但一言一行，总会露出牢骚和不满。如果这时候来个人装模作样地关心你，奉承你，你就会视这个人知己，不知不觉地落入人家的套子里去。

用不着看领导者的政绩如何，只消看他们身边围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而这些人背着领导时在一般人面前是怎样的德

行，就明白了领导是清醒还是糊涂，是平庸还是能干。

看看那些平庸的领导者们身边，大多都是这样一些会哄的人物。他们在领导者面前谦虚，在外人面前狂妄；在领导者面前低声下气，背了领导就是十足的大人物派头；面朝上时是个笑相，面朝下时就是恶相了。你十万火急去找领导，可能就碰上这类家伙，他会拦在大门口，告诉你老爷子好不容易才睡着了，不能吵醒他。如果你要找领导诉苦，他可能不但拦驾甚至还给你一顿训，或者叫你去找什么部门，这位老爷子是不管这种事的。但领导者家里的事情这些人却比当家长的更清楚，处理起来也比当家长的更细心更积极。等老爷子明白家里有什么事时，这些会办事的手下人早就处理好了，只剩下你的表扬和夸赞了……这类事情我们看得太多，因此也有了经验：只看那位领导身边是些什么人物，你也就可以猜出此领导者是个什么角色。

小人得以成气候，都是大人物惯的！

如果你不想背后被人骂为平庸，那么你就应该有洞察身边人的本事。凡是关心你个人比关心人民为重者，不是贼子就是佞人。在这些家伙眼里，地震火灾比不上你的感冒，边塞烽火抵不上你脚上的鸡眼。等到大祸酿成悲剧，你的仕途也到顶了，他也就舍你而去关心别人的感冒和鸡眼去了。

再说说当父母的。

哪些父母好哄？无非大同小异：贪小便宜的，爱好低下的，文化素养差的，对孩子溺爱的等等，都是容易受哄骗的人物，尤其容易受孩子哄骗。别以为自己的孩子最听话，也别以为自己的孩子最懂事，可知孩子用心撒起谎来，其周密性和力度并不亚于一个政治野心家。小儿偷针，长大偷金，其手段和用心并无差别。

你贪小便宜，他可以在外面弄些你喜欢的东西让你满意，以弥补学习成绩的不足；你的爱好是麻将，他可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打出一张好牌让你大获全胜；你的文化素养低下，他就更好糊弄你；你对自己的孩子溺爱，那么许多缺点也被你认为是优点加以赞扬，他在外就更是无所顾忌。

在一个家庭中的一段时间里，最应用心也是最伤脑筋的，就是怎样对付自己的孩子。孩子的谎言容易被轻视，惟其如此，才更让人提心吊胆。

再说专家权威们吧。不敢妄说其他专家，仅就在电视中，看见一些专家学者讲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时，就知道了一些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每年都要求人们报成果，从政策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政府对科学领域里的专家们的照顾，但从科学本身来看，就未必是个幸事。成果与工资和级别甚至分房子都挂上了钩，如何能够不在乎！尽管我是外行，也知道许多科研项目不是几年甚至几个月能够干成的，不然的话，那些几代人才完成的研究和发明，岂不是太蠢？于是，真正须下大力气的项目没人干，而某些人醉心于今天发表一篇什么文章，明天又在哪里发表了什么文章，成了所谓的科研成果，而将真正埋头探索的人排斥在外。

这种人物把科学当敲门砖，图的不是造福于人类，而是荣华富贵。他们最怕的是人家说他们业务不怎么样。而那些有心机的人们知道走哪个门路对自己更有利，便跑来请教业务上的问题。捞到了实际好处的权威们，就十分乐意进那个套子。你需要我的权威身分，我需要你“业务新秀”为自己垫底，各得其所。

但这种人物比起另一类人来，又算是客气的。搞业务的人靠社会活动、靠业务之外的本领爬上一个职位，便两头讨好。

当年搞运动，这些人的表演就曾经伤害了不少人。要搞政治运动了，他是行政官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他是业务干部；在这边他是行政领导，在那边他是业务干部，哪一头有好处就往哪边靠，哪边工资高就在哪边拿。如果要负责任，他就两边开溜。行政没搞好？他说他在忙业务。业务没搞好？他说他行政事务太多。

仅仅自己讨好也还罢了，可恶的是他们靠更多的发言权，压制乃至糟蹋行政官员和业务骨干。在行政领导面前颐指气使，因为他是搞业务的；在业务骨干面前拉行政架子，因为他是领导。对别人肆意指责，妄加评判，容不下任何超过他们的人。他们借用权力，对自己的那点儿业务水平大肆炒作，并常常以扶持新秀为名，用跟自己毫无竞争能力的“新秀”们排挤打击自己的真正对头。

仅就作家队伍而言，就有许多名堂。作家评职称，定工资级别，就是让后人笑话的滑稽戏。评职称看什么？看成果。作家的作品如何界定其成果的价值？一说，得过奖的。那些奖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公平？还有的说要在某一级别上得过奖的。于是某个行业宣传也得到了某一行业的奖，于是成了“中央级”或是“省部级”。还有的在某个配合中心宣传的活动中得过一个什么奖，竟也成了重要的创作成果……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了作家这个行当里的可笑。

在此情况下，竟有那么些人跑来甜言蜜语。“他们的作品算什么东西？认真说，还就只你的作品能够上档次。能够读懂的没有多少人……”既是在文学圈子里哄人，那口才也不是没有，于是当事人便真的以为自己是块材料。如果下次某个场合需要为这人说一堆好话时，不用说，那高帽子是非送不可的。那个人连自己没人能够读懂的作品都读懂了，那么一定不是非

凡的人才，于是便对这个冒牌货大加赞扬。这么做既是对此人甜言蜜语的回报，树起这个人也是给众多同行的一嘴巴。

你说假话恭维我，我也就说假话恭维你，各自心里明白，自己干的并非文学，干不出名堂，也搅得你这一堰塘水不得平静。出于这样一种阴暗心理，忽然冒出个鼓掌的，自然就成了知心朋友了。可知一个小小的虚荣心，给骗子带来的好处却大得多。如果那人将来真的成了气候，他就不能再给你什么好话了。

英明累

看看历史，并留意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的主子身边佞臣多，平庸的主子身边奸臣多。追溯一下原因，似乎不是不可捉摸。平庸者自己拿不定主意，凡事仰仗臣下，久而久之，那拐杖用习惯了再也丢不开，大权旁落是很自然的事情。可叹者倒是那些英明的君主，何以看历史心明眼亮而落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呢？

只有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英明也为英明累。

战国时候的齐桓公，唐朝的玄宗皇帝，都曾有一段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历史。那时候可以说耳聪目明，对天下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绝对不会容许一个佞臣拨弄是非。不幸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人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他们要人恭维，要人逗乐，还要人顺从。如果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来一直在一群喽臣的包围之中，每日要听那些刺耳的所谓忠言，那也的确是够累的。也就在这个空当中，各种小人趁隙而入，凑到了他们的身边。如齐桓公身边的三个人，就是投其所好的。管仲死后，桓

公请鲍叔牙当相，鲍叔牙固辞不了，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将那三个人驱走。桓公无奈，只好照办。但过了不久，没有那几个说好话，没有他们做好吃的，没有他们知冷知热的关照，他活着都觉得没有意思。桓公处处都感到不方便，终于又将三个人弄回来。可见这三个小人已经将一代霸主笼络到何等程度了。

这些英明的君主们，尽管他们在夺取政权时也立过许多志向，巩固统治期间也做了一些好事，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是把享受在世之乐当作人生第一件大事的。如果所有努力换不来享乐，如果大权换不来在世的荣耀，他们是否还会那样雄心勃勃都是个问题。

上面提到过唐太宗李世民斥责宇文士及的故事，虽说他在对待宇文士及与对待长孙无忌上不是同一态度，但能够当面斥责拍马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拿得下面皮。“狠官不打笑脸人”，是一般的人之常情。如果李世民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不能不接受宇文士及的恭维了。

即使像李世民这样的明白人，也还有倦怠的时刻。每天面对大臣们的啰嗦和干巴巴的政治话题，他感到了累，感到了疲惫。他曾经大骂魏征，扬言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而魏征是他最为看重的谏臣。可见，一个人要始终如一地坚持正气是多么地难。记得有部电视剧编造过一个人物，专一对李世民拍马屁。有人问李世民，既然您知道他是个佞臣，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呢？李世民叹了口气说，我也是人，也需要听听好话呀！

说的好！即使如李世民，都有此欲望和要求，何况一般的庸才呢！

唐玄宗李隆基曾让大唐中兴，天下无处不颂扬他的英明。

不幸随着年事渐高，面对着太平兴旺的江山，耳听着四海对他的称颂，对天天上朝管事慢慢地厌倦了。一个杨贵妃让他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他幻想着平民双双对对朝夕相处的日子，那份儿甜蜜足以软化他的意志，不再以天下事为念。但他深知，没有权力作后盾，所谓的平民生活是没有这么奢侈的，杨家姐妹也不可能爱上一个老头子，难以让人永远甜蜜。因而他宁愿将大权交给李林甫代他去办，也不愿让皇太子接班。

于是李林甫这样的人应时而动。先是让老皇帝高兴，待大权到了手里，就独霸朝政，闭塞贤路，叫皇帝什么烦心的事情都听不到，一心沉湎在酒色之中，他就从中捞自己的好处了。

奸人之奸玄宗看不出来，他被那个人的谎言所迷惑，对李林甫信任有加。各地进贡来的好东西，只要是好的，总要留给李林甫一些，不然他吃着不香。有一年让百官检阅岁贡，玄宗皇帝竟然全部赐给了李林甫，用给皇帝专门拉东西的车直接拖进了李府。另一次随皇帝游华清宫，一次就给他御马、武士百人、女乐二部。这种格外的宠信连李林甫的儿子都吓着了，曾跪在李林甫面前大哭，说这样下去让人骇怕。

李隆基以为李林甫能干事会办事，他甚至对高力士说，他不想管事了，朝廷的大小事让李丞相处理算了。高力士说了一句话：天下是不好委任别个的。尽管他承认高力士说的是对的，却也不太高兴，从此高力士再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

一代英主却有奸臣当道，是李隆基自甘沉沦的后果。

而齐桓公身边的小人横行，却是人性弱点的膨胀。齐桓公是何等样人，绝对不会看不出易牙、竖刁、开方三个人的丑恶面孔。然而他“也是人”，他要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要享受天下的各种滋味，没有了这一点，仅仅有霸业的记录摆在那里，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聪明的政治野心家在创业的最初阶段，总是把业绩摆在第一位，不这样就难以爬上凌驾于万人之上的宝座。只有到了随心所欲的高度，才能够随心所欲地享受，而那高度是要下力气爬的。正因为有了这个基本的人生观，使他们集大权于一身而不愿放松半点。有的到了昏聩无知的程度了，为了让天下人不能无视他的存在，还要制造一些事端以证明其英明。尽管名义上也还有些措施预防昏庸，比如设谏官。但无论设立多少谏官，听不听还在他是否高兴。英明或者曾经英明者，以为自己永远都处于英明状态，已经昏聩而不自知，才使得那么多佞臣奸臣能在英明君主当权时得势。

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英明，多听听谏官们的劝告，也许不会出现如此不堪。唐玄宗确实使唐朝振兴了一阵子，但大唐却也断送在他的手里；齐桓公确实如天上耀眼的星曾让世人仰望，齐国的大乱却也是由他而始。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临终前的倍感凄凉。只有到了这时候，他们才知自己早就落入了昏君的队伍里了。但，为时已晚。

说到底，他们的霸业也好，起兵造反也好，起始之初无论旗号多么堂皇多么好听，其实质就是指望有朝一日能够高高在上，极尽人间奢华的。陈胜还没成气候就翻脸不认人了，李自成还没夺得天下就拥有了无数嫔妃，都可以作为此论的佐证。所谓解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都只是谎言，个人的享受才是主要的。

昏庸谁自知

上面我们说了英明反被英明累，将齐桓公唐玄宗归在英明的范畴。因为他们成功了。然而他们真的就是那么英明吗？全

方位地对其人考察一番，就会发现，那所谓的英明其实不过是个误会。在典籍有关齐桓公的点滴记载中，就透露出了此人的浅陋粗鄙。

齐桓公将伐卫国，在朝中跟管仲讨论的事情，进后宫还没开口，卫姬就看出他将伐卫国，拜在堂下并请问卫君有什么罪过。他百思不得其解，问卫姬，我什么都没说呢，你怎么知道将伐卫？卫姬说：“君之入也，足高而气强，有伐国之志。见妾而色动，伐卫也。”卫姬动摇了他伐卫的决心，第二天一上朝，同样还没开口说话，管仲就问他是打算伐卫国了。他再问管仲如何知道他改变了主意，管仲说：“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有惭色。”

原来他的脸和眼神保守不住秘密，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从表情中眼睛里透露了出来。后来更有严重的，他跟管仲讨论将伐莒国，没出门，却让一国都知道了。后来有智者对齐桓公评价说，此人一举一动，妇人小子都猜得出来，原因是此人太浅陋，因而管仲以浅智辅佐他。

原来此人也不过如此。然而成功的霸业使他目空一切，自以为很英明了，从来都没有过自我反省。

为什么有那么多骗子对我们行骗？平心而论，这与我们自身的弱点密不可分。尤其那些真正有实权的人们，身边有多少小人，足以衡量他们的水平多高政绩好坏。问题的关键，在于君子小人如何才能判定？你认为是小人的人，他认为是君子，你认为是君子，他却认为是小人。借助美术评论的术语，看人的“主体”才是主要的。武大郎是不会认为高个子好看的。

每个人都不甘于平庸，每个人都盼望着受人尊敬。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欲望，谁想却成为了我们的包袱。细想起来，还是自己的才气不够和贪图享乐的本性，使我们陷入了昏庸的境

地。自己究竟几斤几两重，应该是能够掂量得出来的。凡是有人把你拔得高于地面时，这个人就可以称之为小人。尤其在你身上有一官半职时。我们干的工作实在太平凡，或许我们自己上去的途径并非正道，没有人给我们恭维，忽然有个人为我们抬庄，把我们并不高级的工作拣起来夸大，把我们的窘迫迅速地掩盖了，内心的那么点儿虚荣心和感激之情，足以让人把马屁精当成知己。于是昏庸便开始了。

听惯了恭维的语言，如何接受得了批评？坐惯了权威的交椅，如何肯在台下寻找一处座位？尤其搞某项工作既有头衔又上了一把年纪，几十年如一日地听赞颂听惯了，假如忽然有人向你直言指出，那些恭维都是讨好你的谄媚之辞，你的成就远没有达到他们赞颂的那个分儿上，这将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你被小人所肯定的一切成功皆是假的，如何能够接受！这时候，自己的名声已经和小人连接在一起撕扯不开了，除了关乎国家存亡和自己的生命，一般而言，是难得割舍的。唐玄宗诛杀杨贵妃，也只有到了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时，才肯忍痛割爱。而向你直言指出问题的，你将会认为他是小人。

昏庸来自个人素质的低下，小人的谄媚似乎弥补了自己才气的不够，或满足了自己偷懒的堕性，殊不知却正好落入了陷阱。你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他处理得很好；你正为不想去干却又非干的事而恼火时，他主动去干而且干得让人满意；你心情焦躁大发脾气，别人不愿听而他却低着头任你训斥；过后你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歉意，他却认为发脾气是正常的，而且对你深表同情；你想甩掉老婆却又下不了决心，他却认为不甩是不行的……总之，小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哪里痒他就挠在哪里，让你感到此人对你比什么都重要，只恨早年没有结识这个人。于是，你将再也离不开他，一百个下级的意见，将抵不上他一

句话。昏庸与小人，便一起突出出来了。这时候，凡是对你提意见的，你都将视为忤逆，而谎言迷住了你的眼，你将把每个人的好坏都以那个人为标准度量，最终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好人，那就是他！

真正的勇者要的是别人承认而不需要别人的恭维。要别人承认，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无端的吹捧。

有时候，自己也清楚谄媚者是个什么人物，然而许多事情还得仰仗他，即使知道他不是东西，也难以抛开这根拐杖。有才气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听话一些呢？这个奴才为什么就没有某某那样的才气呢？这是一切使唤惯了别人的君主们的共同叹息。是的，世上没有这么两全的事情，让有才气者像狗一样听使唤，又让奴才具备有才气者的才能。

那些小人更能够揣测人心。他们有的根本就没有本事，有的自己原本是有才气的，可恨他们的才气并不用来干正事，有的甚至在学本事时就在琢磨如何窃取高位。比如蔡京，原本是名噪一时的四大书法家之一。但他知道，凭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如何能够当大官？而真的当了大官，鬼画桃符也不愁没人说好。于是他就走另一条捷径了。只要主人把你当拐杖，你就有把握让他离不开你，比如齐桓公身边的三个小人。他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拿自己不当人，顺着头儿的毛摸，就一定不会错。

要讨得领导人的欢心，顺从是第一等的好方法。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格言，大概永远不会过时。摊上了一个不地道的上司，我们自己又是如此地人微言轻，顺从，是明哲保身的首选，也算比较正直的人了。上面好什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喜欢受人恭维，喜欢被人夸赞，更喜欢下级能够挠到自己的痒处，这就是人们共通的毛病。也正是这些毛病，使那些

小人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遇见那些庸才当政，那就更好糊弄了。

战国时的齐宣王喜欢射箭，而且特别喜欢别人夸奖他的力量。但他的臂力实在不怎么样。他的一把弓只有三石力，围着他的臣子们却说至少九石。他要人们当着他的面拉了试试，左右都只拉到一半，就说拉不动了，都说不下九石，除了皇上再无人拉得动。宣王一辈子陶醉在他的成功中，至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弓其实只有三石。这真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宣王如果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那些让他生前高兴的左右文武，竟是他留下千古笑话的混蛋！

齐宣王的弓只有三石，这事是如何传出来的？显然，宣王所倚重的大臣们的忠心并不保险。他们当面恭维，背后作践，这是一切拍马屁者的德行。

这个宣王虽说是被马屁蒙骗，拉弓毕竟危害不了国家。

《初潭集》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南北朝时候，并州一豪族士人喜欢吟诗作赋，他自恃水平高超，连邢子才、魏收这样的文学家史学家都瞧不起。可他的诗赋水平实在可笑。一些人为了讨好他混些吃的，就故意恭维他的诗赋如何好。此人不知趣，竟然常常杀牛置酒请这些人到他家做客，专门谈他的诗赋，有如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以此扩大知名度。他的妻子知道内情，也知道丈夫的作品到底几两重，就哭泣着劝他不要这样。谁知此人竟叹息道：“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这位喜爱诗赋的士人真是可悲，在他看来，哭的妻子是他人生发展的障碍，而夸赞他的诗赋写得好的皆是知己。他沉迷于恭维中难以自拔，以为之所以没有魏收的知名度高，是因为嫉贤妒能者限制了他。

这种人物历代都有，到今天还处处可见。厌倦劳作，便有人送去享乐至上的理论；才气不够而又有别人所图的东西，小人就会将你的才气夸大；喜欢恭维，便有人送去高帽子……所有被小人围着自以为舒服的，最终都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使是弱者，也因为自己贪图便宜而被人骗去了钱财，认真追根寻源，还是我们自身希望以最小的投入换取巨大的财富。如此看来，古人总结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实在是至理名言。

我们老爷就这么优秀，宁可自己苦点，也不让下级受委屈。



赞美别人 说不定还能获得经济效益。

我们鼓励谎言



关于诚实的教育

孩子撒谎，如果我说是家长教的，肯定许多人会反对。但是且慢。仔细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吧。

我们并不希望孩子在我们面前撒谎，而且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把不撒谎放在道德考评的首要位置。希望孩子先成人后成才，可以说是每个大人的心愿。然而

愿望是愿望，有多少人认真想过，我们要求孩子不撒谎的实际内容是什么？

孩子对我们隐瞒了什么，这是最让家长恼火的，许多家长为此没有少惩罚孩子，在惩罚时一再要求孩子保证以后不再撒谎了。

可是当孩子面对别人询问的时候，尤其在人家问到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或者其他不便公开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认为孩子不应该撒谎吗？比如你有幸中了彩票，别人并不知道；或者你将要得到提拔，领导已经找你谈话了；或者你为一个目标正在暗中努力；甚至你干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而这些你的孩子都知道。在要求家人保守秘密时，你将首先这样嘱咐孩子：

“别在外头乱说！如果别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这是一般家庭常常出现的风景，谁认为这就是教孩子怎样撒谎？

还记得在农村困难的年月，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谁家有了些给孩子的好吃的，老人就会嘱咐孩子，在家里吃，别拿到外头去吃。其实那点吃的未必就是什么好东西，可是那一点东西来之不易，不够分，而别人曾对我们的孩子时有照顾。这样嘱咐时，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鼓励孩子撒谎。

其他方面还多。比如孩子上学迟到了，假说昨夜发烧，不然就要受惩罚。老师家访问到家里来了，怎么办？还不得不帮孩子一把。实事求是吧，孩子将落个撒谎的名声，将来他在学校怎么与同学相处？老师从此将不再信任我们的孩子。那么只有一条路，证明昨晚孩子确实是病了。尽管事后再嘱咐孩子不要撒谎，但这第一步却已经迈出去了。

上面这还算好的，遇见那些没文化没见识的家长，孩子偷拿人家的东西回家了，知道厉害的会让孩子偷偷送回去，或者

还给人家，假说是拣的。尽管也是撒谎，但毕竟是往好的方向引导。有那些贪图小便宜的家长，甚至会以为自己的孩子聪明，因为孩子偷拿别人的东西，却并没有对自己的父母撒谎。凭这一点，说不定还会鼓励一番。父母的喜形于色，必将对孩子今后的行为产生严重的影响。

假如举例，还将举出许多。但仅这几条也足以说明问题。上面这些表现等于是教育孩子：你不能对我们撒谎，但对别人却不能不撒谎。

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不须上什么学校，也无须跟哪个人拜师学习，自然学会了撒谎。我们常常看见有家长对孩子怒吼，问孩子撒谎是跟谁学的，自己却不知那些撒谎的知识正来源于我们自己身上。

这是小的方面，其恶果看不出来。但这种惯性作用却是可怕的。

我甚至还看见有当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恨声不绝，因为孩子连撒谎都不会。这情景看似荒唐，实则不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当你的孩子连遮掩自己都不会时，你将是什么样的心情？父母其实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的处境。不会撒谎的孩子太老实，而太老实是要吃亏的。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撒谎是环境逼的。

有人犯罪，有人犯包庇罪，家长和亲属包庇的事情最常见。眼见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已经走到了可怕的一步，怎么办呢？愚昧的家长就想保住孩子而将罪证掩盖起来。有的窝赃，有的给钱将犯罪嫌疑人放走，即使将来负责也在所不惜了。

还有的孩子撒谎是被我们自己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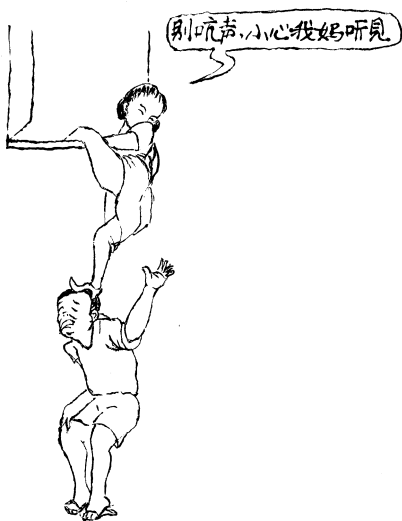
拿着成绩不好的成绩单回家，即将面对暴戾的父亲，怎么办？只能借助母亲的庇护了。可母亲还没有回家，要等天黑或

者明天才能会面。这时候，只有把成绩单藏起来，或者干脆在外面玩，等待老爸跟人打麻将，盼望他跟客人喝醉酒。如果父亲等着他，并问成绩怎么样，就假说成绩单还没有发下来。这大概是孩子撒谎的最初形式。

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

我们的领导炮制了一个假报告，将小灾说成大灾，将小成绩说成重大贡献，其目的是向上头多争取点资金，拿来为我们办点实事。如果这事儿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帮他包着呢还是检举出来？可能领导做的不合理，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同情的。因为这样做是合情的。

假如你到了结婚的年龄正在着手选择一个对象，这人可爱不可爱？值不值得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己的忠诚上。如果他或她对所有人忠诚，大概属于可敬之列，却不是可爱。我们认为的可爱，就跟上面所说的孩子一样，一面看他们对自己的表现，一面看他们对别人的态度，对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同等，那将不是我们所喜爱的人。



我们认为的忠诚，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不忠实之上的。**甜蜜的爱情之所以甜蜜，除了对方大无畏的奉献之外，更在于对另一方撒谎。

一个女孩子对所有男孩子钟情，你还爱她吗？一个小伙子向所有女孩子献殷勤，你还认为他对你忠诚吗？这样一看，就

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所认为的诚实，正在于他或她对某些人某些事情上的不诚实。

孩子大了，晚上父母不准女儿出门。可是为了跟你约会，她不惜翻窗爬院墙。唯有到了这时候，才能煽起你胸中的激情，你才能感到她对你的一片真心和痴情。她的可爱之处，恰好就在于她对父母的不忠诚上。

于是就明白了那些第三者或是奸夫淫妇们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为什么不顾死活。原来对方那对人做假的谎言或在他人面前的假正经，也是煽情的原料。让他们舍身去争取的动力，就在于此。

谎言是那么令人厌恶，有时却又如此地令人神往。

“水至清则无鱼”解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古人的总结告诉我们如何做人，说的是人不可太精明，什么事看得太透对自己是不利的。与此相近的还有一句：“不瞽不聵，难做家翁。”这是唐肃宗对儿女亲家郭子仪说的。

容忍谎言和丑恶，原来还是出于自己私利的需要。

不幸人生在世，祸福难料，你不可能事事都逞能干，“祸从口出”，也是古人对后人的提醒。苏东坡曾有《洗儿诗》说：“人人养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看字面上，仿佛苏翁看穿了世事，从此再不会干那些聪明事了。其实不然。他是无可奈何的感叹。要达到“公卿”那种境界，其前提条件是“愚且鲁”，凭他那一肚子诗书，他再也不可能退回到那一步了。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是因为秀才有了洞察一切的

能力，能够见微而知著，练就了看穿世事的眼光。这是水平，是修养，却也是痛苦。人所掌握的知识越多，对身边的是非看得越清楚，就越是难以跟平庸和无聊和平相处，更不可能同流合污。然而只要现实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状态，那么他的处境就不是很妙了。

也的确有那么些道行高深者，看到只当没看到，听到只当没听到，他们容忍坏事和谎言的能力是别人所难以做到的。这种事尤其在领导者身上表现明显。在有些人看来，现在能否得到晋升，上头要人拉，下头要人推，上下两头都得罪不起。无论对上对下，人缘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是毫无道理。只要把自身的升腾跌落看得重，就不可能做到坚持什么正气，不得不容忍谎言。上司到本地考察，为了让他老人家高兴，他喜欢什么我们就将提供什么，有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雅，也不能不迁就，需知，上司看你是否能让他满意，对你将来的前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是在容忍谎言的同时，自己也参与了制造谎言。

对下也是至关重要的。别看是小不点儿的群众一个，到了关键时刻，一封不署名的群众来信，就可以置你以尴尬的境地。因而对下面的人采取将就姑息的态度。尤其在即将考察的关键时刻，什么原则和人民利益，全然地顾不上了。有时候，面对大多数人的恶习，也不得不退让三分，以换来机关的安宁。“罚不责众”的成语，就是对歪风邪气无可奈何的让步。假如你对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那双眼睛会让人害怕，在本单位呆不呆得下去都是个问题。

还有些聪明的人，以什么都不知道为荣。《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就是个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角色。其实她什么都看得清，越是看得清就越是少管事，这就是她能够

获得大观园里上下喜爱的原因。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人人都说坚持原则是个好品质，人人都认为敢管闲事是真君子，比如在我们遇到小偷或是遇到坏人围攻的时候，多么希望有几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拔刀相助哟！然而落实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少管事才是个避是非的最好方法。

郑板桥“难得糊涂”几个字，被今天的人们奉为座右铭。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相信这句话的人，大多都吃过聪明的亏。这世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聪明者希望自己糊涂，糊涂者却希望聪明。不信吗？看看现实中的各种表现就明白了。

一些素质低下者自以为很聪明，很喜欢打听是非，以知道人家的隐私多为荣耀。听来之后再加工，然后对另外的人讲。还有些人以知道人家的秘密多而骄傲，有如搞新闻的采访到了独家新闻。“这事儿只有我知道”，以此证明自己的不简单。可是另一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以糊涂为荣，以什么都不知道为守身之道。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只不过绕过是非，将那些蠢事让给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去做。

“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句民谚的内涵，除了教你等着瞧之外，就是教你避开是非的锋芒，让别人出头去管恶人恶事。“明哲保身”，也是见了是非绕道走的哲学。那些自称君子仁者或是智者的人们，是不管世间的好坏曲直的。齐国的国君将伐鲁国，跑去找柳下惠问计，柳下惠并不觉得自己很重要，相反却一脸的愁苦。他说，伐国不问仁人，怎么这件事问到我的名下来了呢？显然，他也是个以知道人间是非为耻辱的。

总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的本义，既是教我们宽容待人，也是我们要我们包容丑恶。这丑恶中间，自然也包含着谎言。

我们如何制造谎言

我们在厌恶谎言的时候，是没有人把自己摆在其中的，仿佛撒谎的都是别人，而我们自己一直是谎言的受害者。其实这同样是谎言。只要我们冷静下来正视自己，就不难发现，谎言的世界是我们每个人凑成的份子。当不易说话时，当说话不起作用时，当形势不容许我们直言时，或当我们要捞到某种好处时，我们不是照样支吾其辞或是违心地说谎话吗？

在强者面前，尽管胸中有一股气一直伴随着我们，但静心思量时，总是感到自惭形秽。看看人家的风光，看看人家的排场，自己总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可有可无。尤其面对实际生活时，我们就像老鼠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无足轻重都没办法躲藏。然而，谁又甘心弱小？我们也要挣扎一下，也要表示我们的存在，还要对这个世界负一部分责任。许多重负在他人面前不足挂齿，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自己的能力无法承受的。于是，谎言不可避免地也从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等等等等，都记录下了我们撒谎的成绩。

看看自己究竟撒了多少谎吧。

自己欺自己

生活中有没有自己欺骗自己的事？有。不但有，而且很多。比如阿 Q 被人打了，自己又无还手之力，无奈中便说是“儿子打老子”。这是一种精神胜利，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有人的钱被小偷摸了，无望中便来一句“拿去抓药吃”，也是阿 Q 式精神胜利的延续。有人想当官没当上，便说当官不好或是说自己不愿当，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式的自欺。“老子怕你？”这是无能者的自欺。

以上这些表现，不是弱者就是失败者的口吻。

人生天地间，谁都盼望被别人尊重，而得到尊重的前提是事业的成功。然而弱者的起点似乎总是比别人低了一着，在与人的较量中，总是每一环节都跟下一环节接不上，于是便现出了人生的零乱。面对无力竞争的局面，面对解决不了的困难，幻想成功让我们的思维跟现实脱节，许多尴尬和无奈，就是在这时候显现的。



精神胜利法的药用价值有时跟去痛片相似。

老版电影《巴黎圣母院》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神父看中了美女，他自知灵魂已经堕落不能自拔了，内心发出了这样的独白：“她长得那么漂亮，难道也是我的错？”这几句话实在太好

了。他的话的意思其实是为自己辩护，以为看中了那个美女是因为那姑娘太漂亮了，不是他自己灵魂堕落的责任。其实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多深了，把自己的罪责往上帝身上推，无非给自己一个安慰。

看文艺作品或是别人，我们的眼光堪称敏锐，但审视自己时就不那么下得手了。其实我们自己跟那位神父一样，也为自己找了许多借口。

有那么一天，为了那么一件事，我必须去找那么一个人。去，就得提礼物，人人都是这么办的，而要找这么个人更要这么办。拎礼物去求人，这一招让我难堪，每一想起就脊背冒汗。老婆催，我就找借口（借口就是谎言），不是要学习就是赶任务。但拖只能拖一时，不能拖永久，没办法，不得不去了。于是趁一天夜里，我拎着两瓶酒一条烟，做贼似地溜进了人家大院。如果碰见一个熟人，我都没办法往地底下钻。进了那个单元，我指望走廊没灯，偏偏每一层都很亮。爬到四层，赶紧敲门，一边心里发虚。要是该同志家里有客人怎么办？而客人中有认识我的又该怎么办？人家笑话我，找什么语言回答？……等等问题都在敲门的那一刻涌现出来，在我的脑袋里打旋。我不知我的脸上是什么表情，只知道额上有汗，脊背发燥。我相信，那表情一定难看，再高明的演员都不可能做出我的那份儿表情。

敲了几下，里头没反应。耳朵贴上门细听，里头没响动。这时才发现门上贴着一张条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主人的告白，说下乡去了。我无来由地一阵激动，额上的汗干了，脊背也不燥了，竟比办好了事还要高兴，转身就往家跑。那是解脱了的喜悦，是卸下了重负的轻松。

我在心里念，不是我没来，而是人家不在家。

朝拜就这么结束了，再也没有去过。事情没有办成，与我没有跟人家沟通有很大关系。但我一直安慰自己：不是没努力，而是人家不在。

有时自欺是痛苦的（只要不打算欺人），因为事实真相会时时折磨你的心灵。比如这次的事情没有办好，带来的恶果都没办法说出口。然而我却不能不糊弄家人的同时也糊弄我自己。每当独处想起事情的真相时，那痛苦就没有办法排遣。

求人办事，求人者与求者相较，必定站在被动的一方。无论求人办事成与不成，那渺小的地位和任人说教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许多无奈，许多屈辱，跟阿 Q 失败一样，如一道阴影罩在我们的头上心上，如果没有办法排遣心中的那块石头，那就只剩下一条路：自杀。然而人毕竟不能因为这点屈辱就不活下去。勇者会跟韩信一样，暂时屈服，从人家胯下钻过去。然而有多少人能如韩信一样有成功的把握呢？

因此可以说，弱者之弱不仅仅表现在一时一事上，那是整个失败凝聚在一起的表现，阿 Q 在骂儿子打老子时，是连未来也失去了信心的。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爹妈的信迷信。

小时候病多，到学校上课，直想打瞌睡。一日晚上，当老师的舅爷去到我家，劈头说道：“这娃子有病，你们就没有看出来？”爹妈同时不吭声了，脸色也阴沉得难看。他们的表情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并非不知道儿子有病，只不过都回避着。舅爷的话戳穿了他们的内心隐秘，等于告诉他们，摆在面前的是一道绕不过去的荆棘路。

那天夜里，我烧得迷迷糊糊，听见野外我妈一声声叫着我的名字。我一边答应一边怀疑我妈病了，我明明睡在家里，她怎么不看一看就到野外去叫呢？叫声没有了，接着便看见窗纸

上映出幽暗的火光，我忽然明白了，那是她在沟边烧纸钱。我希望这样能让我的病好转，但这是不可能的。当老师的舅舅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过，喊魂烧纸钱都是迷信。

腊月三十团年饭后，爹拖着我去给另一个妈上坟。那是他的前妻，早就死了。头天夜里，他用铁钱凿凿着几把纸，直到纸上都印出铜钱的样子。阳间的钱家里没有，阴间的钱还多。那一声声的敲击持续了许久，每敲一下，寂静的夜空里就跟着再响一下，那是从对面山岗返回来的回音。到了田畝中间那一堆土前，他要我跪，我不，他就对我的屁股一脚，将我踢倒在坟前。那座大坟旁还有一个小土包，那是我没见过面的姐姐。我跪着号叫哭啼，将脸转向那座小坟。好半天没听见爹训斥，我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他一边扯着坟上的草，一边说：“你也帮一帮吧，你看，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话没说完，几大滴泪落在他的胸前。大概是怕我看见，他赶紧用结满茧的大手擦去了。我的面前，烧化的纸灰在大小两座坟前旋转着。

我的老爹那时是村里第一个壮汉，不止一次地嘲笑过那些怕鬼的。不幸他空有一身蛮力气，不得不向死人低头。如果他有钱，我相信，是很容易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如果那时候有人跟去对他说，烧纸是迷信，那将如何？那无异给他心上一刀。他们的信迷信，全在于自我安慰。他的纸是烧给自己看的，他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惜我年轻时候不懂事，以为他们是真的信迷信。待我明白我的老爹应该同情时，他也成了一堆荒坟。

自欺，有时是弱者或失败者的自我调节。别人不安慰你，自己又不给自己一点慰藉，那还有什么指望？钱丢了说声“舍财免灾”，家里遭灾说声“好歹人还在”；指望提拔却落了空，便说一声“当官有什么好”？指望中奖的号码没有中，说一声

“本来是好玩”……的确是个自我安慰的好办法。我们在嘲笑阿Q的可笑时，可曾想过我们自己的悲哀和辛酸？

但自欺者不一定全是弱者。掩耳盗铃者就不是弱者所为。

人总有尴尬的时刻，无论大人物小人物，没有谁能够幸免。举例说明。这年头是官本位的时髦，人在世上混，无论我们如何地不在乎当官，但干了许多年后还是个级别很低的待遇，而我们的学生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上级，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尤其亲朋好友很在乎你的“进步”，你又如何向人解释？每当这个时候，也正是许多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强装笑脸，人家会说你故作姿态；你找领导或是发牢骚，更显出了自己的没分量；工作中耍态度？那将让你的前程越来越没指望。于是，聪明人就干脆说“命不好”或是“人家不提拔”，或是“官场黑暗”之类的牢骚话。最蠢的大概就要算“早就想退出政界”之类的语言了。无论是哪种表示，都将会露出不得意的尴尬，谁都看得清我们是在自己糊弄自己。

自大，也是弱者自欺的谎言。

当一个人的才气没有地方发挥，或头上一块大石永远让你不得伸头，荣誉感成就感都受到压抑的时候，那滋味是痛苦的。汉武帝时候的东方朔，学富五车，为人正派，却被皇帝当做逗笑解闷的工具，待遇跟侏儒一样。他曾向武帝自我介绍，说他十二岁读书，三年读完了文史资料；十五岁开始学剑，练就了一身武艺；十六岁读诗，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读兵书，掌握了兵法。然而武帝却一直不用他，想跟皇帝讨个说法却一直见不着皇帝。一日他设了一计，假说皇帝要杀侏儒，让侏儒们去向皇帝大哭。武帝问他为什么要造谣惑众，他悲愤地说：“我本来有话向您报告，可是没有机会，没办法，只好想这么个主意。侏儒长三尺，我长九尺，可是我们领一样的米，

他们胀死，我饿死。陛下求才，能用就用，不用就让我回去，免得我天天在长安讨米。”虽然他凭他的机智捞到了一个大夫之职，然而这离他的抱负相距甚远，他的一生也就这样耗费掉了，最后落了个“滑稽”的名声。

尽管东方朔并不缺乏才智和远大抱负，但在强权面前却处于弱势，空怀一腔报国志，身前身后无人识。他的自大可以说是对天下不公的控诉。

另有些人虽经一番努力，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在一个小圈子里也许不是最弱的，但天外还有天，他的那一点点成绩不被承认，或者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心生绝望和怨愤是自然的事。有的则在极度的悲哀中派生出一种傲慢，他的成绩或伟大只有凭自我吹嘘表现出来。所谓自大或傲慢，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下的表现。

阿Q的可悲，有一部分体现在他的可恨上。这可恨就是凌强欺弱。他要跟赵老爷姓赵，随着赵老爷的后尘瞧不起假洋鬼子；他欺负小尼姑，只不过小尼姑没有还手之力；他还一再地向人证明他是强大的。别人认为他没分量，他自认为自己分量很足；人家看出了他的可怜，他的自我感觉却良好。阿Q身上，体现着弱者的劣根性。其实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可怜，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企图将自己的“小”掩盖起来。不幸，他越是要掩盖他的小，那小就越突出，永远也“大”不起来的。

人都有向往优越和尊贵的一面，面对无能取胜的现实，便以整个人生与世界对抗，因此，越是软弱者越是气大。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也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都不甘于做人家的附庸，那“尊严”的背后，往往是无能的自我辩解。阿Q的那一套，又何尝没有在我们自己身上体现。

看看周围这样的人，他们有的向人自我介绍，说“老子谁

都不怕”，以证明自己不是可有可无，却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软弱。那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哀叹“谁都不怕我”。他们那样说时，无异于无可奈何的自我呐喊。

早些年有那么个小品，名字好像“有事就找我”。那个小职员分量太轻，就帮人家买车票，以证明他很有本事。于是这个也找他，那个也找他，并不断地夸他有本事。其实他是自己抱着被子连夜在车站售票处排队，常常一排一夜。而买难买的票时，就自己出高价，这等于自己出钱买赞扬。这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作者的眼光入木三分，把这种小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睁眼一看，社会上这种人物还少吗？我们常常在那些人群聚集处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自己在那里向人们夸夸其谈，多少人求他办事，哪一件事情多少人都没有办好，最后是他一手办好了。社会上什么时髦，他们就摆什么谱。不是有人走关系吗？他们自我吹嘘，谁谁是他的什么亲戚，越是走红的人物他越熟悉，什么事只要找他，就没有什么办不好的。有的则从另一面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寻常。某某是他的什么亲戚，但他从来就不求他。不是有人对入党说怪话吗？他们就说，支部书记请他填什么表他坚决地拒绝。尤其在他曾经努力过的事业上，最忌讳人家问他干得怎么样。于是他说，他早就不干了，不但不干，连想都不想的。其实夜晚睡在硬板床上，那事业不成功的忧郁无时无刻没有缠绕着他。

几年前有个女骗子，因为非法集资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我们从她的第一步开始了解时发现，原来不过是个面子作怪。那时候电视机不好买，她买到了，而且是平价。就这样，她的能力被人们夸大了，她自己也在这种谎言中难以自拔。她不可能向人们证实，她是以高价四处奔波弄来的。后来她想集资干几件事情，以挽回损失，便许以高利率，一下子集起了几亿资

金。然而，以她的身份和才气，是不可能将那么多的钱用好的。最后终于露出了力不从心，几亿资金还不上，以致害了她自己一生。

考察她犯罪的全过程，最初的动机也并不是就要与人民为敌，再看看她巨大名声之下的金融经验，原来许多基本的经济规律都不懂，对金融行业的知识等于零。她实在只是个弱者，却又不甘于弱者的地位，欲在现实中摘取幻想出来的桂冠，无异大醉后开车，车毁人亡是必然的下场。我绝对相信，当年她威名赫赫时，白天在人前是个女强人形象，但夜深人静之后，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凡自夸者，其实际本事绝对跟他的自述差距较大。他们的高大形象，建立在自己制造的谎言基础之上。

同样的道理，与这种人物相反，另一种人因丧失了竞争的能力，便以斜眼看世界。声言不图名，不图利，有时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托词而已。

我们的灵魂干净吗？扪心自问，真实的自我可能比预想的要糟得多。不愿照镜子，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最常见的表现。做生意一败涂地，就把失败归为“这几年走霉运”；事业一事无成，就归为腐败现象严重；官场不得意？那是自己不会吹牛拍马；作品发表不出来？那是出版社只愿出地摊文学赚钱，严肃文学和学术著作没市场了……这些，都是在没有骗到别人之前，就先哄骗了自己的谎言。

也曾制造谎言欺人

只要我们勇敢地正视自己，就不难发现，骗人的把戏也干了不少。不说那些善意的谎言，只说并不善良的并不诚实的方

面，细搜起来恐怕很有些堆头和分量。

在许多有关捐款救灾或是什么工程捐款，我们并不少见那么多人踊跃捐款的感人场面。你捐一百万，我捐一百零一万，一个比一个慷慨，一个比一个大方。电视播完了，观众感动了，真的去落实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并没有拿出他所许诺的数字来。这种事情大概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考察那样做的动机，原来是出于那热火朝天感人至深的环境影响，待从光环里走出来之后，那一百万之巨想想就心疼。拖得过去就拖，反正你也不会硬逼。

至于那些有意造假者，就另当别论了。

一些企业的头头们，一些单位的领导们，在内部管理上动的心思是既要管住职工，又不能把自己框住。他们对职工和职员们制定的纪律十分严格，打卡、登记、打分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大家认真办事不要偷懒。一遇有人做假，便在会上严厉批评。然而他们的司机明白（有的干脆不要司机而自己开车），他们将部下约束住以后，自己却在外面干些什么名堂。

有人的电话打不通。打到办公地点或是家里，总有人先问你是谁，找主人有什么事。问清你只不过是个人物或是讨账的之后，就会告诉你他不在家或是不在办公室。你再问他到哪里去了，一般回答是不知道。其实，他可能就在电话机旁边。

还有的贪官东窗事发，让他反省时还挺硬的，自认为并没有干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有的拍胸用党性保证，有的向上级写血书，诉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心为公的事实。直到问题全部摊开以后，他才明白自己已经走了多远。原来那些贿赂或其他坏事在他面前，都不过是很正常的人情往来。也就是说，他们每天都在一种自我欺骗中过日子，并不认为那是犯罪。

这是那些有身份的人们的例子。其实小人物们也同样干着

骗人的勾当。

武汉某一个杀人案件，起因不过是做假。某人去买东西，老板将一百元收去了，然后说没零钱找，将一百元退给了人家。买货的拿过钱一看，就发现老板将一百元换成了假钞。于是矛盾产生了，接着发生争执，老板欺人太甚，那人气不过，便邀来了朋友讲道理，道理讲不通，便出现了流血事件。把假货当真货卖，货物积压就大喊“亏本大甩卖”，缺斤短两，都是每天可以看到的把戏。

在各种报表中，究竟多少水分，那是公开的秘密。将小灾害当大灾害报，为的向上头要钱；将小成绩当大成绩报，为的是向上级邀功；每当传媒中报道说今年又提前实现了某项指标时，知情人就在电视前哧哧发笑。因为那是假的成绩，上头要求那样报的。

收税的居然出现了个新词儿：买税！如何买？就是你今年的税收任务完成了，可我的还没有。怎么办？给你一笔钱，你管辖下的某几家的税收由我来收。我的任务可以完成，你又有了实惠。卖税的也有自己的想法，即使不卖也不能有多少收多少，如果今年那税如实交多了，明年怎么办？

一次我问某位主任，你作不作假？主任直言不讳：我不作假怎么过？原来上头要那样报，不达到指定的指标，你就不可能睡安稳觉。

更惨的是杀错了人。当然那是过去的资料上显示的。有个人犯了杀人强奸罪，被枪毙了。过了一年多，真正强奸杀人的罪犯因另一桩案子露馅，拖出了这桩案子，才明白去年杀的那个人是冤枉了。可是在杀那个人的公判大会上，念的判决书上说，那个被杀错的人也曾“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想想不寒而栗。那个倒霉的人是怎样“供认不讳”的？显然在那个不为

外人所知的高墙之内，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赔一笔款，不知是对死者的安慰，还是对审案者的良心慰藉。



现代通讯工具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谎言，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谎言。比如当人家来向我们借钱时，心里不想借，却又要找个托词，于是常常甩出来的话是这样：你早来几分钟就好了，钱刚刚被

谁谁借走。女人相互间撒谎的更多。一个女人刚买了一件衣服，征求另一些女人的意见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得到真正的意见的，都说那件衣服好。然而背后，却嘀嘀咕咕地道出了真情：其实那种颜色不适合她。打麻将的人十个有九个撒谎。老婆打手机问他在哪里，他说他正在跟几位客人谈公事，地点离家远得很。一边说时一边对牌友做手势，小心麻将声让那边听见了。领导开会要我们给他提意见，除非他把我逼得没有退路了，一般情况下，谁都不会这么傻。平时想恭维他一番都没机会，这不是创造机会让我们送高帽子吗？于是假借提意见为名，行恭维之实，比如“工作要搞，身体也要注意”之类。我的入党问题、提拔问题、儿子工作问题等等，都还仰仗他老人家解决，给他提意见等于自己绝了自己的路。

这是我们身边每天上演的喜剧。

掩盖自身

有人怀着大目标，偷偷下暗劲，不愿被人看出动机而说他有野心，于是他的说话办事，便不可避免地藏起了目标和步骤而跟人虚以委蛇。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其中自然有并非自己责任的命运作弄，但也不可否认，相当多的部分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谁愿意把自己的尴尬像得意事一样向外人炫耀？谁愿意把我们的力不从心向外人展示？于是，遮掩我们的尴尬或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什么样的办法是最好的遮掩手段？假话！

我们也许发了一笔财，也许升了一个级别，也许即将获取一个荣誉；或者反转过来，什么也没捞到，指望发财的结果一场空，指望升官的没了指望；或者，我们曾经犯过想想就脊背冒汗的错误，恨不能时光倒流从头再来……这时候，谎话不需要诱导就会自然出现在我们的口中。

掩盖自身的说谎各有各的托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事后补漏洞的措施，而不是先有了什么目标。

有计划的人物也以谎言掩盖，但他们是主动的行为，因而往往做得天衣无缝；而尴尬者往往是在别人注意或是询问时的被动回答。在这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事实已经存在，你在说谎的同时，别人也注意到了你的表现不是常态。这就暴露了你的内心，那内心深处远不是口头声明的那么干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话都是真实的，即使是谎话，也必有令人信服的一面，至少幌子是真实的。反之，一切话也都是可笑的，即使是严肃的话题，在一个并不严肃的场合就露出了

它的可笑来了。可笑不可笑，真实不真实，就看是谁说，在什么场合说，在什么心态下说。

看看那些凭关系找门路当了官儿的人们，你分明看出他在玩假，但你还不能戳穿。捞到了一个好职位，谁都不会承认他在背后做了些什么工作。发了财的也一样。在你中了彩票以后，才发现穷亲戚穷朋友原来这么多。人家要借钱，你借不借？人家有困难希望你伸出援助之手，你伸不伸？为了堵住向你伸手的大漏洞，就得找个一劳永逸解决的方法，公然地撕破面皮不是最佳选择，惟有撒谎最为恰当。尤其那些贪官污吏们，老婆戴耳环的不戴了，有金表偏偏戴一块劣质表，抽烟不敢抽好烟，买东西也不敢大大方方地买，总之是怕人家知道自己很有钱。

最可恶的，莫过于为了掩盖错误而再制造错误了。《三国演义》中有个细节：曹操到吕伯奢家避难，人家杀猪招待，他错以为是要杀他，待杀了人家一家八口之后，才看见捆了一头猪。这个错误犯得够大了，怎么办？那就连打酒招待他的吕伯奢一起灭掉。所谓“杀人灭口”者，打击报复者，都是想要掩盖那不愿见人的一面，而再制造更大的错误的。“文革”时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四人帮”一伙为了说明这场所谓的革命的正确性，却还要让几亿农民勒紧裤腰带“思甜”。每当出现在这种不堪时，不是想办法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批可怜农民的“自私”，再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渡难关”。但他们在事先要干什么事时，是不会跟人民群众商量的，凡事都借了人民的名义。即使错到了那种难以容忍的程度了，也还要创造几个“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典型，以迷惑世人。

当然，这是玩政治的人们的做派。作为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也难免出岔子，为了掩盖那尴尬和真实思想，撒谎也是

常用的手法。

靠工资过日子的过得紧紧巴巴，却还要打肿脸充个胖子，因为那点面子放不下来。好歹还有份工资，总是拒绝别人的同情，以为那是丢了身分。对于我们身边脱颖而出的优秀人物，总是不愿正视人家的成功。想当初他还不如我呢，现在有了几个臭钱或是当了个芝麻小官儿，得意什么！人家好心好意请吃一顿饭，便假说今天有事走不开。人家送点东西，偏偏不要，说自己家里还有。人家问你的生活怎么样，硬着头皮说还可以。

至于那些时刻想刮点油水的，那就是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的三分难处当十分叙述。

那些在选举中败北的人们，也要充个硬气汉，因为一躺下就会被人看笑话。通常的自我解释是这样说的：“我早就想退出政界。”

其他的名堂还多。只要你愿意严肃地审视自己，就不会不知道自己撒过多少谎。无论怎样遮掩自己，其实有一条是无论如何遮不住的，那就是毛泽东早年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每个人都在别人眼里活着，你自己的眼睛也不会帮你掩盖得严实，你的一切遮掩皆是徒劳无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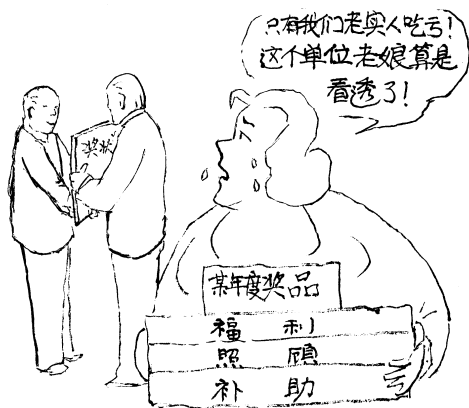
要使自己减少说谎的麻烦，做到坦荡，最关键的还是管住自己的欲望，少出些纰漏，这样就不至于捉襟见肘，拆东补西。为了遮盖一个错误就再撒一个谎，不但不能减少错误的分量，反而使我们越走越远，便又要继续用谎言遮掩。比如警察抓错了人，放会丢面子，就逼他承认，再制造错误。这一制造不要紧，一方面冤枉一个人，另一方面却又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犯的是两方面的错误。

一次说谎，再次说谎，弄到最后，说谎就成了我们的习

惯，那时，想不说谎都没办法克制了。

自己最无辜

每当人们发牢骚自我辩解的时候，大多认为张三李四不是东西，而我们自己则总是无辜的。有人要求调动，有人另找门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单位伤了我们的心。我们待人以诚，可别人却并不是这样待我；我为单位做了那么多好事，可单位在分好处时却把我撇在一边，于是便怀着委屈，怀着失望，舍共事多年的同事而去了。



还有人更绝，不断地在本单位捞好处，却又不断地痛诉本单位对自己不公平，一提本单位就摇头叹息；一边不断地给人家制造不舒服，一边又大讲老实人受欺。

你不声明，别人就难以发现你是老实人。总觉得自己无辜，而让我们处于艰难境地的都是别人，是不愿正视自己的最常见的人物。谁会承认自己的内心也不那么干净？看看那些算命的瞎子们的瞎说吧，他们无一不是拍马屁的好手，对掏钱找他们胡说八道的对象恭维有加。他们总是说，你太善良了，所以总是上当。如果碰见是个女人，那就更是驾轻就熟。这一套的确可以迷惑人，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村女人愿意掏出血汗钱来养活那些搞迷信

的，就在于他们可以给自己一些谎言。

自己最无辜，其实就是谎言。

由于自身的条件和能力以及并不强健的素质所限，有些人虽然也有过改造世界的梦想，但经过一阵努力，因种种原因，其成果并不足以给他人带来福音，甚至连自己的存在也让人给淹没了，因而便消沉了，眼界和心胸越来越狭窄。昔日的抱负和理想在现实生活的无声撞击中粉碎，灵魂深处再也没有为别人创造的意识，不被忽视便成了最后挣扎的目的。

他们的眼睛慢慢地望得低了，只能盯住身前身后的同事或者对门隔壁的邻居身上，要跟人家在荣誉收益方面一比高低。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别人能够获得的我也理应获得。但获取与奉献相比，就常常忘了奉献，没有获得的方面却十分敏感。

然而他们总是比别人慢了半拍，别人没做的他们并没有想着去做，如果在某件事上有所奉献，那绝不是主动的行为，只是因为别人那样做了，自己不做怕落了人后。其实他在那样做时已经就落后了。

现实的生活并不到此为止。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较量贯穿着整个人生，相互间割舍不开的拉扯每天在进行着，时事事事都难以让你能够幸免于矛盾之外。别人轻松取胜的事情，他干得分外吃力；别人已经干过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别人想出的好主意改变了局势，可他连意识都没有；于是在一些按劳取酬的分配方面，或者在得到的荣誉方面，就出现了难以让他心情平静的差距。比如单位每年的评比，总要挑选出表现比较好的人来当一回“先进工作者”，这“表现比较好的”是什么标准？谁又够那个标准？对于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单位说不定也要评一评，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但，谁又是“特别困难”的？谁家又不困难？每到年终总结时，也还有报表之类的东西出

现，列举出人们的成绩以示单位本年度取得的成就……等等方面的结局都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

自己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获，或者一个并不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讨到了便宜，或者并不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得到了照顾，因而心里就十分地不舒服了。怎么办？既然别人无视我们的努力成果和给予照顾，那就只剩下一条路，自己去宣传了。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找领导诉苦，一级一级地挨着找，或言辞愤愤，或泪眼不干，诉说着自己跟人相比时的并不差来。以自己的苦干态度去抵消别人所负的责任，以自己劳动时间的长度去比较别人劳动的结果，是常见的现象。他的成就大？我比他还忙呢；他很困难？我家的电视机比他的还小呢！他的发明是他一个人干的？……越比较就越感不公，越比较就越感到委屈，于是终于从嘴里蹦出了一声呐喊：“我哪点比他差？”如果是评的经济照顾，就将是：“他哪有我们困难？”有时甚至还会喊出一声让大家都不喜欢的话来：“我没得人家会捧会拍！”

盼望比别人过得好，是每个人的愿望。有人经过努力达到了目的，有的人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或才气不够，或努力不够，或有人做手脚而又无力抗争，能够表现不满的唯一办法，也只有自己诉说这一条路。找领导也只是表现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得跟同事们讲，甚至在走廊上在公众场合高声吵闹，在会上大发脾气。同时又还声明：“我不是要那个虚名，也不是在乎那几个钱，问题是太不公正了！”

口里的声明，恰好属于掩耳盗铃式的谎言。人们分明看出他十分在乎那个虚名，十分在乎那几个钱。其实我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自身的价值，就不能不相信毛泽东早年说过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储存有多少，可以从你舍弃的程

度中推测出来。凡争夺小利者，不大可能是个富翁。以此类推，人的内涵和修养的深浅，也可以从人对待小事的态度中分析出来。

无论什么事情，自己的声明倒是证实了一点，那就是群众所评大略没有错。至少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此人的境界就不够档次。

但世上的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职员不多的单位，在某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尤其是偏僻的农村，有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在这些地方，民主成了一个空壳，只是用来走走过场做做文章的工具，谁有权谁的话就是法。无论你是谁，只要在某件小事上对不起我，便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你敢上告？你敢提意见？我就能叫你每一天都过得不舒心。在这种堪称黑暗的地方，你要过得好一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顺着他，你的自诉又有什么用？你越是感到不公，越是申辩受了委屈，他们就越是心情舒畅。

在人与人发生争执的场合，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哪点对不起他？”或者：“我哪点对不起你？”在“对得起人”这个总的归纳之下，还将有许多具体而又生动的例证，以说明自己对得起别人，而别人对不起我。

在一些评职称评奖的什么会议上，为自己脸上贴金成了正当的过程。政治上我是多么进步呀，业务上我的成绩是多么地大呀，某某权威对我的评价多么高呀，某某报纸上对我有专门介绍呀，等等等等，气力不够材料凑，都可以称为谎言。

我曾在乡下参加过不少人的葬礼。乡下死了人，凡来客人了女人们都是要哭的，主人哭，客人也哭。那些女人的哭简直就是随口的创作。有些对不起死者的人或者被主人不理解的人哭诉，唱的都是自己对死者的好处。她唱道，哪一次自己有了

一些糖，孩子都舍不得给，却拿来给了死者；某一年下大雪，为了死者，一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什么东西送来了等等。那真是可怜的叙述，那哭诉仿佛不是哭的死者，而是自己遭误会的苦楚。不幸这个在外面自诉，另一间房里却有人在冷言冷语地说三道四，无论她怎样辩解，也难以抹去在别人心目中的坏印象了。

还有的更不得了，动不动上访，一些在机关团体的人将信到处投诉。

难道他们对自己没有一点儿实事求是的了解？可以断然否定。这类人悲哀的其实不是怨别人对自己不公，说到底，还是对自己驾驭人生的能力不足而伤心。

自 怜

对影自怜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盼望人家同情，盼望人家理解，但他们却很难将自己融入人群中去。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看不见也不愿去看见还有许多应该得到理解和同情的人，总认为全世界就只有自己最值得怜悯，却又很少得到怜悯。每当碰见一个对象，就将倾诉个没完没了，那都是十分悲惨而又生动的故事，和自己的好心肠没有得到好报的例证。

自怜的另一种表现，则是跟谁也不搭理，独自过着敝帚自珍的日子。

你见过男人在女人面前哭诉吗？别看他们堂堂七尺之躯，但心理上却还是个孩子。怪就怪在，那些自以为命运最苦的男人，身上穿的和碗里端的并不比别人差；他们自认为疾病缠身债务压顶，每一次的倾诉都像是最后的遗言，却大多都有一副好体魄。他们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全部的毛病就在于

感到自己最苦。然而因为他们从不考虑自己对别人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义务，过分强调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便给了他人以自私的印象。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过“顶天立地”、“宁折不弯”这样的词儿，更没有想过要怎样奋起改变生存环境，一心指望别人来关心他体贴他，稍不满意便泪眼汪汪或唉声叹气。因为如此这般，往往被人瞧不起，而别人的冷眼或讥讽又刺激起更多的哀叹和眼泪。

你见过女人一直泪水不干吗？这种人物心理狭隘，一言不合就怒气冲冲然后伤心落泪。在与同事或邻居交往中，她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永远受迫害的位置，仿佛天下人都对不起她。她们对公开的讨论不感兴趣，对来自大路的消息总抱着怀疑，而对私下里的小道消息却听得认真。十个人对她讲的公开事情不及一个人的耳语。而在这些“秘密”中，最关心的还是有关自己的话题。所有人都仿佛跟自己过不去，毫不相干的笑声或玩笑，在她们耳朵里，都化成了对她们的讥讽或幸灾乐祸。

对自己丧失信心者往往容易走极端。自卑者表现出来的，有时候是可笑的自尊，和无来由的怒气。他们拒人千里之外，跟谁都不来往，形单影只，独自吞咽着自认为很苦的苦水，或自己关着大门生闷气，弄得你不知又是哪点得罪了他。这种人物看得清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但他们不说，以为腐败如空气般布满了地球，以为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对于他人的幸福，总有一种莫名的愤恨；对于他人的成绩，干脆连正眼都不瞧。心里的不平衡使得他们心灵扭曲，灵魂深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自己却不愿意正视。

其实在那幽暗的角落，潜伏着人类最为丑恶的东西，那就是嫉妒。嫉妒使他们连人世上的阳光和欢乐也怨恨。

竹篱茅舍自甘心，真的甘心吗？不。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

的托词罢了。

更有那些愚蠢的女人，许多辛酸无处倾诉，许多苦情找不到人同情，便转而想念算命的瞎子。在某个算命的瞎子摊位前，那瞎子正对一个女人瞎说：“你呀，心太善良了。你给别人一斗，别人回你一升。自己碗里有，想着人家无。可是好心被人当作驴肝肺，坑你的还是坑，害你的照样害……”那女人不停地点头，说瞎子算的正确。

由此可知，为什么算命的瞎子大多混女人的钱了。

有时候她们也反抗，要对自认为的悲惨命运控诉几声。然而却不是正面的与人交锋，而是指着自己的孩子骂别人。“你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这样的吵闹或大声的训斥，往往在街头都可以听见。别人没有被气着，她们自己倒先气得眼泪流成串。

无论伤心的男人还是忧伤的女人，其实他们的命运远不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悲惨。他们自己也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内心深处，却是幻想着大灾大难的。那副受苦受难的形象，不过是他们幻想出来的场景罢了。

有人升迁了，有人发财了，有人得了个表扬，有人被评上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等等与他们无缘的荣誉或实际的好处，都将是他们伤心的理由。他们明知道别人的工作能力他无力达到，但胸中的一股怨气使他们难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世界。因此，世界在他们眼里总是一片灰暗。

“好心当作驴肝肺”，“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他还嫌苦”，“做好事讨不到好”……都是我们嘴边上的话。凡在这样说时，就有人正在受到我们糟蹋。“做好事讨不到好”，说明了什么？认真想想吧，它一语捅破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帷幕，让人看清了那里面的货色。原来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指望投之于桃报之

以李的。这么一看，就看出那不是做好事，而只是投资。对方没有按我们预想的实行，或者结果离我们预期的差距甚远，牢骚和怨恨便出来了。

牢骚美化了自己，丑化了别人。

种种情形，都是检验我们自己灵魂的标准。我们也许成不了君子，但如果看不清哪些是君子之行哪些是小人心性，那才是可悲的。经五十多年的观察，我得出了结论：凡是骂别人不是东西的，凡是总认为自己最无辜心最善良的，八成正是要敬而远之的人物。

随潮流扯大谎

上了些年纪的人应该不会忘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放卫星，便出现了亩产多少万斤的神话。这些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如天方夜谭的谎言，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过。但要说这样干的都是骗子，那也很不公平。想想那年月吧，我们或是被逼无奈，或是跟形势闹着好玩儿，都在那时候凑过一把火。

当最初报纸上登出某地亩产多少千斤粮食的时候，谁看了都觉得好笑。但谁都没有料到，那股风也会刮到自己的身边来，要自己也卷入其间。各级领导开足马力大作动员报告，要求广大干部敢想敢为，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亩产多少。头天硬着头皮报了亩产三千斤，第二天又落后了，有人已经报到一万斤甚至两万斤了。为了不落后，领导再次鼓劝，于是一咬牙，那么我也报吧。有如今的炒作，你报一万斤，我就报两万斤，你报十万斤，我就报二十万斤，那产量还没开始挖一锄就扶摇直上，终于吹出了亩产数十万斤的大气球。

当然那是领导们干的好事，我们是群众，该是不负这些责

任的。但是且慢庆幸。

群众有群众的优越，然而有时候，群众也是让我们不求进取麻木过日子的安逸环境。我在某篇文章中说过，一切优秀人物皆从群众的堆里经受过一个勇者应该经受的磨练，但群众堆里也让平庸能够理直气壮地存在。一个人偷了东西很丢面子，但大家都偷了，就可以互相打哈哈。随潮流扯谎，那“潮流”就是群众凑的。

先看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年代吧。

只要是在政治学习会上或是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上，上头要求我们大家都表态时，我们谁敢说个不字？明明不是那么回事，那真实可以在会下说，但在肃穆的会上，也都要按照上面所设计好的语言去重复。在农村，贫下中农有情绪或是生产不卖力，就拖了个行将就木的地主分子来斗争一番，说是他搞的破坏。谁都知道这是弥天大谎，却又都跟着愤怒地呼口号。

再看看“文革”期间的记录，也令人汗颜。每日早晨，我们总是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醒来，那词儿大家都记得，“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可是到了晚上电台播音结束时，却是播的《国际歌》，其中鼓励无产者投身革命的歌词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们要靠自己。”只要是读过几句书的，谁都明白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两首歌都是革命歌曲，但内容是矛盾的，总有一方是错的。但，我们谁都不说。不敢说也不愿说。

还有，我们在“文革”中每日的早请示晚汇报，还有那忠字歌、忠字舞，我们都跟随大潮流唱过跳过。难道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不。只因为我们太小了，人微言轻，再说，谁给过我们说真话的权力呢？实在没有必要充那种没价值的好汉。

当然，那都是政治上的处境，而且是过去的噩梦。现在是

不是一切都彻底改过来了？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只怕并不那么理想。我们的生活中同样离不开谎言。且不说长舌妇在公众场合下的嘀咕，也不说恶意的造谣中伤，仅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而言，就不能没有谎言。比如我们的亲朋好友盖了新房，添人进口，添置了新家具之后，你总得拣那些好听的话说。这个不错，那个很好，挑的都是让主人高兴的语言。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人添了儿子，如果送恭贺的人说，你这孩子有一天会死的，人家肯定不高兴。的确，听了这样的话你还高兴得起来吗？再说那不是讲科学讲物质不灭的场合，你来那一套辩证唯物论干什么呢？

在集中学习的场合，领导和群众似乎没有自己的语言，总是按报纸上的腔调复唱一遍，有时甚至连某句话的提法都要“统一口径”，等大家都讲完了就散会。这种会的意义不是看你有了什么提高了的认识，而是我开会了，我发言了，我参加政治学习了而已。上面的总结也得如此这般，统计参加人数占百分之多少，发言有多少人次云云。

领导人说一句什么话，就不住地点头，甚至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什么很受启发等等。至于领导当众念的错字别字，也给于了默认。即使不点头，有谁愿意自找无趣，给正在兴头上的领导指出说，你那个字念错了？前面举例说过有位当过秘书的人的故事，他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说，他当秘书时故意写错几个字或是某一句文字不通，那是让领导纠正的。拍马屁的本事不能说不高。问题在于，有几个领导在读秘书写的文章时，能够发现那错的地方？即使发现了，又有几个人能够洞察出其中的奥妙？有几个能够发现那是谎言的另一种表现？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人的无知，也看得出拍马屁秘书的心机。但作为平头老百姓，不看势头去纠正领导的

错字别字，到底是自己出风头呢，还是要给领导难堪？再说纠正一个错字到底对谁有利？所以我们除了背后当笑话讲以外，当面装聋作哑做好人的确是个正确的选择。

假如有个人不知好歹当面对谈兴正浓的领导说，你那个字念错了。不说领导会怎样对待，也不说同事们将如何评价，仅回家的那一关都不好过。妻子或家人通常所用的语言会是这样：人家都不懂，就只你能干！你出个什么风头？可见，真理的表现形式，往往也能够确定真理的价值。不看势头的真理未必就一定是可取的。在妻子看来，随潮流掩真情，才是正确的态度。这实在是实事求是的悲哀，可又有什么办法！

在各种杂志编辑部里，一些编辑最头疼的事莫过回信了。说穿了，回那种信就是说谎。他们费神费力制造的，是既不会伤你的感情，又要打消你的指望的谎言。

当代生活中最难办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要与各种人物都友好相处，实在不容易，因此撒谎成了我们第一件要学习的本领。见人点头笑，开口多说好，群众都是好群众，领导都是好领导。尽管如此这般，也仍有绕不过去的荆棘路，也有连谎都不好撒的时候。

某个朋友进了那个单位某一级的班子，他是五个人班子中的一员。这位朋友没有想过要领导另外四个，谁当“召集人”在他都无所谓。问题是，五个人开会定“召集人”的时候，都知道他没想当而且也不可能当，但都把自己能够当上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位朋友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得罪人，撒了个很愚笨的谎。得知第二天上班就要开五人会议，他第二天早晨打个电话说得了病要去医院。

这一来就麻烦了。参加会可能得罪三个，这个谎却连四个都得罪了。他把这事讲给我听，并问我，遇到这事该怎么办？

他认为以后还会遇到。我给他出了个点子不怎么样，但舍了我的这个办法还没有其他出路。我说，他们四个不是都想当吗？很简单，别人认为那是好事，你就把好事当苦难。你假装他们谁都不愿当，动员他们为了工作作出些牺牲。那样的话，当上了的高兴，没当上的也不会恨你，最多以为你是个糊涂蛋。

装糊涂，也是谎言。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点头，说我的点子“有道理”。

无论愿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差不多每天都在制造谎言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些谎言并非出自恶劣的品质，有的是出于善意，有的是仅仅出于自保。说一句自我宽容的话：小人物的语言无论多么不合规范，除了伤害同事的感情之外，是不会危害国家的。

况且，没有谎言的社会，是否就是宜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呢？答案是不。因为没有谎言，就没有了探求真理的快乐。况且善意的谎言有治病疗伤的功效，谁都离不开。

做 秀

这是一个舶来词儿，形容为自己脸上贴金之一种。“做秀”，听其言会其意，像是个扮妩媚的做法，便想起了东施效颦，想起了须眉撒娇。做秀的手法并不只是一个方式，所谓的外包装，找名人帮助呐喊，以及故意炒作大约都包括在内。

做秀者并不是人群中最弱者，真正的弱者还不足以这样干。他们是在某个行当中有些成就的人，但比起真正的成功者，他们的气力和功底难以达到理想的高度了，于是才不够，戏来凑。他们图的是名声，或者是先有了名声后才可能有巨大的实惠，仅就做秀这一点来看，至少暂时地不是为经济的利

益而来。他们所要的，是社会地位以及权威性的发言权。

看看我们的周围，这种人物还不少，其表现形式如下——拉扯名人，借以水涨船高。

在生活中有那么些人，开口总有名人开道，男人开口必夸曾在哪个大人物家里喝酒，曾跟哪个大人物开过玩笑，曾经跟某个大人物勾肩搭背；女人则是某个大人物要她注意身体，某个大人物批评她瘦了。这些女人喜欢假借名人的口气将自己的名字摊出来：“那天某长说，小张呀，才几天没见，怎么就瘦成了这样呢？”或者：“那次碰到某长，他说小李呀，要是你不喜欢在那里干，就来找我，好吧？”她们总是把自己摆设在世界的中心，仿佛一世界人都在操心她们的吃喝拉撒睡，而她们的一些小缺点都引起了大人物的注意。

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嘲笑过这种人物。他在一次讲笑话中说，有某些人们正在议论一个大人物，说见那个人一面都不简单，旁边一个叫花子夸耀说，他跟那个大人物对过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叫花子说，有次那个大人物回家，见他站在自己家门口，对他说：“滚出去！”

那对话原来是这样的！

鲁迅的笑话意在讽刺那些攀高枝的可怜人物，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后来的人们是否在这个笑话里得到了警戒？看看现实社会就可以发现，那种人物并未绝迹。在某些学术单位的文人和作家们身上，叫花子式的不同凡响者随处可见。一篇文章的后面，总要附一大串名人的所谓“高度评价”，或者专门写些文章，不厌其烦地吹嘘某次曾在孔夫子家喝茶时，跟孔夫子开了什么玩笑；某次曾在孟夫子家喝咖啡时，讨论过什么问题。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名人家的茶或咖啡可能喝过，至于是怎么进去的喝上的，那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了。况且，真的喝

过茶或咖啡，是否就真的和孔夫子、孟夫子平起平坐了呢？只怕还有一定差距。

拉扯名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专找名人进攻。攻击名人，可以快速引起注意，这也是借助了名人的效应。这一招有的成功了，只要名人一反击，那目的就已经达到。但也有不太理想的，那就是被攻的名人保持沉默，就叫你免不得好一阵子悻悻。



常跟大师接触的人肯定都是优秀分子

忸怩作态，哗众取宠。

这种人物是绝不随大流的。他们希望自己处处优秀，而且这优秀被大家公认而出人头地，不幸现实总拖着他们的后腿，那目的总难达到。因而在一切场合，要抢占到鹤立鸡群的位置。你们闹酒吗？那他就滴酒不沾，虽说他并非没有酒量。你们对某个问题争论起来了，他是不插嘴的，保持沉默甚至作冷笑状。等你问到他的名下时，他将对你们双方都给予全盘的否定，另外扯出一个论点来让你摸不着头脑。其实他的论点也许刚刚形成，而且是从大家的争论中得到的启示。对于一般的人或事，他将是不屑一顾的神情。

他们绝不肯随俗，永远保持着傲然挺立的形象，所谓的“装深沉”就是指的这种人。他们盼望着能获得一言九鼎的威望，希冀获得世人的顶礼膜拜。不幸自己的才气可能永远达不

到那个理想的分上；或者原本聪明却不愿面壁十年经受孤独的煎熬，或期望快速树立起自己的体系或旗帜。看看自己至今还不得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在一起混日子时，内心的焦灼不安，促使他们在感情上离群索居，很难将自己融入凡人组成的群体之中。

他们不大情愿正视自己，一方面内心底忿恨那些名人，以为那些人并无何德何能，只不过命运好罢了。另一方面，却又自视比身边的人优秀，对事物干与不干，说与不说，并无多大的是非观或把握，只不过干者或说者太平凡，他不愿与之为伍而已。其实，他们自己也属于可怜人物，那一切自认为不同凡响的努力，不过是难以实现的理想提早的显示。

标新立异，抢占焦点。

当年我在剧团编舞台唱本，在各种政治禁忌的约束下，编剧们难以自由地发挥想象，于是就有了大家共通的毛病：戏不够，鬼神凑。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就在布景上气氛上大做文章，舞台上便乌烟瘴气，观众受到了震撼，只不过不是心灵的共鸣，而是被机巧弄得目瞪口呆。后来古装戏不准上演了，就搞政治教育节目。戏不够怎么办？“忆苦思甜”凑。没有办法解决矛盾了，就来他一大段忆苦思甜的唱段，那些虚构出来的被教育者的思想，通也是他，不通也是他了。

那故事成了历史，可是看看现实，这种方法却没有绝迹。练书法的下不起功夫，写不了正楷就飞草书，一个个都成了怀素；画画的写生功课不过关或过不了关，说不出所以的画就都成了毕加索式。至于写书的标新立异那就更多。民间对此有句语言形容：不须功夫深，只要胆子大。其实应该还有一句，不要功夫深，只要来头大。某些名人们在某一领域风头出足之后，藐视各行各业，以为人家专门做的事情，他只须抽个时间

就会做得很好，于是出书之风盛行。你说他的文章狗屁不通，他就声明他实在太忙，来不及琢磨。这就给了人一种错觉，仿佛十二亿人强烈要求他出几本书，而他又实在太忙，出书是把十二亿老百姓没办法，才勉为其难干的。真的是这样吗？可能实在太忙，没时间去看灵魂深处装的是些什么东西。

钓不到鱼就扔它几块石头，这也是出名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在作家这一行当里，有人三分才气七分外交，找名家写序，到处请人发表文章，美其名曰“自我推销”。还有的故意将标题搞得吓人，对此并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抢眼”。

大言炫炫，吓退世人。

有人好作大言，绝不肯谈俗事，或是不肯以俗语说具体事。平凡的语言不足以显示其学识的渊博，开口必是警句式或归纳式或总结的语气。墙上挂着一幅画，在他们嘴里那不是画，而是“审美客体”；看画的人也不是人，而是“审美主体”。也不管这种理论专用术语用在这个地方是否恰当。有人吵架，有人拌嘴，有人偷人家的东西，或是有人求教某个问题，这些题目请教到了他们的名下，是不会得到谁是谁非的评价和具体的指导的。他们可能搬出一大堆理论来阐述，从内陆省份到沿海地区的习俗差别，到岛民与大陆民的性格特征，以及历史纠纷的渊源关系，来分析这种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弄得你除了承认他有学问外没有其他半点收获。

大言的另一方式，是搬出一大群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人物和事件来作为他的陪衬。盗版很多，那么他的书可能都被盗了。对图书审查很严，那么他的稿子可能经过了最高的审核。假如哪里发生过因抢购图书而打架的事件，那一定是为买他的书，而且不仅是打伤了人，而是出了人命。

做秀的方式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腐败仅只官与钱

腐败人人痛恨，但痛恨者却未必知道自己痛恨的实在内容是什么，也未必明白腐败都在什么地方。就我们一般人而言，在痛恨别人时，到底是什么动因让我们对贪官们如此愤怒？在对象上，我们痛恨的对象似乎只是腐败的官员，对其他方面却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并不是对一切腐败的痛恨。

其实，腐败并非只有官场存在，只要你愿意正视，就不难发现我们身边的腐败现象并不比贪官弱，甚至我们自己，也未必就那么干净。只不过，官员的腐败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掩盖了对其他人的注意而已。

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不宥于物质的贪污受贿一种样式；腐败的毒素也不仅只在贪官身上体现，它已辐射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合的钱数只是以物质的堆头看他们的牙齿有多深嘴巴有多大；而物质是可见的结果，那背后的贪欲却不是人人都看得见分得清的。

如何分辨出人的忠奸清浊？还是从谎言的角度来审度，就能够拆穿某些人物的西洋景。

下面就请看具体的例子。

见面会上的演说词

李贽编了一本《山中一夕话》，在其中一篇中讽刺读书做官的人时说：“读书应举而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进取，苟不违道与义，皆无不可也。而世有一种人，既仕而得禄，反喋喋然以不仁为高，若欲弃之。”

他所说的后一种人，就是削尖脑袋钻官当，既当上了又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架式，一副很无可奈何的面孔。表面的装模作样，却正好暴露了灵魂的肮脏。自古至今，这种人物从没有绝迹过。但看现在，有的人当着管理一方的父母官，却开口闭口谈老庄哲学，而老庄哲学的内核是让“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且不说他不以自己身负的责任为意，即使对自身，也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忘记了那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申请书是自己亲手所写。还有的跟李先生说的一样，喋喋不休，大谈当干部没意思，十分伤脑筋的样子。

还是看看一个场景吧。

在某个单位会议室里，集合了单位所有人马，主席台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含着微笑的人。本单位的职工早就知道要来个新领导，今天会上的气氛和那人的表情告诉大家，这个人就是新领导。等人都到齐了，本单位的原头儿（一般是副手）介绍了此位是谁，然后请新领导讲话。一阵巴掌过后，这位新领导便开言了。一般情况下，这位领导会传达出以下信息：

我叫什么名字，原在哪里工作，奉组织之命，来跟大家一起共事了。对于这个职位，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虽说自己当过多少年干部，但干这项工作我的经验不足。过去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对那边我还有些经验。但现在这项工作跟以前的专

业差距甚大，我不熟悉或不甚熟悉，因此组织上找我谈话时，我感到很突然，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希望领导再考虑一下，拖了很长时间。但因种种原因，组织上还是要求我到这里来，个人得服从组织，因此我才来了……

这是一般的谦词，一种套路，大多数人在上任时都有过这一套。在他谦虚的发言中，透露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他自己要来的，是组织硬要他来的，到这里任职实在是万不得已。对于这个职位，压根儿也没有想过，太突然了，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个套路大家都熟悉了，新官上任的过门，谁都要走的。但很少有人去琢磨，在这个看似谦虚的自我介绍中，却漏出了许多背后的文章。我们可以慢慢地分析一下。

首先是出卖了组织。

这种自谦的语言中，固然有领导对他格外看重的自得意思想，似乎离了他，这个单位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但如果真的是自己不熟悉这项工作或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组织上又非要他来不可，那么他所说的“组织上”在挑选干部时，就违背了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一般要求。组织在挑选本单位领导人的工作中，岂不是干了违背干部任用常识的事情？可笑他只顾树立自己谦虚的形象，却忘了维护培养他的组织的威望，不知他想到过这一点没有。

其次是对本单位这么多人的作践。

组织上千挑万挑，最终却挑了个不熟悉的外行来领导，至少对本单位的人们是一个否定。不是我无能，是你们比我更无能。难道除了他再也挑不出人才来了吗？

很明显，这番谦虚的自我介绍中掩盖了实质的内容，“个人服从组织”成了装潢门面的托词。

差不多所有上任的新官员们，尤其是新提拔的官员们，到各单位都有这么一套格式，程度不同，讲话内容一样，竟没有一个勇敢地宣称他是自己要求来的或是争取来的。所有听演讲的听众，肚子里其实都明白那是谎言，但这谎言不能戳穿。

不过认真想想，虽说格式一样，讲话的内容也大同小异，但其实质并不相同。再仔细分析一下，无外这么几个方面——

如今腐败盛行，买官卖官已不是新鲜事，仅媒体上暴露出来的事例就从没有断过。但说实在话，买官卖官的对比某种人物而言，只不过是一些蠢蛋，那些跑官要官的才是更深层的蛀虫，他们的手腕下作得多也隐蔽得多，因而比买官卖官更难以识别。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上头有没有人，是能否得到提拔的关键。为了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有些人什么下作事情都可以做。行贿是常用的手段之一，送礼套近乎，请吃请喝请玩，甚至以身相许。那里面的名堂可谓多矣！三十六计不够用了，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拜干爸爸。这些都是暗房的操作，不比买官卖官容易引起爆炸，成与不成都不为外人所知。这些人一旦获得了他所要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就在那个见面会上撒播迷雾，其目的就是要抹去那并不光彩的幕后作为。

这种谦词更是逃跑的准备。将来搞不好，他可以不负责任，因为当初他都声明搞不好，是组织硬逼着他来的。

手段各不相同，获取权力的动机也不尽相同。虽说都不大光彩，但在努力争取那个职位的人中，说他们全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很不公平。有人怀着抱负，想为人类做些贡献，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有权跟没权的影响力不同，许多事情必须在某个位置上才可能办好，因此无可奈何，也不得不走走上层路线。平心而论，他们要掌握一些职权的动机并非为了自

己，或者不全是为了自己，只因为建功立业的抱负唯有到了某个位置上才能实现，也只好低头从那里往里钻。对他们，理应怀着同情的。

都是这一程式，逼得所有人都得如此这般。另一种类型的人是，明明他能够治理好一个部门，尽管有十分的把握，并且踌躇满志，也不敢大胆地宣称，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客套的。形成了套路，而且这套路大家都接受了，一旦谁打破了这一格式，当群众的也将不习惯，认为你不够谦虚，认为你狂妄自大，那么你的工作首先就丢了一分。因此也不得不依样画葫芦，谦虚一番。

说到群众，是否群众都正确？不见得。人人不满意官僚主义，总希望领导干部多些平民的东西。愿望是好的，但果真那样，未必都能接受。我可以随便拖出例子来证明。某地方有位宣传部的领导，开晚会时上台去操了一回琴弦，竟让人提意见说他不像个领导，上台操琴不严肃。有个单位的领导上下班不坐小车，因为单位离家不远，步行一下散散心还可以买点菜。单位也有人说怪话，说有小车不坐是故作姿态。

美国竞选议员或是总统，总是把自己说得很高，并向选民许诺，我如果当上，将要如何如何。可那毕竟是美国，假如我们某个干部敢如此这般，就管教他用不了几天就意见一大堆。

如此看来，当个领导也难！

没有思想准备却被组织挑选去执行任务的情况有没有？有。受命于危难的例子太多了。危险的任务，艰巨的任务，复杂的任务，都是在特殊情况下被组织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承担的。不过那种场合没人讲客套，也不需要见面会上客套。

当然，这并不否认也有实话实说的，他的确不愿到这个单位。但那只能有如下几个情况：同级的平调，而且新单位很

穷，如文化单位。再就是被调人很爱自己的专业，对搞行政不感兴趣。

见面会上的谎言各有各的苦衷，但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言不由衷。言不由衷的后面有文章，而且不止是某一种类型的文章。

愤怒的背后

先看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很有名，古代笔记有好几处记载：唐朝德宗年间，裴佶当谏议大夫，在某次说起当官贪与不贪时讲了这么一件事：小时候，他的姑爹在朝中做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有很好的官声。有一次他到姑爹家去，正遇姑爹从朝中回来，走路时还忧国忧民地发着感叹：“崔照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大家都替他说好话？肯定是姓崔的向官员们行贿了。像这么下去，不乱套才怪了！”显然，下朝之前曾上演过一幕喜剧，那些为崔照说好话的人被他识破了内中的隐情，因而慨叹。

不幸这位朝中大官的忧患之叹还没有发完，守门的报告，说有在寿州作郡守的一个姓崔的人拜见。姑爹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呵斥看门的，还声言要打。那个“姓崔的”就是被他贬斥的崔照。但人家来了，也不能不从礼节上走走，只得穿着整齐不高兴地去见客。

就在那一会儿，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姑爹进去不一会儿，就喊叫人泡茶。再过一会儿，又喊摆饭。接着又喊为客人喂马。姑妈也莫名其妙了，说：“为什么前倨而后恭？”等姑爹回到住室，脸上有得意之色，并拱拱手让裴佶去书房休息。裴佶还没走下台阶，姑爹已从怀里抽出一

张礼单，上面大字写着：奉官绸千匹……

这个崔照当着寿州刺史，在送礼的人中，裴佶的姑爹是靠后的一个，可能礼物也不是最重的，竟然也有“官绸千匹”。那么前面朝中有那么多人为他说好话，给他们行贿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按送给裴佶姑爹的数目计算，仅每个人送千匹官绸，那是多少？那些钱财皆是来自他管辖下的老百姓，足见他那个官在怎么当。裴佶敢于拿自己姑爹的丑事当例子教育别人，颇有些亮私不怕丑的勇气。可见那件事在他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对他的影响也不小。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贪不了与不贪不是一回事。在当今对待腐败现象问题时，看见那些贪官污吏贪污受贿的丑闻曝光，愤然怒斥者比比皆是，仅看表面现象，可以说贪污者激起了公愤。但假如认真地解剖一下这些“公愤”的深层内容，恐怕就不是那么令人振奋。

凡是对腐败现象愤怒的人是否都廉洁？可以肯定地说，不一定。上面那个故事中，裴佶的姑爹就是个例子。在崔照没到来之前，他忧国忧民，慷慨激昂，颇像那么回事，但事实无情地给了那个伪君子一耳光，原来他也是个贪欲心极强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崔照来送礼，他也是个腐败分子。

首先他的“忧国忧民”姿态和对贪官的愤怒，是心理的不平衡，别人捞到的好处他没有捞到。他愤怒的内容是姓崔的送礼给别人却没有送给自己，肚子里其实是妒火中烧。其次没有捞到物质的好处，就要贪个好名声。他的慷慨激昂，掩盖了内心深处的贪欲，捞不了油水就捞虚名，是许多人的拿手好戏。至少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颗腐败的灵魂。

在没有贪的条件时，那副忧国忧民的姿态颇能迷惑人，也迷惑了他自己。他以为他痛恨的腐败和贪婪只有人家身上具

备，自己是没的。一旦有了贪的条件，那被深埋在骨子里的贪婪迅速被诱发出来，原来他比别人来得更露骨。可见，愤怒者的愤怒虽说是一样的，但各自的动因却不尽相同。

将心比心，就想自己。

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口袋里仅剩几个零角子磨擦发出金属的响声，看见别人大把花钱，看见别人又在接待送礼的客人，看见别人一家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日子，实在没有泰然自若的胸襟。尤其当别人在你的面前抖富一掷千金的时候，肚子里巴不得他出点天灾才好。看见送礼的向你打听某人的家住在哪，一股酸气让我们常常给人家一个臭不理。忽然听说某个熟人贪了很多被抓进监狱去了，第一个反应是愤怒，同时意识中出现的，是惊异这家伙跟我这么要好，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给我点好处呢？于是心头一阵畅快，抓进去了活该！

人不会嫉恨一头牛贪吃了一块嫩草，是因为人不吃草。“贪”的概念，是大家都想拥有的东西被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原来那么多愤怒之声中间，也夹杂着心理不平衡者的呐喊。

凡没有物质方面的贪迹的，是否就证明了此人不贪？同样不能证明。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捞好处，不过是贪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人守钱摊子多少年却没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具体例子是，有人偷偷把礼物送到他家里去了，但他义正辞严地将送礼者赶走了；有人硬是把东西或是钱财留在他的家里，他发现后立即送回去了等等。

面对这样的材料，我总觉得里面似乎还有别的文章。

事例可能不会有假，但这人的“义正辞严”似乎另包含着什么东西。送礼者是趁人不注意的晚上送去的，而且是送在家里，没有外人在场，假如真的是拒腐蚀永不沾的铁汉子，这种

事情是不会主动向外人说的。既然自己将别人不知道的先进事迹主动向别人通报，可以肯定地说，那是另有所图。尽管我不敢明着反对树这种典型，但我可以下这样的断语：这种人物并不值得我们敬重，更不值得学习。

由此我联想起了有些人物的“日记”。记得有段时间，记日记成了一种时髦，有些人的日记“被发现”，看看那些日记的内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我们从字里行间，分明看出了作者时刻作好了被发现的准备的。另有一些真正体现优良传统的好事，比如帮忙打扫街道，在一些公共场所帮助老人和残疾人，都是令人感动的事迹。然而面对电视镜头，做好事的人却说出了我们并不愿意听到的与事迹本身并不谐调的语言。有的说是因为学习了哪份文件提高了觉悟，有的说是为了响应某个人的什么提倡或号召。显然，所做的好事仅是个表面现象，隐藏在背后的，是为了证明与本身事迹不相干的东西，原来还是一个私欲。

腐败的概念并不只是贪占了并不属于你的物质部分，它的深刻含义就在于灵魂深处的欲念膨胀，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在世的好处。贪污之“污”的内涵，并不仅指物质。

名人的丑恶

我们只在注意着官场官员的腐败，对另一些人物的作为却忽视了。即使看见不公或是丑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是默认就是无可奈何。据某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的尴尬消息称，那些靠走私发财、或者靠偷逃税款发财的大款爷们，事发后不光拖带出了背后的政府官员，也拖带出了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人物。

名人，是公众对所喜爱的人给予的认可，偶像更是一些崇拜他们的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公众之所以喜爱他们，或因为他们的演技高超，或他们的嗓音甜美，或其作品能够打动人心。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给了观众或读者以美的享受，无论他们收入多少，只要不偷逃国税，都是名正言顺的。

然而有些名人们却并不尊重给予他们掌声的公众，利用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的名声和地位，为虎作伥，为那些贪官污吏或是江湖骗子们跑腿，在贪官和奸商间穿针引线。事情办成，便获得一份不轻的红利。

我曾经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了一位我所崇敬的人的信。那信是写给美国某位先生的，正请这位朋友翻译。信的内容是要求到美国访问，其中有这么几句话：“您回信时，就说经费由你们出（当然是我们自己出）……”忽然间，我像是看见自己的亲人正在掏人家的钱包，那份失望真没法言说。原来我所崇敬的这位，竟骗取了我们的感情。他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身正气，品格崇高。

有些大款靠不正当手段获取了暴利，钱多得用不完了，吹嘘着曾经花多少钱请哪个明星陪客，有的甚至说得更恶心。有些人给这个明星一套房子，给那个明星一个价值多少万的花篮。得了好处的所谓“星”们，竟也能够屈尊去跟这些人凑趣赔笑，甚至以身相许。她们的灵魂干净吗？知道了内幕，再看他们在电视镜头前的表演，就看出灵魂深处的龌龊了。什么“人民需要我们，我们离不开人民”的激动语言，原来不过是跟摄像机的合伙做戏。

一个偶然的场合，在盗版的电影 VCD 光碟中，我竟看见了这样的一幕：一位常常把“人民”挂在嘴边上的女电影演员，居然在台湾某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控诉共产党的角色。那

些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拖家带口向边境逃窜，后面的解放军向他们开枪，哭喊声震天，鲜血染红了河水……形象地控诉着解放军在追杀败军时的“残暴”。这位电影明星扮演着一位军官太太，拖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展示被迫的苦难时同样演得逼真，哭得令人同情。

她是演员，拿人家的钱帮人家演戏，有没有是非观或持怎样的是非观是她自己的事，原本没什么可指责的。问题在于，她常常在电视中抛头露面，说着党如何教育她，人民怎么哺育她，而她又是怎样地把人民记挂在心中，激动不已，原来那也是做戏。说谎不打盹儿，也不怕她跟台湾的合作被人看见，也算是一大本事。可见，以所演的人物成功与否来判断他们的人格，是大错而特错了。



要想生意做得长久，
仅笼络管经营的方面军还远远不够。

据报纸上披露，某些人的书要发行了，不惜跑遍大江南北去签名售书，商店的老板们会做生意，在顾客买书时顺便搭一双鞋。我实在希望那报道不实。

在某一家餐馆，几个人吃饭之后去结账，跟收钱的吵了起来，他们认为餐馆收的太高了，要求打折又被回绝。于是他们拿出了杀手锏，说他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并声言要对本店暴利曝光。老板并不

认为自己错了多少，也不认为他们是真的记者，仍然不肯退让。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过了半天，真的来了扛摄像机的拿话筒的，进门就到处扫描。这次不是假的，是真记者，来曝光餐馆牟取暴利的。后来几经各方朋友周旋才得以平息。

事后才弄清楚，吃饭的是“兄弟台”某位有些身分的记者的老婆一行，他们昂首阔步，大大咧咧，以为是记者便是谁都惹不起的王爷，走到哪里都要受到总统一样的接待。人家敢于不打折那就是藐视新闻工作者，就是受了“欺负”，要找当地的同行帮忙出气。于是本地台的记者们果然慷慨相助，来帮人家出气了。

记者监督别人名正言顺，可谁来监督他们呢？

几年前各报都转载过一个消息：某县级市有一个“民营保护区”，干的是色情行业，沿途的餐馆以女色为钓饵，被记者暗访出来了。见报之后，全国震动，引起的反响不小。这对当地政府来说是一瓢冷水，见报后马上和公安部门对这个区进行了认真地整顿。

然而据后来当地政府透露出消息，那起因却并非是记者一腔正气使然。原来外地有个人赖账，这边的人想办法将那人骗过来，囚禁在一处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囚人是非法的，那边便请了个记者到这边谈判。此记者依仗自己的身分，便想在这件事情上打点秋风，给当地政府开了个价。当地政府不肯低头，于是便有了报纸上的“曝光”。

事情是真的，效果也不错，只是表面一腔正气的背后，却是见不得人的阴暗心理使然。假如当地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呢？可以肯定地说，将是纵容腐败，同流合污。

在演艺界，在一些动听的幌子下，是欺骗人的假唱。造假也造得颇有水平，竟然唱得青筋暴露，让观众以为他们是真的

为人民使劲呢！这些演员既要捞钱还要捞名，骗取老百姓的尊敬。

.....

以上这些丑恶现象都并非发生在官员身上，他们的表演不比任何一个贪官逊色。固然，官员的言行动静都牵扯着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干部的约束理应比对其他方面其他人更严厉。不过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国家似乎并不存在纯真的“民间”，那些冠以民间的演唱和集会，都是经过了包装和加工的，对这些名人而言，就更不用说了。“人民”和“政府”在提法上都是连在一起的，凡冠以“人民”的单位，如“人民银行”，“人民医院”，都是政府所属的部门。因此可以说，那些人也并非货真价实的“民间人士”。他们之所以成为名人，还是有赖于官方的力量。对他们有专门的提法：人民赋予的权力。他们也自诩自己是“人民的××家”。

美言·抬庄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请美言几句。随着这句话的，还有说话者笑嘻嘻的面容再加向你一抱拳。仿佛玩笑，内容却严肃。这种事情往往出现在评奖之前，或在上面对将来人对提拔对象调查时，或是评职称之际。

美言，就是请人说好话，不要说于己不利的话。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听者或会意地点头，或一笑而罢。但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我们在要求别人这么做时，也是要求人家掺杂一些谎言的。只说好的，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人无完人，就是优缺点并存。而“美言”的含义只是一半，即好的那一半。也许那一半是实事求是的，但只是优点部

分的事实，而不是总体的事实。况且“美言”所包含的，并不只是要求人家摆“实事求是”的优点，其实实在的意思，是往高处拔。

在当今风气下，谈人的缺点和不足似乎成了不近人情，成了“左”的代称。大学生找工作时的推荐，干部考评时的发言，文艺作品讨论会上评论家的意见，以及单位年终的总结之类的场合，不来几句美言似乎就对不起人。而往往出现这种情形时，总是有当事人的请求：请美言几句。

于是乎，作品讨论会成了表扬会，对干部的考察会的发言跟追悼会悼词差不多，文学评论成了表扬稿，如果有当事人在场，更是一致的赞歌。

凡请人“美言”者，大多人缘儿关系都不错。这是平时积下的大德。往时对人投之以桃，此时人家才报之以李。

“美言”并不仅仅给被美言者带来好处，也有可能给他人带来伤害。若是被美言的仅仅针对某人，并不涉及其他人，比如仅是讨论某个人的作品，倒也没有话说。但如果是跟差额选举一样受名额的限制，在候选者中挑选出一个来，问题可就来了。“美言”了这个就顾不上那个，那么这“美言”之下，就是对别人的不公。对这个“爱而唯见其善”，势必对那个“憎而唯见其恶”，所谓的公平也就不存在了。

“美言”的后面，是并非正道的笼络。它跟当今盛行的“出门靠朋友”同出一辙。“美言”是对“自己人”才有的恳求，跟志同道合者才肯如此开口。人家是否美言，你敢不敢请人美言，就看平时你跟人家是否在感情上加强了联络。之所以能够向人一抱拳请人美言，说明自己也为别人美言过的。世界看起来很大，其实很小，各人有各人的小圈子，“美言”二字是小圈子里的人才听得懂的语言。

如果是干部选拔，所谓美言之托，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就是腐败的表现。

与此相联的，还有“抬庄”一说。“请抬庄”，听意思像是朋友间的恳求，如果是私人请人帮忙，如请客时“请你务必到场”这种意思，那当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问题在于，这种话用在其他事情上，就有些可怕了。比如在某种场合需要把竞争对手击倒，比如在选举时务必请投我一票，这时的“请抬庄”就是拉帮结派。因为它是要人家以谎言哄弄人的请求，是形成势力的步骤。事实上这种事情到处存在，有的暴露了，有的却顺利地过了关。

美言只是含蓄的一半，是请把我好的那一面帮忙展示出来；抬庄则是无论好坏，都得达到目的。抬庄是江湖中的语言，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如今许多恶势力，就是在这种抬庄中抬成的。

这种语言也出现在一些干部口中，这种事情也出现在干部选举上。你抬了我，下次我必定也要抬你，凡被抬庄抬上去的角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就成了空话假话。有了权力，首先要照顾的是曾经抬过我们一把的人，而那些能够使一把力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久而久之，一帮“朋友”将上台的围在中间，一股恶势力就这样形成了。

那些被抓的恶势力成员，没有谁不认为自己冤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只不过大家都是朋友，互相帮一把而已。可是他们就没有站在圈子外看他们自己，原来那是一个谁都惹不起的小集团。这在那些坏人当道的场合尤其露骨。

据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料显示，农村一些人一人得势有了权力，小兄弟们都捞好处，有了事情兄弟们都一齐上阵帮忙。他

们为了摊派的捐或者什么费没有交上来，就动用那一帮，大家为了帮忙抬庄，便打上门去，拖人家的猪，拆人家的屋，甚至私设公堂拘禁拷打老百姓。那都是抬庄抬上去的。

凡这种抬庄的场合，必有一股势力存在，法律和公平基本上名存实亡。

但相比之下，开口说“美言”和“请抬庄”的，比起那些根本不用语言表达，却达到了比用语言表达更好效果的人来，其层次又差了一着。请人美言几句皆是下层的人们，即使为恶也影响面有限，而那些高级别的人物却不同了。反贪局查处的那么多贪官污吏，都是怎么上去的，是谁把他们弄上去的。其实异曲同工，都是有抬庄的人帮忙抬，有说话管事的人帮助美言而上去的。

反腐败，也应把那些人物计算在内。

我们需要谎言

谎言让我们的人生旅途格外艰难，谎言使我们的生活布上了阴影；谎言如老鼠和苍蝇一样令人厌恶，却又如带病毒的蚊子挥之不去，随时都可能叮你一口，让你防不胜防。谁都祈求结交的朋友是君子，谁都不希望遇见谎言和骗子。不幸上帝总是这么吝啬，要得到真情又是多么地难。

然而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中从此没有了谎言，一切都按照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要求，在一个君子国里“实事求是”地过日子，“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那将如何？

回答是没有谎言的日子并不好过。

且看具体的分析吧。

假如生活中没有谎言

吃过谎言苦头的人们大概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在痛恨谎言的同时想入非非，希冀天下再无谎言。我在胡思乱想中，进入了一个无谎的社会，勾画着无谎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情景竟让人啼笑皆非。知道那是什么情景吗？

无谎的社会是个没有坏人的社会，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斗

争。大家讲客气讲周公之礼，你用不着防我，我用不着防你，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五湖四海皆兄弟，那倒像是共产主义到来了。不过我们是就现在的处境而言，而现在物质还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这种境界，只能是就汤下面，以现在的基础勾划君子社会。

往深处一想，情况就不是这样令人满意。

说谎的源头是私字作怪，无谎的前提便是没有了私利。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成了我的，还要不要家庭？因为家庭是以有血统关系的小团体为单位的。家里家外没有了分别，还要家庭干什么？

就算还有家吧，似乎又不像个家。大门上锁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可以二十四小时敞开，防盗网之类的玩意儿也就用不着装了。家里的东西谁愿拿谁拿，当然，大家都成了君子，是没人拿的。两口子睡觉也用不着关门，并不怕别人偷看偷听，如果不冷得慌的话。有了孩子，入托上学都不会成问题，再也不用不着走后门说好话。

不过从孩子上学起，似乎问题就来了。

孩子们学什么？政治课不需要了，因为政治课是要人们熟悉阶级斗争历史的，既然没有了谎言，天下一家，也没有了人剥削人和人欺骗人的现象，那么还要政治课干什么？学生们学的，无非科学知识。那是为人家学的，因为如果自己没有本事，是用不着操心日后的生计的，我们差吃的差喝的自然有别人主动供给。那样一来，对孩子的未来自然少了些忧虑，比如“不学好本事将来吃饭成问题”，就用不着考虑了。

历史似乎也成了多余的课程。因为剔除了斗争，历史剩下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了。而“斗争”一词怎能够少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谎言！《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还有没有值得借

鉴的价值？智、谋、计、策、术、略，诡譎、狡猾、奸诈、伪装等等词儿皆是谎言的范畴。“智取”是要对付谁？“狡猾”是对谁而言？更有数不清的成语都与谎言有关，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等等，还学不学？学了干什么用？在学习语文方面也有些不好办，比如讲学习雷锋精神吧，“对坏人坏事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因为没有了坏人，这些文章都得重新衡量。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方面也都得重新审视。

还需要警察吗？不需要了。因为没有了犯罪，没有了纠纷，还要警察干什么呢？君子国不能独立存在，大概是世界性的君子国，国与国之间也没有间谍，当然也不需要军队和武器了，国界的划分也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与此相联的，是仲裁机构呀，消费者协会呀，监察、法院、检察、公安、保密等等，甚至居民委员会等机构都将无事可干。

既然大门用不着上锁，造锁的也要失业。银行还需要吗？存款是个人的储蓄，个人即是私。

从此上街不必担心有小偷行劫了，用不着担心买假货，也不用担心买的猪肉是注了水的，吃药也不必害怕假药。

然而理想境界的背后又有问题，那就是太累。你给我作一个揖，我必然要还你两个揖甚至还将磕个头。你来找我借一碗米，我希望你连我的米坛子都抱去。你请我吃顿饭，我将很难埋头吃得舒心，因为我得照顾别人的情绪，应酬主人往你碗里不停地夹菜。开车到街上，那将寸步难行，因为大家都在为别人让路。再没有打架吵架的事情发生倒是好，但打麻将打扑克也没有了意思，因为那是损人利己的娱乐，玩那玩意儿都是要取胜的。

据此往深处一想，问题还多。奥运会还开不开？你让我领

先，我让你先到达，竞争总是不好意思，任何成绩都有些对不起别人。还要不要竞赛？如果还要，发不发奖？发奖就将对落后者的道义惩处……

还要不要国家？就算还要吧，大国从此不会欺负小国，强国也不会再欺负弱国，说不定美国会将他们花不完的钱送给我们。假如万一有个国家不讲周公之礼，要抢占我们的地盘，他们打来了我们是作揖还是拿枪？

总之，不好办。

记得有个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妇女，怀孕怀了六十年，后来经过剖腹产，只见里头有两个白胡子老头，他们两位在里头讲客套。这个请那个先走当哥哥，那个请这个先出去做老大，这么一直客套了六十年，只苦了他们的老娘。

既然天下再无骗子，还有什么必要戒备，研究识别谎言的那部分思维完全可以关闭。大家都是君子，老实人也就不再是希罕之物，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没有欺诈就没有了真诚，没有狡猾就没有了诚实，没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那是一个不阴不阳的世界。

还有，我们的道德领先于物质，精神倒是上去了，但物质不够分，难以让所有人衣食无忧。我们给了别人，自己吃什么？更有可怕的，少男少女谈恋爱是否还有激情都成问题。没有激情就不是恋爱。爱情是自私的，自私就有谎言存在，既然都无私，张三李四无所谓，跟谁结婚都无关紧要，“爱”这个字眼儿还要不要？还爱不爱得起来？就算还有激情吧，一对朋友同时爱上一个人，势必互相谦让，让的结果，是那被爱的再不是爱的对象，而是像物品一样成了君子赠给对方的礼品。

美与丑，也是有私社会的概念。爱美就要装扮，装扮就是谎。一切都无需遮掩，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真实就

是好。大家都真实，只要不冷得受不了，衣服都可以不穿的。

再者，我们的文学创作写什么呢？没有了矛盾，没有了真伪，现实主义也就没有了现实的意义，大概也没有必要创造些大家都不感兴趣的东西了。写人的自我感受或是内心世界？那时候没有了个人的所谓内心世界了。我们的舞台和银幕上将没有东西可看。即使有，也将是科技方面的纯技术方面的东西，即使是动物世界的争斗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后代不知什么叫欺骗，也不知道如何使心计。大脑的某一部分不起作用就会退化，从功能到外形都会变化，久而久之，将会变成怪物。

无谎的社会固然没有恨，但无恨的社会也将没有爱。

七情六欲怎么办？不好办。为了他人的幸福，只有赶紧去动手术，免得在压抑不住激情时做出了对不起人的事情来。于是大家都跟工蜂一样只知劳作而无欲望，人都成了会思维的机械。

这么想下去越想越多，越想越怕，那无谎的社会原来寡淡无味之极。其实这种君子国在《镜花缘》里有过描写，不过那个君子组成的社会让人很累。还是现实社会好些，尽管谎言让我们常常吃苦头。

谎言的功能

既然无谎的日子不好过，那么还是得在现实的世界寻找其合理性。没有了谎言，人们就没有了必要学习辨别真伪的本事，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了防范，由此而辐射开来的，是一切努力都成了无所谓的东西，而人的脑袋也将在无所用心中退化。先是不与人较量，发展下去恐怕连动物都斗不过了。因此

说，生活中不能没有谎言。

除了善意的谎言让我们得到安慰和增强信心外，恶毒的谎言也不全是坏的结果。可恶的谎言能够提高我们的警惕，让智力不至于停滞，识别真伪的能力是智力的主要方面。再想想生活的方方面面，仅我们每日常用的语言和成语，就无不与谎言有关。

看看具体的例子吧——

吃一堑，长一智。

如何“长一智”，来源于“吃一堑”，这“一堑”少了谎言还不全面。与它相近的还有一句：“上一回当，学一回乖。”人的成长是由无知到有知的过程，人的成熟也是在上当学乖中达到的境界。人生路上，谎言如拦路的障碍难以避免，既然如此，还不如勇敢面对它。骗子行骗的方法并不只是单一的一种，“吃一堑长一智”的内涵，就是上当过后增长的免疫力。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的含义并非只有政治斗争这一种解释。竞争，就是与人奋斗。学生的升学，职位的提升，单位年终的考评，都是人与人的竞争，也是与人的奋斗。自我调整，也是与人奋斗。所谓“战胜自我”，就是克服自身的弱点以适应社会，其目的还是为了与他人的竞争。人类的不断成熟，社会的不断进步，很大程度是人与人互相竞争的结果；而自我的调整亦是奋斗中的步骤。识别谎言和揭露假相，同样是与人奋斗的内容。

去伪存真，去芜存精。

这既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尽管探求真理的含义并不等于全在对谎言的辨别上，但谎言的存在却有助于我们学会如何思索。人文素质与科学知识之间并无横梗，“触类旁通”的重要作用在古时就已经被认识了。如何去伪存

真？首先是在日常生活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而“伪”，就是谎言和假相。所谓的“芜”，就是掩盖在真之上的杂质。没有了谎言和假相，那么人类这一部分的功能将会大大地削弱退化，由此而涉及其他方面，那脑袋未必够用。

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提倡说老实话，是因为假话害人，而且假话太多；提倡做老实人，是因为老实人可贵，却又太少。是否老实人老实话，落脚点还在于做老实事。新中国历代的领导人都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可见实事求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的。正因为如此，老实人才受到人们广泛的尊重，老实话才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老实人可能在一时会吃亏，但时间是检验一个人优劣的最好裁判，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格言，就是因为世上有谎言才创造出来的。老实人和老实话在可恶的谎言对比中存在，谎言便衬托出了老实人和老实事的价值。

如果世界上全是老实人，那么可以说，地球上就成了白痴的世界。

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

在世上得一知己如沙里淘金，古人的感叹来源于知心人难得。熟人相逢总是点头笑，但人心隔肚皮，隔膜让相互间如雾里看花，在这样不知对方深浅的情形之下结识一位真朋友，那朋友的友情才尤其显得珍贵。许多生死交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串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但给了我们借鉴，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桃园三结义”。假如世上所有人都是君子，“知己”也就多余，我们的生活岂不是少了许多味道！

火眼金睛。

这句成语是从《西游记》里来的。孙悟空被关进了太上老

君的八卦炉烧了四十九天，炼成了一双能够识破一切妖魔鬼怪的眼睛。现代人将这句话引申过来，用来形容对谎言和假象的识别能力。如果没有了谎言，这句成语也将没有作用了。因为生活中没有了火眼金睛的位置。

现象与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我们常用的一句话。现象是直观的，但直观的却未必是真实的。撇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不谈，仅就假话假象而言，这句话就值得重视。骗子都是一些聪明人，他们在骗人的时候，总是设计出一些虚假的东西诱人上当，而真实的东西却隐藏得很深。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无论是人还是事抑或是好听的话，是真是假，还得多长个心眼儿。因为世上有谎言，才有现象与本质这样的词儿，而这样的词儿又教育我们正确的思维方式。

与此相连的，是真理与谬误的区别。真理往往掩藏在假象的背后，谬误即是假象。

斗智斗勇。

这个词儿既存在于与人的奋斗中，也存在于科学和各种工作的探索中。两军相持，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自不待言，在生活中也未必没有运用的价值。我们在某些方面，明知只剩下一层纸，但那层纸还没到戳穿的时候，就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事情在对敌斗争或公安工作中常常可以见到，“人赃俱获”的常用语中，就贯穿着斗智的方面。那些犯罪者在被调查时候，却不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已经被控制了。而在平常交往中，办案的也得用假话跟被调查者虚与委蛇。在正当的竞争中，也有相斗的场合，比如商业活动中的竞争，就少不了迷惑对手的方面。迷惑对手要用假象。这之间，少了谎言就难以成

立。

保守秘密。

既然有大家都应该保守的秘密，这秘密就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冷战之际，天知道有多少间谍在活动。即使冷战时代过去，“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仍然不可能消除。国家有保密机关，单位有保密纪律，个人还得受保密纪律的约束。一方要刺探敌情，一方要保守机密，保守机密中就不能不用谎言来对付。如果将泄露机密看做是说老实话，岂不是笑话！

.....

除了这些之外，在我国古代的成语和习惯用语中，有许多与谎言有关：指鹿为马，欲盖弥彰，信口雌黄，朝秦暮楚，颠倒黑白，运筹帷幄，足智多谋，言行一致；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这些成语和用语，舍了谎言都难以成立。

有人提出，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不能尽宣传好的一面，要引导孩子认清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我赞同这个意见。轻信他人，就是单面教育带来的恶果。总体来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并没有错，但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和环境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总有几个回合的黑色季节，而这种逆境正是催人成长必不可少的磨练。孩子出门，不能不嘱咐他们将钱包装好，因为人多处有小偷横行。孩子出门旅游，不能不教他们多长个心眼儿，因为精彩的外面世界有不少骗子。一个人贪图小便宜上了当吃了亏，引起的反思恐怕不仅仅只有对骗子的愤恨，其中也有对自己的反省。从这个角度来看，谎言的世界对人的觉悟过程也不是没有好处。

近来学校提倡“素质教育”，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也是素质之一。而“社会”的构成中，谎言和虚假是重要成分。

善意的谎言

谎言有善有恶，区分谎言的善恶，不在于语言是否正确，而在于说话者的用心是否善良。中国的语言表现力丰富，任何话都可以作多种解释，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或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其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凡是怀着善良目的的谎言，都是善意的。而善意的谎言能够起死回生，能够克敌制胜，能够让我们战胜看似不可能战胜的任何困难。

生命是如此脆弱，我们的感情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每个人都少不了别人的理解和同情，有时候，甚至需要人家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带给我们的收益是多方面的。

谎言战胜死神。

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西方某个城市的一个角落，一群穷作家艺术家住在那里。在寒冷的冬天，那房里没有暖气，甚至没有取暖的东西。一位年轻的姑娘病了，她睡在床上能够看见的，就是窗外对面住户的墙。在那面墙上，爬满了长春藤，藤上原本长满了绿叶，随着寒冷步步紧逼，她眼睁睁望着那叶子一片片落了下来。她哀叹道，等最后那片叶子落下时，我就要死了。然而那最后一片叶子总没有落下。一天又一天，那片叶子固定在那里，不掉，也不褪色。寒冬终于过去，春天到来了。那姑娘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以后她才知道，那片叶子是一位好心的画家画在上面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就叫《最后一片叶子》。

科学证明，人的精神是战胜疾病的重要因素。许多人在未知什么病痛之前生龙活虎，一旦知道得了不治之症，迅速地垮了下来。最后一片叶子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这样的例证同样

可以在现实中找到。

一位朋友的父亲曾是一名军官，一九三九年，身为团长的他带兵打日本鬼子时，飞来一枪打在他右边的腰部。卫生员为他包扎了一下，说是子弹擦过去了。他带兵又经历过许多战争，伤口也已痊愈。一九六九年，左腰疼痛，医生开刀，取出一粒子弹。原来那正是三十年前在黄河边上从右腰进去的枪弹。如果三十年前就知道子弹还在腰里，他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地度过三十年吗？显然是不行的。

由此可见，人的精神能够击退疾病的进攻，并不是毫无来由。而善意的谎言即使不能挽救人的生命，至少可以减轻精神的压力和痛苦。

谎言能够疗伤。

前苏联曾有篇小说，讲的是一位老太太，住在一幢大楼里。支持这位孤老太太生活下去的，是她的儿子。她一直盼望着儿子归来，而她的儿子早就在战场上牺牲了。后来老太太真的接到了儿子的信，每当少先队员去她家， she 就把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信是从远处寄来的，儿子说工作太忙，要她老人家注意身体等等。只有那些孩子们清楚，那信是他们以她儿子的名义写的，绕了好大的弯子才寄到老太太手中。后来那样的信不停地寄来，让老太太在幸福的盼望中度过了残年。

这种事在我们中国也不乏例证。就在我家乡那个县里，一位转业军人在水利建设中死了，他的妻子不愿让婆婆伤心，就跟大队的干部商量，假说她儿子又回部队上去了。过了一年多，老太太埋怨儿子，去了这么久也不回来一封信。眼看纸包不住火了，儿媳再跟干部商量，让人在外面假装以死者的口气给家里写信，并让死者的儿子念信。那孩子也很懂事，压下他对父亲的思念，跟母亲和大队干部一起，共同做假安慰他可怜

的奶奶。这个谎言竟然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老太太过世。为了这个谎言，那位可敬的女性再也没有改嫁。

在纪晓岚的随笔集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嫂二人在一起生活，某天夜里，墙倒了，小姑为了保护嫂嫂，自己顶住墙，被压死了。嫂嫂日夜啼哭，怀念小姑。村里人为了安慰她，就假说小姑成了神仙了，夜里给他们托过梦。有人就掰歪理，小姑对嫂嫂那么好，为什么给别人托梦偏偏不给嫂嫂托个梦呢？纪先生说得好，此时是不需要弄清楚的。能够安慰可怜的嫂嫂就是目的，何必要管它真实不真实呢？

的确，此情此景此时，对于一位苦命的人来说，迷信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安慰剂，此时去破除迷信只怕对嫂嫂是最大的刺激了。

东晋的郗超是个孝子，自己快要死了，他怕父亲受不了，就在死前让门人转交给父亲一只箱子。果然在他死后，他的老爹悲痛欲绝，可是看了箱子里的东西之后，大骂儿子不是东西，再也不伤心了。原来郗超的父亲是忠于晋王朝的老臣，郗超曾跟乱臣贼子桓温有来往，箱子里装的，都是跟桓温往来的信件。这个郗超可能在政治上有些糊涂，但对待自己的父亲可谓用心良苦。

谎言可以驱走恐怖。

在古书上看见一个故事，有个人犯了灭族的罪，他被杀了，接着要杀他的孩子。两个儿子一个才九岁，一个才七岁。轮到他们了，哥哥说，死了就可以见到爹妈，因而弟弟引颈受刑，并不觉得难受。即使难受，大概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也会认为这暂时的难受很快就会过去，马上就会见到父母了。可惜这篇故事翻遍了书，也没有找到。

谎言能够建立信心。

狄青南征，为了打消南方兵士的疑虑，设计了撒铜钱的一手（前面提到过）。他向天祷告说，如果我们能取胜，就请将所有铜钱正面都朝上。于是他将一把铜钱撒出去，果然所有铜钱的正面都朝上了。事后才明白，铜钱的两面都是正面的图案。假借鬼神让兵士建立起必胜的信心，这是谎言，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那一把铜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即使能够将这工作做通，也还需要有大量的时间，而他们面临的是战争在即，没时间来讲究科学破除迷信了。

另一个故事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曹操的部队在一次行军的时候，兵士们都渴得厉害，曹操指着前面一片树林说，树林里有杨梅，于是军心大振。这个故事就是“望梅止渴”。尽管是一时的糊弄人，但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速度，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那个谎言起着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

曹操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前面将没有水，那岂不是自取灭亡！

这么多例子证明，如果没有了谎言，那将会使生活变得苍白而缺乏色彩。当我们正在经受着绝望的折磨时，当我们遇见困难难以克服时，有个人对你说上一句好话，尽管你也许是半信半疑的，但无论如何，那将会是给你的最大支持，比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据调查，绝大多数人不反感这类谎话。

当我们处在衣食不保的境地时，这几句话足以让我们建立起信心。

再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正话反说，才使生活充满了情趣。一个姑娘很喜欢一个小伙子，但她不直接说喜欢他，却说：“小坏蛋！”大人喜欢孩子的活泼可爱，却说：“捣蛋鬼！”男人猜不透女人，就在于女人撒点小谎。她说不爱你，可能正是爱你。她说不，恰好也正是要。

等等例子说明，谎言并不只有害人这一种解释。正因为生活中充满了谎言，才使得人生更显艰难；唯其艰难，又才使人的聪明得以发扬，使我们的头脑不至于简单，思维不至于停滞。能不能识破谎言，是检验一个人智慧高低的重要方面，古人在这方面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就在于那些超凡脱俗的智者们的才智，将历史装点得绚丽多彩。这些故事给后人的，并不仅仅是有趣，重要的还在于它给了我们启迪，开启了我们的心智。至于上面所说的善良的谎言，对人的帮助更是直接有效的。

因此说，生活中不能没有谎言。

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

《红楼梦》里有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红楼梦》时还很年轻，许多内容都没有读懂，可这两句话一接触就马上记住了。因为生活中老是出岔子，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以为这两句是做好一个人的根本，便记得特别牢。不幸的是，记得牢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得到是另一回事。岔子照样出，并不因为记住了两句警句就有所好转。直到年过五十，才明白了其中的玄妙。

原来，“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是两码子事。

所谓“世事洞明”，就是有一双能够看透一切的慧眼，当然也包括谎言。《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是按照这一模式塑造出来的一个让众人仰望的典型。

所谓“人情练达”，就是圆滑处世，优游于世人之中，当说的说，不当说的就不说；当听的听，不当听的坚决不听。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装糊涂，做得恰到好处。

谁能做到洞明世事而又人情练达，那可就成了大圣贤了。

《红楼梦》里还专门塑造了一个达到如此境界的人物，这就是薛宝钗。丫五受辱投井自杀，王夫人因为是自己逼得人自杀的而心里难过，这个薛宝钗明知事情原委却要撒谎，对王夫人说，那孩子说不定是玩儿时不小心自己掉井里去了的。这还不算，她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了不少那个丫头的家人，以平息死人的风波。再就是她生日的时候，贾府专门让演戏的唱戏为她祝寿，要她点节目，点吃的。这位富家小姐可真是修养到家，她知道贾母人老喜欢热闹，就专点热闹排场的节目，又知道老人喜欢吃甜软的东西，也就尽点甜食。她悟透了人生，却大智若愚，她天分极高，却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拿定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惹得上下左右的人都说宝姑娘是个好人。

这个薛宝钗就是对那两句话悟透了的人物。她既看得清世事，又悟得透人情，可谓左右逢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般人却做不到。谁能对世事清白到如此程度？谁又能圆滑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做不到却也罢了，只要我们既不懂世事又不懂人情，日子哪怕苦点，倒也并不太惹人讨厌。

最可悲的，是对世事洞明却对人情糊涂者。因此苏东坡恼恨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郑板桥慨叹“难得糊涂”。苏先生作诗说：“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郑先生恰好也

有诗说：“年年为恨读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尽管他们是发牢骚，却也透露出了对人生某些方面的无可奈何。由此可见，能够让那两句警言在一个人身上统一协调起来，是多么不容易。

世事洞明，必然识得透人间的谎言。而人情练达，却要对谎言包容，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出卖另一个人的利益。薛宝钗对王夫人的安慰，即是对那个可怜丫头的出卖。世上最无奈最痛苦的，莫过明知是谎言却又不能揭穿，而昧着良心帮人说谎，就更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够达到的了。

是不是凡捅破谎言者皆值得同情皆值得赞扬呢？却也不。为人圆滑与宽容待人，同样不能混为一谈。

《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是个才子，他聪明绝顶，天下大概没有什么事能够骗过他。不幸他对世事的洞明，正与他对人情的糊涂成正比，最后终于因为太聪明掉了自己的脑袋。为这件事，我恨了曹操一辈子。在李贽的《初潭集》中，李先生将杨修归在“愚臣”类。我以为李贽是一点黑色幽默。等我也上了一把年纪以后，才看出其中的问题来。

杨修的被杀，实在是他咎由自取。

平心而论，曹操是很看重杨修的才气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对曹操的评价是“曹公尚通脱，天下少礼仪”，认为他开了一代撒谎的风气。但在评价他的读书学习上，也不得不承认他“老而好学”。因了这个特点，他尊重文学之士，在写作上也绝不投机取巧。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性格中的这一点是公认的。

罗贯中抓准了这个人物的特点，特地为他设计了一个细节：蜀中张松来见曹操，杨修向他推荐了曹操写的一本兵书。张松瞟了一眼，竟然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并说蜀中小儿都知道

这本书，让曹操以为跟前人撞了车，一把火烧掉了。曹操在许多事情上造假，在这一点上却不敢充大。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在他不是一句装潢门面的话，有许多事实能够证明。孔融、弥衡、徐庶、蒋干、杨修等等一大批人物，都是他请到帐下去的。在这些人物中，杨修并不是最优秀者，但他贴曹操最紧，曹操对杨修也是格外看重的。即使行军打仗，曹操并没有把杨修当作一般的幕僚看待，常常跟杨修走在一起，谈天说地，讲古论今。

一次行军路上，他们两个又走在一起，在路边看见一座“曹娥碑”，碑上正面有一篇文章，碑后面有八个字：黄绢幼妇，外甥齏臼。曹操问杨修，你知不知道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杨修说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让我猜猜。走了三十里路，曹操琢磨出来了，原来这八个字暗藏着对曹娥碑上文章的赞语：绝妙好辞。曹操诚心诚意地说，我跟你的差距是三十里。

不幸曹操的看重，并没有让杨修自珍自爱，他不但没有点谦虚的意思，反而更加不知进退，处处卖弄他的小聪明，曹操对他也是一让再让。有几件事可以看出此人的不知趣。

一件事是曹操做了一个门，手下人做好了请曹操去看，曹操什么也没说，写了个“活”字就走了。负责造门的不知什么意思，拿不定主意，知道杨修的大名，就请杨修出点子。杨修说，门下一个活字，那是“阔”，门太宽了。造门的马上改建，果然曹操就满意了。曹操问是谁出的点子，有人报告说是杨修，曹操便没有再开口。

第二件事：人家送给曹操一盒点心，曹操顺手在点心盖子上写了个“一合酥”。杨修看见，拿起就吃。人家问他怎么敢吃丞相的东西，他说丞相叫大家吃，因为那“一合”拆开念就

是“一人一口”。

第三件事：是曹操假说在梦中而杀了一个侍人。那个侍人在曹操睡时，见被子掉下来了，就要为他扯一扯，曹操害怕人家靠近，曾嘱咐人们不要在他睡时靠近他，那个侍人就是为靠近他而丧了命。曹操为侍人安葬时在那里哭，也许是假哭，边哭边说自己在梦中。杨修也去哭，却指着死人骂活人，说丞相没有在梦中，倒是你（侍人）在梦中。

第四件事：曹操跟蜀国打仗，久打难决胜负，很有些恼火。一日部下问当晚的口令，曹操正吃鸡，顺口说：“鸡肋”。杨修知道了，就带头卷铺盖。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卷铺盖，他说要撤退了。并给人家解释：鸡肋是什么意思？吃着无肉，扔了可惜。马上要走了。就为这件事，曹操说他扰乱军心，将他杀了。

都说，曹操杀杨修是嫉恨杨修的才气，借故有意加害。

现在看来，事情恐怕不是这样。对于杨修的死，大家都不好过。有一次曹操遇见杨修当太尉的老爹，问他怎么瘦成了这样，杨老爹悲哀地说，愧无日殫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曹操也为之改容。当年金日殫因为自己的儿子很得汉武帝喜爱，可是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宫殿里戏弄宫人，金日殫将儿子杀掉了。杨修的老爹拿那个人比自己，可见也认为儿子自己不检点才有杀身之祸。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吧。

单从杨修这一边去看，他所说的都是实话，的确将曹操所有的谎言或者没有说出来的话都戳穿了。按一般的想法，曹操是恨杨修的才气，杀他是迟早的事，所谓扰乱军心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但我们设身处地为曹操想想，就不能不讨厌这个处处卖弄聪明的家伙。

首先曹操名义上是丞相，杨修如果不愿跟曹操在一起，满可以不出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都给他做出了榜样。可是他却不是这样。既然跟了曹操，那么就应该在这个历史阶段展示他自己的才华。但杨修却不。他既要端人家的碗，却又要处处显示自己比曹操聪明。在曹娥碑问题上，曹操对他尊重，稍稍知趣一点，就应该自重。他却越来越放肆，大处无作为，小处卖聪明。在门的问题上，也可以说既照顾了曹操，又解除了造门者的困难，这是一件好事。在点心问题上，虽说是小事，但也太不尊重人家了。慢说是丞相的东西，即使是同事的东西，或是士兵的东西，也不能在不征得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就吃。这种表现至少说明了他的轻浮。在杀待人问题上，相信曹操并非毫无心肝，即使按演义书中说的，他是为了不让有人刺杀，故意杀个人给人家看的，但人毕竟是死了，那人在为曹操服务的时候可能也有令曹操感动的事情。相信此时曹操的心情是矛盾的。可他偏要往人家痛处戳，而且明白地表示，是曹操故意杀人。无论是谁，在此时如果对这个人还有好感，那才是怪了。

最后关于鸡肋的口令。慢说只是一个口令，即使真的知道队伍马上要开走了，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达之前，军中任何人都不能擅自作主。他那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军队管理。要严肃军纪，不杀他就难以服众。聪明反被聪明误，安在杨修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的聪明是指世事洞明而言，但他还没有聪明到足以保护自己的分上。真聪明就会猜出曹操将会怎样对待自己。连自保都不会的人，还谈什么聪明呢？李贽说他是“愚臣”的确不冤枉。

杨修的故事给了我一点启发，那就是，实事求是的东西也得有个实事求是的位置。真实的东西并不总是让人欢迎的。放错位置的东西都是没用的，这句格言也适合于说话。

回过头来看，所谓的人情并非只有圆滑一种解释。古代执法的县衙背后有一道墙，墙上写着六个大字：天理、王法、人情。可见人情也是对人文主义的认可。对人的理解和同情，审时度势，讲究策略，也应包含在里面。真实的，不一定就是美的善的。这是毛泽东早就阐述过的观点。

为了更能够说明问题，且再举几个现实的例子：

有一次从重庆坐船到宜



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碰到一起，常常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昌，到了巫峡，广播响了，播音员充满感情地告诉乘客，前面就是神女峰，接着就讲着古代的神话故事。大家都跑到船边望那云雾中的神女峰，一边惊叹那形象的逼真。偏偏有个家伙这时候插进来，挤到船边讲起了“科学”。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且正在以什么速度继续风化，过多少年以后它将不复存在。我发现，许多人都厌恶地瞪着他，但他却浑然不觉，看不出人家对他的鄙夷之色，继续喋喋不休。



有时候，诚实比谎言更可恶。

此时刻，这个人的科学论述竟比相信那块石头是真的仙女还要荒唐。他以为大家都是科盲，不知道那是一块石头。

另一件事是二十年前，那时在“文革”中封杀的古装戏才开禁，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放电影《追鱼》。到了动人处，有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被那里面的情节感动了。这时，她的身边杀出个“唯物主义者”，告诉那女人说：“这是假的，哪有这种事！”一时间，许多人都笑起来了。

这个人的可笑，也在于他说的是事实。那的确是假的，鱼怎么可能变成人呢？然而这个“实事求是”的语言偏偏就证明了他的无知。

可见，真实的东西并不总是显示了真理，也并不总是受人欢迎。

再回到谎言的主题上来吧。

假如你是个医生，查出一个病人患了癌症，并且到了晚期已经无药可治了，而那个患者自己却不知道。你将如何向他开口？你这样说吧：“我很悲痛地告诉阁下，阁下得的是癌症，而且是晚期，大概还有三个月好活。”这时候的实事求是无异杀人。

假如你碰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女朋友，你惊异她的老态，你设想一下这样开口吧：“好几年不见，你怎么老得这么快呢？记得你不多时候以前，还是面若桃花，身如柳丝，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你看你现在吧，脸上布满了皱纹，面色蜡黄，而且腰也如水桶般粗，肚子也起来得这么突出……”我想，那个朋友会在三天之内再老十岁。

以“假如”论证谎言不可或缺的方面还多，不列举了。

现在假设另一种可能。假设一切事物包括生活都严格按科学的推论判定是非，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读到神话故事，也不可

能有机会看那些好电影或电视剧了。因为那些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造假”。飞檐走壁，鬼狐化人，皆是撒谎。扔下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就成了纯物质的，那还有什么情趣。这些故事尽管假托鬼狐，但它说的却是人情，只要是正常的人，谁都不会去考证那些鬼狐故事是真是假。

世事洞明显出了学识的渊博，理应获得人们的尊重，然而有时候，世事洞明者竟比那些糊涂人更令人反感。如果将人情练达当作世故来解释，那的确是不足取的。但如果因为聪明连起码的人之常情也不顾及，却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事。

谎 之 源

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之初”不知指人类之初，还是指婴儿。但不管是哪一种，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人最初的本性是向善的，身上的毛病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得来的。比如撒谎就是毛病的一种，谁都不能说人生下来就有了撒谎的爱好。

然而怪。世界上劝人向善的书绝对比教唆做坏事的书多，收效却不大；没有哪一本书是教人们撒谎的，但谎言却一直是人类根除不了的恶习，古今中外甚至出了不少布谎大家。没有什么地方办这类学校，更没有哪所学校开这类专业，何以撒谎的那一套都能够一脉相承，无师自通呢？可见，性本善的理论并不是那么严谨。班固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那么在孔子作春秋之前，是谁教会人们做“乱臣贼子”的呢？

这只能说，人的心灵深处原本潜伏着做“乱臣贼子”的基因，一遇适当的气候就表现了出来。但这又与“性本善”说相悖了。

古时选官讲“孝”讲“廉”，可见既孝且廉的并人不多。现在评模范选干部讲“德”讲“才”，而德是首位，也证明德才兼备的人是需要“选”的。不挑选就往往弄出个冒牌货。

还是那句话说得实在：“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虽说这有点儿性本恶的味道，但它说明了人类向善，须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这一基本事实。

人是有脸面的动物，除了温饱还要顾及脸面，这就注定免不了还需要遮掩和乔装。那被包裹和伪装的部分是最脆弱或者最宝贵的部分。

脆弱的部分易于被进攻而需要保护，宝贵的部分用来交换而需要珍惜；这个矛盾体就决定了不可能如动物般坦荡彻底。

竹林七贤的某些人不穿裤子，以为那才是人的本来面目，却遭到了世人的讥笑，笑他们是疯子。在世人眼里，不疯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乔装打扮，就是掩盖了真相的假相。

那阴暗的一角，正是我们布谎的根源。

贪图享乐和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是人类的天性。梦想光荣和被人拥戴，是人们进一步的欲望。而圣人们的努力就只为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们都没有欲望。这种要人听话的学说很对帝王们的脾胃。所有皇帝总是希望天下安宁的，你的吃饭问题由我来考虑，你们只做到一条：听话。

但要人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如猪一样地活着？为了达到人生的辉煌，有的努力奋斗，有的却玩弄机巧；玩弄机巧的手段很多，最拿手的就是谎言；努力奋斗者不愿自己被耍弄被欺骗，也不得不给自己多准备两手，其办法也是隐藏真相，掺进谎言。

有的撒谎为了获取，有的撒谎为了自保。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世上谎言遍布的原因。

对于谎言，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叫法和称呼。一方叫阴谋诡计，一方叫斗争策略；这边的足智多谋者，站在那边看就成了诡计多端；这个人看他

是聪明，那个人看他就是狡猾……因此可以说，大家都站在竞争的前沿，每个人都是矛盾的一方。

人的两面性

社会风气好，逼得坏人办好事；社会风气不好，逼得好人也办坏事。这是一位基层干部针对目前腐败现象而作的概括。这位干部的忧虑无疑是正确的，社会风气对人的影响不可小看。但好人坏人，并不是生来就定型了，他们成为好人或者成为坏人，是否也与环境有关呢？下面两个例子大概可以作为此论的佐证。

明朝的李贽读了唐朝贞观年事迹之后发感叹，如果魏征早出生多少年赶在炀帝朝，焉知他不是个佞臣？李老先生的话虽是“假如”，但细想想，也不是不可能。李贽的猜测是读破了史籍而得的结论。

那个让后人喜爱的大诗人李白，一生也没有少拍马屁。他在给许多人的诗的抬头，就送了不少高帽子给人家。

唐明皇一日召集诸学士，请他们在便殿吃饭，喝酒喝到八分醉，皇帝便问李白：“我朝与天后（武则天）朝如何？”李白连忙答道：“天后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唐明皇笑道：“学士过有所饰。”李隆基那时候显然还比较清白，看出了李白的马屁。

李白这几句话比起贞观时候那些大臣们来，实在是拍马屁的格调。他将自己与唐玄宗拴在一起，既将自己也算在“精粹”里面，也指望皇帝一直重视自己。不幸没过多久，他这个如金如玉的“精粹”就被明皇当石头一样扔掉了。他可以用自

己的下场证明玄宗皇帝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同时证明他的话是溢美之词。不知他在落魄时有没有过反省。从这一点上看，唐明皇的话倒是：“学士过有所饰。”

向善与随恶，依附与自立，诚实与狡猾，这些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并不是棱角分明地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如果那样，世界倒是好办了，将他们按君子小人各种类型分拣出来，以免人们上当。麻烦的是，这些特征都糅和在一起，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先看以下这些表现：成克杰在某些场合作报告时心情沉痛地说，看到那么多人还没有脱贫，他心里很难受。某省原交通厅长曾锦成在被调查时给省委书记写血书，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说他这么多年来“没有收人家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此人倒台一年后，他的后任厅长张昆桐又步后尘，成了巨贪。还有的原本跟那些大贪官或野心家跟得很紧，待所依靠的人一旦东窗事发，他们指天划地委屈万分地说，他送礼行贿原非出自本意，对野心家也怀着不满……等等表演够多了。

这些人物以自己的犯罪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话皆是谎言。然而在仔细研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时，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话未必没有真实的成分。

先说成克杰吧。他在说那样的话时，不能认为他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毕竟负着一方的责任，看见自己治下的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时，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儿触动，至少不能说他的心里很愉快。就事说事，他未必不希望自己管辖下的老百姓能够过好一点。那时候，他是不会把自己贪了多少拿来跟老百姓的苦处对照和比较的。只不过，别人再困难也不能阻碍他不贪，更不会把自己贪的拿来救助老百姓。待跟情人讨论如何再获取

更多的钱财时，老百姓的问题就从他的脑袋里飞得无影无踪了，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多贪了。只有到了后悔无药时，他才感到委屈，原来自己不是没有考虑老百姓。

付出的每一点都记得清楚，获取的再多都可以忘记，是每个人的欲望所赋予的本能。普通人“我对得起他而他对不起我”的抱怨，与大贪官的委屈同出一辙。那位写血书的原交通厅长曾锦成，我们看他的血书，可以说写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但，他是否忘记了“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呢？也没有。他的信也的确有真实的一面。在写那封信时，他脑袋里装的是自己凛然正气的那一面，是勤勤恳恳工作的那一面，而那一面是对得起“一个党员”的良心的。至于那么多被查出来的钱财，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印象。也就是说，他不认为他接受的那些钱财是贪。一方面他也讨厌贪污贿赂，那词儿说出来都不好听。可是一方面他却又在不停地贪。如果要他说出那些钱的来路，可以肯定地说，一笔笔都不是贪的，而是有正当来源的。原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贪与正常收入的界限已经含混不清，因此他要感到委屈。

差不多所有的贪官污吏和政治野心家在被抓住辫子之后，都感到委屈。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也的确藏有正义的一面。只是那正义并没有表露出来，而行为上却走在一条荆棘路上。

还有那些行贿者，以及政治野心家的死党们，在某个有权势者或者政治派别正得意之时，他们惟恐跟得不紧，惟恐钻不进那最核心的小圈子里去。于是，送礼者送得比别人更重更巧，巴结者以别人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认别人的爹妈胜过自己的爹妈。一旦有权势者或那股势力倒台，在追查党羽时，他们一个个都感到委屈。想想自己送的礼，原来并非自愿，原来

都是迫于压力；再看看跟那人干的坏事，也无不是被逼的。

尤其在那么多证据摆在面前无法否认时，也还是挺憋气的，他们拉出许多人或事例，以证明自己对倒台的那人也是有看法并曾经流露出来过的。

说他们全是说谎，也并不太公平。问题在于，他们灵魂深处原本也不是坏种，也曾经有过堂堂正正做人这一点因子。他们企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随心所欲的高度，那样的话，做好事不必有什么阻碍，讲正气不必担心风险。但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那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多么地难！现实的好处是这么直观，既然高居人上的目标难以达到，何必去遭那无谓的磨难！因而内心深处，那一点可贵的东西被紧紧地压在底层，只有靠依附他人来换取现实的好处，于是丑恶的一面占了上风，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死党来了。

忽然发现所依附者并不是坚不可摧，在那人倒台的那一刹那，压在心底的厌恶猛地浮现出来，才知道自己原本不喜欢这个人，原来奉献给此人的一切，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在一种逼迫下的行为。于是感到委屈了，感到自己也有斗争的一面，反复向人解释的，就是自己的确有过多少抵制和抗争。

其实他们只要反问自己一句就够了，倘若那人不倒台呢？

人的两面性，体现在各个方面。性格的两面性，人格的两面性，随着环境的影响和掌握知识的程度而有所增减。当社会上以什么为荣的时候，人的那一部分就会被刺激活跃起来。比如在学雷锋的日子里，人们以做好事为荣，有的甚至为没有做一件让人看得见的好事而心焦。尤其在做了一件善事而得到了回报的时候，内心的喜悦让人感到做善事让人愉快而越做越高兴。在那种情形之下，贪婪的一面被压抑着，便让人以为自己没有贪婪之心。其实，那只不过是潮流影响之下的一种从众

的心态。

如果不信，可以看看我们周围的例子。在经济大潮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上了年纪的人慨叹当年拿着好东西没有当回事，不是一件无价之宝捐掉了，就是扔掉了。有的还回忆着当年，挖出的那么多金银财宝都上交了。年轻人叹息不已，老年人恨声不绝。可见，那年头的慷慨，原来是糊涂而已。因此后悔了，有的甚至为过去的行为捶胸顿足。

我们既不能据此就认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是假的，也不能认为今天的后悔是假的。只能说，人的两面性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时这一面占上风，一时那一面占上风。

由此便可解释那些想吃后悔药的人们，为什么在自己坏事的证据面前，还一再要声辩那坏事并非出自本意了。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丑恶现象都如沉渣泛起，腐败盛行，贪欲公开，有钱的成了好汉，贫困者被人嘲笑，这些都能够刺激起人的私欲膨胀，因而假话也就成了谋取利益的手段。认识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清自我，选择好在新的生活面前，对自己心灵深处的两面该怎么处置，该压制哪一面，该发扬哪一面。认清了这些，即使犯错误，也用不着吃后悔药。

保护自己离不开谎言

当人世深感步履艰难，处处有陷阱的时候，君子气或者还幻想周公之礼再现，是愚蠢的。比如商朝灭亡的前夜，箕子眼见皇帝和他的臣下都醉得不知年月了，谁劝谁就有掉脑袋的危险，掉了脑袋也难以改变局势，此时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史籍上记的都是历史上大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作为我们

老百姓，前车之鉴未必就没有借鉴的价值。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其艰难程度正与丰富多彩成正比。

一辆长途汽车行至无人地区，车上忽然站起几个人来，手里拿着家伙，问谁有钱，并命令所有人把钱都拿出来。车上乘客马上意识到，自己遇见劫匪行劫了。这时候，尽管人们无力对抗打劫者，也不会有一个人讲什么实事求是，告诉歹徒自己衣兜里有多少钱，更不会老老实实在拿出来奉送。即使刀枪顶在身上，那钱拿出来时也都不会利索。

撒谎，这时等于自救。

如果能够跟司机达到默契，人们还可以用假相跟歹徒周旋，让车开往公安机关。等到歹徒就擒的那时候，大家将会对最会撒谎者给予热烈的掌声。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撒谎，等于是救助大家。

因此说，在特殊情况下，面对一个不会保护自己，连撒谎都不会的“好人”时，如在车上，人们对他的态度未必很友好。因为他的老实等于白痴，甚至是对大家的出卖。“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忠厚也正是我们所指的老实，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的刻画，在这时候尤其显得正确。

想当年，老百姓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劳动，然后开会，然后再劳动、再吃饭、再睡觉、或者再开会。我们的生死有别人操心，我们的人生由别人安排，有困难指望领导照顾，有不平寄希望于领导公平裁判。“你要相信领导会公平对待的。”“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领导者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做个头脑简单的人，简单的生活让普通人的生活也简单了。

可现在不行了，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再现那样的生活了。你

的人生交给了你自己，你得自己给自己作主。公事公办成了不办的代名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你得自己管自己。于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格言尤其显得重要。

这等于告诉人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你得学会识谎撒谎！

识谎，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别人，分析别人的每一句话和展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件事，以免上当。撒谎，是以假话对待你不信任的人，先把别人的来头摸清了再说。识谎撒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时揣在你的怀里，既要一眼识破别人的用心，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又不能让别人揣度出来。在这样一种境况下闯荡江湖，要多累有多累。但没法子，你还得如此这般地混下去。

出门在外就要跟人打交道，这交道如何打？想想自己的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担心些什么，指望些什么，将心比心，你就不会不知道对方想些什么。比如你去应聘，老板们会对你怎样猜想？那就想想自己如果是老板将会怎样选拔别人。我们需要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既希望你本事，又希望你肯干，而且对他忠心耿耿，可能的话，还希望你不计报酬。他们最怕的是你的背叛和出卖。好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你却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跑了，那是多么令人伤心。如果你直截了当地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爷爷的孙子不是好孙子，我将来就是要当大老板，现在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我可以保证，招聘者会请你打道回府，最多让你留下电话，等他那永远不可能到来的通知。

定好你的目标，藏起你的步骤，在为人家忠心耿耿地工作时积累自己的经验，于人有利，于自己有利，人家也不会不理

解。但如果你把你的真实思想一开始就端出来，人家就不能不防备。因为那口气俨然是个野心家。

现实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人们不再只是拥护加劳动的机器，每个人都要发展，每个人都要求得一席生存的空间，因此提防别人和暗藏计划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我们的领导总是要求群众“知无不言”，有意见就提，而做群众的偏偏就不听，要么就不提，要提就是“要求领导注意身体”之类的意见。于是领导就对老百姓不提意见心生芥蒂了。其实当领导的就没有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想想，如果你当领导的问题很大，这时就不是提意见的问题，我们得考虑是否向检察院检举了。对于个人无关大局的爱好和个性提什么意见，不是自己找无趣吗？群众对你的印象如何，你自己应该胸中有数。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干部，是不会强求群众提意见的，只要你不是希望老百姓歌功颂德。

头儿要老百姓提意见，如果不是上面布置而是自己安排，那么其目的无非两点：寻求歌颂或者查找异己。

他也许会说，多听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和自己的缺点。乍一听有理，细想就不大对劲了。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可以反问一句：一个小单位有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毛病都不明白，还值得提什么意见吗？所以说，给头儿难堪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一般情况下，谁都不愿成为领导的眼中钉的，趁机送几顶高帽子，其实际意义无非给自己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已。如果是平时生活上的小枝节，又何必无事找事挑毛病呢？对一般老百姓而言，只要不危及到我们的生存，就这么过就不错了。“知无不言”只是个良好的愿望，谁都不可能做到知无不言的。多栽花少栽刺，这是老百姓的做人的信条，不能强求为了你的饼子圆就让人家失了人情。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也可用以我们的生活。身在江湖，风浪无情，身边的几个人你得认识清楚，不然就要上当受骗。也就是说，要学会看人。

有一种人喜欢耳语，常用的套路是：“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要明白，他绝对不可能“只跟你一个人讲”的。你别为好奇心驱使，更不要以为他是对你特别信任就听他讲，一听，八成就会成为他怀疑的对象。以后出了事他会默算：我只跟哪几个人讲过，暴露出来的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再加上你。因此说，耳语不要听。如果万一逃不掉，无论他说的那人那事是真是假，你来他一句：“不会吧？……”绝对不会错，这是为日后留下的逃生通道。

有一种人喜欢回忆过去：“老子那时候……”那么可以肯定，这位老子已经不是“那时候”了，显然现在混得不如人。再听他口述的当年的英雄事迹，也不过如此这般，就更不要相信了，不但不要相信他的今天，甚至连他的“那时候”也可以一概否定。跟这种人在一起呆久了会让自己也发霉。但你得不住地点头，仿佛对他的当年佩服之至。这种人的过去和现在虽说都不怎么样，但恨心却不弱，最恨的是别人对他的不承认，一旦恨着你了，你将有无穷的麻烦。

有一种人仿佛今日的英雄，他的亲戚都是当今的权贵，曾在国务院某人家里吃饭，曾在政治局某人那里喝茶，某名画家给他画了一张画，甚至你脚下的路都是他弄钱修的。这时候你不须想他有多么伟大，只想自己就够了。自己是几两重的人物，这位英雄有那么多大亲戚，怎么会跟我对话呢？这就跟电线杆子上的广告词一样，包治百病的祖传秘方，不会寒酸得往电线杆子上贴广告的。不过，这类人物做不了气球，给气球戳洞的本事还是有的，为了你的气球不被他戳，还是得点头。

“朋友”哪里最多？酒桌上。“感情深，一口吞”。许多人在酒桌子上马失前蹄上当受骗，就是把酒桌上的朋友当了真。三杯酒下肚，就忘了身负的责任，恨不得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朋友”管着。须知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嘴里说“我们是朋友”的。好比父母兄弟，不会对你唠叨“我们是骨肉”一样。但还得把假话当真话听，拆穿西洋景对谁都没好处。

有人在你家里吃饭时信誓旦旦，拍胸保证这事办得成。不过请你放心，十有八九是办不成的。真正办事牢靠的人，并不在嘴巴上自夸，相反他生怕人家知道他有这般神通。

有权的头儿和有钱的老板们怕人家知道他有权有钱，凡是怕人家不知道他有权有钱的，一般而言是没钱的，或者只有几个小钱再加一点小权力。看看那些款爷和上了被告席的贪污犯们吧，生活上勉强凑合，他们是绝对不会自夸“老子有钱有势”的。

有钱的有权的结婚偷偷进行，无权无钱的小户人家却要大摆宴席。爹妈当年没权没钱受欺负，现在有权有钱了，让儿子女儿做个样子为父母扬眉吐气。有的一方是小市民心态，再怎么耗费也得排排场场，要求另一方得依我的意见办，即使将来还情半辈子也在所不惜。当然，摆阔的也不都是想图个排场一圆富贵梦，有的图的其实是祝贺者的礼金。当初他们结婚我们都是送了礼的，我们结婚他不能不来。婚丧嫁娶的一争高低，暴露出来的是地位的低微和经济的“比过去强多了”而已，这只有局外人才看得明白。

有人不断地给你寄什么“大奖赛”之类的函件，或是恭喜你入选了诸如“世界名人”之类的喜报，而且他不要参选费，也不要你拉赞助，只是书出了之后，你买一本足够。等你把那本书拿到手之后就会发现，跟你排在一起的“世界名人”或是

一同中奖的人物们，会让你恨不得钻地缝里去。其实给你奖的人图的是赚那个书本费。

.....

等等现象都必然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看似与谎言的题目无关，其实关系却大。只有认识了这些现象，才能应对自如，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太老实。不要轻信别人的赌咒发誓，不要听别人几句好话就拿他当知己，任何事情都得在脑袋里转几个弯儿。为了适应环境少上当，假话也成了我们自己的家常便饭。于是，在假话世界里，也有我们凑的份子在里面，虽说有些是无可奈何。

我们需要人顺从

求人对自己撒谎，你相信吗？这简直有点像天方夜谭。可是且慢，这种事不但有，而且随处可见。

先说个古典：南北朝时期的宋世祖刘骏所爱的殷贵妃死了，他到她的坟上去，独自伤心难以表达对爱人的思念，就对陪着他的臣子发号召，要他们也一起伤心。他先对一个叫刘德愿的人说，你们哭吧，如果哭得很悲惨，我有重赏。刘德愿应声就大哭，哭得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刘骏果然就封了他为豫州刺史。又让一个叫羊志的人哭，羊志也呜咽得悲惨，同样得到了赏赐。以后有人问羊志，你从哪里来的那么多“急泪”？羊志说，我那时哭的是我的小老婆。原来他的小老婆也死了。

主动要求人家拍马屁，这是个什么心态作怪？看似荒唐，实则不然。人的某些方面是脆弱的，盼望得到荣誉，盼望得到安慰，也盼望自己有比人家更高的谋略和勇气。可是在得不到自己所指望的东西时，也就只好开口让人家进奉了。

宋世祖的小老婆死了，他很伤心，这是自然。然而他的伤心是他对那个人独特的感受，那是由许许多多的暗房里的细节串起来的感情，外人怎么知道！他要人家跟他一样伤心，这时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伤心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他要别人的顺从。

大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被当作笑话记载下来了，其实小人物也未必不是这样。《笑林广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人有一千万家财，老要人家恭维他，可是他选择的对象就是不肯恭维他。富翁就说，我有一千万，你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不恭维我？那人说，一千万是你的，与我什么相干。富翁再说，我给你五百万，你恭维我一下行不行？那人说，我们的财富相等了，凭什么我要恭维你呢？富翁说，我把一千万全部都给你，你能不能恭维我一句呢？那人说，我有一千万了，还用得着恭维你吗？虽说是个笑话，但笑话之所以让人会心一笑，就在于这种笑话切合了凡人的心理。另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唱戏的要人说好话，不然就给人家一顿打。但那人宁可挨打也不愿承认他唱的好。

这些故事说明，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企盼能够得到别人的赞美，也期望得到比自己已有的成绩大得多的荣誉。当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别人的承认或别人没看见时，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别以为那是古时的笑话，其实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此类的情况。

要求别人恭维，这种事情发生得最普遍的是女人。凡女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爱虚荣，这无可厚非。女人盼望着被人爱，更是值得同情和理解。面对丈夫连“我爱你”都不说一句时，不免心生怨艾。大多男人则想的是，两口子朝夕相处，何必把什么爱呀疼的挂在嘴上呢？凡是挂在嘴上的都是假话，凡是用甜

言蜜语哄女人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可女人有女人的说法：就算是假话，我也愿听。

别以为这是无理取闹，也别以为女人是愚蠢。在女人说这番话时，跟上面的宋世祖一样，是否真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顺从。丈夫依了妻子说上一句“我爱你”，妻子要的不是这种言不由衷的假话，而是丈夫顺从了自己一回，这比什么都重要。顺从自己也是一种爱呀！原来假话里头也有真情，聪明的女人就能够从假话里得到她所要的那么一点点真情实感。



在嘴上的爱不真实，可聪明的老婆明白，连嘴上都没有的爱，可能正在雾化。

人人都不甘于寂寞和平庸，当我们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没有一个人理你的时候，看见别人交流感情，谈笑风生，一种落寞感会油然而生。看看他们，你会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差，盼望得到承认，加入群体中去的愿望此时尤其强烈。如果这时候有个人将你介绍给大家，哪怕有些虚浮之词，你也会乐意接受的。在我的朋友中，有人开玩笑取笑另一位当了小领导的人，说他知道即将提拔后，等不及第二天宣布，连夜把自己的女儿叫醒，请她叫他一声××长。这是朋友间打趣的笑话，之所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也正在于这种心态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共有的。

“请美言几句”，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过类似的话。这

并非是脑袋不正常的人干的，或许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出现过不少。所谓“美言”，就是夸赞，而夸赞的解释是夸张的赞美，离真实有了不少的差距。在一些单位评职称的时候，在加工资的时候，候选圈里的人们给同事们作揖，一边笑嘻嘻地请“诸位美言几句”，有的甚至送礼。在文人圈里，某一篇什么文章出笼的时候，还有什么评奖的圈子里某件作品已经入围的时候，这种求人说谎的故事是常演不衰的。所谓的“炒作”，所谓的“包装”，所谓的“舆论效应”，皆是求人说谎的套路。

花钱买恭维，并非只是笑话。我们在生活中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有人喜欢花钱请客，其实就是要来吃喝的“朋友”们对他恭维，或是听他演讲。而有些人物好吃好喝，便投其所好，他的那张嘴巴一边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一边听时一边不停地点头，还不停地抽空给人送高帽子。

这种事例在那些所谓“汇报演出”中更是当作正大光明的路子走的。请你写篇赞颂文章，请你开会讨论时多说说好话，花多少钱就是小事一桩了。明着请吃饭，暗中送红包，皆是求人美言。这“美言”的含义，到底还有多少真实可言，那只有天晓得了。

这些表现皆是求人者的罪过吗？也不！

从行政区域的划分，到各种势力强占的地盘；从明着的派出所居委的管辖范围，到暗中乞丐要饭小偷行窃的控制区；从上不得台盘的街头叫卖者，到正襟危坐的专家们，似乎都有每个行当的小圈子。在某些单位，职员们相互间来往太密切就有小集团的嫌疑，让头儿心里不舒服，而负责人却可以组成以他为中心的小圈子。有什么好处，圈内人先上，那些人是用不着请谁美言几句的。相反，说不定还常挨批，“打是疼，骂是爱”，也体现在这些小圈里的人身上。

在一些文艺圈里，同样有人像左右股市一样左右着局势，他们为自己的圈内人充当保护伞，却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糟蹋圈外的人，因而逼得摸东不知西的人们只好求他们多少讲点儿良心了。

当演员在台上累得死去活来，台下却没有什么反应时；当作家熬尽心血写了一本书，出版后没人花钱去买时；当你为大家办了一件好事，却无人肯定时；当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却没有什么反响时……你还能够泰然自若吗？有人说得好，在社会上享受荣誉的贤达们，企盼得到承认的心情，与幼儿园拖着鼻涕盼望阿姨表扬的孩子并无两样。

我们需要别人的吹捧，哪怕假话也愿听，是人类弱点所决定的。“互相抬庄”一词，就是这种弱点的反映。遗憾的是，这年头互相抬庄的太多，而公平对待的又太少。在这种情形之下花钱买赞颂，可笑可悲的就不一定是花钱者了。

讲真话诸多不便

讲真话，立正气，说说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

男人谁不愿做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男儿？女孩子谁不愿在一个充满阳光的环境中享受爱情？可是想想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想想我们的一家老小，想想我们现在的处境，许多宏誓大愿就不得不在迈开第一步时就大打折扣。于是我们就说谎了。

试想想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尴尬吧。

记得十几年前的处境，是过几年加一回工资，也不是政策性的人人都加，而是“今年加工资的人占百分之几十”。这就决定了会有一番大拼搏。张三李四论资排辈都一样，王五周六工作差不多，要挤进那百分之几十里去，其依据是看表现。这

个表现由谁来看？首先当然是群众。这就注定了我们在平时不能够见什么就说什么，得罪了人可不得了。这时候，你就清楚了古人“多一个人多一条路”、“多栽花少栽刺”的教导是多么地正确了。那是古人亲身实践得出的可贵经验，告诫后人的至理名言。

对你加那级几块钱工资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几个领导在一起定盘子，只要有一位领导对你提出点什么来，也足以叫你完蛋。即使将来那个什么问题可以澄清，那也是加了工资之后的事了，你只能等下一轮了。所以每当加工资的

前夜，多少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脑袋里反省得最多的，是最近得罪了什么人没有，尤其是领导。至于平时，不说笼络领导，至少说不跟领导扯横皮，不关己事少插嘴，是大多数人的作法。因为领导的话就是钱。

现在加工资不是那时候的办法了，但奖金可多可少，同样开不得玩笑。一些企业主给谁多少钱都是保密的，你问都没办法问。这种情况下，你除了卖力地工作外，还有什么理由无事找事去跟头儿讲什么原则问题？不到彻底绝交之前，有什么必



要为那些小事自找无趣。你要讲也可以，他可能含笑肯定你的责任心，只是发钱的时候让你心里发毛。在老实干事的前提下多送高帽子，高帽子就是钱。

如果我们是个农民，对干部的态度更是至关重要。吃喝拉撒睡，哪一样都离不开领导照顾。他受礼了，他大吃大喝了，你怎么样？你送礼他还不要呢。你要告？吃喝构不上品质问题，没有谁因吃喝问题受过多大的处分。告状的结果，是他睡得着觉你却夜不能眠。等你家里生老病死或婚丧嫁娶求他的时候，他给你个爱理不理，就足以叫你欲哭无泪。

如果我们还等待提拔，对领导的态度更是非同小可，让领导看着你顺眼是第一重要的。顺从都来不及，还提意见？还有我们的档案，说不定什么时候要调动，天晓得他在对你的鉴定中写了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就业，我们的家庭离不开照顾，不说别的，电线坏了没人理都可以让你喊天无路……况且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从不会出点差错，到了那一步，说你偶然出错也可以，说你向来调皮捣蛋不服管教也不是没材料。凡此种种，都将我们夹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小小的地盘不够我们大义凛然或是铮铮铁骨。

民族危难，大敌当前，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那没说的。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大吃大喝构不成人的品质问题，收人家几百块钱的礼小事一桩，用公款装修房子是个普遍现象；同是国家机关，大家都是同志，但单位跟单位不一样，东家肥，西家穷，肥的有人求，穷的要求人；人不求人一般高，但只要有人求，那就永远不可能是五湖四海皆同志的待遇。那些管人的单位和管物的单位以及管关卡的单位，富得流油，你还得把你从牙齿缝挤出来的好东西往他那里送，生怕他们看不上眼。你提意见？你抗议？只要他在你面前“拒腐蚀永

不沾”，就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级号召我们要有主人翁思想，什么都没有，如何做主人翁？在现实生活中，像主人翁的是那些管关卡的。比如管电的说停电就停电，连招呼都不打。打电话找他们讨说法，那是脑袋不清白，电话拨通了，还没开言就先憋一脸笑。他们倒是做主人翁的模样。

一次在某县城坐的士，车在交叉路口被警察拦住了。司机说没有违章，拦住我干什么呢？原来警察命令他掏二十块钱买“某某市旅游节”的宣传标语。司机说这不是非买不可的，但警察说，这就是非买不可的。司机忍气吞声买了。那条标语成本最多块把钱。我要管一管闲事，司机求我别管，因为他还要在他们治下吃饭。于是我想，这位倒霉的司机行使主人翁权利的方式，与那位警察是不可能一样的。

吃亏上当的事情无处不在，你想去管都不知从哪里下手。年轻时候爱管闲事，上了年纪就没了这份儿锐气，等你受够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你就会说，还好，大家都不容易。

如果你对天下事愤愤不平，人家可能会认为该同志心理有障碍。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牢骚！“老来尝尽愁滋味，却说还休。”辛弃疾的这种感叹，是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彻悟。于是当上面或者下面征求对某个即将提拔的人的意见时，征求对某单位的意见时，我们也就只有说：还好。

更有许多暗箱的操作，不是当老百姓的能够知道的。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明处走路只能目不斜视，循规蹈矩。

只要选拔干部还是依靠上级意见为主，那么要求群众提意见不能不说只是作个参考，杜绝假话就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人治的比重太大，自己把握自己的空间和幅度又太小，使得我们不得不很在乎领导和主管者的态度。

即使真的依靠群众，是否群众的意见都那么正确呢？在上面某一节里说过，群众的素质同样堪忧。群众，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景，有时却也是毁灭我们的洪水猛兽。一句“罚不责众”的成语，暴露出的就是对大多数人歪风邪气无可奈何的妥协。我们呼唤民主，真正要大家行使民主权力的时候，其效果往往令人失望。“众心一，泰山移”，说的是依靠群众能够把难办之事办好。但，“煽阴风，点鬼火”，却也是阴谋家在群众中的活动。“四面楚歌”形容脱离了群众的支持，“含垢忍辱”同样是失去了群众的理解。还有揭露政治骗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句，就是群众参与了破坏。“群众愤怒地扔臭鸡蛋”，假如只有一个人，未必会去扔的。一个人偷东西被捉，至少脸上无光；大家一起哄抢，抓住了就可以打哈哈。因此说，“群众”既是训练英才的基地，却也是让人流于平庸的土壤。单看每年对领导的考评，在无记名投票中，就有人不顾事实地给你打一个“不合格”。因为你某次得罪了他。至于你的工作是否给国家和集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他是不管的。

面对这样的情形，许多有为的干部们，也不得不含恨对有些人让步了。“敢于坚持原则”的不简单，就在于冒着被人暗地里打“不合格”的危险，坚持了应该坚持的。这恰好暴露了另一面，那就是，只要领导干部每年让群众的评议照常进行着，就一定有人为收买人心而出卖原则和国家利益。

真话让人不喜欢，真话有时也让我们自己难堪。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好比母鸡喂窝，喂那么个窝实在不易，而得罪别人就仿佛给自己的窝里丢下了几根钢针，到头来不舒服的还是自己。

分析一下谎言的盛行，就不能不正视这些因素。

道德之虞

在火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幕：一个人急匆匆赶来要买一张车票，可是票没有了。这时候，有个人恰好来退票。一个需要车票，一个要把票退掉，这不很好解决吗？然而遗憾。当买票者将票钱给了退票者后，退票者要把多余的钱找给人家，买票的不要，双方就产生了疑问。买票者问：“你这张票是假的吧？”在他看来，真票是应该卖议价的，这人要按售价卖给他不正常。而退票者也产生了怀疑。这张钱可能也是假的，不然，他怎么会不要找零呢？这是武汉市某文艺团体演的小品，它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观已经到了什么样子。正当的令人怀疑，不正当的反倒成了正常。

说真话的成了傻瓜，办老实事也没有人相信，这就是道德的滑坡。只要没有一套让人们都遵守的道德准则，一切美妙的号召都将是软弱无力的。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成了谏语，小人也就有了成长的气候和环境。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受到批判。它的核心内容是为了取得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而“不择手段”又该如何认识呢？认真分析一下，恶行的源头可能并不在老百姓身上。

所谓不择手段，是对那些非正当手段获取者的评价。然而分析一下那成功者的成功之道，就很难说他们是择了手段的。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一切都按别人所知道并认同的办法行事，那些伟人们如何能够成就其伟业！“先诈力而后仁义”，是孔子对春秋五霸的评价，这几个字真是意味深长，道出了政治野心家们提倡的和自己干的原来并不是一回事。那个帮助齐桓

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就首开了用女人肉体积累资金的先例，他堪称妓女的老祖宗。可是他为了治人，却又讲什么“礼义廉耻，是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你看他也在讲道德，他的理论并被后世的政治家们奉若神明，但他干的最不道德的事情却无人追究。

一方叫足智多谋，另一方就叫做诡计多端；这方认为聪明者，另一方就叫做狡猾；自己一方叫做策略，另一方或者就称作阴谋了。因此在获取时尽管那手段不足取，但要达到目的，也就不惜以名声作赌注，根本就顾不上什么仁义道德了。奸狡的刘邦，无赖的韩信，无行的陈平，无耻的勾践……等等人物的有悖道德规范的行径，因为他们运用这些手段让事业成功，也就都成了歌颂的“策略”。这倒说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总结，也适于手段的运用。

他们的成功很有说服力，也很有煽动性，任怎样的号召和提倡，也难以与成功的事实相比。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择手段”不断地被批判，却仍有那么多人不停地“不择手段”闯江湖。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成功之后，他的那些丑恶纪录全部变成英雄的策略。

再者，上面好什么，下面就仿效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总结，至今仍然没有过时。现在的人们并不听你说什么，只看你做什么。只要你说的和干的不是一码事，那么你再好的号召也等于零。

当社会把奉献当作一种美德时，帮人做一件好事，便得到了心安。为人行一次方便，就仿佛一次解脱，给人家帮助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欣慰。但与此相反，大家都在偷东西时，一个没偷就有吃亏上当的感觉。扎堆，从众，赶时髦等等，都是社会风气形成的推波助澜者。那么这时髦到底是谁领头呢？我们

只能从历史上的某些东西上看问题了。

《水浒传》里的高俅，不过是个会踢球的闲散人员。他得以晋升高位，跟那个球有关。根子还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上。那时候天下太平，物质丰富，皇亲贵戚竞相奢华，游乐成风。那个端王好踢球，便被高俅撞了个正着。如果那种游戏仅仅限于皇宫，高俅就不至于有那么熟练的技巧。可见，玩球是那时候的时髦。当然，那风气还是从宫中传出来的。东汉马廖给皇帝上疏倡导易风移俗时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又举长安民谣说：“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一个踢球的浪子就凭会玩两手的本事，爬上了管理国家大事的高位，凭的仅是踢球的技术。

唐朝杨贵妃得到皇帝的宠幸，一度时间，天下就把女儿当宝贝养，梦想着靠女儿光耀门庭。那时候，无论李隆基怎样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也难禁娇惯女儿之风。

五八年大跃进，全国的干部一阵风，“卫星”放得搁不下。

再看现在，钱的多寡似乎是衡量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于是瞒天过海的伎俩风行一时。为了爬上那一级，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些贪官们信誓旦旦拍胸保证，他没有拿一个，差不多所有贪官都“以党性担保”他是干净的，并怒斥别人腐败，可是暗地里，谁不贪就是傻瓜。

在这样一种风气下，要老百姓保持纯真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那么多凭歪门邪道发财的受到了尊重，“勤劳致富”也就仿佛成了骗人的谎言，敝帚自珍式的生活受到了嘲笑，所谓“竹篱茅舍自甘心”的淡泊，成了无所作为者的代称。于是各种投机取巧的勾当也竞相出笼。假货充斥着市场，假话堂而皇之地做成了大匾，汇报材料掺水，等等东西都让人不敢相信。

谁是小人

人人痛恨小人，小人在舆论下简直不是人。可是小人在哪里呢？说起来真有些滑稽，每个人都骂小人无耻，可见小人一定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既然自己不是而别人是，可见小人在每个人的道德称量中，各自有不同的标准。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相近的标准呢？小人无耻，小人无信，小人害人等等，只不过是人们气愤之下的形容词，只能说明说话者恨小人，还是不能作为评判小人的标准。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古人的形容来勾画了。

孔子所说的“人有恶者五”，那是指的大奸，用来概括真正的小人多少有些不全面。再看看其他人的说法吧。

唐朝的李德裕说：“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他所说的邪人正是小人。这说明，小人永远难以独撑一方，生成有抱粗腿的喜好。攀附正是藤萝的特性。

再引前面说过的齐桓公时候一个东郭先生说过的话：“君子善谋，小人善意。”傍粗腿必须有“善意”的本事，会揣摩对方的喜好和前途的吉凶。对有权者奉迎、拍马，并有察颜观色的灵敏度，见风头不对迅速另攀高枝，是他们的另一特点。不然的话，对有权者攀不上去，得不到重用，不会揣度又说不定烧错了香磕错了头。

《聊斋志异》里有篇《辛十四娘》，那位小生太轻浮，十四娘劝他不要这样下去，说你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生，“施之君子丧吾德，施之小人杀吾身”。这就是说，小人嫉恨心强。管你什么功臣英雄，你只要曾经对不起我，我就绝不放过。远小

人也是自保。

孔夫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这是说，小人把自己的私利看得重。无论是谁，只要对他的私利有所损害，他是绝不罢休的。反之只要有利可图，什么无耻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干。

唐宪宗朝一个三朝元老裴炎说：“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所谓朋党之徒，就是聚在一起说是非起祸端，他们在一起是不会讨论道德问题的。

另有一句“小人无信”，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信誉可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者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大概都可以归结到这一句里。

.....

根据这些表现来看问题，说出来恐怕有些伤感情，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点儿小人心态。如果不信，可以举例证明。

李贽在评史书时曾写眉批，有人以小人始而以正言终，有人则以正言始却以小人终。同时他在读了魏征的事迹之后说，魏征之所以成为一个正臣，幸亏遇到唐太宗，假使生在炀帝朝，说不定就是个佞臣。这足以说明，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变化。在前面某一篇里，还举了李白拍马屁的例子，就看得更清楚了。在这件事上是个君子，在那个问题的处理上是个小人，这也不是没有例子可举。

后面我将讲《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那时候，邹忌没有其他对手，他的表现也还算个正人君子，如果不是另有人功劳盖过他，也许他在历史上会成为一个正臣。然而当有人走到他的前面了时，潜伏在灵魂深处的阴暗心理，让他的丑恶也暴露了出来。

在邹忌当相的时候，田忌也当上了将军，他嫉妒田忌拥有了发言权，时刻想对人家使绊子。恰好有个家伙给他出点子，让他向齐王建议去攻打魏国。打仗要靠将军，田忌必须出征。如果打赢了，那是他邹忌的主意。如果打输了，却是田忌的责任，那么田忌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个点子出得很好，邹忌果然就劝说齐王向魏国开战，并且真的就由田忌带兵出征。

不想田忌三战三捷，打赢了。尽管是邹忌出的点子，但前方将军的功劳还是主要的。于是邹忌就再让那个家伙出点子。那个人派了个心腹去找算命先生，假装是田忌家的人，说我们连战三捷，田忌的大名无人不知，现在有干点更大的事的打算，不知吉凶如何。所谓“更大的事”就是想图谋不轨。求卜的人一走，邹忌就让人把算命的抓了起来，当着齐王的面审问，问是谁算命，算的内容是什么。算命的便说是田忌家的人，并交代了算命的内容。齐王一听田忌要谋反，果然大怒。三战三捷的田忌蒙受不白之冤，不得不逃走他乡。

看看，同是一个邹忌，前面是人，后面就是鬼。

君子如沙里的宝石，少而又少。他们是在经历了磨练之后，得到做人的真谛的人们，是读破万卷书、领悟出人生玄机的智者。可作为普通人，整日里为柴米油盐奔波，有几个能够把利益扔在一边？那个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在没成气候之前，也是个事必言利的人物。如此看来，小人离正常人的距离并不很远。

于是我们就可以想想自己的内心世界了。

说攀附，不知有几个敢于宣称他不笼络任何人。服从与顺从的概念被许多人混淆，将对领导的服从弄成了对领导者个人的顺从。下级服从上级，服从的是正确的原则，而顺从则是让

领导者个人欢心。我们要升个一官半职，好好工作的同时，又怎免得了仰仗领导的提拔？某个领导对我们的升迁起着决定的作用，到了这时候，不知几个人能够不赔笑脸不躬腰。

要讨领导喜欢，就不能不揣摸领导的喜好。他到你那里视察工作，爱吃什么，爱喝什么，喜欢读书还是喜欢跳舞？爱喝洋酒还是爱喝清茶？这些都是要弄清楚的。会办事者不需点拨，能达到这一个境界者，就是“善意”。

再说嫉恨心，跟妒忌是同一祖宗。人家的事业取得了成果或是经济上发了大财，我们心里总有那么点儿不舒服，尤其那人过去还不如我，不知有没有人能够麻木看待人家的收成。再如我和他同时参加工作，人家成了处级而我才是个科级，也不知有几个人能够泰然处之。至少我还没见过同一单位这样有级差的朋友。假如有个人过去曾经对不起我，当众出过我的洋相或是对我的前程起过不好的作用，要不记住那一脚，只怕很难。遇到要我对此人说句话的时候，我还能够公平对待吗？

看见过去找我们借餐票的现在坐着小车兜风，看见过去连狗都不理的现在后面跟着一群拎包的端茶的，他们从你面前过你还能心平气和，那才是修炼到家了。不过这样的人我还没见过。每逢这种情况，要么远远地躲避，要么假装没看见给人家一个臭不理，即使人家寻着你说话，也是硬憋出一丝笑来。其实谁都看得清楚，那是肚子里有酸水作怪。

本单位要提拔年轻干部，考核的时候无记名投票，发的一张表上，同意的打勾，不同意的打叉。我在监票时，竟然看见有人打叉气冲冲划破了纸。显然那股气不是君子所应有。尽管动笔的已经是过了年龄的，跟年轻的被选者并无利害冲突，可是肚子里的那一股气就是消不了。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这些被冠以不正之风的作风说起来不好听，但谁都不敢保证他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比如对某个人评职称或是评模范，我们从心底是不同意的，但大家都同意了，假如我不举手，说不定会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于是便从众。但背后有人指责时，却说，我其实是不同意的。言不由衷，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闲谈莫论人非，是君子行，然而闲谈时如何能不涉及别人？

.....

要认真搜索，还将会搜出许多来。这些都谈不上小人之行的现象，却实在说不上是君子之行。以此证明，我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干净，不过因为我们的目标太小，影响也不大，便没有人给我们下君子小人的结论。问题是，身居高位的小人与市井中的小人，其本质并无区别。小人物闹意见是团结问题，大人物闹不合就是个忠奸的问题了。小人物的贪被称为占小便宜，大人物占小便宜也是贪。

谎言带给我们好处

如果撒谎难以给我们带来好处，大概请人撒谎都不可能的。比如上面所说的例子，为了自保，也难免将谎言挂在嘴边。人生在世，总有追求。大有大的追求，小有小的追求。光荣和尊贵是每个人的梦想，至少平安是每个人并不过分的愿望。

那些英雄豪杰就更是这样。然而晋升的门路并不是向每个人敞开的，每个人的命运不同，机缘面前也并不平等，许多旷世奇才起初也经历过常人难以经受的苦难。韩信到处寄食，苏秦的嫂子不给他烧饭，韩世忠漂泊在妓院门口，范仲淹庙里读

书……当命运之神并不给他们以关照时，为了实现人生的伟业，他们不得不想办法推销自己，各自想出了自己的一招。

自我推销，就难说实事求是了。

吴起杀妻求将，尽管有些惨无人道，但在那时候，他为人怀疑，那胸中的惆怅也不是不可琢磨。杀妻是为了消除怀疑，而那怀疑说不定就是有人对他嫉恨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更有那位写了《文心雕龙》的刘勰，书写成了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便想请既当大官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推荐一下。可是沈约的官太大，自己人微言轻，更不认识人家，很不好办。后来他想了个苦办法，装作一个卖东西的，天天守在沈约门外的车前，等着人家上车时候再往前凑。终于有一天，他拦住了沈约，急急地如此这般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后来沈约读了他的作品，不但“大重之”，还一直放在他的几案上。这样的人后来都成为了大英雄大文豪。

但另有一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也要晋升，却不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和志向，而是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荣华富贵，图的是在世的享受。只要是这种思想作怪，就没有人格可言了，谈不上责任心或是正义感，更不可能有什么人民和民族的概念。为达到目的，他们什么办法都可以上。但万变不离其宗，在要求得到那一官半职的晋升道路上，谎言是首选的办法。

秦始皇时候的徐福，骗吃骗喝还要骗钱，又没有别的本事，看穿秦始皇想长生不死的心思，就假说海上有三仙山，山上有不死药。皇帝真的要他去弄时，他支五支六撒一个谎又一个谎，最后知道再这么撒下来就要露馅，干脆带着一千名童男童女和大量金银财宝跑了。

骗子行骗的本领不小，要在皇帝面前行骗，得面对许多能够看穿西洋景的文武大臣，但他们竟然就能够过关斩将，杀入

重围。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据说是个清白人，竟也上了他们的刁当。文帝十五年，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说，长安有五彩神气，皇帝一听高兴，居然为此修了渭阳五帝庙。十六年，这个骗子又说阙下有宝玉气，不久，果然有人献上了一只玉杯，上面还刻了几个字：人主延寿。皇帝为此决定从明年开始为元年。史书上从文帝第十七年称为“后元年”，就是根据这个家伙的那只玉杯而引起。不过没过多久，就有人告发了这个骗子，说他那都是行骗的把戏，玉杯是事先埋在那里的。结果皇帝大怒，将这个家伙腰斩了。武则天时的“大足”年号，竟也是骗术引起。几个犯人假造了几个大脚印，说是神来过，并称神说的，现在是“天子万万年”，会赦免你们。武则天那时正要人支持，于是便假戏真唱，不但真的赦免了罪犯，而且改年号为“大足”。

历史上这类骗子很多。这些骗子行骗的目的，最多只是为自己弄点荣誉弄点钱花，或者为了改变倒霉的处境，倒还并不害人。相比起来，官场的鬼名堂就齷齪得多。他们的道貌岸然，他们不知怎么弄上身的巨大名声，是比江湖骗子更多几层的保护色，因而也更能蛊惑世人。

在史书上看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以后，要引进治世人才，闻听哪个名声大就征哪个。太原一个周党，征进了朝廷却不愿当官，有人就说他是窃取虚名。另一个严光曾跟刘秀同游过学，刘秀去见他，他竟然袒腹睡着不起来。后来同进皇宫，他跟皇帝睡一床，也是个不愿当官的。那个严子陵和钓台都让后人迷惑，不少人提出了疑问，对他的所谓隐居表示怀疑。隐，也是窃取名声的手段，何况一起玩捉迷藏的还是皇帝！

经这么些真假名士一闹，隐士的名声大震，许多人物纷纷

效仿，真的假的都弄不清。后来又征了一个王良，拜谏议大夫，当过太守、大司徒。此人是个庸才，他的第一大优点，是在位的时候谦恭朴素，仅可以当艰苦朴素的模范。因为他除了守本分之外再无别的招数。有一年告病回乡的时候，路上去拜望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拒不见面，并且甩出几句一针见血的话来：“没有忠言奇谋的本事却窃取大位，还窜去窜来不嫌麻烦！”这个王良也算个有脸的，受了点刺激，自后朝廷又来征他，他再也不敢出山了。

到顺帝刘保时候，征贤良方正的政策没变。南阳有个樊英，名声也大，想必空口说白话的嘴巴很能够迷惑人。因为他有许多学生。朝廷前后礼请，他就是不肯出山，皇帝以为他是个真家伙，备了厚礼去请他，总算把他请动了。进了皇宫，皇帝备以师傅之礼，这个樊英才接受了。因为“帝师”比起“帝臣”来更高一格。结果拉开架子向他求教治国的策略时，才发现他并无什么锦囊妙计，朝廷这才知道此人也不过是个寻常人而已，他的装模作样，不过就是要求个官当。怕堵了后来者的路，坏了朝廷的名声，也只好假戏真唱，让他当了个官。这些人的洋相让士子们难堪，后来有人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路，‘出’，或者‘处’。我们以为你出来能够辅佐皇帝安抚百姓，没想到你是这么副德性，害得连皇帝都发怒了。现在你当了这么大的官，又没有一点于国于民有益的办法，看你如何进退。”

樊英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如何进退，在他已经不重要了。他没本事，但毕竟已经进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只要继续拿出他“不想当官”的那一套在官场里头混，照着先王遗训教几个学生，一份并不轻的俸禄是拿稳了。起码轿子有坐的。樊英后来名声很大，不是他的才气，而是他的地位。许多人将自己是樊英的学生挂在嘴上，到处炫耀。

樊英的故事历代有人效仿，这种人读书拿不出一篇好文章，当官拿不出一个好点子，做人没有一个真朋友，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装模作样，指东扯西夸夸其谈。你说这样，他说不，应该那样。你如果说应该那样，他还是说不，应该是这样。他们就靠一张直说直有理横说横有理的嘴巴沽名钓誉，骨子里其实是最下作的欲望。

为了得到一个好前程好地位，骗人的把戏没有什么不能用的。北宋时候，金人入侵，岳飞的母亲为了教儿子能够为国尽忠，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几个字，激励和感动了当世和后世的许多人。这种事后来竟也有人效仿，不过那是在无仗可打的时候，他们也将背上刺上这几个字，以示自己的忠诚。当有个背上刺了字的人犯法要挨板子，惩办他时，他便脱了让人看他背上的那几个字，表示他是忠心耿耿的，仿佛有这几个字就不能惩办。文革中有人为了显示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不但可笑而且恶心。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上已有的谎言的变种，求的还是个人的私利。

这些人物都被揭穿了，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些笑料。许多至死也没有被人戳穿，比如唐朝的卢杞，坏事做绝却能善终，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大手段。再看看今天，那么多人说假话，将小成绩报成大成绩，把没办的事情假说办成了，为了讨上级喜欢。还有的坑害老百姓，为了获取一个上司看了舒服的好数字。这些都是为什么？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还是为了自己捞取的一官半职。尽管暴露出来的已经不少，理论上总是把这些人物称为“极少数”，但事实谁都清楚，没有被揭露出来的才是大多数。浮夸年代升的官，让我们老是想不通。不说谎才是好干部，可那时候你不说谎难过关，既然他升了，可见是个不说谎的。可他是怎样渡过那么多关口的呢？

多少人眼睛里看的是那些没有暴露的，抱着“抓住了算我倒霉，抓不着就该我讨好”的心态，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

谎言可以晋升，可以捞取一个好前程，这种局面一日不改变，那么天下的高级骗子就不会绝种。

寄身与卖身

人生旅途上总有泥泞的时候，错误和挫折常常使人于毫无准备时陷于绝境，这时候，总得寻找一块踏脚的石头，以渡过难关。如果有个人雪里送炭，真诚地拉我们一把，那么这个人对我们来说无异于救命恩人。

然而这帮助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人？被帮助者对这恩情又是什么态度？这是决定人生和日后道路至关重要的。《水浒传》里头的施恩对武二郎百般照顾，原来他是要武松帮他夺回被人霸占的酒馆。这种故事在《聊斋志异》里也有表现。而高俅遇见了端王，他俩的友谊却是建立在玩球上。

许多人的第一步或受了挫折后的振起，就依附在某个人的手下。历史或现实一些感人的至交，就是在这种患难情形之下结成的。

所不同的是，谋事者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抱负；谋人者却另有心计，或收买死党，或卖身投靠求取荣华富贵。无论是哪一种，小人都将把对方作为跳板或是人生棋盘上的棋子而加以利用，永远不可能有真情。庞涓对孙臆的迫害，易牙谋杀齐桓公，虞谦对林冲的恩将仇报，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小人也寄身于矮檐下，但为了获得主人的信赖，他们不惜扭曲自己以讨好主子，借以稳固地位。为达到那个目的，什么肮脏事情都可以干，什么恶心的话都可以说。

谋事者寄人矮檐下，端着人家的碗，不得不听命于他人。刘备遭打击，也曾投靠在曹操麾下；关公受挫，也在曹操那里住了不短的日子；武松身染重病，也曾在柴进家寄食；陶渊明的先人陶侃，也曾求别人引荐……他们虽寄人篱下甚至低头，却从来不失自己的人格；他们也有过谎言，但那谎言只是保护自己，绝不是拍马屁。卖身投靠者就不是这样了。

无论是寄身还是卖身，有一条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将操纵他们命运的人摆在主人的位置。主人们未必是优秀的，有的干脆就是庸才，但他们或者有钱，或者有权，便决定了他们处于支配别人的地位，所获得的就是别人的顺从和恭维。可笑世上的人们清白者甚少，以为地位高的一定优秀，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作指示，好批评，他们不但受别人欺骗，听好话听得多了，也自己欺骗起自己来了，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块治世的材料。

分析一些谎言产生的原因，还在于体制的不平等或一些地方的不民主。这个掌管着那个的命运，势必一个昂着头一个躬着腰，无论你怎么地“发扬民主”，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意见。

即使是社会主义，在民主与法制不断健全的情势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道路依然是十分艰巨的。一些地方买官卖官之风猖獗，就是因为“上面”起着决定的作用。单靠个人品质要达到公平，既是不可信也是不可能的。吹牛拍马，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的事情比比皆是，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无论是哪个领导，总是号召大家说真话，但这个真话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问题可就来了。不少人一生蹉跎，并非大问题，仅在于某一句话。

某个朋友年轻时候就当了县委副书记，二十多年后，还是一个县里的宣传部长。当然，干部能上能下，不能认为提升就

是进步没有提升就是落后。问题在于这个没有提升正是为人所构陷，那就另当别论了。事情起因也是为了工作，但工作涉及到了某人的脸面。当年那县的主要领导人当面和背后说的不一样，他在会上驳斥了那个人。

事情不小可也不大。这个朋友当时兼一个公社的书记。那地方长年闹水灾，必须挖开一条渠道排渍。经过头一年的奋斗，渠道挖成了，但还不足以保证以后不发生洪涝灾害，于是决定第二年再接着干。恰好第二年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句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渠道是非开不可的，因为那是关系到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但上面有精神，不执行也不行。于是他跟县委书记商量，渠道继续整修，但规模不能按去年的方案上那么多人。县委书记表示，这主意好。不幸到了冬天，地委书记知道某个地方还在拉人修渠道，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批评。这事其实不难解决，县委书记是参加地委书记的会的，解释一下也就没事了。可是这位书记竟来了一手，回来传达地委书记的指示时说：“我早就不同意再上马。”于是这位朋友就开腔了，说当初不是你同意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干？

都是工作上的事，争了几句也就完了，好像都过去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的争执关系着一个人的一生。接着这位朋友被派往西藏，一去多少年，回来当宣传部长，一当十四年。他的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就这样被耗费掉了。如果事情摆在桌面上，原本可以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说清楚，都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不能理解。可问题在于，向上反映情况的是人家而不是他，他永远都不可能向上去证实自己。因为只争了几句，那事情太小，你怎么可能用这么件小事去麻烦领导人呢？而人家反映情况时也未必就是用那么件小事当作炮弹的。

用什么来置他于死地呢？那就是假话。编造出其他的东

西，似是而非，虚虚实实，“听群众反映”，是真是假用不着较真的。但是在慎重选拔干部的时候，上级就得考虑某次有人反映的有关“群众意见”了。一个人的前途就这么不经一摧。

即使小小的事情，即使明摆着的谬误，当你指出来后，被指出者也未必就高兴。据说有位领导人讲话，把忏悔之“忤”念成了“千”。如果就这样一句带过，也没有什么话说，因为中国的汉字如此之多，谁都不敢保证一辈子不念错字。问题在于他反复讲“千”，怕人家不懂，还手里画着，嘴里念着，将“忤”字当“千”字。有人便说，那个字应该念“忤”，那位领导脸上红了，笑着表示要多学习，但所有人都替多嘴者捏一把汗。因为领导的笑容很不好看，那笑是一种假笑。后来那人把这事拿出来反复讲，目的是教育他的儿女，千万不要多嘴。

这真是说真话的悲哀。

只要世界一日不平等不透明，那谎言也就不会绝迹。

识 谎 揭 谎

无大智者难以识破谎言，无大勇者不敢揭穿谎言，无正气者不愿揭露谎言。这些都是被历史证实了的。说大智才能识谎，是因为撒谎者都是工于心计的小人，往往做得天衣无缝，“要抓住狐狸，就要比狐狸更狡猾”，这句格言道出了抓住狐狸尾巴的不易。再者，唯具有大智慧者才不计小利，不为表面现象所惑，能够分清表相深层的内容。说大勇敢于揭谎，是因为揭穿谎言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有时甚至牺牲生命。历史上许多义士的成名，不是在战场上，也不是赴国难，仅仅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然而他们为了坚持真理，不惜牺牲自己。哥白尼，张志新等等，如果没有视真理如生命的执着，就不会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性命相拼。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说无正气就不愿揭谎，是因为小人总有搔到人痒处的绝招，有这种人物在身边，可以让你过得很舒服，可以让一个人最本能的欲望得到满足，而且还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给倭人以可乘之机，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等于将自己亮在明处受人监督。这是那些贪图享受和爱好虚荣的人们不能也不愿做到的，是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不敢做的。唯有这一条最难。

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有人做到了。

自己到底几两重

你要想少上当，少吃亏，首先还是得从约束自己开始。骗子骗人，序幕是要引起你的好感，得到你的信任。如何让你信任？那就是讨好你恭维你，把你的实际本事夸大是最基本的手法。如果你不知自己几两重，就很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跑了。

男人女人，都希望自己文武双全，品貌皆优。可是完美的东西很难让一个人占全，美中不足是人所共有的遗憾。对自己的客观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优劣的重要方面，也是不为骗子所哄骗的前提。《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以自己的亲身体面对齐威王进行了劝说。

邹忌身高八尺，按现在的尺寸算接近两米，算得上美男子。可是城北的徐公是公认的美男子，他估计徐公的长相远在自己之上。有一天他问妻子，自己的长相比城北徐公如何？妻子说，徐公怎么比得上你呢？他对着镜子打量自己，还是没把握，对妻子的话半信半疑。再问妾，妾也说徐公比不上他。来了一个客人，他又问客人，自己与徐公到底谁比谁更美？客人也说，他比城北徐公长得好。

连续三个人都证明他的长相超过了城北徐公，按一般人的心理素养，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了。可是过了一天，徐公到他家造访，他一见就知道自己比不上人家。于是半夜里就琢磨这件事，为什么问到的人都说了假话呢？邹忌到底是个人中大杰，并不很费事地就找到了答案。他得出的结论是：妻子对丈夫偏爱，认为丈夫应该比徐公好；妾惧怕他，不敢说徐公比他美；客人更是有求于他，要对他笼络，所以大家都说他比徐公漂亮。

邹忌以自己的例子对齐威王说，现在齐国强大，宫中女人都向着你，大臣都怕你，老百姓都求着你，你处于十分可怕的封闭境地了。齐威王在这点上也是个有远见的，在这个故事中得到启示，下令说，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得上赏，书面指出的得中赏，在外面说我的不是的得下赏。此令一出，当面提意见的还真不少。不过渐渐地，提意见的人少了，因为他想提的意见别人都提了。齐国从此渐渐地强大起来。

邹忌的这个故事也许是他亲身经历，从中得到启发，才去向齐王汇报；也许是为了劝齐王，在自己身上编了这么一段经历。但不管是哪一种，邹忌是个智者，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这是肯定的。那些只爱自己的人也可以用别的例子来劝齐王，而不会糟蹋自己，更不会承认长得比别人差。邹忌那时候还是个襟怀坦荡的有志之士，自己的长相如何，在他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齐国的强盛。他之所以能够识破谎言，就在于他的人格高尚。

认识自己几两重，就不会被谎言所迷惑，就不会上某些人的刁当。骗子骗人，一般而言是不会太离谱的，你是个跛子，他不会说你可以参加长跑；你是个矮子，他不会说你是个跳高冠军。假如他那样说，那将适得其反，马屁就变成了讥讽。他们拍马屁的技术之所以能够哄骗世人，就在于摸透了被拍者的心思，说你正希望别人说的话。

当你正为长时间没有提拔心烦的时候，他就可以举出一系列例子证明你早就应该提拔，所列的政绩比你自已还清楚。当你穿上一件刚买的衣服时，别人没看见，他倒看见了，说那件衣服仿佛专为你做的。你讲几句话，他说你讲话的深度是别人所难以达到的。假如你有演说癖好，他可以连爹妈死了都不顾，在你的面前听你教诲。至于你的政绩究竟如何，那件衣服

到底适不适合你的身材，说的话到底有多深刻，可以肯定地说，恭维者皆是言过其实。让骗子大加赞扬，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不幸能够冷静看待自己的人实在太少，谁向我靠拢谁就是好同志，骗子的话也就成了知己之言，甚至骗子的思想也可能很有深度了。

认不清自己，很容易被谎言包围，久而久之，原本糊涂的更糊涂，原本不糊涂的也糊涂了。

认不清自己，除了骗子行骗，连好人也不能不跟着撒谎。比如有位朋友很有些才气，当了个小官儿。据我所知，上级曾经有给他挑重担子的打算。不幸这位朋友嗜酒如命，一喝就忘情，忘情就失态，摔碗砸碟发牢骚，弄得一桌子人跟着受罪。后来每当碰见熟人就要请人喝酒，尽管是他花钱请人家，人家也怕他酒桌上的表现，朋友们见了他都绕道走。因了这个嗜好，那重担最终没有落到他的肩上来。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再说喝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能构成提拔与否的条件，即使问到领导名下，领导也不会承认没有任命是因为喝酒的问题，谁又愿意告诉他真实的情况呢。于是，牢骚伴随着这位朋友的生活，有那么些不知怀着什么动机的人物们，在他的面前大送高帽子，说他没有得到重用皆因他的为人太正直，不会吹牛拍马。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以为天下皆醉而我独醒了。这当然可以慰藉一下那颗受伤的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位朋友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别住人生发展链条的，并非什么大问题，往往就是你的小毛病。作为普通百姓，小毛病自然无关大局。但当考虑让你负某方面的责任时，就要担心你的小毛病会引起大麻烦。

可以这么说，认识不了拍马屁者的人，皆是认不清自己的人。

北宋神宗年间，宦官李宪当副总管，有个官员帮他洗脚，夸他的脚香。这个李宪一脚踏上这个官员的肩，笑骂道：“你就不嫌拍马屁过分了吗？”李宪为人如何不管他，至少他明白一条，脚是不可能香的，无论是谁脚。将臭脚说成香的，不是马屁是什么？这个李宪不吃这一套，也不怕这个御史翻起大浪报复他。如《笑林广记》里的拍马屁秀才，夸阎王的屁有“丝竹之音”，有“兰麝之气”，那个阎王就是个糊涂东西，他以为他的屁真的很动听很有香气，竟然给了那个秀才十二年阳寿。古代的笑话为我们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提供了参照，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少上当的根本还在于自身的免疫力。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才能看穿别人的赞美是否属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领导讲了一番话，趁讲话者在场，人们发言尽量地戴高帽子，什么讲话深刻呀，深受启发呀，一个这样说了还不算，下一个就还将举出受到启发的具体例子，比如某一句，过去我们的认识是多么糊涂，某领导的讲话使我们茅塞顿开等等。有的干脆就在会下对讲话者个人行拍马屁之能事，对那番不过一般化的讲话大吹特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堪？说到底，还是讲话者本人对自己的认识不清。平时不学习，自以为悟出的所谓大道理，在稍稍有些常识的人看来实在只是平凡得很。平庸者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平庸的。不然的话，是会被这些表面的恭维弄糊涂的。假如那讲话真的很有思想深度的话，那么就不会受到这些并无思想深度的人们恭维了。满足于这些奉迎者的高帽子，说明了自身的底蕴至少还差一把火。

对这些奉迎者也不能一概斥责。领导者如果并不在乎别人

的马屁，相信不会有如此多的人这样说话。群众或下级摸透了领导者的喜好，或者领导者的喜好暗示老百姓该怎样对待，才有这样的结局。参加一个会旁听一下这些发言，就知道讲话者有多深的底气。

在这一点上，几千年前的邹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言过其实的赞美等于吹捧，违背常理的恭维等于拍马屁，不知天下有多少人能够认清这一点。

人之常情的背后

在某本笔记小说里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县官下乡微服私访，走在一条路上，发现有人抬着一副担架从他身边匆匆走了过去。他问抬的是个什么人，那一行中有人回答，说是一个女人得急病了，到城里请郎中医了病抬回去的。那担架走了不多远，县官忽然命令将那些人抓了起来。一搜，果然担架上抬的全是在城里抢劫的财物。人们问县官是怎么看出来的，县官说，如果担架上抬的真是个女人，怎么会容许男人们随使用手摸？可是他们这个塞被子一下，那个伸手进被子摸一下，这绝不是对待女病人的态度，显然是不放心被子下的东西。

这位县太爷之所以看出问题，是这些人的行为有悖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拆开来解释就是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和思想感情。人所共有的东西你没有，或者反过来，别人都没有的东西唯有你具备，不是假话便是发育不全。当人的行为跟人所共有的常情不相符时，内中的隐情不言自明。妻子哭丈夫哀而不伤，聪明的县官便断定这女人的丈夫死于非命，后来将这女人一审，果然审出了这假哭的女人就是罪犯之一。

有悖常情，暴露出了大秘密。

齐桓公身边的三个人都有一手，易牙杀了儿子给桓公做了一盘菜，竖刁自己阉了要去伺候桓公，开方伺候桓公十几年，连自己的爹妈死了都不回去看一看。在桓公看来，他们为了伺候他这个君王，连最亲的人都舍弃了，连最应该看重的自己都牺牲了，忠诚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管仲却站在另一角度，恰好通过他们不近人情的一面看清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知道此人将来必定“下毒手”的依据，就是那“好话”言过其实，好事做得悖了常理。

孔子曾有精辟的看法，人对自己父母的孝敬程度，也可以用来检测对君王对国家的忠心。不敢想象，一个对父母都不爱的人会去爱人民。据新闻媒体披露，湖南某位县长当官当得有滋有味，自己的母亲却在冻饿中上吊自杀了。这样的人物却被上级看中，并被层层审查者通过，不然的话，他是很难爬上县长宝座的。可以看出，审查者对干部的审查标准到底是什么。显然，对干部品质的考核，是没有把对自己父母的态度计算在内的。这不能不说是用人标准的失误，也不能不说思想政治工作在某些方面与伦理道德的脱节。没有了道德依据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绝不可能让人民接受的。如文革时期，视整人为政治进步，凡表示拥护者，无不被人背后骂为狼心狗肺。

古代在选拔人才上，将“孝”排在首位，其次就是“廉”了。既孝又廉者，就是“孝廉”。孝是对父母的态度，廉是对公众的态度和自己在利与义之间的表现。无论那标准是否还有毛病，也无论那标准是否被人偷梁换柱，但这要求本身却是有道理的。这反而比空洞的高调要贴切得多。一个人的品德怎么样，有一句俗话概括得十分准确：不看人待我，但看人待人。这看的，就是一个人在做事说话中是否符合人之常情。

是否合情合理，是真实与谎言的分界线。

用这个办法看看身边的事情，就看出名堂来了。但看那些卖货的，喊叫“存货不多快来买”的，那一定是货物积压，卖不出去了。喊叫“赔血本大降价”的，不是促销手段之一招就是货物过时。八十年代初，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曾经号召领导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于是一些寒碜的知识分子的家里，走进了来“交朋友”的领导们。那是交朋友吗？不。因为天下没有奉命交朋友的。

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某单位或某地方“通过学习某文件，大家的思想得到很大提高，深刻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了云云。就这么一看，似乎没什么毛病。但往深处一想，就感到了不大对头。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媒体撒谎就是那单位和地方撒谎。因为在这“某文件”下达之前，他们是否不清楚在为谁服务？为了满足现在的上级而不惜给自己的昨天抹一把灰，甚至糟蹋昨天的领导，可以肯定地说，到明天有了新的“某文件”时，他们将会以为今天是糊涂的来笼络明日的领导。这简直就是将谎言请上了正席。

以此类推，其他方面也无不是这样。想想“文革”时候，政治运动整得人人自危。可上面还有个政策，叫做“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仿佛所有人都在一个悬崖边上，政治运动就是要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拦住，让他们别往悬崖下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用得着搞什么运动吗？“坏人只是极少数”，好像这场运动是别的什么人搞的，谁在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当坏人似的，这个提醒简直就是做好人，而把罪责推给了执行的人。其实整的也许是极少数，吓的却是绝大多数。

再就是搞忆苦思甜。都甜了就感觉不到甜，这也是人之常

情。如果生活让大家都感觉到了甜，也就用不着“搞忆苦思甜运动”了。搞这种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把苦认作甜，至少是要让你忘却这苦。

在那年月，常常可以看见这类人物：他们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起家，到处演说，口齿伶俐，每次都声泪俱下。可人们私下里却说，谁剥削得了这个人？也许这话有些刻薄，但真正受剥削的贫下中农未必能够伶牙俐齿，巧舌如簧。

万物自有它本身的规律，万事都有它自身的常理。凡违背常理和规律的语言和行为，皆是作伪。仅仅作伪也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把这些有悖常情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给予充分肯定然后加以宣扬。那时候有位姑娘为了救小孩，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这是个英雄行为，就要姑娘到处做报告。但姑娘不认识字，要请人代笔写讲稿，于是写稿子写总结的要把她往高处拔，就说她是学习了某文章后才产生的力量。谁都知道，千钧一发之际，能够容许人的思维转那么多弯儿吗？都明白那是谎言，可还得那样做。

除此之外，为了证明某些理论的正确，将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拉扯到某个政治范围里去了。小学生将一位跌倒的老太太扶起来，很正常的事情，却被夸大到了某个革命理论让他这样做的；有人的日记被公布，人们从中很明显地看到那是随时准备被公布的。大话太多，情感太少，就会让读者怀疑他的真实思想，以及写这种所谓“日记”的动机。如上面所说的“控诉”，太表演化了，便露出了作伪的尾巴。

几经起落，人们学会了从反面看问题。如今讲究承诺，这里承诺，那里承诺，承诺得越彻底越是让人放心不下。为什么？公事公办曾经是让老百姓高兴的办事方式，记得有个歇后语是这么说的：警察打老子，公事公办。它是铁面无私和办事

公正的代名词。现在可好，公事公办反倒成了不办的代名词。有人骂人家时有个形象的勾画：他有一张公事脸。这玩笑的背后，道出了公事公办令人厌恶的一面。显然，公事公办正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倒是“出门靠朋友”。某些办事单位的年终总结上，把拒收××万元礼当作重大成绩；为老百姓办好了一件事居然是按政策办的，也是通过学习后的新气象新面貌；某个好干部没有贪应该让大家学习……等等理所应当的事情都变成了难得的大功劳，正好反映出了道德的滑坡。

对于老百姓而言，凡是他叫你“明天到办公室说”时，这就表明你的事情没指望了。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的承诺还有什么用？当你在拒绝礼物时，我们只能往一头想，那就是可能礼物太轻了。至于你是不是真的不收礼而认真办事，不会埋怨老百姓不理解，人们都能够从你的表情和语言中看出真情来。

大言炫炫，露出的是腹内空空装腔作势；赌咒发誓，等于自己告诉人家你正在撒谎；电线杆子上贴的“祖传秘方”，透露出的是自己没本事；拉扯大人物以装门面，恰好说明了他没有多大来头。自称公平的不公平，自称能干的不能干，还有自称善良的，自称直爽的……都可以从他自己的声明中看出其中的狡诈。

学会看人，学会识谎，对我们的生活绝对是有益的。而识别谎言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看他的声明是否符合人之常情。

警惕你的小辫子

要想让机械表走得准，就必须按时上发条。遵守规律的代价，是让最里面的发条永远处于被压迫状态。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准则。

你如果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不想被骗子或野心家利用，第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小心翼翼，一步三叩。世上的小人多，小人的拿手好戏是欺骗，是欺诈。他们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揪辫子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别人的小辫子对于正派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但对于小人，其利用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差不多天天可以从报纸或是什么地方看见有人被利用的例子。在犯罪案件中，有一条是“敲诈”，如何敲诈？就在于利用一些不敢暴露的某些小辫子上。

在文艺脸谱化的过去，我们喜欢看反特的文艺作品，尤其喜爱抓特务的电影。那些电影中的特务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总会抓住个把裤子上有屎的人加以利用。虽说这种创作手法千遍一律，但道理却还是说得过去。小辫子被人抓住不一定都被要挟去当特务，但被人利用却是真的。根据各种媒体中披露出的犯罪案件中，除了敲诈者的直接犯罪外，由于受人要挟而走向犯罪的就不在少。有人强迫别人卖淫，原来她自己也是由人逼迫而走出了第一步，因为她的辫子被人抓在手里。有人利用职权为别人捞好处，原来他曾经落入别人的圈套，照片还被人家捏着。有的家里被盗而不敢报案，因为他的经济来源说不清楚。贩毒者将吸毒者引诱上钩，等你再也离不开毒品时，就成了他的俘虏……等等例子都可以证明，一个人小处的不检点，足以导致身败名裂。

多少有为者的远大理想还没有实施或者刚开了一个头，就走向了与愿望相反的另一面，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的把柄被别人抓住，就不得不为揪辫子者个人卖命。人一旦落入这样的陷阱，天大的抱负也成了虚话，保住自己成了做人的头等大事。这是多么伤心的结局。巴尔扎克曾在某篇小说中说过这样

的话，人在犯罪之前有一千条理由，但在犯罪后的那一刹那就后悔了，因为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到了这时候，后悔显然来不及了。为了遮掩错误和罪过，就是接着再一个犯错误，于是，人在邪道上越走越远，直到身败名裂甚至掉脑袋为止。

在人与人争斗的角逐场上，要搞倒一个人不那么容易，尤其对那些有为又受到拥护的人们，而且公然那样搞也太愚蠢。怎么办？对手们将利用不知在什么地方获得的材料，先把你搞臭再说。搞臭一个人的最好材料无非两条：男女关系再加经济问题。那材料不是他掌握的，如果某个人的问题只有他知道，他是不会运用这种材料的，那样容易暴露自己而适得其反。某个人无意中讲的一个笑话，或是曾经在什么地方出过的一次洋相，或是曾在什么时候犯了点错误，谈者无心，听者有意，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将这些材料抛出来，而且他是听某人说的，自己不沾一点腥气。而提供材料的人，往往也正是被他正在加以利用的对象。

这种扳倒对头的手法并非自今日始，其实古代就很流行。刘邦打天下的时候，陈平凭他的聪明才智立下了不少功劳，并获得了刘邦的信任，委他以重任。于是有些人心理不平衡了，就向刘邦打小报告，说陈平在家跟他嫂子有一腿，而且最近还接受了某个人的钱财。这消息让刘邦大怒，将陈平叫去质问。好在陈平自己也具备大奸的才气，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他对刘邦说，事实究竟怎样，我不想多加解释，但我认为这样追查不大好。因为大家跟随你是帮你打天下的，并非树道德标准。如果这样一闹，跟随你南征北战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毛病，他们都将自畏。那样一来，还会有这么卖力吗？刘邦一想，说得对。于是他不但没有惩办陈平，反而再给了他奖励。

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陈平身上而是在另一个拿不定主意的

人身上，陈平的政治生命可以说到此为止了。解释吗？越解释越糟糕。不解释？那就是默认了。无论你怎么对付，都不可能抹去刘邦对他的坏印象。

小人具有看风向的本领，他们知道哪样的材料有杀伤力。生活中的不检点，经济上的小瓜葛，都可以成为杀人的剑，先让你出丑，再让你倒台。记得“文革”中那么多受迫害的干部，真正让他们不得翻身的，让老百姓自觉地对你蔑视的，并不是所谓的思想反动或是政治立场，其实就是那些涉及生活作风或是经济问题的材料。汉朝的张敞是个执法很严的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为了把他搞倒，向皇帝反映，说这个人在家里为老婆画眉。皇帝也认为这家伙没出息，将张敞叫去询问，张敞说，两口子在暗房里的事，他们端出来是什么意思？可见，无论古今，小人行奸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让你栽跟头的，未必就是大石头。启动自行车往前进的，只不过是掩在后轮中小小一根如发的细丝，而让轮胎爆裂的，也不过小小一颗钉子。

先说你的小缺点或是某些错误吧。当你的对头在你的上司面前透露你的问题的时候，这问题八成是真的。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谎。他们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或是以不大不小的玩笑的方式说出来，当你追究的时候，他将会以“没想到”来掩盖他的真实用心。但他们知道这句不经意的话可以在什么人的耳朵里产生作用。因此说，你如果想在这世界上立住脚，并想有所建树，千万注意自己的小辫子。“小处不可随便”，“循规蹈矩”等等，都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做人经验，这经验固然有对人的束缚方面，却也包括着多方面的其他内容。

有了小辫子怎么办？真正的好人并不是那些永远不犯错误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坦荡地对待自己的过错。唯有如

此，才不至于被人利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的坦荡将是对小人的当头一棒，也是为自己解脱的最好办法。还是举那些反特片为例，特务最怕的，就是被利用者去向政府自首。只要你一硬，对方就会软下来。

在某本杂志上，读到了外国一则小故事。有兄弟俩卖服装，设计的圈套才真是叫绝。客人看中了一套西服，问多少钱。帮客人试衣服的是弟弟，弟弟不清楚价格，就高声叫着问哥哥。哥哥在另一边忙碌，一边干活儿一边回答（具体价格忘记了，假设一个价吧）：“一百八十五。”弟弟是个聋子，再问一遍，哥哥再回答一遍，音量比第一遍大得多：一百八十五。弟弟这次听清楚了，对客人说，八十五。客人听见的是一百八十五，可耳背的弟弟却听成了八十五，客人以为占了大便宜，赶紧掏出八十五将西服买走了。

其实弟弟的耳朵根本就不聋，哥哥说话也用不着那么大的嗓门儿。兄弟俩摸透了顾客想讨便宜的心理，便设计了这一手，果然就效果显著。大概那衣服连八十五都是暴利。

在这件事上，兄弟俩可谓深得顾客心理之奥妙。首先弟弟先问，哥哥的回答怕客人听不见，弟弟就再问一声，其目的就是要客人听见。其次，他们知道客人贪了小便宜就会迅速跑走，这样客人先背了理，不怕你再来找他的麻烦。可见，贪小便宜者容易上当，是一切骗子最先摸清的。

原来贪小便宜也是小辫子。

我们在电视中在报纸上读到的这类消息不少。有一种广告，说要招收男女服务员，月薪两三万元。有些人就将钱给骗子们送去。得知是一场骗局以后，还不敢报告，因为那两万三万的报酬是给“特殊服务”的。贪图不劳而获的便宜，是他们张不开嘴的原因。

月薪两三万，而报名费只须出区区五十元或一百元。巨大的收益与小小的牺牲，两相比较，让你觉得即或上当也不是很大，便少了怕你告状的后顾之忧。什么东西可以获得如此高的月薪？这便是骗子戏弄人的第二大骗术。现在不是色情泛滥吗？除了让你想到那高利润回报之外，不须花本钱的肉欲也是钓饵之一。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让你上当之后都没脸报案。其三，搞色情行业不需要文凭也无须技能，只须有一副好体魄再加一张好脸蛋即是活资本。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大多来自乡下，总是会有人上钩的。骗子行骗，在揣摩人的心理上，却是没有作假。

心灵的不干净同样是小辫子。

人情债与亲友情，有时候也可以变成辫子被人抓住。如果你的面皮薄顾忌个人情谊而忘了身负的责任，其后果也是可怕的。许久以前有报纸披露，有个在部队管钱的贪污犯受到了制裁，追究其原因，原来是亲戚们找他“临时”挪用。到了归还的时候了，那些至爱亲朋们赖账的赖账，狡辩的狡辩，却将他送上了法庭。贪污者受到惩处是咎由自取，但他的那些亲戚们人格的卑下，不能不让我们受到震动。为了金钱，他们不会为他的被枪毙惋惜，相反还会松一大口气，毕竟不再为还帐而心怀焦虑了。另有一个银行的女出纳，不知道找她谈恋爱的人正是冲钱而来，竟陷入感情的深渊，为骗子一次又一次地盗取国库的钱，东窗事发，骗子跑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这实在是些令人伤心的故事。然而法律无情，不会因为别人受别人骗就放他们一马。

义气，也是小辫子。这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见得不少。武松服刑被施恩百般照顾，原来施恩是为了让他帮助夺回被别人霸占的酒馆。《聊斋志异》里也有这种人物，因为别人照顾太多，

他就知道那人需要他去拼命，为了义气，他果然就帮别人杀人了。看看现在那些充当打手的人们，有的是为了那么一点小利益而甘为别人作牺牲，有的则是出于“打抱不平”而受人唆使。有的为人讨债，不惜绑架人质；有的致人残疾甚至杀人，以为在做善事，却不知那些请他们铲除不平的人们，并非什么正人君子。那些以情义和慷慨好义包装自己的人们，摸透了讲义气者的弱点，那就是好出头，好名声，以出头露面为荣耀，便以小小的技巧拨动他们内心的发射机关，让他们去干自己干不了的事情。

小辫子是多种多样的，凡是你自己注意不到的嗜好、习惯、性格弱点，在居心叵测的人们眼里，皆是可以利用的小辫子。你的嗜好可能成为行贿者的参考，你的脾气可能成为别人挑唆的原料。酒色财气之所以自古都被人警惕，就在于这些特点皆是易于攻破的弱点。

你的那一份儿

有人名气很大，但你考察他的作品和致使出名的原料，却实在不敢恭维。可笑的是，每个人当面都说好，背后就嘀咕，再一次见面再一次说好，背后再一次说不好。到底是如何吹起来的呢？原来是占了名分的便宜。

搞业务的埋头苦干，永远敌不上当着官儿的专家，埋头苦干的最后可能是个业务尖子，当官的专家就可能成为大师级。你能否爬上高级别，还得看当着领导的专家高兴不高兴。专家当了你的顶头上司，基本上在你头上盖了帽，你的作品得让他看了再说，无论他懂不懂，他的话是专家兼领导的话，说你某件作品“还可以”，你就该向南天门磕头了。

面壁十年悟真谛？那是昔日的皇历。

满眼一观，这样的风景还真不少。

不幸不可能人人都有一把交椅坐，你还得熬。这说明，你只能得到你的那一份儿，人家所得并不是你应该得到的。

《红楼梦》里贾宝玉说过一句话：你只能得到属于你的那一份儿。他的这一彻悟是源自一位女孩子。贾宝玉生长在大观园，在女孩子堆里泡着，养成了他对天下女孩子独特的认识。他厌恶男人，皆因男人的功名心太强烈，因而他喜爱女孩子，而且是未婚的女孩子。他认为，女孩子一嫁人就失去了天真自然的美，这让他很伤心。他曾幻想，如果自己有一天死了，女孩子们的眼泪将他的尸体漂起来，那该是多么好的一幅画！

有个雨天，有个女孩子一边哭一边在地下写着什么字。他去关心她，那女孩子根本就不认识他，却在地下写着一个又一个字：“蔷”。这对他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才明白，并非所有女孩子只爱他这个宝哥哥的。于是他有了彻悟：无论是谁，不可能将喜爱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

可笑认识到这一点的也仅只有宝玉这样的高素质人才，大多数人并不满足仅只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儿，巴望一切好东西都为自己所拥有。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有人读了《红楼梦》，恨不能将金陵十二钗都弄来做自己的老婆。平常人当然做不起金陵十二钗的梦，可是欲壑难填的本性大小一样。

做梦是做梦，无论梦境多么荒唐，也不会有旁人知道，同样可以在人前自夸灵魂很干净很纯洁。万一达不到梦中的境界，也还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名利皆是过眼云烟，不要也罢。另有一句“知足者常乐”的古训，也能够帮助调剂一下心里的不满足。

不好办的倒是那些有了圆梦的条件。比如手握批条子签

字的权力，有任意报账的优越，甚至还有送“干股”的朋友，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要挺直腰杆一身正气地做人确实不易。

看看那些倒台的贪官们吧，差不多皆是被谎言哄得晕晕乎乎的角色。考察他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原来大多出身贫苦，也曾有过奋斗的历史，也曾有过回忆起来让人称颂的功绩。然而那只是强打精神的一阵子而已，或是没有尝到有钱有势的好处之前的单纯。他们也许认得字，却谈不上什么人文素质，并不知道除了现世的享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值得追求。

总算熬到一个职位上了，看见了过去不曾看见过的风景，对比起来，过去竟有些小家子气，也就挺直腰杆儿充好汉，仿佛生来就是将相种。周围被一帮子过去没发现的朋友围着，点头哈腰的，送高帽子的，想着法儿让他玩的……这些人遮挡了他的视线，便以为坐上了铁打的江山，再也无所顾忌。他以为，看见的几张熟面孔是群众的全部，这些人的恭维仿佛是普天下人的恭维，直到东窗事发，才明白这天下并不是他的，那些人也不过是跟他同流合污的一帮混蛋，但后悔晚了。

还有，他们在没有贪那第一笔之前，也跟我们常人一样的心胸，痛恨天下腐败太盛，但他们不可能想自己到了有贪的条件时将会怎样对待。且不说那些伸手找人家要的——那些人都是下作东西，不说也罢。只说踩虚了脚的人们——于是当那些“朋友”们将金钱物资摆到了面前时，当爱非其道的妻儿接受了人家的馈赠时，心底算计的是比别人过得好了，别人不能得到的自己能够得到了，那份儿欣慰建立在别人比自己差这一点上，并没有算到有一天都将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没有怕过？或许有过。但身边的人和送礼者有一千条理由，告诉你不接就是愚蠢。他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说明收那么点儿东西不叫贪，“不要紧的”，“谁知道”，“你知我知”，“朋友间的往来嘛”等

等，都是常出现在耳朵边的话。久而久之，也把谎言当真了。的确，自己的地位不会被人查的。直到查到身边来了的那一刻，才后悔理应避免的错误却没有能够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官的日子真没有老百姓的日子安逸。

其实要想清楚天下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琢磨透贾宝玉说的那句话：你只能得到你应该得的那一份儿。天下的金钱多得很，但哪一部分属于你？天下的官位也很多，哪一把交椅属于你？人与人的起点不一样，竞争的条件也并不平等。有人生来就已经有宽广的道路等着他，有的人则是每一步都得用自己的脑袋去碰撞。用脑袋撞的想跟生来就好的人一比高低，其结果注定是自己的头破血流。

中国是孔孟之道的故乡，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中庸。老百姓由此而派生出了许多对人生的解释。长期不害病，将会感到忧虑；做生意老是赚，就有些心不踏实；一段时间老是一切都很顺利，就要担心是否会有突然的无妄之灾……月亏月盈的自然现象，也被人用来比喻人生。这并非毫无道理，更不是迷信。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们，才侈谈什么天不足畏，人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古代一则裁缝做衣服的故事，大概可以帮我们认识问题。

某一位专门为当官的做衣服的裁缝，人家请他做衣服时他就问人家当官多久了。原来他从穿衣服上发现了做官的规律。才当官的挺着胸，他就前长后短。当官久了的人，就要前短后长，因为只有饱经了官场的风霜雨雪，才知道缩着脑袋做人。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内中玄机不难明白，但要把它说清楚却又不那么容易。这是个须用心体会的故事。

当今行路，到处都有收费的，听惯了司机的抱怨，忽然有位司机说他喜欢出钱。我问为什么，他说出了钱路上心里踏

实。另一位的车司机，那天恳求我少给他几块钱。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从早晨六点起来就一直很顺，总感到心里憋得慌。看似迷信，其实不然。常怀忧虑，一步一顿，可以减少被蛇咬的可能。“得意忘形”的成语，的确是对人的警策。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才是个正常现象。不如意，才让我们奋斗，挣钱艰难，几个钱揣在兜里才踏实。

面对不如意的社会，打起精神活着，可以保你一生平安。

别丢了尊严

清朝陈其元的随笔《庸闲斋笔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他的祖父曾经在滁州当官，那时已经六十岁过了。老人喜欢读书，对孔夫子“老也，戒之在得”很不理解，也有些不以为然。人老了嘛，还有什么贪欲呢！可是在官任上就出了一件事。有人因为打官司，暗地里给他送去了大笔金钱。老先生当面呵斥了那人，贿赂当然是没要。可是当天夜里，他老是睡不着了，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可以前他是上床就睡着的。后来仆人听见他打了自己一嘴巴，并自骂了一句：“不长进！”然后才睡着了。

原来人老贪心更炽。假如这位老人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不是把尊严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那一大笔钱他肯定收下了。其实在他睡不着时，捞钱的机会并没有失去，因为那个案子还没办呢。如果那样，那一耳光可能就是另有原因，那是放弃了机会的痛悔。老先生的事例之所以可信，就在于他没有那么多令人难以信服的空话。可见要尊严不要钱并不是那么简单。

勾践曾为夫差尝粪，为的复国灭吴。后来居然也有人效仿。唐朝武则天时，御史郭弘霸去看望生病的魏元忠，适逢

魏元忠拉大便，这位御史就效仿勾践，用指头蘸了大便往嘴里送，而且谈出的道理也跟勾践一样：有病大便是甜的，病愈是苦的，您的大便味苦，说明病好了。所不同的是，这个被拍的魏元忠不买账，他厌恶郭弘霸的这一套，掖好裤子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别人，让郭弘霸一辈子都无脸做人。

堂堂御史级别不低，在人前的模样也颇有几分神圣，竟也干出了这种无耻的勾当！这对相信当官会为民作主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我实在不愿相信，那些没有骨头的家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堂堂正正做人，从来没想过光明正大是个好词儿。问题在于，尊严往往是与富贵相抵触的，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要了尊严就要不成富贵。这个选择很难。假如此人生来就有富贵相伴，相信他也会知道人格的重要性胜过一切。不幸，人跟人的起点不一样，有人生来就拥有的东西，另一些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得到。于是卖身求荣的事情就发生了。如那位尝粪的御史，爬上御史的位子想必不容易，可能给许多人尝过大便的。他在往便桶里伸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这很下作？然而富贵是那么诱人，他终于将手伸下去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那很累很苦；从恶，可能富贵立至。古人的告诫说明了从善的不易，道出了从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为威逼许多人做得到，利诱却可以攻下人的心理防线。南宋的朱浚是理学家朱熹的后代，他没有一点曾祖的骨头，拍权臣贾似道的马屁，凡给贾似道的帖子或书信必写“朱浚万拜”，露出的是一副无耻的形象，于是人们背后给他取个外号“朱万拜”。但元军打来，要他投降时他却说，我是朱熹的后人，怎么能够当叛徒呢！于是上吊自杀了。人们对他的评价是舍得命却舍不得富贵。

我们不可能人人都碰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也不大可能随时面对抛头颅洒热血的选择。在和平的日子里，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日子里，人的另一面就很容易诱发出来，这就是对金钱和权力的占有欲望。如这位朱万拜。在这种风气之下，有人能够不为金钱名利所动，保持自己的名节和骨气，其高风亮节堪与大英雄媲美！

唐朝有个刘朝霞，很会写文章，但他不是按照官方通行的格式写作。他有他自己的创作方法。天宝年间，唐玄宗游华清宫，随行的除了各路达官贵人，还有不少文人学士。大家都要写歌颂文章，刘朝霞也来了一篇。李隆基读了他的文章，也被他的文采所折服，只提了几个字要改一改的意见。可是刘朝霞竟然反驳道：我做这篇文章文思如泉涌，自己认为是一篇好东西，我实在不愿改。玄宗只好依他，却说，你真是个穷命。

牺牲自己以迎合上司，正是这迎合会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不肯委屈，就难以获得利益。但刘朝霞宁可不要荣华富贵，也不愿屈服于权势而说谎，哪怕只是几个字。天下文人如果都如这位刘先生，那么历史上就会没有拍马屁的文章了，天下的谎言也将少得多，说谎的风气一定不会这般炽。不幸那是不可可能的。

以文学做为敲门砖以捞取富贵者，古今从来就没有断过。那个令人敬重的大诗人李白，也未能免除拍马屁的俗套。还有许多被人敬仰的人物，他们的才气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他们也有牺牲真理迎合时尚的另一面，却让崇拜者们伤心。将所学的知识化为权力，更是许多聪明人的做法。如王莽，如蔡京，如秦桧，如严嵩，他们在取得高位之前，也曾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也有许多崇拜者。但圣贤书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君子，相反，倒是盗用圣贤之名网罗死党，闭塞贤路，以自己的

学问傲视天下名士，任意诠释古典，行祸国殃民之实。他们树的是个人绝对权威，而不是人格和人的尊严。

令人遗憾的是，等到这些巨奸们败露之时，他们所埋下的祸患就已经难以收拾了。并非人们看不出他们的险恶用心，无奈他们窃取了高位，把持着朝政，一般人即使能够识别，也难以扭转乾坤，唯有焦虑地等待他们自行灭亡。

不拍马屁不容易，不接受拍马屁也不容易。第一不吃拍马屁那一套，第二给予这种无耻的家伙无情地揭露，是一切具有正气者的好品质。尤其第二条，假如自己没有打算堂堂正正做一辈子人，是不会不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的。这是因为，对无耻者的揭露，将把自己摆在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位置，自己的一言一行将被别人监督。比如那个揭露郭弘霸的魏元忠，他将郭弘霸的丑态端了出来，郭弘霸不恼羞成怒才怪。他必然地要时刻关注魏元忠的一言一行，一有空子他就将拿出杀手锏。魏元忠敢于给郭弘霸无情的一脚，就在于他根本就不怕这个姓郭的反扑。

许多人对坏人坏事放一马的本意，原来并非宽容待人，只不过是怕自己以后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好让别人也手下留情而已。由此看来，那些敢于当面揭穿谎言者，不能不说是铮铮铁骨。

还是以齐桓公时代的几个人物为例。管仲病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能不能当相，管仲说，鲍叔牙的性格能够做个好人，却不能做个好相。因为他爱憎太分明，难以包容坏人坏事。易牙得知管仲活不长了，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跑去找鲍叔牙，对他说，管仲当初跟您的友情那么深厚，后来他当相也是您推荐的，可是现在管仲病了，大王要请您当相，管仲却不够意思，竟然说您不能当相。鲍叔牙便反问他，依你说应该怎么样呢？

易牙说，至少不要反对大王的意见吧。鲍叔牙不客气地说，我跟管仲的友情是私，大王问当相的事是公，我之所以推荐管仲当相，也正在于他为公不为私。如果我当了相，你们这帮小人怎么办？易牙也不得不悲哀地自己承认，对比鲍叔牙，我们的确属于小人。

管仲与鲍叔牙的友情千古传颂，就在于这样为公不为私的朋友太少。假如鲍叔牙跟我们今天某些干部一样的德行，易牙这样的小人马上就会得到重用，说不定还要嘱咐他：一定要帮我注意那边的动向。可见，正气的树立不是那样容易。因为树正气首先得牺牲私利。

报纸上曾经出现过如下字眼儿：道德重建。与此相联的，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从我做起”之类的提倡。然而这些似乎都是针对普通人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提倡也就没有约束力。目前正在开展“三讲”教育，其中一条就是讲正气。树正气的第一要求，就是不说谎。

凡醉心于权力和金钱者，无论在会上讲树正气如何慷慨，一概是谎言！

揭谎者的人格

开篇时说过，无大勇者难以揭谎，尤其那谎言来自上面和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时，就尤其需要烈士上断头台般的勇气。哥白尼被活活烧死，只因他戳穿了教会的谎言。张志新被残忍地杀害，只因为她坚持了真理。要不死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出卖真理，出卖自己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看看古往今来那些揭露谎言者，他们无一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

一九五九年，神州大地到处放卫星，亩产多少万斤。大家

都知道那是谎言，但大多都抱以沉默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坚持实事求是，该是多难啊！但彭德怀怀着“我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证明那是谎言！

无正气者不愿揭谎。这种人并非识不破欺骗和谎言，但因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或不敢戳穿那些西洋景。越是这样，越是感到那些不为私利所动而坚持真理的人们是多么崇高。

“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是古人劝齐桓公的话，后来王崐又用此例来劝过唐太宗。有人明知道在自己面前献殷勤的是无耻小人，可是离了这样的人搔痒就没有这么舒服了，说不定还要利用这种小人去整对头冤家，也就不愿意小人离开。甚至在有人揭露这种人物时，还伸出胳膊帮忙挡一把。在这种情况下，仁人志士空有一腔热血，也难以有所作为了。姑息养奸，说到底还是出自私利，离小人的距离并不太远。

宋朝时王安石变法举步维艰，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名士们都跟他作对，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人们的支持，可是当面对假的拥护者时，还是予以揭露。有个人拿来一篇文章，说是在街上抄的大字报，人们都赞扬变法好处多。这个冒牌的“群众来信”被王安石一眼识破，并当众斥责，将那人赶了出去。我想，如果换个现代人将会如何？一九五九年的假话甚嚣尘上，报纸编造了那么多群众“热烈拥护”的假文章，那都是争着哄骗领导的鬼名堂。再看看王安石，不能不承认那位倒霉宰相的人格高尚。

另一个故事也可以作为参照。唐朝的礼部侍郎王凝有次巡视长沙，一个柳州刺史去拜见他，见面就磕头，说他是王侍郎的子侄，名叫通郎。王凝让人一查，的确有这个人，但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招待那人吃饭之后再回去查族谱，发现本家那个

叫通郎的早就死了。王凝大怒，第二天让人召那位“通郎”。那个刺史一到就又要下跪，却被两个大汉挟住了。王凝说：“我昨天误受你一拜，今日还给你。”说完就跪下去对此人磕了几个头。这个刺史“通郎”不顾脸皮就到了这种程度，不认那位干亲戚，也不至于受这顿气。假如王凝是个乐意收门生的，他岂不甘愿当王家的死党？这个王凝的不简单处，就在于不吃那一套。

更感人的就是三国时候一个胡质父子。胡质几代人当官，到他名下时，既有爵号又有兵权，皇帝先后赏给他不少东西，竟无一文入私门，都赏给了手下有功的将士。死后，人们清点他的东西的时候，除了朝廷给的官服，就是几箱子书。

在他任荆州刺史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儿子胡威从京城去看他，没有仆人，没有马车，只好自己牵一头驴，驮着米，一边走一边自己烧饭自己喂驴。在荆州玩了十来天要走了，胡质送给他一匹绢。可是胡威不敢要。他问，父亲向来以清廉著名，这绢是从哪里来的？胡质说，这是我的工资的一部分，给你在路上换饭吃。胡威这才接受了。但在路上他并没有用那匹绢，还是自己烧饭自己喂驴。胡质手下一个都督，见长官这么清贫，就决定帮一把。他假说家里有事请了假，追上了胡威，一路跟胡威做个伴，帮他烧饭。走了几百里路了，胡威察觉到有些不对头，想办法套出了真实情况，得知此人是父亲手下的官员，就再也不要他送了，并且将那匹绢给了那个人。以后父子通信，胡威对父亲讲了这个情况，胡质竟然当众打了那个都督一百军棍，并开除了他的公职，而且永远不能当官。

这个胡质堪称古今一绝。拍马屁有罪，而且惩办如此严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今天，谁不希望手下像都

督这样的人能多几个？都督的办事能力和对长官的关照天衣无缝，并不需要长官给他一个眼色，竟然做得这么得体。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过感叹：让他当办公室主任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胡质的看法与我们相反。他认为，这个都督抛开公事不办却去为私人服务，这一条就难容。再看我们今天，多少人拿国家的钱为长官私人办事，不但领导高兴，甚至可以得到提拔。甚至可以这么说，许多人的官就是靠给私人办事得来的。

以后胡威长大了，又在晋朝当官。有一天晋武帝司马炎问胡威：你的父亲很清，你也很清，相比起来，谁更清呢？胡威答道：我父亲的清怕人知道，我的清怕人不知道。这说明，世界才短短几十年光景，就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一代不如一代，从这句话里看得十分清楚了。

胡氏父子的清廉曾经感动了数代人，李白都曾经有诗提到此人。与胡质同时代有个人当过刺史，在任上时做了一张胡床，卸任时，将胡床挂在衙门里。李白的诗说：“不羨胡威绢，东壁挂胡床。”

可见，不是所有人看不清谎言，也不是认不清那些吹牛拍马的人物。之所以容忍他们的作为，就在于这些人物能够让他们服伺的头儿们享受到舒服和荣耀。召门生，结朋党，认干亲戚，收干女儿，皆是为了发展私人势力，因而小人对他们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人才。在退休制度才开始的那几年里，有人已到退休年龄久久不退，就是因为“自己人”还没有上去。对这些人的提拔，不是为人民培养好干部，无非是对这些人鞍前马后的回报，或者，自己离开了这个职位，有个“自己人”在那地方守着，可以名退实不退，对将来绝对有好处。邓小平当年调这里调那里，到任何地方总是一个人去上任，从来不带用熟了的干部和部下，为我们的干部做出了榜

样。

对自己无把握者不愿揭谎，不愿承担责任者也不愿揭谎，贪图私利趣味低下者更谈不上揭谎。唯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襟怀坦荡、趣味高尚者，才将坚持真理看得比一切还重，容不得谎言。

睁眼看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内涵也包括着谎言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结局，因此也就有了下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眼里生活，这生活像表演，让你没办法逃遁。

不过不要紧，我们同样也可以把别人纳入我们的眼中，看别人的表演。别人有的善行与恶行我们也有，通过人家的手眼身法步，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是如何表演的。只要睁大你的双眼，就能够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分辨出不合情理的成分来，这对少上当绝对有好处。

祖传秘方

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有人误信了游方郎中的广告宣传，请他们治病，结果出了人命。通过血的教训，经验倒是有了，但死了的人却再也活不过来。假如事先能够不信那广告，这血也就不会流了。我曾在以前某一篇文章里说过电线杆子，电视中的新闻让我想起了电线杆子上的广告和其他方面。

首先说那些广告的真伪吧。

那些广告大多是这种类型：除狐臭、割包皮、治不孕，治阳痿早泄……而且大多有“祖传秘方”为依托。尽管我没有亲自去试过看过，但我可以武断地说：不必信它！

运用识谎的办法，以人之常情揣度，再来个换位思考，结论并不难下。

一、是不是祖传秘方，只有那郎中自己清楚。祖传秘方忽然一下子涌出这么多来，倒让人糊涂了。如果此人真的掌握了祖传的秘方，而那秘方又的确是了不得，那么可以想象，他是不会等到现在才拿出来赚钱的。也许此人会说，那时候阶级斗争抓得紧，不敢拿出来云云。

这么说是缺乏起码的常识，再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错，在相当长时间里，政治运动不断，的确伤害了许多人。但对于祖国的医学，从来就没有过压制，相反，即使有罪在押的人，对身怀绝技者也是从宽的政策。假如真的是出身成分不好，有了这一技术也可以改变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处境，聪明的郎中还会等到今天才让秘方见天日吗？在中国农村大地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所以说，那“秘方”十有八九是假冒伪劣。

二、我们暂且承认那秘方是真家伙吧。祖宗不在了，只留下了方子，让后人用它来服务于人民，也不是没有例证可举。子孙们用这方子开辟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可以在经济上得到收益，这些都可以理解。不理解的倒是为什么后人不得不打前人的牌子。这至少说明，后人不及前人。凡是利用祖宗招牌的，一定不是现实的优秀者。祖宗的好东西也将被搞歪。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医者的水平。

其次，祖传秘方就一定有用？不一定。这倒让我想起古代的一则笑话来。有一个人想学骗术，一天看见一个卖药的，用

一尊观音像，有人求药，那药就从观音的手里滚出来了，粘在手上不动。此人觉得这个办法好，便设了一计，要掏出其中的秘密来。他请卖药的上馆子吃饭，朝那里一坐，饭菜就端来了，吃完了屁股一拍就走了。卖药的问，你怎么不出钱，而人家又为什么没找你要钱呢？此人说，这是个祖传秘方，你先把卖药的窍门告诉我，我再把吃饭的窍门告诉你，我们交换怎么样？卖药的答应了，告诉那人说，我在观音手上用了磁铁，那药都有铁屑，滚到手上就不动了。此人便告诉对方他吃饭的窍门，说，我的更简单，是在请你吃饭以前先出了钱的。这两个人都是秘方，虽然不一定是祖传的。可见，“祖传”的未必就一定好，“秘方”也未必管用。

三、如果功效奇特，无论是不是祖传的秘方，都用不着自吹自擂。

四、广告贴在电线杆上，足见郎中捉襟见肘的狼狈。

祖宗也可能有个把单方曾经治好过某例病症，但这种单方民间多的是，没有上过《本草纲目》的皆可以称作祖传。但祖传的不一定就是秘方，即使是某一家的秘方也不一定具有包治百病的普遍性。现代人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多了，混饭吃的人们瞄准了这个大市场，便把一鳞半爪的所谓秘方拿出来哄人。还别说，中国人多，上当的还真不少，电视新闻中出人命的就是其中上当受骗的事例之一。有些骗子凭半生不熟的本事，居然名声大噪，顾客盈门。你一进他的那个诊所，满墙的锦旗，足以让你将假当真。再加上有了经济作后盾，广告宣传不断线，电视报纸再加传言，狗屁郎中也就慢慢地成了真医生。

说的是卖药行医，道理却具有普遍性。

看看我们身边，各行各业都有游方郎中式的人物。凡是夸耀祖宗如何了不起的，本人一定不怎么样，无论那祖宗在他嘴

里是如何地了不起；自夸当年如何辉煌的，目前一定混得不如人，也无论他的当年辉煌到了如何程度；自夸有本事很漂亮的，那本事和漂亮都应该打折扣。遗憾的是，卖假药的到了一定时候，穿起白大褂成了有文凭的医生，江湖骗子到了一定时候也成了正宗权威，或作家，或评论家，或……某些人甚至成了主宰别人的所谓评委，那更是一辈子吃喝不愁了。而促成他们成气候的，都是我们这些把谎话当真的普通人。

且说图名

在某单位一个大扫除的场地，人们一边劳动一边闲聊，谈起了四十岁。有人说到四十岁时能够发笔财就好了，有人说到四十岁能够挣到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有个醉心写作的人说，我力争在四十岁时出一本书。忽然一个长者冷不丁地插进来鄙笑道：“还是谦虚点好吧！”

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一个年轻人边读书边做笔记，这时进来了头儿。年轻人这时才忆起来，昨天通知今天下午开会，他忘记了。他不好意思地作检讨：“对不起，我忘记了。”头儿不高兴地说：“学习业务是好事。但是脑袋里的名利东西装多了也要不得。”接着对年轻人进行了一番不图名不图利思想的教育。

表面看来，上面所说的这两位教人家谦虚和不要有名利思想都没有错。不图名，不图利，是处世做人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危，将性命都搭出去了，名和利自然也在舍弃之列。这是真正的君子之行，烈士之志。教育年轻人正确对待名利，无论怎么看都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遗憾的是，这种高境界的语言被

有些人滥用，甚至用来压制别人或者掩盖自身平庸的托词。也就是说，成了某些人们谎言的包装。

看第一位长者吧，年轻人说，力争在四十岁时能够出一本书。这是他的志向，是他努力的方向，即使到时候达不到的，相信他是奋斗了。可是这位长者认定那就是狂妄自大，并拉起权威架子要人家谦虚谨慎。其实真正应该谦虚些的倒是长者本人。没有大能耐，何以敢如此说话！

再看第二位头儿吧，年轻人误了开会，可以用别的语言，他凭什么就断定人家是名利思想作怪呢？尽管他也说了“学习业务是好事”，但那分明是言不由衷，他的实在含义，是你不开会就是名利思想作怪。还没有搞清他的那个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会。无谓的会议，耽误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多。

我喜欢英国毛姆的书，为什么喜欢却说不出个道道。至少他的有几句话很对我的胃口。比如说“名”吧，他在一本书里这样说：

“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常常嘲笑对名望的追求，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平庸的表现；但是他们忘记了后人总是从某个时代的知名的而不是不知名的作家中进行选择的。也可能有些应当永垂不朽的巨著一出版就夭折了，可后人永远不会知道；另外，也可能后人把我们时代的畅销书统统屏弃了，但最终他们选择的范围还只能是这些畅销书。”

他说某些应当不朽的巨著“一出版”就夭折了，其实出版了已经很幸运了，看看我们生活中那些醉心于文学的人们吧，天晓得有多少名著没来得及出版或根本没门路出版，就胎死腹中了。再说那些嘲笑名望的人们，也未必就一定是“出类拔萃”者。有的自己出了名，就劝年轻人不要讲究名；自己捞到了好处，便劝别人不要捞那好处，仿佛他捞的不是好处只是一

堆灾难；还有的自己原本没有捞名望的资本，便大谈不图名的崇高与伟大。

过去一些善良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善良。饱受压制之苦的岁月莫过“文革”，那时候全民讲所谓的政治，“名利”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尽管我既无名又无利可言，却深受这两个字的折磨，被我那些善良的同事们判为“读了一肚子乱七八糟的书”的人，而且又干着编剧这一行，因此每当在什么总结会什么座谈会上，总有人在自我表白时声明自己不图名不图利。无论人家是不是指我，我觉得那就是说我的，至少他们的所指是将我作为陪衬者之一的，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强大的舆论攻势让人们不思进取，并以什么都不懂为荣，有的人甚至这样自夸：“我给我的儿女们什么都没留下，倒留下了清白，档案袋里就只几张表。”在对待受打击的人上，他们一点情面都不留，在自我表白时就已经包含了对你的糟蹋。嘴里说着不图名不图利，其实肚子里未必没有自省，那冠冕好听的词句之下，是力不从心的尴尬。

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名并非是十分恶不赦的东西。除了袁世凯、秦桧那样的人物外，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名就是奋斗者的荣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图的就是一个名。为了这个名，他什么磨难都受了，什么苦都吃了，什么冤枉都背了。爱名，你将会奋斗；爱名，你将会舍身奉献；爱名，你将会廉洁自律。人们如果能够爱惜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世界上定会减少很多的恶行。

不图名不图利，是默默奉献者的高尚情操；也是人们送给那些有能力图名图利却不图私利者的最高评价，其他人是无资格享受这一待遇的。自夸不图名不图利者，其真实性都值得怀

疑。

在某些时候某些人身上，不图名未必就是善行。那些干坏事的，就从没有把名看在眼里，他图的只是利益。成克杰式的人物声言不图名，掩盖着背后的贪婪；小偷声言不图名，因为他图的是夜间劫利；平庸者声言不图名，遮掩着对有为者的嫉恨；权威号召不图名，其实质就是对同行的压制。

中国自古就是崇尚清高的民族，但这清高被人崇尚时，就已经有假冒伪劣夹在中间捣鬼了。默默奉献者的节操，也可以用来作为谎言的雾障。最可恶的是自己无能却又自以为万能的“长者”们，凭着地位的优势指手画脚。“谦虚”是个好词儿，偏偏就有人当棒子打，常常冷不防地给奋斗着的年轻人一击。图名图利，也是作践年轻人的大帽子。这些把戏在当年使多少年轻人受害，今天也并未完全绝迹。

当然，图名并非只有一种解释，它同样可以是某些人获取利益的前奏。“沽名钓誉”里的“名”和“誉”，就属于来路不正。有的财主赚饱了钱，又嫌名气不够，就请人炮制传记或者借记者之手在报上露脸；有人为了名，不惜将别人的劳动果实窃为己有；好朋友共同创作的东西，一旦作品有了些名声，便为署名权打得头破血流；为了名，出卖良心的也大有人在，弄虚作假的就更多；以名整对头压制别人的也时有所闻。

还有一些搞写作的，一边在写一边发表却又口口声声说不图名，其实那只能骗自己。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人对当年人们把自己的著作安上“集体创作”耿耿于怀？古人有一则笑话倒可以说明问题。一个秀才去赶考，飞马奔驰，他报的科名是“不求闻达科”。

现在是真正各尽所能的年代，是勇士尽管大胆地站出来，

不必害怕谁在背后指指点点。真正的勇士不但能够战胜困难，而且更能将自己的抱负亮在天地之间。认识到动听词句下的谎言，有利于我们理直气壮地追求。

佛的庄重背后

到旅游地去观光游玩，大多是些名山古刹，里面的泥巴菩萨、铁金刚也都大同小异。看得多了，就要琢磨一些问题。坐在中间那个面如满月的人儿，面前的香火最多，而它前面和身边的凶神们小鬼们却无权享用。他为什么会如此风光？一次跟一个朋友一起玩，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间这个菩萨的眼睛老是半睁半闭，似笑非笑，又不说话，怎么人们就要向他顶礼膜拜呢？朋友说，如果他能开口说话，他的面前就没有这么多香火了。他的妙处就是不看人不说话。

回想几十年来的遭遇，看看眼前的神佛，多少事情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答案。首先说这不阴不阳不哭不笑的神态，就是琢磨透了人情才有的绝妙创造。读古书时，常常看见那些所谓高僧们给人一些偈语，比如“遇×而发，遇×而兴”之类，似是而非，只有等到事情过后才能明白内中潜藏的秘密。再不就是创造出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来，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以示那是个高人。其实那种玩意儿说了等于没说，天命不可违，天机不可泄，几句话半点作用也没起。但唯其如此，才能显出高僧之高。如果高僧说了大实话，那么他就不高了。

也就是说，那不阴不阳的神态原来是一个骗子的嘴脸。

人们算命为什么要找瞎子？就因为瞎子不知你何许人也。如果是明眼人，顾客的秘密就不会跟你说了。

这一套被许多聪明的俗人悟透，便在现实中应用。有一篇小说名叫《关于添置一把铁壶的报告》，明明一句话能够解决，偏偏要你打个报告，然后他在上面写上“同意”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这位作者的高妙之处就在于看透了官僚们的把戏。有的要你干一件事，尽管你跟他擦身而过他也不对你说，等你的班长来通知你。“文革”中闹过许多笑话，有个军代表被派到某科研单位，人们一直以为那个人很严肃很有威望，因为他不苟言笑，也很少说话。直到那人犯了错误，要他检讨时，人们才发现他结结巴巴，原来他不会说话。

神秘产生威望，这就是那佛给我的启示之一。

光有佛一个，树在那里也难以立威。于是便有陪衬。慈眉善眼者是不要的，必须外表凶悍。这叫黑脸让别人去唱，佛唱的是白脸。这一套也在现实中被人效仿。看那些枪战片，黑社会的头儿们无不是慈祥和蔼，到一个地方访问，亲亲孩子们的脸，吻吻女人们的手，好一派政治家的风度。但他的身后却跟着几个脸上铁板一块毫无表情的人物。

据说，这叫距离生美，反衬生威。

香火越盛的地方，神佛越多。或者反过来说，神佛越多，香火越盛。若只有一个陪衬，那是叫花子和他的娘，是没有声势的。陪衬越多，我佛越庄重，他面前的香火就越旺。英国一个人写的“帕金森定律”，只怕是从庙里得到的启示。俗人同样悟出了这些道理，到什么地方出巡，小车一大路，随从一大排，前呼后拥，浩浩荡荡，于是，主人便在这种阵势中得到了威。

这叫排场生威望。

你越想，得到的启示越多。佛教进入中国有了几千年，那佛的面孔是中国人根据中国国情自己创作出来的。它从没有跟

谁说过一句话，也没见他帮谁做过一件事，却让众生把钱往那儿扔。无论穷人富人，也无论贵人贱人，都对他顶礼膜拜。你日子好了，会感激他，你日子混得不如人，也不怨他；你活了赶紧去敬香，你死了很自觉地不要他负责。他的秘诀到底在哪里？你看他半闭着眼，给你个琢磨不透；似笑非笑，让你在希望与绝望中徘徊。

还是我那朋友说的对，其秘密就在于他什么都看了，却什么也没看见；仿佛什么都说了，却什么都没说。

琢磨其中的道理，原来让骗子得逞的，责任还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喜欢心直口快，骗子就以深沉的面目出现；因为我们相信难得见面的一定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感情很近，因而神佛的前头就塑了些丑八怪吓人，他们自己却躲在后面做好人；因为我们以为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他们就将自己藏在背后，以此哄骗众生。

同志与朋友

“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这曾是在电影舞台上出现过，让观众感动得下泪的一句话；也曾是让老革命想起战争年月，激动不已的一句话。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句话一出现，就惹起了台下或电视屏幕前的笑声。它变成了笑料，变成了过时的皇历，成了年轻人开胃的话题，却让许多老同志百感交集。

看现在，同志的称呼除了在文件上或是正规的会议上，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市场。取而代之的称呼是先生，或是朋友。

仅仅只是一个称呼的改变吗？不。称呼的变化，是我们生

活发生了变化之后的零散反映。想过去，曾经有个歇后语是这样说的：警察打老子，公事公办。然而这一套行不通了，这个歇后语也不存在了。因为公事公办成了不办的代名词，能够办事的是不通过公事渠道的。公事渠道的公事怎么办呢？皆是幕后做好了套子，到办公事的场合走走过场而已。

通过什么？朋友！

朋友，按现在的解释，理应是个志同道合者互相的称谓。而在古时候，“朋”字却是个让人避讳又令人厌恶的东西。“朋”字跟“党”字连在一起，就是历史上常常发生流血事件的“朋党”。几个人干坏事，叫做朋比为奸。古时只说交友，是不敢说跟谁为朋的。记得一篇故事，说的是唐朝时候的刘宴很聪明，玄宗皇帝让他当了正字官。有人打趣问他，你的字正完了没有？刘宴回答，只有一个字正不了：朋！这是暗示打趣者陷于朋党的意思。也许是党派成了合法的称谓之后，朋友也就沾光成了个好词儿。

朋友是好词还是坏词都无关紧要。问题是，现在的朋友正取代着什么东西，而更深层的问题所涉及的方面更多。

假如你有事要办去找某个管这方面事的人，有人告诉你，要你明天去办公室谈，这个兆头就是没指望了。而你在走门路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就会得到好心人指点，说某某跟那人是朋友，你交给他办就是。听起来仿佛不可思议，但怪得很，到办公室办不好的事情，往往就真的能够通过朋友办好了。

只要走进饭馆里去，就不难发现，大多是为宴请朋友或为了结交朋友而请客的；老板请老板的少而又少，大多是负责一方的领导干部跟生意人夹在一起，这里面的文章不言自明；在许多酒席宴上，“我们是朋友”的劝酒词不绝于耳，“大家都是

朋友”之类的话飞来撞去。“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都是要做真朋友的。交朋友的真正动机，其实就是要找过关的通行证，买活的是守关卡的人。

大家都是朋友，就能够无话不谈，无话不可谈，无事不能办。于是在酒桌上就出现了另一不可思议的现象：灰色幽默或荤笑话中，总把干部夹在故事里，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跟妓女同在一个故事里出现，对腐败分子而言自然并不冤枉。可是讲起腐败故事来大家打哈哈，甚至有党员糟蹋自己的党，就不能不令人遗憾。可是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党员说了一番话让人震惊，针对那些灰色的话和故事，他说：



市场经济不但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且

“我既然信了她，就不能使两情相悦的朋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面说好背后又说她的坏话。信神信鬼的也没有这样说鬼神呢！”

仿佛境界不高，可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话里的内容却很深刻。它说明现实是多么地不容乐观，也包含着自已无能扭转局势的痛苦心情，包含着对眼前事实的痛心疾首。对比那些人，他的一片忠心令人感佩。

不幸酒桌上难得遇见这样的人，政界的官员与生意圈的老板交朋友，朋友结成了小圈子。认识一位朋友，朋友再介绍出一串朋友，酒席宴上大家欢声笑语，尽欢而散，道别时还有打

发新朋友的礼品。但从来都没有听人说，我跟谁谁是同志。“同志”，似乎成了志不同道也不同的称呼。

看看我们身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司机违章，警察要罚时，马上就去找朋友。有人犯法，亲属第一个反应是到公安局找熟人。要打官司了，也要想办法去拜见一下法官。如果遇到朋友说他认得某法官，那就大喜过望。不用说，那是要花钱的。在掌管公家某一道关卡的那里有人，要弄到货或是请求网开一面，就打听此人有什么爱好和家里还有什么成员。即使那人不是朋友圈的，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马上建立起朋友关系。

这一切门路都走通了（事实上走不通的不多），就说明有人出卖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背理的一方假如打赢了官司，足以说明有人出卖了被害人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靠什么出卖？谎言！

尽管生活的挫折告诉我们，最不可靠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朋友”，被朋友出卖，被朋友坑了，到处都听见这样的控诉，却没有听谁说被同志坑了被同志出卖了，足见公对公仍有其严肃性。但，人们还是在不断地交朋友，却没有人带头恢复起同志的关系。因为大路走不通，不能不从后门进出。贪官污吏和官僚们造成的影响实在是不可低估。

那么“同志”为什么贬值了？这个问题从贪官污吏那里找到答案。如果公事真的能够公办，如果背后没有那么多“朋友”作祟，使老百姓有个依靠，就会真的感到还是同志好。不幸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和官僚们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却又出卖人民的利益，才使同志的称呼不值钱了。

但那些人还在装模作样地继续称同志，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喊得亲切，一本正经地称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但今天的人们

不是那么好哄，恰好能从这言不由衷的称呼中，看出他们正以假相和谎言欺骗老百姓，欺骗他的组织。

去掉一个最高分

下面这个故事，是尊敬的权威们共同制造的一个谎言。

这个院子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年年有人从中级升到高级，又有人从副高升为正高。升了正高再评专家，当了专家便有了资格给升副高的人当评委。这年又有两个正要迈进中年的知识分子升副高了。党委书记充分民主，说知识分子的事知识分子自己办，让那些权威们当评委。不好说是谁，且将他们按百家姓的次序排列。

赵教授是老资格，评委们当初走向高职称，都有他的一份功劳，能够高职称当上评委更是他极力推荐，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由他当召集人理所当然。为了不让人们打搅或是暗中窥探，他用心良苦，选了个谁都料不到的地方开会，其他评委被引到了目的地，才知道赵教授不愧为教授中的召集人。那是门房王老头的家，家里只有老王的老伴一个人，而那老太婆不认识字，不久前才从乡下来，除了帮大家烧开水搞服务外，自然也就不可能干扰评委的工作了。几位教授端了茶杯进到那间房里，赵教授问有谁看见没有，都说没有看见，是偷偷来的。这地方真是秘密得不能再秘密。

赵教授首先发言了：“书记跟我讲了，评职称，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是个严肃的工作，因此要求我们一定不能马虎。我们肩负的担子是很重的。根据今年上报的申请，经过筛选，只剩下两名：张三和李四。但是名额只有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动些脑筋，评得公平合理。业务水平是个重要考核标

准，但也要看一个同志一贯的作风，特别是政治思想。大家说吧，就只这半天时间。”

钱教授发言：“根据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张三表现是不错的。他的论文去年发表了四篇，其中有一篇在美国杂志上登了，另一篇在南方那次大会上宣读获得了好评。他的发明在乡办企业用上了，最近听说，经济效益前景看好。这个同志每天都埋头研究，据人们反映，差不多每天都搞得很晚。李四同志也不错，但是相比起来，社会活动似乎太多了一些。”

孙教授也补充，说张三的确不错，这几年冲得很快，既有理论的成果也有实用的成果。尤其在让科技成果转换成生产力这方面，在本单位填补了一个空白。

李教授也说，他也觉得张三不错。

意见差不多一边倒，这个名额定属张三无疑。然而事情总是会有预料不到的变化。糟就糟在时间还早，才三言两语就这么定了？那似乎太草率。赵教授启发说，时间还长，可以多思考一下，各方面都想想，党委书记要书面材料，请大家务必说得有条理，好记录。一时间，大家没有话说，该说的都说了，要再发言就必须再“想想”。赵教授握着笔提示道：

“我们提了一个同志的优点，也应该提提希望，这也是我们对同志负责的表现。比如张三同志，对比李四同志来，成绩当然大些。但是李四同志的过分处，或许正是他的不足处。比如社会活动，比如政治学习等方面。你们说是不是？”

钱教授点头说：“我也有同感。张三这个同志埋头业务，自然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比方说吧，李四同志对老同志的尊重就要比张三同志好一些。那次送煤气的来了，李四正要去实验室，看见我一个人，就放下东西，帮我扛到了四楼，水都没喝一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人家帮助扛了煤气坛子就是好的。我的意思是说，人都生活在集体当中，不可能生活在真空。张三同志就差了。那次听报告，他就没去。我们都叫了他，他也答应了，可是会散了他还在桌子上写，见了我们他才摸东不知西地说正准备去。这当然不行嘛。”

孙教授也补充：“要说这方面，张三同志是要差一些。我们原定每星期集中学习两天，他愤愤地反对，说那是浪费时间。我说了一句，说你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前，就可以给你定个政治问题了。你看他怎么说？‘现在不是以前了！’的确不是以前了。但是方向路线不是都否定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为谁而钻研的问题，仍然是年轻人需要正确对待的。”

“有人说他在那个乡镇企业拿了回扣。”

“听说他最近家里有好几个女青年进出。”

“他买了一台微机，听说要花万把块，他哪来的那么多钱？”

.....

只要用心去“想想”，一个人的问题和优点都是能想出来的。于是情况急转直下，张三同志的优点不多一会儿前还是优点，现在就成了问题了。

“那么李四同志呢？大家都说说。”赵教授再提示。

“李四同志虽说成果不明显，但是他肯学习，对人也很友善。每次看见我们，老远就一脸笑，每次都叫某老师，谦虚得很。对同志间的困难，他也乐于相助，老赵你的孙子上不了幼儿园，不是他帮忙跑的吗？”

赵教授含笑点点头，说：“正是有了这一点，使我不好发言了。因为我得避嫌。但是平心而论，李四同志的发展要全面得多。首先他乐意助人。我们在座的，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其

次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每次听报告他都认真做了笔记。尤其那次舍己救人报告团，他都感动得下了泪；其三是他把大家的事当自己的事办。比如上次锅炉房下煤，没人叫他，他就去了。平时办公室打开水，扫地，什么都干。我的意见倾向于李四同志。”

这么七扯八扯，时间快到了，钱教授还要去食堂买菜，老伴交代的；孙教授午睡不够下午血压就要升高；李教授的孙子没爷爷喂就不肯吃，孩子的营养问题是个大问题。

“你们看怎么样？”

都说，那就李四同志吧。至于张三同志呢？大家发言说，建议领导对他多帮助，该同志本质还是好的。形成了决议，就散会了。不明内中原因的王老头的老伴感动得下了泪，让大家莫名其妙。赵教授问她为什么哭，她说：

“你们的会议我晓得，过去搞专案的常在我们家开这种会。你们到底是读书人，别看不是搞政治的，觉悟比那些搞政治的人还高些。我一听到你们说要帮助，本质是好的，我就晓得你们与人为善，我原以为那个姓张的会坐牢去的……”

这话如果认真听，教授们就应该听出问题来。但时间没有了，各自都记挂着各自的任务，在那个老太婆说话间就都离开了。但要说时间太紧也不确切。就在那个对大家都十分重要的中午，李四分别接到四个电话，都是告诉他好消息的。

对别人可有可无的半天时间，另一个人的命运却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本不属于他的一环。王老头的老伴以为她看见了最为善良的一幕，便将这个上午发生的事向她认得的所有人宣传，于是评委们的优劣便在这个大院里被人们评判着。

拆台一招

“对一个自己用不着担心的对手大加赞扬，往往是拆自己真正对手的台的一个好办法。”

这是英国作家毛姆说的。这句话有些拗口，得用心琢磨，因为我们身边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物，弄懂它绝对有好处。我想，假如毛先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没有吃过这些人的亏，是不可能有这么深的感受的。见到这句话，许多感觉得到却没有认识到的事情，许多现实中难以解答的现象，都顿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对一个自己用不着担心的对手大加赞扬”，这里所指“担心”的内涵是什么？是对手超过自己的危险，是自己半瓶子醋露馅的可能性。判明这个跟自己同行的对手没有竞争力，不可能超过自己了，对他“用不着担心”了然后对他大加赞扬，其目的是为了“拆自己真正对手的台”。如果身边没有潜伏有“真正的对手”，这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是不可能获得他的赞扬的。那么谁是“自己真正的对手”呢？是快赶上自己的，或已经超过自己的。赞扬这个等于给那个一嘴巴。

但这目的是不能说的，所有的实质含义，就都凝聚在对“用不着担心的对手”的“大加赞扬”上。

这种赞扬是对冒牌者的吹捧，夸这个等于打那个，那言过其实的语言，也是对“真正对手”的贬斥。这也是典型的谎言，是各个有人群的地方久演不衰的喜剧。这种人在对并无多少实力竞争的人大加赞扬时，打的牌子绝对是冠冕堂皇的。如何识别其内心的谎言？得从两方面去看。

其一，赞扬的对象是否真如赞扬者所表达的那么高深？如

果名不符实，那么赞扬者的用意就值得怀疑。那目的绝不仅是对其人“美言几句”而已。其二，看看赞扬者本身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赞扬别人”的资格是个高级别待遇，一般人是无权赞扬谁的。他在赞扬别人时，抢占的是个制高点，表示自己已经很高。但这种人物使出这一招的时候，其实对自己就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而这种人物倒有一些颇为吓人的头衔，或虚假的地位。拉起架子吓人是他们唯一可用的手段。

这么一想，就明白了那么多笔墨官司的真正用意，也明白了一些严厉的评论家们为什么喜欢“扶持新秀”，还明白为什么一些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学生，还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不称领导为某长而偏要称某老师……许多现象，似乎都可以从这句话里延伸开去并找到最玄妙的东西。

对照这句话想现实生活，有些现象也颇耐人寻味。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西游记》中有两个孙悟空，然后再加一个猪八戒，三个人中要选一个出来当组长，会选上谁？不用说，猪八戒将会得到满票。选举除了投票还得说几句话，这时候的猪八戒将不再是那个贪嘴好色爱打小报告的悟能了，他的一切优点都将被两个猴子发掘出来，或者过去的问题现在干脆都成了优点。两个孙悟空在对老猪百般恭维时，却正是对另一个孙悟空的糟蹋。一个正在拆另一个的台。

看看某些能干的领导和总裁之类的人物，他们总是喜欢用一些庸人，其中有许多干脆就是小人佞人。于是善良的人们认为，是那些小人哄住了总裁，迷住了总裁的眼。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再看看毛姆的这句话，就明白并非全是如此。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当年，许多单位的什么代表什么委员就是这么产生的。那些被抬出来的年轻人多半是没有竞争力的，拥有的资本最多是人缘儿不错。那时候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就是对

这种现象的调侃。

这类现象在文化科技单位有没有？事实是不但有，而且不少。这在那些靠资格熬到某一级别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明明单位有一批人成果颇大，明目张胆地攻击或是制造桃色新闻不免太拙劣，拿不出成果却又很聪明的一些人们，便拖出一个别人



吹捧这个的真正意图，可能与另一个有关。

不知道的人物来大加赞颂，说他或她是如何地了不得，是新涌现出来的新秀。如果这么干的掌握着一些权力，更是名正言顺，拆对手的台的一招不易被发现；赞颂“用不着担心的对手”的另一心机，是掩盖自己的力不从心，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好名声：“扶持新秀”或是“热心帮助××爱好者”。更有恶劣者借助权力，提拔一个没有多大来头的跟对手平起平坐，让他们去对打，不整死你也气你个不死不活。总之，其中的名堂还多。

唐朝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玩的就是这套把戏。他在权倾朝野时，对于后进的年轻人总是悉心扶持，获得了不少人的赞誉。但见有人将要跟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使出了杀手锏。这个杀手锏不是别的，就是拖出另一个“新秀”大加赞扬褒奖，

给对他产生威胁的人物一个冷板凳。不过，李林甫的聪明最终被人看出了破绽。这倒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偷天卖日头的勾当也瞒不过人的眼。

可笑的是，一些新秀当面朝拜恩师，过后便将恩师的作为当笑话讲。还有些新秀并不满足于芸芸，表面尊着恩师，暗地里却走着自己的路。这倒说明天理昭昭，那些人在欺瞒别人之前，就先哄骗了自己。

赞扬之中有谎言，这是我要说的话。

强盗宰相计

执法公正而又有眼力洞察秋毫者，莫过于包青天了。然而有谁知道，就连他老人家也会有上当的时候？故事载在冯梦龙所著的《智囊》里（其他书中也出现过），说是包公在管理京城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应该挨棍打。那个人就对在包公手下办事的行贿，给了许多钱。那个小吏收了好处，就在上堂之前对犯法者说：

“你等会儿上堂受刑，老爷必然交给我执行。你呐，就大声跟我辩解，声音越大越好，我帮你分担就是。”

果如他所料，上堂之后，包公命令拖下去打。犯人便如小吏所教，大声辩解，呼号不止。那小吏也大声喊道：

“赶快挨了打滚出去，不准说了！”

包公看出了问题，为什么犯人要喊叫？为什么小吏急不可耐地要打人家？为什么这小子要禁止人家说话？包老爷以为小吏跟那个人有什么纠葛，命令将小吏按到堂下，打了他七十棍，却从宽处理了那个犯罪的人。包公为了抑制小吏的威势，对手下人管得很严，他怎么都想不到人家会利用他的“严”字

做文章。小吏倒是吃透了老爷的精神，懂得了老爷的为人，便来了这么一手。故事说到这里，冯梦龙加了一句话：

包铁面尚尔，况他人乎？

在我们老家农村有这么一句话：强盗有宰相之计。的确，干坏事的人并不是不聪明，有时甚至比一般人更聪明，比如这个欺骗包老爷的小吏。

假如包老爷跟这个小吏比着干，包老爷未必比得过他。包大人是光明磊落的人，他干的都是直来直去的事情，如果他老人家成天也专门揣摸别人的心思，那他就不是包老爷了。而那个小吏却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揣摸包大人的心性，你有什么政策，他就有什么对策。再说他在包大人手下干的时间长，什么场合都见过，所以他使起计来一使一个准。即使今天，多少人莫名其妙地栽了跟斗，其实就栽在那些表面谦恭的小吏身上。

如果谁说自己是一片公心就以为对得起天地，谁说自己无私就可以无畏，那么看看包老爷上当的例子。那些才走向领导岗位的人们，实在有必要提高警惕。

在《客窗闲话》里读到了一则故事：

某乙找某甲借钱，因某乙是某甲的中表亲戚，某甲常常接济。但某乙不自觉，无休止地打搅，弄得某甲很恼火。一年隆冬，此人再去借钱，某甲嫌某乙不务正业，就不借给他，并将他赶出了门。某乙在外大骂，骂不解气，索性弄了根绳子吊死在某甲门口。某甲没听见骂声，开门看人走了没有，见某乙死在他的门口，吓着了。因为他是个富户，邻里间少不得有矛盾，怕人借题发挥害他。听说一个讼师很厉害，只好连夜去找这个人物。

那时这个讼师正在跟人玩一种“叶子戏”，某甲将讼师拉出来，如此这般一讲，讼师首先就问他有没有钱，因为他赌输

了。那人为了自保，连忙拿出钱来了。讼师接了钱，说，你回去把死人解下来，不要让别人知道。说完他就继续去赌。某甲按讼师说的，回家把死人解下来放在地下，然后跑去找讼师。讼师不急，让他在一旁观战。某甲心里有事，哪里看得进去？一再请讼师帮他想办法。他说，天快要亮了，死人还放在门口，怎么办呢？讼师说，你回去，再把他吊起来。某甲说，这不是害我吗？讼师发怒说，你要保没事，就听我的。挂起来后你就睡大觉，什么人喊都不要开门。某甲自己毫无办法，不得不听讼师的，回去果真将死人再吊起来。

天亮了，吊死一个人很容易被发现，有人见了死人喊叫某甲喊不应，果然就串起许多人跑到衙门告状，说某甲逼死了某人。县官一听，不能不去现场勘察。他让人放下死者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回去就将那些告状的每人打一通板子，然后说：

“死者脖子上是两道印迹，一深一浅，这就说明，家门口是第二现场。这人是在别处死的，你们为了害人家，故意弄到他的家门口。”

那些人挨了打，怕有更进一步的祸事，只好自认倒霉。毕竟逼死人之说没有证据。县官也很得意，因为他凭他的知识澄清了一个冤案。殊不知，他在自我陶醉之时，却有人正暗地里笑呢。

这个讼师一边玩牌一边轻描淡写地就处置了一件棘手的麻烦事，并将县官耍弄于股掌之间，可见不是一朝一夕学成的本事，也不只见过一件两件冤案。他见得太多了，积累起了怎么玩人的经验，再怎么厉害的官员，有这样的人物为伴，当个清官谈何容易！

另有一则故事也是讲讼师的。有一个老头儿告状，说他的儿子不孝，把他的牙齿都打掉了，老头儿嘴里流着血，手里还

有几颗掉了的牙齿。县官一听大怒，命令把那个逆子传来。那个年轻人来了，捂着耳朵。原来他的耳朵掉了，伤还没好。他对县太爷说，他爹对儿子太残酷，把他的耳朵扯掉了，而老爹的牙齿是他自己磕碰了的。边说边哀哀地哭泣着。县官一听，也是，耳朵不是自己扯得下来的。老人牙松，一磕就掉也在情理之中。老头儿再来告状时，县官便将他轰了出去。原来封建社会对不孝治罪很严，那个逆子怕受重罚，请讼师想办法，那只耳朵是讼师咬的，说不这样就难免大难。

这几个讼棍玩法律如儿戏，可恶之极自不待言。我倒是想那些清官，心术不能说不正，知识不能说没有，怎么就上了刁当呢？后来又在《子不语》中看见了另一则故事，似乎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有个王监生跟佃户之妻私通，嫌佃户碍眼，给了一笔钱让佃户去远处做生意，一去几年没有音讯。有一天有个人发现一个井里有个人，而附近又没有旁人失踪，人们恨王监生，就到衙门将他告下，说他害死了佃户。县官平素自傲，自诩为老包。他进行了一番调查，抓来王监生和那个女人一顿大刑，两个人都熬不过严刑，便认了杀人。按照法律，两个人都被杀了。县民感谢，有好事者将这事编成戏上演，称县官为真龙图。正演得欢，那个佃户回来了，看了戏才得知老婆冤死了，于是上告省城。那位“青天大老爷”抵了人命，而唱戏的却又编了另几句歌：“瞎说奸夫害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气粗。”

再说证据，证据保险吗？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今天的律师不同于旧时的讼师，他们应该是法律的捍卫者，有两句话是我们都听熟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某些具体人物的具体做法却似曾相识，那是古时讼

师的一套把戏。比如最近听一些律师说他们的“业务很好”，就使人有些皮肉发紧。

维护法律跟做生意办企业八杆子打不着，怎么冒出来一句“业务很好”呢？他们拿法律作为做生意的本钱，这对盼望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受害老百姓来说，只怕不是个好消息。也就是说，这里头的空子颇大，是可以让人当“业务”做的。须知，受害人往往是那些没有防人之心而又不太懂法的善良人，而害人者在下手之前，早就作好了准备，反倒证据充足，反倒学透了法律上的某些条款。如果法官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当庭片面强调证据，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有一则古时故事很说明问题。

有个人对邻居女人垂涎已久，早就打主意了。一日那女人去菜园，被他看见，便趁机跑去点便宜。先是调戏，调戏不成便施暴。那女人生长农家，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她极力反抗，在地上用脚蹬开了施暴者。那人朝后倒时后脑袋撞在一个石头上，碰了个头破血流。事情过了也就算了，偏偏那个男人的家人要问这是怎么了，后脑上破了，决不是自己跌的。一家人都把矛头对准了隔壁的那个女人。不知这男人恨上了女人，还是碍着家人不好交代，便找着一个讼棍，告上了那个女人，说自己蹲在菜园，这女人因为两家多次为菜园扯皮而恨他，搬起石头要砸死他，因此后脑袋就被砸破了。县官传来女人，女人因为害羞，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好不容易才说出了此人的行为。但她的表现却让人看出了许多疑点。县官问女人：“你说他想强奸你，有何证据？”女人说没有。再问“有没有人证”，回答也是没有。县官再问男人，你说她想砸死你，有什么证据？那人在讼师指示下早就搬来了石头，那石头上有血。现场勘查，两家菜园紧挨着，石头在两家地界，男人请的讼师会很

描述，将当时场景描绘得天衣无缝。女人却说不出来。按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县官判了那女人有罪。

在这里，“依据”倒是有，“事实”却被歪曲了。原来法律条文上所谓“以事实为依据”里的事实，只不过是“证据”证实了的“事实”，并不等于真实的事实。“证据确凿”或“缺乏证据”，只不过把证据作为情况是否属实的辅佐材料。在这个案子中，石头作为证据证明了那女人谋害人命的“事实”，真实的事实却被这证据给掩盖了。至于判那女人多重的刑，相信县官老爷是翻了有关条款的，不会偏离太远。只不过，一个受欺者实实在在蒙受了不白之冤。

古时才对那些青天大老爷送去几个字的概括，一句叫做“明察秋毫”，一句叫做“明镜高悬”。“秋毫”意在说明，证据是很隐蔽的，不是那么好掌握；“明镜”是要求法官心里要亮堂。有老百姓说，最怕的是两点：一是律师变讼棍；二是法官变裁判。“明察秋毫”与“明镜高悬”两句话，该由谁负责？

人说无私就可以无畏，由此看来，那还得看你是什么职务什么身分，再加还有什么场合。一个老百姓当然可以这么说，面对揭露坏人受到威胁时可以这么说，但如果你是个判案的，什么都不怕未必就是件好事。怕搞错了，怕上当了，这时候，怕可能比不怕要好。

理论骗子

公鸡为什么喜欢大叫，而且总是跑到高处叫？原来他的优势是不生蛋；不生蛋的优势是不必为自己的产品质量担忧，并且有为母鸡蛋打分的资格。

先来点幽默吧。有两个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请一位德

高望重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先生评理。这位先生听了双方叙述，作如是说：



不谈具体事，可以显示学问高深。

比如内陆省份与沿海人的心态，西部人与东部人的个性，就有根本的区别……”

抛开具体事情看这位先生，无疑是有学问的，如果没有学问，何以将一个小小的打架事件上升到如此高度？何以能够讲出如此高深的理论来？然而对打架的双方而言，这套理论等于放屁。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认真看看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人倒还真不少。他们靠大言蛊惑人心，那一套不着边际的玄谈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他们从不谈具体事情，对任何事物既无解决的办法，又不可能拿出一个好的主意，只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以不着边际来掩盖心底的力不从心。但在那些不懂事的年轻人

“关于双方诉诸武力解决争执问题的，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现实现象。它有其历史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的根源。历史上这类事情就曾经发生，其中春秋战国时候最为激烈。现实的根源，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地域也有很直接的关系。

看来，这种人物总是那么超然物外，总是具有理论的高度。你只有到吃过许多苦头之后，才能看清他的真实面孔，如那两个打架者。

这类人在每个领域都有。且看一些具体例子：

他们身居一定位置，尤其身为一方长官时，不理政事，却喜欢玄谈，不愿也不会解决老百姓的具体困难，却喜欢搬弄大而无当的理论吓人，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无所作为。但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他在那个位置上对他而言是场误会，怎么办？于是就跳开具体的俗事谈天说地，以掩饰才气的不够。“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也是自我掩饰的办法之一。

这种人物还有一招，那就是其两栖性。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鬼看他是人，一身正气；人看他是鬼，颇有威慑力量。比如对文化人讲政务，对行政人员讲学问，两头不照面，既让文化人看出了从政的不易，又让那些行政人员看见了学问的高深。于是在一度时间，该同志的威望呈直线上升，盼望有个好领导的人们到处谈论，这个领导同志是如何地了不起。

这真好有一比，好比跟道人讲释迦牟尼，又对和尚讲老子庄子一样，两边一看，他都是内行，既懂佛又懂道，可以称为双方的祖师爷。在另一些场合，他可以利用自己发言的位置突然提出一个什么题目，别人不知所云，唯有听他讲。他讲的都是他所了解的东西，很可能是刚才从某本书上得到的一鳞半爪的杂碎。自然，面对目瞪口呆的听众，他无论如何也成了一个内行。

但这种人物也有一惧，那就是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都不能持久。时间长了，反复讲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发现，那西洋景其实没有什么内容。而且为官一任，总得要有那么一两件政绩让老百姓看着舒服，光凭嘴巴是不能让群众满意的。随着干

部队伍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种人物终于会露出马脚来的。

在理论和业务战线，同样有这样一些人物。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吧。

上面说过，早在政治运动不断的那年月，有些人就曾经以其两栖性，而游离于夹缝之中。在搞政治运动整知识分子时，他们就成了领导干部，在批判权威和“反动分子”上比那些外行更具杀伤力；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专家学者，领学者工资，挂靠学者级别，得学者实惠。如果只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那样做，也还情有可原。然而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自保的同时却伤害了他人，而且并非被逼。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些人生活在两只船之间。他们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业

务专家，两边讨好，却又两边都不负责任。在对待行政事务时，以专业性而不承担责任，但在行政人员要挂上什么级别时却又声明自己原本就是行政级别。

原来专家也有极其丑恶的一面。

在业务上，他们下不得功夫面壁，却醉心于社会各方面的交际，坐



树立权威的秘诀是不停地否定，
而永远没有正面的意见。

主席台每请必到，在讲坛之外搞“述而不作”，“诲人不倦”，以似是而非的东西哄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一些什么讨论会上，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权威架势，自己提不出什么理论，光靠否定别人来立名立威。你说吃饭很重要，他说这种说法不全面，人活在世上怎么能够光考虑吃饭呢，人总是要有所追求有所创造。你如果说干事业最重要，他还是说不。吃饭是第一等大事，如果肚子问题都没有解决，一切所谓的创造都无从谈起。总之，他们绝不在开始时发言，总是挪在最后，因为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听到别人的主张和见解，他来否定一番或是肯定一番，以表示其不凡。

这种人物其实跟江湖骗子没有两样。

久闻大名

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只要你留意，就可以找出它的规律。比如前面所说的，贴在电线杆子上的广告，凡是打着“祖传秘方”牌子的，你大可不必信它，因为它果真是祖传秘方功效奇特的话，便用不着这么自吹自擂。

于是便可一句话总结：凡是将名衔当招牌打的，凡是把理应自然显示的效果用嘴巴说出来的，其实际本事和实际效果大多值得怀疑。例如我们常看见电视里播放的什么晚会上，主持人在介绍某位人物时，只要说他是“著名”的某某，这个人一般而言是等着晚会以后才去“著名”的。而真正著名的人物一上场呢，主持人不会说他是“著名的”某某，或许会这样说：“你们看，这是谁？”

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

这是几年前的事。本单位一级作家一大排，其他单位朋友

间“一级”也不少，一级记者、一级演员、一级编剧等等，许多人在发表文章时，名讳之前不忘加上几个大字：国家一级。一次到某个地方，人家请我们吃饭，我们这支队伍领头的要让人明白这不是一般的队伍，便在拿筷子前向主人介绍我们这些名人。介绍者先介绍张三：“这位是张三同志，一级作家。”接着介绍李四，“这位，李四同志，一级记者。”然后轮到了我，“这位是映泉同志，著名作家。”“著名”的摆在了“一级”之后，等于宣布：这家伙不是一级。宴席开始了，主人们挨着敬酒，轮到我名下，主人说了许多恭维话，“久闻大名”自然是随便拖的。我也装糊涂，承认人家久闻我的大名，但我心知肚明，我的大名人家今天才第一次“闻”，还不知“闻”清楚没有。

道理是懂的，表面也无所谓，但肚子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凭什么你们是一级而我才是个“著名”？之后回家乡，便对家乡的朋友们谈感受，言辞愤愤，颇为这个“著名”耿耿于怀。本县无人不知本作家何许人也，该是走一路风光一路的。一种自得，一种安慰，在家乡才能满足。

不幸那安慰和自得才冒头，便又挨了当头一棒。

我得了感冒，到一个镇卫生院去看病，陪着我的自然是我的朋友。朋友为我开道，医生听说我是著名人物，就没有按程序来，先开了药，然后才让我去门口缴费。他的那张处方上没写我的名字，只划了一个“张”字。镇卫生院，没有大医院正规，挂号收费取药在一个窗口。陪我的朋友跟里面那位小姐很熟悉，就跟她聊了起来。小姐先拿药给我，我还要发票，她提起笔，看了一下处方，问：

“你叫什么名字？”

朋友很吃惊：“嗨，这么著名的作家你都不知道？×××

你看过吗？还有××××，都得过奖的，还有……”见那位小姐一脸茫然，朋友忍不住了，干脆点穿，“你真是，我们本县这么知名的大作家，你都不知道？”

那姑娘脸一红，显然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哦，我简直都敢不相信是您呢。晓得晓得。您是张……”

我接着说：“映泉。”

“就是嘛，怎么会不晓得呢？久闻大名呢。”小姐说着，就将我的名字写上了发票，嘴里还在说“久闻大名”。

回到单位，那张发票却报不了，因为不是我的名字。当时因朋友热心介绍弄得我不好意思，接过发票不及细看就往衣袋里一塞，这时才看清，那位久闻我大名的小姐写的是“张运权”。接着我猛想起了那位医生，他在处方上只写了个“张”字，绝对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位“著名”的作家是哪路神仙。这时我才明白，那个“著名”并不冤枉。

几经碰撞才明白了一个大道理：既是著名，何须介绍？既需介绍，何由著名？“著名”二字从介绍人嘴里出来，那就定然是个谎言。现在我总算熬成了“一级”，一级又如何？到了一个地方，只怕还得由人反复介绍人家才知道你的著名，说明这个一级也不过是难以免俗的虚荣和捞现实利益的砝码。于是我忆起了清朝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的另一则故事。一个秀才老以为自己了不起，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一心要考个官。一次考毕，站在门口等好消息。果然报录的来了，说他考取了，看热闹的都拥进他的家里向他祝贺。他大大咧咧进屋去命令妻子为他着靴，得意地问：“何如？”不幸话没落音，报录的说搞错了，考取的是隔壁沈家。祝贺的人一窝蜂都跑出去了，一只靴还没有穿上。他的妻子反问他一句：“如何？”

简单的“何如”与“如何”，简直是残酷的幽默。然而生

活往往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可笑。现在“一级”满天飞，只不过，一级演员不知他的拿手好戏是什么，一级作家不知写过哪些作品，一级记者最显眼的是他一把胡子，连舞台上插科打诨的都成了大师级……总之，一级人物比一级产品多。这种现象说穿了其实不值钱。一个单位就只那么几个人，而评职称是年年都要搞的，只要你在那把位子上不犯错误，等那么几年，那个“一级”总会轮到你的名下。

看看长年在地、市、县级工作的朋友们，只因为是在“下面”，成就再大，也难以达到一定级别。

因此我想告诉人们，高级别只能证明他在某个单位和领域有些年头，至于实际本事，你还得先冷眼看他怎么整。不然，那些介绍出来的“著名”皆可以称之为骗人的道具。

大家关心你

过去在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人得病住院，单位的人们都要花一笔钱去医院探望。这种关心原本应该令人感动，然而我在经过了几场病灾过后，就发现了里头的文章。原来那关心并不是冲你来的，至少不全因为是你的恩德所积而得到的回报。

某次腿有毛病住医院，碰巧遇见了教育战线的另一位。那时教育与文化在一个局，叫文教局，因此我跟他算是同一战线的病号。我是小字辈，他是老字辈，我住在病房这一头，他住在那一头，没事时他就到我的房里来，两个人东拉西扯闲聊。但过不几天，我就发现了他跟我的级差。

一日，他正在我病室里坐，有人来叫，说是局长来看他了，已经到了他的房间。他走了，我却好气。局长是他的也是

我的，他住院我也住院，为什么局长探望他而不探望我？那时我很明显地感到了自己的分量之轻。从那一刻起，我好半天打不起精神。过了一会儿，局长走了，我听那位病友在走廊跟局长告别，听声音一行人不少。送走局长他再到了我的房间，我照样跟他说着话，情绪却大不如前。

下午，我拄着双拐到外头打转，碰见了一些管教育的和搞教育的人，他们大包小包，向我打听那位老兄的住处。我告诉了他们，情绪越来越差。一下午他没有到我的房里，因为来探视他的人不少。我去拜望他，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好多人，不便进去，转身走了。

晚上，他到我的房里，拿来了水果和罐头，说是给我的。我知道我的脸上向来藏不住秘密，就半开玩笑地说：“人比人，气死人。”他却打了个哈哈，笑得颇开心。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病人只不过是一件道具。”

对他的“道具说”那时我还没懂，于是他在这句话之外，还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以说明这么多人的探视并不完全是对他的关心。他的例子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我一想，的确。这位仁兄白天在医院呆着，晚上就回家睡觉，并非十分沉重的大病急病，何以在一个食堂吃饭的同事们不到他的家里去呢？显然，这个探视中夹杂着很复杂的各种因素。那些经验之谈给了我启迪，相信对大家也有好处。只要我们不以狭隘的心理对待，做到心里明了还是有帮助的。

不能否认亲朋好友的真诚，也不能否认来看你的都是假心假意。但也不用回避，养小病让人兴师动众的行为，并非完全真诚的关心。

设想一下，真正的亲朋好友们，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以实在的帮助，而不在于形式和地点。相信你也有这种体验：尽管你有病天天到医院去打针去接受医生查房，但并不妨碍晚上回家睡觉。同事们早晚都能见面，但等你白天去了医院，刚才还跟你打过招呼的同事们，居然将看望病人的礼物送到医院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果单位很大，仅仅你那个科室几个人来看看也就罢了。偏偏一个单位的人不多，因此一个人生病住院，就牵动了全部人马。第一拨来过之后，接下去，更热闹的探视跟着来了。张三来过，李四如果不来，将会被人家说闲话。李四来过，那么王五也必然会来。

我们每个人大概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人住医院，同事们碰面就要打听，××住院你去了没有？如果说去了，就再问你提的什么礼物。前面一个探视者的礼物，将是后去者的参照。张三提的是价值一百元的水果，那么第二个人拿的就是比张三高的东西，至少不会比张三更少。但也不会太多，太离谱了就会对人家张三不利。因为第二天说不定还要交流体会，如果自己送的东西太少，对不起的就不是病人而是同事们的嘴巴。当然，病人自己也会从那里面看出礼轻礼重来的。

许多人害了病，因为这种探视的繁琐难得应酬而不敢告诉别人，宁可自己悄悄地治病而不愿让同事们知道。这样的情况还算好的，还有更绝的故事。

几年前曾读过这样一篇小说：有一位女士得了不治之症要死了，她对家人留下的遗愿，是希望人们不要向遗体告别，不要开什么追悼会。因为经过了一场大病之后，昔日的容貌已不复存在，她希望能在同事们的心目中保持过去的形象。这个愿望实在不高，既不伤财又不劳民，理应得到大家的同情和理解。不幸死者的遗愿没有办法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尊重。本单

位的人不幸死了，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怎么可以！这时候，对死者的同情和尊重都成了假话，大家都怀着悲痛的心情前去践踏死者，她最后一点可怜的要求也被善良的同事们丢到了脑后。

看看，人们在这时候表现出来的，是真正把对象当道具的做法。假如真的按死者愿望，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那将会怎样？将会被人说三道四，将会被不明真相的人们误解。宁可得罪死者，也不愿背后留骂名，何况负着一个单位责任的人还将得到人们的拥护，这件小事足以说明你不懂得人情世故。对死者的态度是做给活人看的，因此那戏还得唱。死者是个明白人，她知道那悲痛场面的背后隐藏着人们最为自私的欲望，或做给活着的人看以获取名声，或去看看西洋景，看一个貌若天仙的人死后到底是什么模样。事实也的确如此，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过后有几个还继续悲痛着？大多讲的是死人可怖或可悲的形象。

我们当然用不着因为看得太清就苛求于人，但如果自己不认识这一点，就会把表面的人情看得过重，把虚假的现象当真实，因此便随着人情的厚薄忽喜忽悲。每件事情在你的面前出现，先弄清这件事到底是对你有利还是对别人有利。不可责难别人，但不能不认清现象背后的真情。

一生经过了多少谎言 (后记)

大家都说他那一代人最不划算，其实认真想想，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这一代才划算。即如我吧，回忆五十多年来，真是不堪回首。别的方面不说了，许多无妄之灾，都可以在谎言中找到源头。

孩提时代是做金色梦的年龄，然而那梦做得比别人好，粉碎得也比别人的更彻底。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过不了几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我们就是“青山绿水，花花世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我在课堂上听得激动不已，小脑袋勾画着电灯电话时代的景象。怕我的父母不知道有这样的好消息，下课赶紧往家跑，告诉他们，过不几天我们就点电灯安电话了。

记得那天晚上，隔壁左右的邻居坐了很多，一屋子人讨论电灯、电话是什么样，讨论了好半天也猜不出电灯是什么东西。不幸的是，电话、电灯的时代并没有来，来的却是制造贫穷的大跃进。

“赶英超美”的年代我还在读初一。因为我们天天听的是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解放”，我以为美国英国比我们还糟糕。忽然听到赶英超美的口号，我才明白，美国和英国可能比我们强。不然的话，怎么要赶超他们呢？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是不愿想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强的。

赶不赶得上美国，超不超得过英国的标准，就是那一千二百万吨钢。上中学的第一年冬天，就到乡下割谷。平常割谷是在秋天，这一年却是冬天。所到之处，大门大多上锁，除了老人和孩子，大人一个不见，都到山里大办钢铁去了。理应早就收割的田里都上了霜，满目稻子都躺在田里，没有发芽的也都腐烂了。

第二年，仍没时间上课，要勤工俭学，去山里养柞蚕。喝的是面糊糊，肚子成天都是饿的。有时见到同学的父母找去，也都如纸糊箴扎的，走路摇摇晃晃。那时最想的，是什么时候吃一顿饱饭。但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看到如下的消息：美国的穷人过圣诞节露宿街头。

全国人都是一样的收入，吃一样的口粮，但，是算富人呢，还是穷人？说富人，吃不饱；说穷人，可是已经被解放了。我相信多少人就处在这种身心双重的痛苦之中。我们不愿承认还在受苦，可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苦。

以后的事情更多。不停地有人饿死，也就在那时候，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忆苦思甜。不停地饿死人，却又不不停地忆苦思甜。我看到了上台忆苦的人声泪俱下，说过去没吃的。过去没吃的就是罪，现在没吃的叫什么呢？那些专门到处控诉的人也不都是被动员去的，有的乐此不疲，因为流一场泪可能捞得着一顿大米饭吃。

大概人们都盼望粮食跟树上的果实一样大吧，接着来了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大运动。我也参加了亩产三十万斤的

种地运动，将地里挖一个大坑，将肥料往里头堆，为了照相，还在麦子上站几个人，以证明那庄稼是多么地了不得。据说，肥料充足就可以达到那个数字。如果是我们的老师这样说，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我出身于农村。但这样说的有农业专家，就叫我不能不相信。专家说谎，竟比文盲说谎更可怕。

所有撒谎的骗子都捞到了好处，制造骗子的官儿们也往上升了，说真话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使被动员胡吹的也有了政治资本，堂而皇之地，成了“劳动模范”。明知是谎言，却不能戳穿。这倒比糊里糊涂更让人伤心。

到了一九六四年，经济情况好些了，便又开始了运动。小小年纪，就参加农村社教，去教育我的父辈们。只因为我们是拿国家工资的，就决定了我们仿佛天生就比农民进步，去教育爹妈们了。那些在经济恢复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干部们，许多都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开除了党籍，制造了多少血泪。

接下来的就是文革了。《人民日报》发社论要我们造反，据说造反是保卫毛主席。我们凭一腔热血，幼稚地以为毛主席正受到威胁，喊喊口号就是保卫了领袖。后来有了一把年纪才明白，不是我们保卫毛主席，而是祈求毛主席保护我们。小草样的人儿，保卫得了谁！而那些坐在上头煽阴风点鬼火的人们，就凭我们的推波助澜差一点儿窃取了国家的权力。

明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却还要大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明明知道现在是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却还要高喊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我们喊得那么真挚，那么诚恳，谁知却是个笑话。而那些靠喊口号说大话起家的人们，却捞到了比经历了长征的老红军更多的实惠。即使农村，那样的人至少也捞

到了比社员多得多的工分。

到了今天，谎言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的阴影。

我们去买东西，卖货的说得天花乱坠，不相信吧，怕人家说的是真的。相信吧，又实在上当上怕了。假烟假酒假农药假化肥，这是最早的做假，曾经让我们大吃一惊。发展到现在，这些方面倒见惯不怪了。因为假东西如春天的苍蝇，越打越多。到馆子里吃甲鱼，据说用避孕药喂的。吃大米，原来是用矿物油抛光才那么好看。看见街上的卤鸡那么好，后来才知道那是抹上化妆品做的假相……吃的喝的用的，假东西让你防不胜防。到底还有没有值得相信的东西？

过去老百姓相信干部，有什么苦处和牢骚就找干部说。记得从土改到社教，工作队动不动开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那些运动有些当然要否定，但作为绝大多数干部们的个人品质，却是绝对信得过的。在老百姓那里吃饭不给钱要受处分，不好好劳动也要批评。因为他们是代表党和人民的公仆，因而自觉地起着模范的作用。即使有的人有那么点儿偷奸耍滑，也表现出不好意思。然而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们的高调哄骗过老百姓，让你分不清真假。有的头天还在作反腐倡廉的报告，第二天就进了班房。有的在台上擂着桌子愤怒声讨贪污腐化，结果他贪的比别人还多。

挖出的蛀虫越来越多，反贪局和检察机关的成绩越大，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却并不值得拍手称快。因为这种局面让好坏难分，我们对真的好干部也抱怀疑态度了，这就是贪官带来的恶果！

高等学府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吧？然而遗憾，有些学校竟也卖假文凭让混文凭者过关。所谓的“扩招”，许多学校理解成了赚钱。只要你交了钱，不让你毕业就会影响生员来源，于是

好的坏的都毕业，而且“表现”都不错。

知识分子应该是清高的，这是过去的印象。今天再到社会上听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恐怕会令知识分子们伤心的。有些人的名片上堂堂正正印着教授副教授，但他谈话的题目却是什么提成、回扣之类的玩意。就说评职称，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使绊子事情没有停过。

“评职称”，前提是你得自己给自己抹粉。政治上我是如何进步，业务上我是如何用功，成果上我取得了哪些了不得的成绩，社会效益方面我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等等。这到底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呢，还是堕落？说觉醒，背后想想自己也汗颜。说堕落，却又是政策性的规定，不如此这般还不行。住房医疗工资都跟职称密切相关，谁敢马虎？至于需要几辈人努力的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怕是不敢一趔趄进去的。

越想越令人丧气，还是不说了吧。写这本书，也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下动的念头。至于这本书能起什么作用，那只好让读者去评论了。